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当代美国十大奇案



## 前 言

人们对一个国家的了解一般始于其奇特之处。透过对特殊性、个性的考察，我们才可能在更深层次上研究一个国家。对于曾经成为本世纪大半个时期的西方国家的楷模、迄今仍是各国赶超目标的美国更是如此。它有哪些奇特之处？这些奇特之处值得我们仿效或借鉴吗？这是读者很自然会提出的问题。

美国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是个谜，很多稀奇古怪的现象发生在美国。大概谁也不会否认，许多立志迅跑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国家，朝野上下、老少贫富、各色人等，大都十分关注美国。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年轻、实力最强、最富有且仍具相当活力的超级大国；这是一个拥有来自世界上 220 多个政治单位的外来移民的国家，其移民活动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影响之深是任何一个国家所难以比拟的；这又是一个商品经济和现代组织管理以及现代化社会物质和文化水平高度发达的国家；这也是一个主张和信奉资产阶级宪政、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国家；这还是一个开放的、政策不断调整的国家，一个人口频繁流动、通讯媒介和交通运输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这是一个自 1894 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居世界各国之首的国家，然而她又是一个被丰裕中的贫困所时刻困扰的国家：这是一个诞生了《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然而又是种族危机愈演愈烈的国家；这是一个物质文明盖世无双的国家，然而又是一个精神文明危机和社会问题重重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宪法之稳定性和随机性、各种法律条文之繁琐、律师数量之多为列国难以匹敌，然而其法律空子和漏洞之多，特别是金钱和利益集团对法律影响之大也是世界上鲜见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登上了超级大国的宝座，美苏冷战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个国家。不过它时而激化，如 1950—1954 年间麦卡锡主义的法西斯思潮泛滥；时而淡化，倡导缓和，甚至主张伙伴相处。本书十大奇案选择的卢森堡夫妇受控为苏联间谍案。反映的是美苏冷战处于激化时期的情况。当时，尽管全世界掀起声势浩大的拯救运动，也难使卢森堡夫妇免遭电刑。类似的间谍案虽然到了 90 年代仍时有曝光，但随着美苏关系缓和以及苏联解体的形势变化，这类案件也就显得不那么沸沸扬扬，不那么具有轰动效应了。

“水门事件”的丑闻曝光导致尼克松总统辞职，这一案件反映了在一个号称法制健全和求真唯实的国家里，权贵们对于法律和真理的践踏。如果不是第四种权力工具——舆论的强大威力，如果不是党派之间相互攻讦，这样涉及代表国家声誉的最高领导人的丑闻显然是难以暴露的。现在人们走进在加州洛杉矶附近奥兰治县的约巴林达尼克松出生地的博物馆，可以看见尼克松掩盖“水门事件”真相的种种图片和录相。和尼克松被迫下台不同，“伊朗门事件”泄露天机，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里根的作为和尼克松的“水门”不过是半斤八两，但是“伊朗门事件”并未导致里根总统的落马，只是由听命执行的中校诺思代过受罪。“水门”丑闻，涉及内政，“伊朗门”丑闻则涉及美国外交，暴露了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美国既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它口头上强调意识形态因素至上，而事实上则是重经济利益的实用主义国家。高估它的意识形态原则性，认为美国是一个反共产主义至上的国家，并不符合实际；当然以为它会信守诺言和国际法，也会上当受骗。从

尊重历史本来面目的角度看，无论是尼克松还是里根都不属正直的政治家之列，事实上他们同样是信奉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哲学的。至于与克林顿在竞选阿肯色州长时经费来源有牵连的“白水事件”，是以“水门”模式结束，还是以“伊朗门”模式了结，抑或出现克林顿根本不受干扰的新模式，由于案情还在深入发展中，还可能在激烈大选前的半年内出现新的奇闻和曲折，因而与其预测它的后果，不如跟踪事态发展，拭目以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法制的天平对每位总统并不会一律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它受制于政治力量的对比。说到这里，我们还注意到“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和“白水事件”都与总统本人密切相关，总统、第一夫人要当众出庭，受制于法，这种情况用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作简单化的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美国，民主机制的运行对于资本集团统治的稳定是有利的，一位总统可以更换、一个政党可以下野，但是上台的另一个总统或政党同样要有利于资本集团统治稳定。这时人们关心的并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资本集团的命运了。可以说，总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随时可弃的替罪羊而已。

在讨论法律问题时人们往往谈到“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根据美国联邦宪法，总统在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前提下，拥有巨大的决策权力；然而一旦违反法律，造成对稳定统治的危害。这位总统同样难逃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在美国历史上，总统不仅是无数政客终生追逐攀援的最高目标，而且也成为某些政客千方百计想要制服的棋子，如果合法手段不成，则改用特殊手段。在美国历史上，总统遇刺身亡的就有四次，有惊无险的总统遇刺事件就更多，大凡这些案件在历史上多半成为悬案或疑案。像肯尼迪总统英年殒命案，迄今的调查卷宗垒在一起，就有一人多高，30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的调查，疑点重重，仍然得不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是美国的法制不健全，还是美国的侦破手段不先进，抑或法律部门和联邦调查局、中央调查局等情报部门不尽心，舆论界各有说法。不过民众大概越来越不相信什么这只是个人所为并非阴谋之类的结论了。至于像里根总统被一个实际上神智健全的青年追星族所刺。本该是十分清楚的案件，却因这是一位巨富的公子，花了一千万美元，法庭居然宣判他是一位精神病患者，送精神病院给予人道主义治疗了事。看来“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在这里变成了“钱”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了。

政治声望不亚于肯尼迪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遇难，同样是一起30年来多少次调查仍然不能说清真正凶手的大案、要案。要说美国政府没有侦破此案的能力是无人相信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是美国政府自有难言之处。还是如人们怀疑的，联邦调查局和白宫确实参与其事？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在这些问题上，美国的法律更多的是保护受控人而不是受害人，如果你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杀人犯有罪，就等于宣布他无罪，这实际上为真正的罪犯利用法律空子逃避惩罚、从而使受害人冤沉大海提供了可能。美国的许多不了了之的疑案与此不无关系。

被称为“世纪审判”的辛普森双命血案是发生在90年代轰动全美国的大案。这个案件从个人涉嫌杀人发展到全美国白黑肤色对垒，对辛普森案的审理早已超越了普通凶杀案，一开始就受到法律以外的各种干扰，包括种族、金钱和电视媒介。人们看到司法独立在美国徒具形式，辛普森用千万美元买来了强大的“梦之队”辩护律师团，它使涉嫌双命血案的辛普森昂头走出法庭呼吸自由空气。在这里“钱”大还是“法”大人们看得一清二楚。一个充

满种族背景的审判，一个有浓重种族背景的陪审团，必然会得出一个富有种族特色的审判结果。辛普森案审判后，大多数黑人高兴，大多数白人不满。因为担心辛普森案件审理会引发种族冲突，克林顿不得不中断他的工作，在电视机前等待法庭的宣判。

十大奇案中两案受害主角是妇女。国际闻名的好莱坞艳星玛莉莲·梦露的猝死是发生在1962年初夏的一条爆炸性新闻，从那时起一直到1996年，30多年来梦露是自杀还是他杀，是个人行为还是另有政治背景，一直是众说纷坛的。梦露自杀说难近情理，梦露与肯尼迪兄弟有染已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公开秘密。梦露曾梦想有朝一日成为肯尼迪家族中的正式成员，这对肯尼迪家族来说是荣辱大事。在这种情况下，梦露成为“牺牲品”一说得到很多人的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梦露死因真相会被揭开。一个负有国际盛名的影星尚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何况千千万万普通美国女性呢。战后美国出现了新的法律诉讼案：“性骚扰”案。它的出现和增多，一方面是美国女性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女性迄今仍遭受某些男性的欺侮和凌辱。但是“性骚扰”的界定是一个法律难题。这里写的是一位女法律教授公开起诉布什总统提名的黑人大法官曾经对她不只一次的“性骚扰”。由于这个案件直接关系到托玛斯能否被国会通过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直接涉及两党势力在最高法院中的力量对比；还由于一开始电视媒介就介入，这样审理的结局自然掺杂了法律以外的各种因素。事实上，这种奇案并非法律本身所能解决的，在报案、办案和判案的背后活动才是真正应当注意的。

美国是一个以政局稳定自诩的国家，自1865年以来的131年里在美国本土上没有发生过战争；自1814年以来的182年里，没有一个外国士兵敢于在美国本土上耀武扬威。美国每年开列一份名单指责一些国家为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美国还以安定的乐土、和谐一致的“避风港”自诩。然而本书中所叙述的1995年4月19日的俄克拉荷马市美国联邦政府大楼被炸惨案、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大楼被炸造成一千多人伤亡的惨案，以及其它屡禁不绝的恐怖活动，宣布了这一神话的破产。俄克拉荷马市政府大楼的恐怖行动并非来自国外的恐怖组织所为，而是来自美国本土。尽管美国政府重金悬赏，至今第二号嫌疑犯尚未归案。值得注意的是作案人选择作案的时间是联邦调查局扫荡韦科庄园邪教两周年之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又恰恰是美国独立革命220周年的纪念日。作案人对邪教极为崇拜，又和美国的反政府武装民间准军事组织有密切联系，这类组织在美国多达300个，声称要对美国政府来一个“革命”。很明显，90年代的美国早已不是一块安定的绿洲，美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保障再次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本书提供给读者的只是许多奇案中有代表性的十个案件。编者的追求在于融知识性、趣味性和科学性于一体，力求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寓思辨于情节，雅俗共赏。本书是由十位从事美国史、世界现代史等专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所撰写的，他们力求运用专业知识为普通读者服务，是提高通俗图书品位的一种尝试。在叙事上注意情节的起伏迭宕，写作时突出一个“奇”字，适当勾画案件的历史背景，同时画龙点睛，以期发人深省。读者可以选择自己所好，阅读每个完整案情，了解个案之“奇”。由个案之“奇”可以窥见当代美国社会之“奇”，从“奇”引发对美国社会的深入了解。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发行部门的大力支持

持，得到了责任编辑庄学君女士的精诚合作，在此致谢。还要说明，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有关这些案件的著作、文章和报道，并且查阅了一些原文资料，这里不一一列举。限于时间和水平，不足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指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黄安年

1996年5月15日

## 当代美国十大奇案

## 原子武器泄密案——卢森堡夫妇受控

### 为苏联间谍

1949年9月9日，美国一架高空侦察机通过远距离测试系统追踪到从西北太平洋上飘来的一大片极为特殊的“云彩”。经过高空取样并通过仪器分析，查明它具有高强度的放射性。此事引起美国有关部门的高度警觉，他们认为这一不寻常的迹象表明苏联在8月底肯定在其内陆某处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应美方的请求，英国方面于9月10日晚上派装有“哈利法克斯”过滤器的飞机沿挪威海岸向东北方向升空侦察。侦察结果再次证实了美国方面的判断。

苏联原子弹的试爆成功，给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当头一棒。它彻底击碎了美国统治者妄图在战后以独家垄断原子弹为讹诈手段而独霸世界的美梦，严重地打乱了美国战后全球范围的战略部署。在震惊恼怒之余，美国当局不相信苏联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依靠其自己的力量就制造出了原子弹。他们认为这一定是苏联间谍窃取了西方原子弹机密的的结果。因此，美国加紧了对原子弹泄密案的调查工作。

## 一、扑朔迷离 原子弹间谍案案中有案

1945年9月5日，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有一个名叫伊果尔·谢尔盖耶维奇·科津科的年轻人携带妻子、儿子逃离了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投向两方。此人是苏联驻加大使馆武官的机要译电员，他的叛逃，在美、加、英3国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通过他提供的大量绝密材料证明，苏联已通过其在美、加、英等国的间谍获取了有关原子弹的许多重要机密。科津科事件令西方统治者深为震惊。加拿大立即逮捕了涉嫌人员13人。美国、英国也分别在国内采取了行动，数人被捕，其中有直接参与原子弹研制的英国原子核物理学家阿伦·纳恩·梅博士。他向苏联方面提供了有关美、英原子弹研究情况的书面报告及用于制造原子弹的主要原料铀233和铀235样品。同时，科津科提供的资料表明，在西方国家内部仍有许多未被挖出的苏联间谍人员。

为了把这些深藏不露而又令人胆战心惊的原子弹间谍挖出来，美国中央情报局费尽了脑汁。1949年夏天，美国特工人员成功破译了苏联的一套密码，然后用此密码分析了数年来截获的大量苏联密码信息。分析表明：苏联方面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实验室获取了大量机密。这说明苏方间谍确已打入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在破译的一份密件上发现了一个英国籍原子弹间谍的线索，说此人是参与了原子弹武器研制的英国科学家，还说此人的一个妹妹在美国上大学。

在洛斯阿拉莫斯原子能研究所工作过的英国科学家主要有两人涉嫌，皮尔斯教授和富克斯博士，其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过的英国人被排除在嫌疑之外，因为原子弹的秘密只有那些直接参与原子弹研究工作的人才有可能接触，并且在当时除了专家之外，一般人对原子弹的秘密也是无法理解的。通过分析，富克斯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的妹妹克里斯特尔·海涅曼正巧在哈佛大学所在地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这同破译的密件线索是一致的。富克斯于1911年12月出生于德国一个路德教派家庭，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由于反对希特勒和纳粹而被赶出德国，流亡到英国，以后一直从事原子物理的学习与研究。1942年，富克斯加入英国国籍的申请被批准，正式成为一名英国公民。1943年底，富克斯同皮尔斯及英国原子弹研制小组成员来到美国，参与了美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共在美国工作了两年半时间，然后返回了英国。

美国联邦调查局与英国的陆军情报部第五科取得了联系，陆军情报部第五科传讯了富克斯。出人意料的是，富克斯竟毫不迟疑地承认他向苏联泄露了原子弹的大量机密。更令英方震惊的是，他们原以为富克斯只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向苏联方面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情报和数据，而实际上富克斯的间谍活动已持续7年之久，当英方调查人员问富克斯究竟给了苏联人哪些情报时，富克斯说，最糟糕的是他已经告诉了苏联人如何制造原子弹。

据富克斯交待，他是主动把原子弹机密提供给苏联的。因为他完全赞同苏联的政策。当时苏联正同德国法西斯进行殊死搏斗，富克斯对于西方盟国听任苏联饱受德国法西斯侵略而坐视不救大为不满，就决定把他所研究的这项内容告诉苏联。

由于富克斯和梅等人向苏联提供了他们各自在曼哈顿工程中的工作情况，美国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经反复研究得出的意见是：富克斯等人提供

的情报使苏联至少提前 18 个月实现了他们制造原子弹的计划。

富克斯被判处 14 年徒刑并被取消了英国国籍。在服刑 9 年后，被赦免。后富克斯来到东德，曾担任东德核物理中心研究所所长职务。

在富克斯事件发生后，美国方面极力想从富克斯身上获取更多的东西，以期顺藤摸瓜，挖出潜伏在美国的更多的苏联间谍。因此，美方对于富克斯在美国期间的接头人这条线索紧盯不放。但据富克斯说，他只知道同他联系的人叫“雷蒙德”，显然这是个化名。“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年男子。圆脸、宽肩，身高 170 公分左右，年纪在 45 岁上下，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化学家，同他在纽约、波士顿和圣菲三个地方会过面。”

单凭富克斯这几句漫无头绪的话就想从茫茫人海之中把一位间谍找出来，简直是大海捞针。富克斯谈到“雷蒙德”为了找他，曾去过住在波士顿的他妹妹家数次，联邦调查局人员找到了富克斯的妹妹海涅曼，海涅曼说：“一个身体结实，大约有四十五六岁的化学家曾到这里来过三次。他是来找我哥哥的，据说他住在费城附近。”

联邦调查局根据“住在费城附近的中年化学家”这一细微线索全力以赴展开了调查。纽约和费城一带所有化学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律遭到调查。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几个重点嫌疑分子被发现了，其中一位是经营化学研究所的布罗斯曼。布罗斯曼同美国共产党关系密切，以前曾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这次调查时却发现布罗斯曼不知什么时候从化学研究所失踪了。为查找此人的下落，联邦调查局决定去调查布罗斯曼以前的助手哈利·戈尔德。戈尔德出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美国，加入了美国国籍，当时他在一家大医院里工作，是个人们评价很高的化学家。在调查中发现，戈尔德以前一直使用化名，“布罗斯曼”就是他的化名之一，这一点引起调查人员极大的兴趣，戈尔德成为重点怀疑对象。“认识这个人吗？”联邦调查局官员拿出富克斯的照片问。“好象是那个窃取原子弹秘密的间谍，英国人。我在报纸上看到过。”戈尔德从容地回答。

联邦调查局官员记起富克斯说他曾与“雷蒙德”在波士顿和圣菲多次接触，便问：

“你去过波士顿或圣菲市吗？”

“我一生从来没有去过这两个地方。”

哈利·戈尔德的回答既轻松又沉着。调查局官员最后搜查了戈尔德的公寓，一无所获。就在调查人员准备失望而返时，猛然间，一个调查官员发现了戈尔德公寓内书架上的一张圣菲市地图。

声称从来没有去过圣菲市的人却拥有一张该市地图，面对调查局官员的追问，戈尔德无法解释这一矛盾，他面色苍白，语无伦次，最后承认了他就是与富克斯多次联系的“雷蒙德”。就在戈尔德交待问题之后不久，1950 年 5 月 23 日，从英国传来消息说，富克斯从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拍摄的一些录相中也认出了戈尔德。联邦调查局人员曾把许多嫌疑分子的照片给富克斯看过，但开始时富克斯并没有把戈尔德给认出来。后来富克斯谈及此事时说，是联邦调查局人员没完没了地硬逼他指认戈尔德，说什么“看在上帝份上，就说他是那个人吧，戈尔德自己都说他是那个人了。”

戈尔德彻底交待了自己所从事的间谍活动，并供出了一些与他联系的间谍。作为对他同当局合作的酬谢，戈尔德在监狱中受到特别好的待遇，吃特殊的伙食并享受其他优待。1950 年 12 月，戈尔德被法庭判为 30 年徒刑。

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努力，戈尔德这个深藏的苏联间谍终被挖出，轰动世界的原子弹间谍案似乎应宣告结束了。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这仅是不断发展的原子弹间谍案的一个序曲而已。由于戈尔德的交待，美国国内又逮捕了数位原子弹间谍，从而引出了美国有史以来最有分歧的案件——卢森堡夫妇原子弹间谍案。

## 二、祸起萧墙 卢森堡夫妇涉嫌入大狱

据戈尔德交待，他奉苏联驻纽约副领事阿纳托利·雅科夫列夫的命令，曾与一位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美军士兵联系过，从他那里获取过原子弹研制方面的一些资料。戈尔德不知道这个士兵的名字，只记得这个士兵异常健壮，大约有5英尺7英寸高，留着又黑又长的头发。他推测这个士兵是纽约市人，因为他们曾商量过在纽约会面的可能性。

在曼哈顿原子弹试制工程实施期间，美国陆军曾派遣一支部队予以协助，这支部队被称为陆军特殊分队。联邦调查局官员于1950年6月3日来到纽约监狱戈尔德舒适的牢房，把一份有20个曾在陆军特殊分队服役过的士兵的名单念给他听。戈尔德留下两个姓名，认为可能是他曾接过头的那个士兵的名字。第二天，特工人员又拿来一些照片给他看，戈尔德从中挑出一张名字叫戴维·格林格拉斯的，觉得他极象在洛斯阿拉莫斯与他接头的那个士兵。但戈尔德补充说：“如果这就是他的话，他比我在1945年见到时有些发胖了。”

1950年，戴维·格林格拉斯28岁，他同妻子鲁思·格林格拉斯及孩子们住在纽约市的一套公寓里。戴维·格林格拉斯同他的姐夫朱利叶斯·卢森堡一起在布鲁克林工程公司工作。1950年6月16日，戴维被逮捕。监禁期间他受到讯问。他说1945年1月间，他从洛斯阿拉莫斯回纽约休假，朱利叶斯·卢森堡同他就原子弹问题进行交谈。戴维表示，他把所知道的关于曼哈顿工程方面的情况都写了下来交给了朱利叶斯，并且曾为他画过一张原子弹草图。朱利叶斯表示要把这些情报送给苏联。当检查官问他与朱利叶斯交换情报时，朱利叶斯的妻子，也就是戴维的姐姐埃塞尔·卢森堡是否在场，戴维肯定地回答说：“她从来没有在场。”

戴维还谈到，1945年秋天，在他要退伍时，朱利叶斯还曾极力劝他在洛斯阿拉莫斯找一份文职工作，留在那里继续为朱利叶斯提供情报。戴维交待说，1950年戈尔德被捕的消息传开后，朱利叶斯曾劝他与鲁思到墨西哥去避难，并愿意为其提供费用。但朱利叶斯的意见被戴维夫妇拒绝。

戴维·格林格拉斯被捕的当天，朱利叶斯也被传讯。但他矢口否认他与间谍活动有任何联系，他承认鲁思曾告诉过他，戴维在洛斯阿拉莫斯一个绝密的工程工作。但他说在原子弹投到日本之前，他根本不知道原子弹为何物。第二天，他被正式逮捕了。朱利叶斯的妻子埃塞尔·卢森堡8月11日也被监禁起来。朱利叶斯有一位大学同学名叫莫顿·索贝尔，是纽约一家仪器制造公司的雇员。联邦调查局发现，索贝尔曾向朱利叶斯提供过一盘35毫米的电影胶片。他在富克斯案件发生后，曾带着全家逃往墨西哥，后来据说又被墨西哥驱逐出境。8月18日索贝尔在英国的得克萨斯州被捕。

戴维·格林格拉斯、卢森堡夫妇、莫顿·索贝尔、哈利·戈尔德以及苏联驻纽约副领事阿纳托利·雅科夫列夫都被联邦陪审团以阴谋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起诉。戈尔德和戴维表示服罪，雅科夫列夫逃回苏联，卢森堡夫妇和索贝尔都不服罪。关于朱利叶斯的妻子埃塞尔，一开始，联邦调查局没有发现她从事间谍活动的任何证据。格林格拉斯夫妇受到传讯时，也没有谈到埃塞尔曾从事过任何间谍活动，直到开庭审判前10天，格林格拉斯夫妇改变以前口供，说埃塞尔也卷入了间谍活动，她曾用打字机为她的丈夫打过原子弹的情报。戴维解释说，这是因为他的笔迹很难看懂，所以要由埃塞尔来进行

处理，但这个说法很难证实，因为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存有数百封戴维写给他妻子的信，字写得都非常清楚。因此，埃塞尔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这场苏联间谍案，联邦调查局提供的罪证确是值得推敲的。另外，从戴维等人交待的内容来看，他的妻子鲁思·格林格拉斯与这起间谍案有很深的关系，但却被免于起诉。因此，该案尚未审理，就已有许多方面令人费解。

### 三、纽约审判 戴维、鲁思夫妇作人证

1951年3月6日，卢森堡夫妇和索贝尔原子弹间谍案在纽约地方联邦法院里开庭审理。法官是欧文·考夫曼，主要公诉人是检察官欧文·塞波尔，另有5个助理检察官，其中罗伊·科恩在麦卡锡时代以对共产党进行疯狂政治迫害而闻名全国。在被告一方。朱利叶斯·卢森堡的辩护律师是伊曼纽尔·布洛克，布洛克的父亲亚利山大为埃塞尔·卢森堡辩护，莫顿·索贝尔的律师为哈曼德·菲利普斯和爱德华·孔茨，戴维的辩护律师是曾在联邦调查局工作过多年的约翰·罗格。

第一个被传到法庭作公诉证人的是马克斯·埃利彻尔。此人曾当过海军军械局的工程师，自称是共产党员，由他出庭为索贝尔参与间谍活动提供证据。埃利彻尔说在索贝尔的引诱下，他加入了一个“基层组织”，并通过索贝尔认识了卢森堡夫妇，知道了他们是积极的共产党员和苏联间谍，但无论埃利彻尔怎么表白索贝尔参与了卢森堡夫妇的间谍活动，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唯一的证据是埃利彻尔有一次与索贝尔一起开车到卢森堡夫妇住宅附近，索贝尔从汽车仪表盘底下的小储物格里拿出一个胶卷盘，显然，索贝尔把这个胶卷盘交给了卢森堡。但埃利彻尔没能看到胶卷盘里装了什么东西，如果是胶片的话，他也无法得悉其内容如何。

随后出庭作证的是鲁思·格林格拉斯。鲁思说，大约在1944年11月的某一天，她打算要到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去看在部队工作的丈夫。临行前，朱利叶斯对她说，戴维在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他要鲁思转告戴维，他希望得到原子弹研制方面的情报。朱利叶斯给了鲁思150美元。鲁思见到丈夫后，把朱利叶斯的话转告了他。戴维当时没有答应，但第二天就把朱利叶斯所需要的情报给了鲁思。鲁思回到纽约后，再把情报转给了朱利叶斯。

证人鲁思说，1945年1月，戴维休假回到纽约。一天晚上，朱利叶斯要戴维写了一些情报，并说由埃塞尔用打字机把它打出来。为了以后交换情报，戴维与朱利叶斯商定了接头暗号，朱利叶斯把一个黄色的果子冻盒的一面撕成两半，一半给了戴维，另一半说将交给前往新墨西哥州同他联系的联络人，交接情报时就以这两半个盒盖为凭证，不久，鲁思就随同丈夫到新墨西哥州居住了。在1945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日，联络人哈利·戈尔德前来找戴维，他拿出那半个果子冻盒并说：“是朱利叶斯派我来的。”戈尔德取走了戴维准备的情报并留下了500美元。

证人鲁思说，到1950年5月，她和当时已从军队中退役的丈夫回到了纽约。5月24日，朱利叶斯来到她家，手里拿着一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纸头版上有哈里·戈尔德的照片以及他作为苏联间谍被逮捕的消息。朱利叶斯极力劝说戴维一家逃到墨西哥去，并给他们留下1000美元作为费用。6月4日，朱利叶斯又送来4000美元，还让她去拍办理护照用的照片。但格林格拉斯夫妇不愿逃走。6月15日，戴维被逮捕了。

戴维·格林格拉斯随后出庭作证。助理检察官罗伊·科恩首先询问的是戴维早年的生活和家庭情况，特别是他同卢森堡夫妇的关系。

“你是否曾与埃塞尔和朱利叶斯就我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体制的优劣进行过讨论？”科恩问。

“是的。”戴维回答。

“检查官先生，我们指控被告的是间谍活动，这同体制优劣相差太远。”

被告律师布洛克提出了抗议。

罗伊·科恩引用了一个被判有罪的纳粹间谍豪普特的案例来抗辩：“当时最高法院维持了原判的叛国罪，他们认为关于被告对德国和希特勒所持的同情态度和对美国持敌对态度的陈述，可以被法庭接受，作为定罪的依据。”

“你是想让证人说明，”法官考夫曼打断他的话，“被告在讨论中对苏联表示过某种好感倾向吗？”

“一点不错，阁下。”

“我认为这是恰当的。”法官考夫曼说。

“他们谈到社会主义超过资本主义时，是否具体谈的是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和我们这样的资本主义？”科恩继续问。

“他们是这样说的。”戴维回答。

“他们喜欢哪一个呢？”科恩坚持说，“他们告诉过你吗？”

“他们喜欢社会主义而不喜欢资本主义。”

“哪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法官考夫曼想把问题问得更明确一些。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当被问到他所从事的间谍活动时，戴维的回答与鲁思所讲基本相同。戴维表示，1944年秋天在洛斯阿拉莫斯、1945年1月在纽约及1945年6月在阿尔伯克基，他曾向朱利叶斯及联络人戈尔德提供过曼哈顿工程的情报。在法庭上，戴维还出示了他新近画的3张原子弹内引爆装置的模型草图。他说这是他凭记忆按照他1945年1月和6月转交给朱利叶斯和戈尔德的草图原样画的。法庭让一个名叫沃尔特·科斯基的物理学家为公证人，此人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参加过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科斯基当庭查看了戴维画的草图，说是“相当精确的。”

对于戴维能在事隔多年后“精确”地凭记忆画出原图以及该图内容本身，布洛克皆提出了置疑。因为戴维在法庭上承认，他没有得过工程学、原子物理学及热力学的任何学位，只是曾在在一个技术学校学过几门功课，且全都不及格。

“那么，这些复杂的原子弹草图，你不用别人的帮助，单凭记忆就画出来了？”布洛克追问。

“是的。”戴维回答。

“隔了四年多的时间你还记得？”

“是的。”

关于戴维所画的原子弹内引爆装置模型草图，其内容的真伪如何，全凭科斯基去评判了，但科斯基在布洛克的盘问下，也一改“相当精确”的结论。说这些草图是“粗略的”，但是已经“足以表明原子弹内引爆装置的主要原理。”

“你的证言是不是说这些草图尽管可能忽略了某些对外国有用的细节，但是专家一看就能知道洛斯阿拉莫斯在研制什么？”法官考夫曼问。

“是的。”科斯基回答。

卢森堡夫妇在当时没有也许不能聘请任何专家担任抗辩人。但如果他们得知20余年后有关专家对这三张草图的结论，卢森堡夫妇不知会作何种感想。1973年，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给两位美国著名的科学家看了戴维画的原子弹内引爆装置模型草图。这两位科学家一位是哈佛大学的化学教授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另一位是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教授维克

托·韦斯科夫。两位科学家面对草图竟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韦斯科夫对草图的评价是“可笑的小孩子图画，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基斯塔科夫斯基的看法是“拙劣无用”，该草图对苏联“几乎没有价值”。

哈利·戈尔德出庭作证时证实说，1945年6月，他奉其苏联上司的命令前往新墨西哥的阿尔伯克基同戴维联系。他从戴维那里取走了一个信封。在数月前戈尔德受审时，他曾讲述他在阿尔伯克基会见戴维时的情景，他说他使用的接头暗语是一个人的名字，好象是“本尼派我来的”之类的话。在这次作证时，戈尔德说接头暗语是“朱利叶斯派我来的。”

戈尔德对于暗语的说法前后不一，确令人困惑不解。后来一位名叫理查德·布伦南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回忆了他参与审理戈尔德的情况。他说，戈尔德原来说的是“本尼派我来的”，后来当戴维审判涉及到卢森堡夫妇时，调查人员问戈尔德：“那句话会不会是我从朱利叶斯那里来或朱利叶斯派我来的？”戈尔德眼睛立即为之一亮：“是的，就是这个名字，不是本尼，是朱利叶斯派我来的。”

#### 四、对簿公堂 定罪原子弹间谍疑点多

朱利叶斯·卢森堡被传唤到证人席上。他说他的父母是俄国的犹太人，后移居美国的纽约，他是在纽约出生的，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他还讲到了如何与埃塞尔·格林格拉斯结婚以及如何于1940年成为美国通讯部队的初级工程师和5年后被遣散的情况。

“1944年11月前后，你是否同鲁思谈过关于从戴维·格林格拉斯工作的地方搜集情报的事情？”

“没有。”

“在1944年年中的时候，你知道戴维·格林格拉斯在何地方吗？”

“我不知道。”

朱利叶斯矢口否认了一切。他说他对于什么果子冻盒盖的事情一无所知，在哈利·戈尔德出庭作证前，他从来没有见过戈尔德其人。他家中是有一个打字机，但他妻子埃塞尔从来没有为他打过什么原子弹情报。1945年9月，戴维是回纽约休过假，但朱利叶斯否认戴维曾向他提供过情报。在把戴维画的原子弹草图给他看时，他否认其内弟曾给他这样的草图。他说他没有学过核子和高等物理的课程，除了在法庭上听到过的之外，他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回事。他更没有劝说过戴维及其全家出逃墨西哥。

在格林格拉斯夫妇出庭作证时，多次提到朱利叶斯向给他提供情报的人支付大笔美元的情况，鲁思还谈到朱利叶斯说有时为了间谍活动常常去高级餐馆里款待他的朋友们。格林格拉斯夫妇认为，卢森堡夫妇在经济上如此富有的原因是苏联为他们的间谍活动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经费，如卢森堡夫妇家中的一个价格昂贵的靠壁桌就是苏联人赠送的，据说这张桌子下面有一个空间，是用来隐藏缩微胶卷的。针对此，检察官对朱利叶斯进行了发问，问他是否常出入于夜总会和高级饭店。朱利叶斯回答说一生中曾去过一次夜总会，那是数年前建筑师联谊会举办的一次晚宴。至于高级饭店，大约在10年前，他曾在一个名叫曼尼·沃尔夫的饭店吃过饭，当时他是一家无线电公司职员，是公司老板邀请他及其他雇员到那里去的。

对于朱利叶斯提到的上述情况，公诉人没有进行反驳。因为朱利叶斯家的经济状况法庭已经调查过了。朱利叶斯以前在部队的收入是每周52美元75美分。离开部队后，他在一些公司里当过雇员，后来还与朋友包括他的内弟戴维一起作过生意。但一直运气不佳，欠了别人不少钱。他居住的公寓每月要付房租45美元75美分。他家中“最好的一件家具”是花5美元买来的一个旧书橱。实际上这个旧书橱是朋友送的，5美元是把家具送到他公寓的运费。朱利叶斯仅有的一件大衣是10年前买的，花了55美元，其他几套衣服最贵的只有26美元。在他结婚后的10年里，他妻子埃塞尔的服装花费大约只有300美元，其中包括一件80美元的“皮大衣”。事实上，尽管他们生活得很愉快，可他们的家庭生活时常近于贫困。在法庭上，朱利叶斯坚决否认他从苏联人那里接受过任何礼物，更没有发生过莫斯科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金钱援助的情况。

朱利叶斯承认，他被从部队里辞退，是因为政府说他是共产党员。但他在法庭上庄严地表示，他“衷心拥护我们国家的宪法，始终忠心于我的国家”，“假如这个国家不得不同任何一个国家交战的话，我将为它而战。”

这时法官考夫曼提出了一个涉及被告与共产党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你

是否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比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

“我不是研究这类问题的专家，法官先生，我也没有说过这种话。”

“你是否曾参加过什么讨论苏联制度问题的小组？”

朱利叶斯援引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关于被告不能自证有罪的规定说：“法官先生，此时此刻我认为应该拒绝回答可能造成不利后果的问题。”

朱利叶斯谈到苏联时曾说：“苏联政府改善了他们国内一向被压迫的人的境遇，在扫除文盲方面已有了很大的成绩，做了很多开发资源的工程，希特勒那个野兽杀死了 600 万与我有共同信仰的人，而我觉得在消灭希特勒方面，苏联贡献出了大部分的力量。这一点使我极为感动。”检察官塞波尔抓住朱利叶斯这段表白，进行了一通刨根究底的追问。

“你刚才说你感觉到苏联政府改善了一向被压迫的人的境遇，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塞波尔问道。

“那只是在报纸上看到的。”

“你看到过什么？”

“在报纸上看到苏联工人的生活水准和居住环境都比沙皇时代好了。”

“你这是在什么报上看的？《工人日报》？”（《工人日报》是美国共产党办的一家报纸。）

“有时候从《工人日报》看到，还有《纽约时报》。”

“还有别的报纸吗？”

“《先驱论坛报》、《世界电讯报》。”

“你经常看到《工人日报》吗？”

“不，不经常。有时候看看。”

“他们建立了很多开发资源的工程，请你把这些工程告诉我好吗？它们在哪里？都是些什么工程？”

“我不是每件事情都知道，不过我知道他们造了一些大水闸。”

“你把水闸当作开发资源的工程吗？”

“是的，水力发电站，工厂……”

“这些水闸藏在哪儿？”

“塞波尔先生，我不懂你问的什么。”

“嗯，老实讲，我也不懂你说的什么。”

被告律师布洛克这时打断了他们之间的谈话：“请法庭注意，我反对在审理原子弹间谍案的法庭上有人进行关于水力发电的闲谈。”

朱利叶斯的妻子、同案被告——埃塞尔·卢森堡被传到被告人席上。埃塞尔介绍说，她是朱利叶斯的妻子，他们有两个儿子，8 岁的米契尔和 4 岁的罗伯特，他们在父母被捕之后现住在一个临时收容所里。

谈到她家中的生活状况时，埃塞尔说家中一点也不富裕。她没有工作，在家中承担着一个家庭主妇要做的一切事情——做饭、洗衣、打扫屋子、缝制衣服以及擦洗地板。除了她生孩子及得病期间之外，她家中从来没有请人干过家务。她宣称她是美国忠实的公民，她否认她及丈夫曾参加过任何间谍活动。她强调说，她的弟弟戴维所说一切都是假的。埃塞尔承认她的确为她丈夫用打字机打过一些材料，但绝对没有打过什么原子弹情报。

检察官塞波尔接着问了她关于一份签名的事。1941 年，埃塞尔·卢森堡曾在共产党候选人彼得·加西奥的竞选纽约市参议员的提名申请书上签过字。对此，埃塞尔予以承认。布洛克对于塞波尔的提问提出异议，他认为这

个签名的文件与本案毫不相干，况且当时在这份申请书上签字的共 5 万多人，埃塞尔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把这份申请书作为证据提出来，去证明埃塞尔犯了间谍罪是不能成立的。布洛克的意见遭到法官考夫曼的拒绝。

在传讯完卢森堡夫妇之后，法庭又传讯了两个抗辩的公诉人。第一位是一个老处女，在 1944 年到 1945 年期间曾为埃塞尔·卢森堡作过打扫房间的雇工。她谈的是前边格林格拉斯夫妇提到过的关于苏联赠给卢森堡夫妇的礼品——一张桌子的问题。她证实说，卢森堡夫妇从梅西那边送来的一个装在墙上的蜗形靠壁台桌是苏联人给的。但她仅知道“那是一个朋友送的礼物”。她说她从来没有往桌子底下看过，也从来没有注意到它有什么反常地方，也就是说她并不能证明鲁思·格林格拉斯关于该桌子有个空洞用以隐藏缩微胶卷的指控。在她见到这张桌子之后不久，就发现它被挪到卢森堡公寓的储藏室去了。

另一位证人叫施奈特，是一个商业摄影师，他在卢森堡家附近开设了一家照相馆。施奈特说在 1950 年 5 月或 6 月的一个星期六，他曾为卢森堡夫妇及孩子拍了 3 打护照照片，由此来证明在戈尔德被捕之后，卢森堡夫妇曾想逃出美国。布洛克律师在两个方面提出了异议：一是对施奈德在事隔这么长时间后能否准确地认定卢森堡一家曾去过他那儿拍照片表示怀疑；二是就算卢森堡一家曾去施奈德那里拍过照片，也不能说他们肯定拍的是护照照片，因为卢森堡夫妇喜欢拍一些照片，保存在他们的影集里，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从卢森堡家中确也找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照片。

在证人、被告及抗辩人皆已传讯完毕之后，检察官塞波尔向陪审团就该案案情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卢森堡夫妇及索贝尔 3 人应当被判罪，因为他们与其他间谍一起，把有关美国国防的情报传达给了苏联。埃塞尔、朱利叶斯、鲁思、戴维、戈尔德等人组成的苏联间谍网窃取了原子弹的秘密并转给了苏联政府。塞波尔认为这是一种最严重的背叛美国的罪行。他指出共产主义与本案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因为共产主义思想使这些人产生一种动机，给他们一种启示，他们才因而进行了现在已完全得到证实的可怕的活动。洛林格拉斯夫妇在 1944 年到 1945 年期间所犯罪行是不可宽恕的。但他们为了弥补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已从实招认了。卢森堡夫妇却一味抵赖，这只能加重他们的罪行。

被告律师布洛克也作了最后陈述。布洛克指出公诉人方面把共产主义同苏联间谍等同起来，被指控为间谍的人，可凭他曾参加过共产党作为证据去定罪，这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其次，就被告人被指控的证据来看，几乎所有证据皆不能成立，因为大多数是口供，缺乏令人信服的物证。就埃塞尔来说，能拿得出来的指控她的物证是一份提名申请书，上面确有她在 1941 年的签名，但当时曾在这个申请书上签名的有 5 万余人，把这件事同间谍共谋罪硬扯在一起，实在是有点说不通。

布洛克还谈到，格林格拉斯夫妇的入品值得怀疑。拿戴维来说，当法庭在审讯她姐姐埃塞尔时，他竟在那儿高兴地发笑，一个满面笑容来出庭作证陷害自己亲骨肉的人是令人讨厌和令人恶心的。实际上，格林格拉斯夫妇是想咬出其他“间谍”以减轻他们自己的罪行。因此，对于他们的话，希望陪审团仔细慎重地加以审查。如果这个原子弹间谍案成立的话，格林格拉斯夫妇也应该算是同案犯，用同案犯提供的单方面证词就能判定被告有罪，这也是不合情理的。

布洛克的总结发言还未说完，法官考夫曼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布洛克先生，你发言的时间已经完了。”

1951年3月18日下午4时，陪审团退庭，法庭休息，到第二天上午再次开庭。陪审团宣布朱利叶斯、埃塞尔、索贝尔三个被告都有罪。三位被告随后被法庭执行官带走，等候判决。判决日期定在一个星期之后。

4月9日，法官考夫曼宣布对三个被告的判决。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考夫曼开了口：

“在杀人案中，一个犯人杀掉的只是他手下的受害者。你们的行为使苏联人比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的预言提前好几年制成了原子弹，依我的观点看，共产党人因此才侵略朝鲜，造成了5万多人的伤亡，天晓得也许还有上百万无辜的人为你们的叛国行为付出代价。的确，由于你们的背叛，你们使历史的进程转向不利于我们国家的方向。每天在我们的周围都有你们的叛国活动带来的影响——因为全国的百姓都忙于为防止原子弹袭击做准备。

“……我夜以继日地思考了很长时间，……朱利叶斯和埃塞尔·卢森堡，赦免你们不是我的权力范围所能办到的，只有上帝才能饶恕你们的所做所为。”考夫曼法官最后下结论说：“本法庭对于朱利叶斯和埃塞尔·卢森堡的判决是根据你们已被证实的罪行而定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判处死刑，在从5月21日星期一开始的一周内执行。”在当时纽约州施行死刑的办法是坐电椅。

对于索贝尔的判决，考夫曼说：“尽管本案的证据表明你所有的活动都与原子弹工程没有关系，……毫无疑问，你是有罪的。”法官判处这位被告法律规定最长期限的徒刑——30年，并提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假释——实际上是无期徒刑。

对戴维·格林格拉斯的判决是第二天举行的。他的辩护律师罗格在法庭上为他争辩说，正是戴维的供词对法庭起了重大作用。出于保护同政府合作的人的考虑，他建议对戴维从轻发落，可判刑3年。但法官考夫曼却宣布判处戴维·格林格拉斯15年徒刑。

## 五、夫妻罹难 布洛克律师奔走相营救

在卢森堡夫妇被判刑的当天晚上，他们被暂时关进了法院的单人牢房，这对一起厮守 10 年的夫妻被人为地分隔开来。为了安慰与鼓励自己的丈夫，有一副好嗓子的埃塞尔·卢森堡唱起了歌剧《蝴蝶夫人》中著名的唱段《他将在明朗的日子归来》。她唱得是那样动听悦耳，关在另外一个牢房的朱利叶斯听到自己熟悉的声音，激动异常，他大声喊：“埃塞尔，再唱另一段！”显然这是他最喜欢听的一段，出自同一歌剧的唱段《啊！愉快的夜晚》。美妙的歌声震撼了所有在场的人。这哪里是戒备森严的牢房，这分明是在豪华的歌剧院倾听一位女高音在尽情地歌唱。所有的人——犯人还有看守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一位看守走到关押朱利叶斯的牢房前激动他说：“朱利，在法庭上他们把你说成是一个卑鄙的家伙，但是在这里，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曾经有过这样深挚地爱他的女人！”

对卢森堡夫妇的死刑已决定在辛辛监狱的死囚行刑室进行，该监狱距纽约市大约 30 里。因移交手续需要用一些时间，卢森堡夫妇被分别关进了纽约市的男女拘留所。但关押女犯的拘留所里没有合乎规定的死囚犯隔离牢房，所以几天后 4 月 11 日，埃塞尔转押至辛辛监狱。辛辛监狱的女犯死囚牢房已有些日子没使用了。监狱方面临时雇了四个女看守来照看埃塞尔。

在狱中，埃塞尔给朱利叶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亲爱的，如你所知，在我们永垂史册的共同旅途中，我已经踏上了第二段行程。看来我已经开始变得成熟了。

我的牢房里有一些书籍。我把在拘留所积攒的五颜六色的明信片（包括你祝贺我生日的那张）一一摆在桌子上的空架上，它们真是赏心悦目。我把孩子们的照片用胶纸贴在一个卡纸做的‘像框’里，他们好像总是甜甜地对我微笑着。我将在自己身上找到我所需要的勇气、信心和对未来的期望，它们将帮助我度过那无比恐怖的、忍受酷刑不敢呻吟的和必须克制着极度思念的日日夜夜。朱利，我最亲爱的，恶魔剥夺了我们甜蜜的生活，我热切期待着结束这一切，回到我们甜蜜的生活中去呀！

“亲爱的，把你转移到辛辛监狱是一个残酷而又带惩罚性的行动。”朱利叶斯在第二天就回了信，“司法部企图在肉体上和感情上对我们施加压力，使我们成为达到他们政治目的的工具，我相信，他们这种做法是不会成功的。”朱利叶斯对其妻子说，他们的律师正在为此事而奔走，如果他不能使埃塞尔回到女犯拘留所的话，“我将竭力争取也被送到辛辛监狱，这样可以离你近一些。”“要对公众隐瞒我们案件的真相和事实是不可能的。人们迟早会了解到真实的情况。许多人已经向我们的律师和我们一家人表示愿意帮助我们。振作起来，要知道，我们并不是孤立的。”朱利叶斯在信的最后说。

对于纽约州地方联邦法院对卢森堡夫妇的判决结果，被告表示不服判决。他们的律师布洛克向纽约巡回上诉法庭提出了上诉。这样，联邦法院考夫曼法官提出的行刑日期便自动延期了。一般说来，向纽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的话，需几个月才能有结果，假如继续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的话，多则可能要用几年时间才能审理完毕。任何一级上诉法院都无权更改原判，但它们可以裁定原判定罪不当，最后再由原审判法官在 60 天之内根据情况重新考虑是否更改原判，也就是说，尽管卢森堡夫妇已被判为死刑，但通过努力，可能还有改判的希望。

尽管布洛克一再向联邦法院抗议，说把埃塞尔关进辛辛监狱死牢的目的是想摧垮她的身心，希望把她送回拘留所，但遭到了联邦法院的拒绝。在此情况下，朱利叶斯提出希望也转到辛辛监狱中去。5月中旬，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朱利叶斯从纽约联邦法院男犯拘留所转到辛辛监狱关押。这样他至少是同他心爱的埃塞尔同在一个屋顶下了，尽管是死囚牢的屋顶下面。

经监狱长允许，朱利叶斯每同可有一个小时与妻子会面。会面对，需有一监狱管理人员和一个女看守在场。他们夫妇会面时，中间要用铁丝网隔开。他们可以在律师室里与他们的律师进行商讨。在死囚牢里的相会使这对患难夫妻心痛如绞，埃塞尔写给朱利叶斯的信中哀婉地表明了他们对生活的渴望以及表明他们无罪的坚定信心，今天读来，仍令人怦然心动：

我多么不愿意离开你那多情的拥抱，我多么悲伤啊！

在走向牢房时，我又是多么万般无奈，步履维艰！牢房在那里静静地、无情地、倨傲地等候着我，它对我的离去无动于衷，又似知道我终将回来而暗自得意。只不过三天前，我们还如饥似渴地唇吻相接，我还在满怀激情地端详着你——我们曾经久久地相爱，曾经有多少夜晚我在你的身边甜蜜地憩息，多么亲捻、多么奇妙的人啊！日子仅仅过去了三天，对我却实在是绵绵无尽的分隔，同你相聚的往事似在梦中……你苍白痛苦的面容，你满含冤怨的目光，你纤柔稚弱的身躯，你受到折磨的明显迹象，都使我悲痛欲绝。

我最亲爱的丈夫！究竟为什么，要使你这样日日惆怅，夜夜悲伤？究竟为什么，要使你这样无尽地渴求，无尽地失望？然而，在这里，我们要重盟鸳誓；在这里，我们的爱要冲破牢房，深扎根，绽新花；在这里，我们要呼吼反抗，我们要挑战……

1952年2月25日，纽约的美国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布洛克的上诉。巡回法院的法官解释说，上诉法院无权对联邦法院的审判进行改判，根据法律，只有美国最高法院才有权从轻改判一个即将生效的判决。于是被告律师布洛克又把卢森堡夫妇上诉美国最高法院。10月13日，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以1票赞同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否决了对于这件案子的复审请求。被告律师仍没有放弃努力。11月17日，他们再次来到高等法院请求复审，但高等法院坚持拒绝调审案卷。高等法院解释说，复审地方法院的审判案卷主要是巡回上诉法院的职责，高等法院无权改判一个地方联邦法院的判决。

1952年11月21日，在最高法院再次拒绝被告律师对该案复审请求4天后，联邦法院法官考夫曼宣布对犯人执行死刑的日期定于1953年1月12日。

1953年1月3日，卢森堡夫妇的两个儿子被人带到了辛辛监狱。死刑按预定日期再有9天就要执行了。这是为了让卢森堡夫妇在被处决之前再见孩子一面。10岁的米契尔和6岁的罗伯特在其父母被关进死囚牢房的一年多时间里，精神受到很大打击。生活上更是倍受煎熬。两个孩子的的外祖母特谢·格林格拉斯年迈体弱，无力在生活上照顾他们，两个孩子在纽约一家儿童收容所里呆了一年。面对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卢森堡夫妇心如刀绞。在两个小时的见面时间里，朱利叶斯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让罗伯特骑在他身上在屋子里飞跑，又陪同儿子一起画画，讲故事，儿子用小胳膊搂着朱利叶斯的脖子，使劲地亲他的脸。对于心神不定显得极为忧虑的米契尔，埃塞尔细致耐心而又坚强地给他解释他想知道的一切问题。两个小时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送走儿子后，朱利叶斯悲伤到了极点，他在给律师布洛克的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当我再回到牢房的孤寂中，牢房门在我身后呼地一声关上时，我承认，我的精神垮了。由于孩子们内心受到了深深的创伤，我竟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我背朝庭院，面对水泥墙站着，让撕心裂肺的痛苦化作泪水涌出来。所有这一切都是这样的卑鄙残暴，惨无人道。当心点，暴君们，你们将为你们的暴行受到应有的惩罚！

为了拖延时间，使他们有尽可能多的时间为自己改判寻求哪怕是一丝的希望，被告及律师施出了最后一个办法，那就是请求美国总统运用其仁慈的特权，对该案出面干预，他们向总统呈上了请求改判的请愿书。在被告向白宫上诉期间，法官考夫曼不得不同意再次延期对卢森堡夫妇执刑。

布洛克律师把卢森堡夫妇的请愿书送交白宫，在请愿书中，卢森堡夫妇再次全面而又详细地否定了政府所指控的他们与从事原子弹间谍活动有联系的每一个证据。恰好在此时，白宫主人刚刚易人，由民主党人艾森豪威尔接替了共和党人杜鲁门的总统职务。

在等候总统答复期间，1953年1月19日，埃塞尔的母亲特谢·格林格拉斯来到辛辛监狱探视了她的女儿。特谢劝女儿说：就算是戴维撒了谎，可只要卢森堡夫妇承认有罪，就不会被判处死刑，为了他们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是委屈一下自己吧。埃塞尔立即态度坚定他说：“妈妈，您为什么要让我为一桩从来没有干过的罪行而受惩罚，让我用我自己和我丈夫、孩子的名誉受诽谤为代价而去说谎呢？我这么做不是犯了伪证罪吗？”

新总统艾森豪威尔在2月11日驳回了请愿书，在驳回请愿书的声明中，艾森豪威尔说：“他们为之被判有罪并且受到判决的罪行，比夺走了另一公民生命的罪行更为严重。他们的罪行是有意背叛整个国家，很可能会造成成千上万无辜人民死亡的恶果。正当渴望自由的人们为自由事业战斗和流血牺牲的时刻，这两个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出卖了自由事业。”

1953年2月16日，联邦法院法官考夫曼再次宣布对卢森堡夫妇施行死刑的判决，时间定于3月份的第二周内执行。2月17日，被告律师布洛克再次向纽约上诉巡回法院提出延期行刑的请求，以使他在3月底之前提出新的证明被告无罪的证据并证实摄影师施奈德等人的证词不实。纽约上诉巡回法院予以批准。行刑日期再次被推迟了。

## 六、笑赴黄泉 拒伪证视死如归世人赞

卢森堡夫妇间谍案从一开始审理就引起了美国社会甚至世界各地的极大关注。对于政府提出的用于指控被告的证人与证据，许多人颇有微词，认为卢森堡夫妇无罪的大有人在。在卢森堡夫妇及律师布洛克上诉期间，许多报刊杂志纷纷刊登文章为卢森堡夫妇鸣不平，许多知名人士和社会团体也都对卢森堡夫妇表示同情和声援，并在社会上掀起一股要求复审卢森堡夫妇案的运动。1951年年底，记者鲁本在《国民前卫》上发表文章指出：“原子弹间谍案实际上在卢森堡夫妇卷入之前就已定了案。由于卢森堡夫妇的左翼政治观点，政府就拿他们杀一做百，这里面有政治目的。”鲁本还发起成立一个确保公正审理卢森堡案件的全美委员会，他担任了委员会代理主席。

1952年1月8日，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洛斯阿拉莫斯曼哈顿工程的负责人之一——哈罗德·尤里博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支持卢森堡夫妇的信，信中对该案所有的证人证词都提出了置疑，并对同案犯鲁思·格林格拉斯没有受到审判表示吃惊。在该信的最后，尤里博士说：“我们与苏联专制政府正进行着一场冷战，我们希望赢得世界上所有好心人们的赞同与忠诚。假如将卢森堡夫妇处以死刑，有可能表明美国处死了两个无辜的人，而让一个有罪的人完全逍遥法外，这难道不是很令人难堪的吗？还有，要记住，在某个地方，还有了解事实真相的苏联代表存在。”五天之后，爱因斯坦也致信杜鲁门总统：“我的良心驱使我努力劝您减轻对于朱利叶斯和埃塞尔·卢森堡的死刑判决，我向您提出这一请求。是出自我的同事尤里在他信中提出的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此案还引起了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关注，1953年初，教皇专门派代表向美国司法部提出了对卢森堡夫妇案进行复审的请求。

1953年5月25日，美国最高法院撤销了纽约上诉巡回法院的延期行刑的裁定，并再次拒绝调审案卷。6月1日，纽约州地方联邦法院再次宣布对卢森堡夫妇实施死刑的时间定于6月18日晚11时。这一天是卢森堡夫妇结婚14周年纪念日。

这已经是第四次更改行刑时间了，看来这也是最后一次更改了，因为几乎能想到的所有救援办法都已全部采用了。死神离卢森堡夫妇已越来越近。6月2日这天，辛辛监狱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即联邦监狱局局长詹姆斯·贝内特，他是美国司法部长布劳内尔私人代表的身份前来会晤卢森堡夫妇的。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贝内特分别同卢森堡夫妇进行了会晤。

在会见朱利叶斯时，贝内特提出，如果现在朱利叶斯想同政府“合作”的话，为时还不太晚，可以通过他来转达。而只要朱利叶斯答应了这一点，就可以考虑给卢森堡夫妇减刑，对此，朱利叶斯动情地申辩说：

“我们无辜地在死囚牢房坐了两年多时间，我的家庭经受了巨大的折磨。我妹妹的身体垮下来了，我那上了年纪的可怜老母悲痛欲绝，我的孩子们也尝到了许许多多感情上、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到这时候，你还对我们谈这些，记住吧，贝内特先生，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那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的孩子们和我的亲属的故土。我们不愿意使她美好的声誉蒙受耻辱。不论是讲公正还是讲一般的道理，我们都应该被允许活下去。我觉得你应让司法部长建议宽赦，这样才公平、人道。实际上这次起诉是借用‘共产党原子弹间谍’大捞政治资本，我和我的妻子成了替罪羊，成了因冷战激起的政治争

论中抛来抛去的稻草。”

朱利叶斯在回答贝内特的提问时，接着说：“我们没有受到公正的审理，而是受到了诬陷。现在，你要我们承认这个大骗局是真实的，这绝对办不到，至于判处我们死刑，这是我们决不能接受的，即使我们犯了所谓间谍罪，也不应该判我们这么重的刑。从我们国家以前的实际作法来看，放纵了纳粹战犯和法西斯战犯。从来没有对叛国者和间谍处过死刑，却第一次把卢森堡夫妇当作有史以来罪行最严重的犯人——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你说这样处理公平吗？此案的全部事实、审判案卷和判决都表明是高压统治的一种手段。只有人道的、公正的和正当的行动才能挽救我们的生命。”

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争辩后，贝内特对朱利叶斯同政府“合作”的可能性完全失去了信心，但在最后，他仍劝朱利叶斯说：“朱利叶斯，即使审判不公正，处刑过重，而且所有的证据都值得怀疑。但你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与华盛顿的官员们合作，并使他们相信你的合作，只有如此，他们才有了要求对你实行宽赦的依据。”

朱利叶斯态度坚决地摇了摇头。

贝内特在会见埃塞尔时，同样也劝她与政府“合作”，并希望埃塞尔谈一下朱利叶斯所进行的间谍活动，埃塞尔表示她在法庭上已把真实情况都讲了，她不知道其他任何情况。贝内特指出，美国政府掌握着一些不宜公开的材料，能够说明对卢森堡夫妇的指控是正确的，因此只有卢森堡夫妇愿意与政府合作，政府才可能考虑减刑的问题。

“我不可能知道他们是否掌握什么材料，”埃塞尔十分严肃地回答，“如果你根据没有在法庭上亮出来的证据劝说我承认我曾庄严宣誓说我不知道的活动，那么，即使真有那些所谓的证据，那些证据的内容真实性也很成问题。”

贝内特同卢森堡夫妇的谈话，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他徒劳地叹口气，离开了辛辛监狱。第二天，卢森堡夫妇通过他们的律师向新闻界公布了这样的声明：

昨天，美国司法部长向我们提出了一笔交易。他告诉我们说，如肯与政府合作，我们的性命就可以保全。

政府要我们否认自己清白无辜的事实，等于说政府也承认他们本身就不相信我们有罪。我们不会帮助政府粉饰那种陷入于罪和野蛮判刑的肮脏行为。

我们庄重地宣布，从现在起直到永远，甚至在死亡的痛苦之下，我们都绝不被迫承认假证据，也不会被迫屈服于暴政，放弃我们作为自由的美国人的权利。

我们对真理、道德和人类尊严的崇敬不是能用金钱收买得了的。正义不是谁出钱多就卖给谁的装饰品。

如果将我们处死，那就是残害无辜，美国政府将为此蒙受耻辱。

不论我们是否活着，历史都将记载我们是我国历史上最大冤案的受害者。

1953年6月6日，离真正处决的日子只有12天了。为了推翻原判，卢森堡夫妇及他们的律师们在顽强地努力着。这天，被告律师再次上书纽约州联邦法院，要求考夫曼放弃原有的裁决，准予重新审理卢森堡夫妇案。理由是他们已拥有主要起诉证人戴维和鲁思证词不实的新证据。

第一项证据是那张下落不明的靠壁桌。格林格拉斯夫妇在证词里说这张

桌子是苏联人送的贵重礼品，是用来存放微型胶卷的，在审判时没有当庭展示。据卢森堡夫妇说，不清楚到底传到什么人手中去了，被法庭认为大概在1950年10月中旬已经随其他家具一起卖了。1953年3月《国民前卫》周刊的一位记者重新发现了这张桌子。原来这张桌子和孩子们的玩具一起存放在朱利叶斯的母亲索菲·卢森堡在昆斯的房子里。在审判时，朱利叶斯说这张桌子是从梅西商店买的，价格极为便宜，共花了21美元。而检察官则说其价值极为昂贵。在这次发现了桌子后，记者专门去梅西商店核对此事，可惜的是梅西商店的旧帐目已全部销毁，但该商店一位有经验的老雇员在看到这张桌子的照片之后说，这张桌子是在1944年的某一天被人买走的，连同营业税一共20美元37美分。卢森堡夫妇，布洛克以及朱利叶斯的三位家属和《国民前卫》记者部对这张桌子的真实性情况作了郑重的保证。

第二项证据是从格林格拉斯夫妇的辩护律师约翰·罗格那里复制下来的审判后秘密备忘录摘要。备忘录记载了戴维·洛林洛拉斯同联邦调查局的人两次会谈的情况。备忘录中说的情况表明。虽然说朱利叶斯同这个案子关系密切，说他说服鲁思去向戴维索取情报，还安排戴维与一个人在小汽车里会面，但既没有说明朱利叶斯要的是哪一类情报，也没有说他接到过什么情报。备忘录中没有谈到朱利叶斯在1945年1月和9月从戴维那里收到原子弹或其他情报，更没有安排格林格拉斯逃跑的计划，以及向他们提供5000美元，没有提到戴维与戈尔德在阿尔伯克基的会面，没有提到那个一撕两半的果子冻盒以及“是朱利叶斯派我来的”作为接头的暗语。至于埃塞尔，戴维在这两次同联邦调查局人员的谈话中没有谈到她曾参与间谍活动。

第三项证据是戴维的弟弟伯纳德提供的，伯纳德在一份宣了誓的证词中说，戴维被捕之前确实从洛斯阿拉莫斯偷拿了铀样品，但戴维告诉他说已把这份铀样品扔到纽约的东河里去了。

对于这三项新证据，考夫曼法官一一进行了辩驳。他认为不能证明被告律师现在找到的桌子就是以前卢森堡夫妇曾经在房间里使用过的那张。因此，不能说政府使用了“伪证”。至于罗格的备忘录，布洛克不能清楚地解释他是如何搞到的，因此，备忘录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再加上戴维前后与联邦调查局人员谈话有七八次，两次会谈的备忘录自然不能包括戴维同调查局人员谈话的全部内容。最后，考夫曼反驳了布洛克关于戴维盗窃铀搞间谍活动与卢森堡夫妇无关的论点，他认为单就戴维把盗窃的铀扔到河里这一举动，并不能证明卢森堡夫妇与原子弹间谍案无关。法官考夫曼在他的书面裁决中最后说：

“值得再次强调指出的是，经过这么多年，政府的证人没有一个宣布撤回自己的证词。以前我说过，现在我还要说，被告所犯罪行铁证如山，目前提出所谓新的证据丝毫未能削弱政府提出的证据的可靠性。本庭驳回以被告卢森堡夫妇的名义提出的申请。”

哈罗德·尤里教授在旁听了裁决之后，感受颇深，他坦率地对《纽约日报》的记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在我目睹了在考夫曼法官主持下的法庭上的一切情况，我相信卢森堡夫妇是无罪的。我在法庭上看到的不是考夫曼，而是麦卡锡……”

6月9日，卢森堡夫妇的辩护律师们来到纽约巡回上诉法院，要求他们对考夫曼法官的裁决提出申诉准备期间暂缓行刑。法院要求他们当时就提出申诉。于是律师们尽其可能地提起了上诉。第二天又补充了一份法律问题的

说明。6月11日，纽约巡回上诉法院维持考夫曼法官的裁决并拒绝延期对卢森堡夫妇的行刑。

6月12日，被告律师们向最高法院提出了延期行刑的申请，以便有必要的时间起草和提出一份根据新证据复审的被告申诉书，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律师申诉书，其中两份是对卢森堡夫妇被判处死刑的法律依据提出置疑的。6月13日，最高法院接受了这份申请书。6月15日，最高法院宣布：被告律师的申请书被以四票对三票否决了。随即，最高法院宣布夏季休庭。道格拉斯法官作为值班法官留在最高法院负责会见被告方面的律师。

看来一切希望皆已落空了，可就在这关键时刻，田纳西州的一个律师法默从法律角度提出了改判此案的新论据。理由是卢森堡夫妇是根据1917年的间谍法被判死刑的，这个间谍法上有死刑的规定。而实际上这次法官对卢森堡夫妇判以死刑的理由是他们两个所犯的罪涉及原子弹的秘密问题，在1946年美国制定的原子能法另有明确规定。根据原子能法的规定，类似案件最重的处罚也只是20年徒刑。法默急速赶到纽约面见考夫曼，陈述了这一论据，希望从轻判处卢森堡夫妇。考夫曼指出法默的行为没有得到卢森堡夫妇和律师们的授权，故拒绝接受他的申诉，言外之意，希望法默不要多管闲事。法默对此没有灰心，他找到布洛克，然后两人来到美国最高法院面见道格拉斯法官。道格拉斯表示同意考虑这一新证据。

请求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卢森堡夫妇实施宽赦的电报、信件、电话源源不断地从美国各地、从世界各地涌入白宫。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1953年期间，白宫收到了关于请求宽赦卢森堡夫妇的电报大约20万封，仅在6月16日至21日的6天，就收到电报2.15万余份。科学家尤里给总统打电话说：“事情本来就够清楚的了，新的证据更明白地证明公诉人的诉讼根本不合逻辑，它所依据的显然是破绽百出的伪证。”尤里曾经试图会见司法部长，没成功，他还一再要求会见艾森豪威尔，也被拒绝。在6月16日，艾森豪威尔同一个4名牧师组成的代表团见了面，他们是数千名在宽赦请愿书上签过字的牧师们的代表。艾森豪威尔对代表团表示，卢森堡夫妇的间谍活动同朝鲜战场美军的伤亡数字是相联系的，在他看来，卢森堡夫妇是为了金钱而从事间谍活动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很显然没有看过该案的原判纪录就匆匆得出了他的结论。因为他连该案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在他写给在朝鲜战场的儿子的信中，总统竟然认为主谋是埃塞尔·卢森堡，而纽约地方联邦法院在审判时是一直认定朱利叶斯·卢森堡是主谋，埃塞尔只是丈夫从事间谍的助手而已。

根据律师法默提出的法律新证据，6月17日上午，道格拉斯法官代表最高法院批准对卢森堡夫妇的死刑延期执行，并要求纽约地区联邦法院考虑是否在此案中援引原子能法。

司法部长布劳内尔得悉此事后大为不满，他要求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召集最高法院成员重新开庭复审，并宣布撤销道格拉斯法官延期执行的决定。首席法官文森同意这一意见，下令第二天即6月18日中午重新开庭。所有9位法官都于18日准时来到最高法院，他们听取了律师们的申诉，并进行了商议。在下午6点过后，法院发出通告，宣布休庭，明日开庭再议。

对卢森堡夫妇执行死刑的日期本定于6月18日晚11时。18日这天，辛辛监狱的官员们已经做好了用电椅行刑的一切准备。他们一从广播中听到最高法院休庭的消息，竟然为卢森堡夫妇这对死囚犯奔走相告。而卢森堡夫

妇得此消息之后也是“喜出望外”。

6月19日上午，白宫就卢森堡夫妇案专门召开了内阁会议。对于这个搞得国内外舆论沸扬不止的案件，总统召集内阁成员共商对策。艾森豪威尔让司法部长布劳内尔介绍一下该案的情况。司法部长说道格拉斯批准对卢森堡夫妇延期行刑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除了已在法庭上公开的证据之外，政府还掌握着证实卢森堡夫妇有罪的材料，但因国家安全需要不宜在法庭上公开。这些不宜公开的证词表明，卢森堡夫妇是在这里直接与苏联人联络的谍报网的头目和中心人物。在最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支持对卢森堡夫妇的死刑判决。经内阁会议一致同意，艾森豪威尔于当天下午发表了一项声明：

本案业已在国内外严肃的人们心中引起严重的忧虑——尚且不论法律上的考虑。对此，我并非无动于衷。

我只能说，由于卢森堡夫妇无法估量地增加了发生原子弹战争的可能性，他们可能已经判处了全世界成千上万无辜人民的死亡。处死这两个人固然是件很严重的事，但更严重的事情是要想到数百万可能直接归咎于这些间谍所作所为的死者。

事实已经证明，那些敌视民主的人已经犯下了的可怕罪行，就象卢森堡夫妇的罪行一样；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运用民主的法律程序来保护这些已被定罪的间谍的生命，美国的法庭在它们庄重的审判中已经裁决了这些间谍有罪并作出了公正的判决。在此情况下。我是不会介入此事的。

6月19日中午，最高法院在经过预先秘密磋商之后，继续开庭。首席法官文森宣布了通过投票作出的裁定。法庭以6票对3票的表决结果撤销了道格拉斯关于延期行刑的裁定。理由是1946年的原子能法并不能取代以前的间谍法，而且被告主要的活动都是在1944年和1945年，即原子能法制定之前。

最后一线希望都已破灭了！但为了挽救卢森堡夫妇，布洛克律师仍在顽强地努力着。他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拍发了一份加急电报。恳请仁慈的总统能够听取一次他及他的同事们对卢森堡夫妇案的意见，并且指出，最高法院的表决行为是草率的，因为他们从未审阅过该案全部的材料。时间已是19日下午，布洛克已没有时间耐心地等候总统对电报的回音了，他火烧火燎地来到白宫门前，要求面见艾森豪威尔，但警卫拒绝他进入白宫，他要求使用警卫电话，警卫同样予以拒绝。布洛克匆匆回到自己办公室，但他每次拨通白宫电话，得到的回复总是“占线”。

司法部长亲自下令将处死卢森堡夫妇的时间定于19日晚上8点。联邦法院执行官在把行刑时间通知监狱长后，整个辛辛监狱便忙碌起来，多日不曾使用的死囚犯执行室的所有器械都被检查了数遍。武装看守在联邦警察的协助下封锁了通往辛辛监狱的所有路口，与此同时，华盛顿司法部与辛辛监狱之间的电话保持高度畅通，以备卢森堡夫妇或他们中的一个会表示与政府“合作”。

在这天下午大部分时间里，卢森堡夫妇被允许呆在一起，但他们之间仍然必须用铁丝网隔开。改判或减刑的期望已不复存在，在这诀别的时刻，卢森堡夫妇反而冷静下来。他们给其律师与亲爱的朋友布洛克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对布洛克答应抚养他们的一对宝贝儿子表示由衷的谢意：“孩子是我们的掌上明珠，是我们的骄傲和宝贵的财富，希望你能真心地爱护他们，永远保护他们，使他们得以健康地长大成人……决不能让他们败坏了我们清白无辜的名声。”这天下午，他们还给他们的儿子们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

最最可爱的宝贝，我最亲爱的孩子们：

直到今天早上好象我们还有重逢的可能性，然而现在已是不可能的的事情了。我多么想让你们了解我所知道的一切呀。遗憾得很，我只能写下几句简单的话，余下的一定会由你们自己的生活教给你们的，就象我的生活教会了我一样。

当然，你们首先会为我们感到巨大的悲痛，但感到悲痛的不仅仅是你们自己，这就是对我们的安慰。也终将是对你们的安慰。

你们还必须相信人生是有价值的。振作起来！即使是现在，在死神一步步向我们逼近的时候，我们深深了解人生的价值，这个信念支持我们战胜了刽子手！

生活一定会教导你们，善是不能在邪恶中得到充分发展的。要获得自由，要获得真正令人满意和有价值的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有时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你们应感到慰藉的是，我们是安详的。我们最深刻地理解到，人类文明还没有发展到为了生活无需失去生命的阶段。当得知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的时候，我们感到很宽慰。

我们希望能得到和你们一起生活下去的极大快乐和喜悦。你们的爸爸在这最后的时刻和我在一起，他把他的心和心中全部的爱都奉送给了他最心爱的孩子。永远记住吧，我们是清白无辜的，不能欺偏自己的良心。我们用尽全力紧紧地拥抱你们，吻你们。

最钟爱你们的爸爸朱利叶斯妈妈 埃塞尔 1953年6月19日19日下午7时20分，该到诀别的时刻了。朱利叶斯用手指透过铁丝网抚摸了埃塞尔的脸颊，向她做了最后的告别，然后随着看守来到一个特殊的单人牢房，他将在这里被施以电刑。看守们撕开他的一条裤脚管，剃去他头顶的长发，为实施电刑作准备。

8点整，朱利叶斯在一位年轻犹太教教士的引导下，走向死囚执行室。犹太教教士面色庄重，低吟着《圣诗》：

“是的，纵然我在死亡的幽谷漫步，我也不惧怕魔鬼，因为你与我同在，……你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设宴，在我的头上敷油，我的杯爵满满……”

行刑室里挤满了人，大约有40余位。有记者，有监狱官员，有行刑的刽子手以及联邦法院的执行官。电话已通到了行刑室，执行官在墙边的电话机旁站着，期盼着朱利叶斯在最后关头“回心转意”。

8点零2分，看守们把朱利叶斯带到了阴森森的电椅上。他们把他捆好，把电的一极接到他的脚上，把连着另一电极的头盔放下来，压到他刚剃过的头顶上。朱利叶斯顺从地听任看守们摆布，神色从容，目光镇定地注视着前方，嘴上带着一丝笑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行刑的刽子手合上了电闸。

刹那间，一股烧人肉的焦糊味和大小便的恶臭味充满全室。8点零6分，法官宣布朱利叶斯死亡。尸体被移到旁边的房间，将按照惯例进行尸体解剖。

过了几分钟，年轻的犹太教教士与两名女看守来到了关押埃塞尔的单人牢房。

“他死了吗？”埃塞尔问。

“是的，他已经死了。”

埃塞尔半晌不语，呆呆地凝视着墙壁。

“埃塞尔，”犹太教教士打破了这死一般的沉寂，“看在孩子们需要你

的份上，你是不是就说几句还能挽救你的话？难道这场悲剧一定要演完吗？”

“没有什么好说的，”埃塞尔回答，“我已经准备好了。”她随着犹太教教士走出牢房，向死囚行刑室走去。在经过她丈夫那间静悄悄空荡荡的牢房时，她忍不住回过头深情地望了几眼。

在电椅之前，埃塞尔脸上露出了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她向站在她身边的女看守伸出双手，在女看守的面颊上留下了轻轻的一吻。埃塞尔受刑的时间比朱利叶斯长一些，当给她丈夫使用的同样强度的电流通过她的身体后，法医用听诊器检查。发现她仍旧活着，因此又给她通了两次电流，“从她的头部一次又一次冒出了一缕缕可怕的青烟。”8点16分，法官宣布埃塞尔·卢森堡死亡。

《纽约时报》报道：卢森堡夫妇“镇静自若地死去了，使得目击者很惊讶。”

## 七、天下奇案 夫妻间谍疑案众说纷纭

卢森堡夫妇的葬礼是在布鲁克林的殡仪馆举行的。有数万人和他们的两个妹妹参加了仪式，卢森堡夫妇的两个孩子没有在场。

在葬礼上，布洛克律师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我把谋杀卢森堡夫妇的罪过归咎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布劳内尔先生（司法部长）和埃德加·胡佛（联邦情报局局长）。的确，拉动电闸的不是他们。但是他们指挥了那个拉动电闸的刽子手。这不是美国的传统，不是美国人的公正原则，也不是美国人光明磊落的精神。这是法西斯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杀害了卢森堡夫妇。我们如果忘记了这个教训，我们就是卑躬屈膝，就是跪着求生，就是畏缩害怕。精神错乱，没有理性——这些就是那些统治我们的人的一部分感情。”

两辆灵车缓缓地驶出了布鲁克林殡仪馆，数百名前来送行的人们驾着各自的汽车跟在灵车后，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长龙。卢森堡夫妇的遗体被安葬在长岛附近的韦尔伍德公墓。朱利叶斯 35 岁，埃塞尔 37 岁。

1953 年 8 月初，布洛克还没有来得及办好他充当卢森堡夫妇两个儿子监护人的手续，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时年 53 岁。后来，默罗波尔·阿贝尔夫妇收养了这两个孩子。阿贝尔夫妇在纽约市当教师，当卢森堡夫妇还在坐牢时，他们就曾提出为这两个孩子提供一个暂时居住的密子。两个孩子都改姓养父母的姓，不过他们仍不时去看望他们的祖母——朱利叶斯的母亲，并常在那里住上些日子。这两个孩子日后也都成了教师，长大后都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安了家。

从收审到被处决，卢森堡夫妇共在狱中住了 3 年多时间。直到被处决，卢森堡夫妇也没有承认他们犯过罪。卢森堡夫妇间谍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分歧的案件。一直到今天，关于卢森堡夫妇间谍案还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以考夫曼法官等人为代表，他们站在政府一边，坚决认为他们是有罪的。除了当时法庭上提供的证人证据之外，政府方面还多次提到他们持有不宜公开的其他证据。从后来联邦调查局公布的一些材料看，朱利叶斯在纽约联邦拘留所候审拘押期间，曾向同牢的一个囚犯塔塔科讲过一些情况，可以算是他在战后从事秘密间谍活动的证据。朱利叶斯不知道此人是联邦调查局的“密探”，因此毫无保留地向他谈了很多情况。塔塔科把从朱利叶斯那儿了解的情况都向联邦调查局作了汇报。但从公布的材料看，朱利叶斯同塔塔科的谈话只谈到朱利叶斯在战后仍从事共产党的活动，也谈到想出逃墨西哥的事，但没有任何谈话内容涉及到原子弹秘密。并且政府公布的塔塔科的证词受到了许多人的指责，他们认为这个证人是“不可靠的”，因为联邦调查局曾在正式文件中把塔塔科说成是“一个不能判断是否可靠的提供情报的人。”尽管几个月后，联邦调查局又收回了这一看法。还有记者披露说，二战后联邦情报局曾成功地破译了苏联人的密码通信，其中一份密件上谈到在纽约的一个苏联夫妻间谍组的情况，其中还谈到女方的弟弟也参与了间谍活动。在审讯卢森堡夫妇时，为了保护绝密的情报来源，美国政府没有出示这份证据。值得指出的是，这份密件并没有提到卢森堡夫妇或烙林格拉斯的名字，并且到底有没有这份情报，至今无明确答案。

反对判处卢森堡夫妇死刑的舆论一直就没有平息过。天主教教皇、科学家爱因斯坦等许许多多社会活动家、知名人士及社会团体都曾致书美国总统，请求对卢森堡夫妇进行宽恕。人们强烈地认为，不管卢森堡夫妇有罪还

是无罪，即便从仁慈角度考虑也不应判处他们死刑。而令人失望的是美国政府却采取了迥然相反的态度，不管卢森堡夫妇有罪还是无罪，只有他们先承认有罪才考虑予以缓刑。许多美国律师及法官对政府指控卢森堡夫妇间谍罪的证据提出了异议，政府的这些证据几乎全都是根据自首同案犯所提供的证词，很少有什么象样的物证，而且法庭上主要是由弟弟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姐姐、姐夫有罪。审判官居然把共产党员同苏联间谍划等号，用曾是共产党员作为朱利叶斯从事原子弹间谍活动的证据；更有甚者，法官及艾森豪威尔皆把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的死亡归罪于卢森堡夫妇，这诸多不正常的情况不能不使人思考对卢森堡夫妇死刑的判决是否公正。

在卢森堡夫妇被处决后的几十年里，他们这桩原子弹间谍案始终是报纸、杂志、书籍、电视、戏剧等长盛不衰的话题。考夫曼法官、美国联邦调查局、司法部长布劳内尔、艾森豪威尔总统成为众多媒介抨击的中心。为卢森堡夫妇翻案的呼声多年来一直就没有平息过。鉴于公众舆论，美国政府也曾数次对卢森堡夫妇间谍案进行了重新调查，但其结果均是不了了之。美国联邦调查局也陆续公开了有关卢森堡夫妇案的数十万字材料，但仍无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这对夫妇到底是否有罪。

卢森堡夫妇是否有罪？他们是否从事过原子弹间谍活动？人们拭目以待，期待着联邦调查局关于卢森堡夫妇案的档案全部曝光的那一天早日来临，期待着历史为卢森堡夫妇作出一个客观公允的结论！

## 八、恣意迫害 拉铁摩尔、奥本海默蒙冤

卢森堡夫妇被审讯期间，正是美国国内反共反民主狂潮泛滥的时期，卢森堡夫妇在和平时期被以间谍罪判处死刑，同美国历史上这段特殊时期有着密切的关系。此时正是杜鲁门忠诚宣誓年代和麦卡锡主义盛行全国时期，反共反民主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潮流。在此期间，美国国内发生了一系列的“苏联间谍案”，卢森堡夫妇案只是这十几起“间谍案”之一。其他著名的还有：1949—1950年的阿尔杰·希斯苏联间谍案，1949—1950年史沫特莱苏联间谍案，1950年拉铁摩尔苏联间谍案，1950—1951年“四个约翰搞垮了中国”怪论，1953—1954年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受指控为苏联间谍案等等。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美国国内竟一下子冒出这么多“苏联间谍”，且这些“间谍”多为美国政界、科技界、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这一事实本身怎么看都是不正常的。但如果我们与当时美国国内的反共反民主的歇斯底里相联系，便能有所理解了。

二战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国的霸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美国妄图在战后充当世界霸主的行径受到强有力的打击。1949年苏联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的原子弹讹诈顿失其威。一时间，美国国内反共舆论高涨。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反共潮流。以麦卡锡为首的一批政治投机者见时机已到，趁机跳到前台，大造舆论，极力煽动人们的反共反苏情绪，同时利用恶意诽谤、栽赃陷害等手段，肆意迫害共产党人、民主进步人士及进步团体和组织，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大量“苏联间谍案”就在此背景下发生了。这些间谍案中仅有少数查有实据，大部分纯属冤案，这些冤案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拉铁摩尔苏联间谍案和奥本海默苏联间谍案。

1949年，尼克松通过对希斯苏联间谍案的指控。一下子风头出尽，名扬全国。对此，刚刚跳到前台不久的麦卡锡羡慕不已，他认识到反共反民主是一条出人头地的最佳捷径。因此，麦卡锡这位既无政治资历又乏过人才能的政客于1950年初掀起了反共狂潮。1950年1月，他在国会上捏造说，美国国内已混进了大批共产党员，并且他已掌握了这些人的材料。令麦卡锡“感动”的是，他的肆意中伤竟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默许甚至支持，这一结果令麦卡锡更加紧了政治诽谤和阴谋迫害活动。

针对麦卡锡对国务院的指控，国会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了听证，对麦卡锡指控的人进行了传讯调查，其中重点人物是拉铁摩尔。麦卡锡无中生有，诬陷拉铁摩尔是“最高级的苏联间谍”。并扬言“我愿意把成败押在这个案件上”。

欧文·拉铁摩尔是美国第一流的远东问题专家，他出生于中国，在中国生活了12年。1941年，担任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拉铁摩尔受罗斯福总统的推荐，曾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后来他曾负责过美国战略情报局太平洋地区分局工作。二战后，拉铁摩尔重返霍普金斯大学。在受到麦卡锡的指控时，他正在阿富汗进行访问旅行。

得知受麦卡锡指控的消息后，拉铁摩尔当即中断了旅行返回国内，同麦卡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得知拉铁摩尔决心同麦卡锡当堂对证的消息后，心中发虚的麦卡锡改换了口气，说：“在拉铁摩尔案件中，我可能过分强调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受雇的间谍，鉴于他在国务院中制订远东政策所

起的作用，我们需要更多地着眼于他的意图和目的，即他的目的是符合美国利益还是符合苏联利益的。我们灾难性的远东政策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反映出执行了拉铁摩尔的建议和主张。如果你们去问一个小学生，谁是美国远东政策的设计者，几乎每个人都会回答：是拉铁摩尔。”

拉铁摩尔一回国就向报界公开宣布：“我从来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共产党外围组织。我从来没有支持过或主张支持任何国家——美国、中国、远东各国——的共产党。麦卡锡是一个卑鄙的家伙，是一名打了就逃的政客，是一名伪证者。”

1950年4月6日，关于拉铁摩尔间谍问题听证会在参议院大厅举行。针对麦卡锡无中生有的指责，拉铁摩尔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予以反驳，并当场出示了蒋介石和宋美龄赞扬拉铁摩尔的私人信件。在听证会上，拉铁摩尔愤怒地对麦卡锡进行了指责：

“麦卡锡破坏了美国与其朋友及盟国的关系和信誉，使美国政府成了共产党国家政府的笑柄。”

“他在美国政府官员和雇员中间制造了一种恐怖气氛，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麦卡锡不负责任的攻击。”

“他未经授权擅自使用政府的机密档案，诽谤美国公民并无端加罪而又不给对方以辩护的机会。”

“他说话不算数，人格扫地。他曾两度在参议院宣布，他在参议院中以豁免权所说的话将在另外场合重复，假如他说的是谎话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去法院告他。他还说，如果他不执行上述诺言，他将辞职。现在人们已多次要求他在公开场合重复他的指控以便在法庭上见个高低，但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而且迄今尚无辞职之意。”

在听证会结束时，主持听证会的委员们宣布：麦卡锡对拉铁摩尔的指控证据不充分。此外委员会还公开宣布拉铁摩尔的个人档案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他曾参加过共产党或与间谍有关的任何活动。

麦卡锡曾经表示，拉铁摩尔案件是决定他胜负成败的关键，所以他不甘心在这个案件上碰壁。过了4天，他找来一位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人前来为他作证。布登兹曾是美国共产党创办的《工人日报》的编辑，是一位共产党的叛徒。但在听证会上布登兹并没有对拉铁摩尔的具体问题提供什么新材料，他只是说美共领导人曾对他说过，拉铁摩尔是听共产党的，但拉铁摩尔是否是共产党员。布登兹承认他不知道。

布登兹在听证会上的证词，令麦卡锡等人大失所望。负责调查拉铁摩尔案件的国会小组委员会最后不得不得出结论：“麦卡锡关于拉铁摩尔是苏联超级间谍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对于这个结论，麦卡锡极为恼火，他指责该委员会是“向美国红色第五纵队开了绿灯。”麦卡锡不甘心失败，到1952年，他终于如获至宝地发现了拉铁摩尔的一封有“亲共”倾向的信，于是拉铁摩尔还是跌入了麦卡锡的陷阱。此后近10年时间，拉铁摩尔一直遭受政府的迫害与排斥。

奥本海默是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领导了秘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被世人誉为“原子弹之父”。然而在美国国内反共反民主的歇斯底里四处弥漫时，这位享有盛名的大科学家也无端受到“苏联间谍”的指控，被迫接受美国个人安全委员会的审查，蒙受不白之冤达10年之久。

由于奥本海默在研制原子弹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战后，他被选为美原子能委员会附属总顾问委员会主席，此外，他还是美国政府所属的 35 个各种委员会的成员，他还是新泽西州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所长，他持有参与政府绝密机要工作的许可证。按说这样的人其忠诚性应是无可怀疑的。

1953 年 11 月，美国国会原子能委员会的前任执行秘书威廉·博登向联邦调查局告密说，奥本海默可能是苏联的间谍，理由是他的妻子琼·塔特劳克及其妻弟弗兰克都是美国共产党。联邦调查局对此如获至宝，当即把奥本海默当作“叛国嫌疑犯”进行专案审查。1953 年底，联邦调查局起草了一份诋毁奥本海默的报告。在报告中，一位调查局官员推测说，奥本海默长期以来就是苏联的暗探，为了苏联的利益，他不仅从事间谍活动，而且还向美国军界、原子能委员会、知识界、国家外交政策等方面施加影响。在收到这份报告后，艾威豪威尔总统下令：在对奥本海默指控的情况彻底调查清楚之前，禁止他继续接触绝密情报。

1954 年 12 月，原子能委员会下属的保安委员会对奥本海默问题进行了秘密听证会，听证会实际上变成了对奥本海默的审讯。在长达 20 多小时的听证会期间，奥本海默一直站在证人席中，听证委员会对他 12—15 年以前的活动进行了详细的审问。听证会共持续了 4 周之久，听取了 40 个证人的证词，之后，听证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奥本海默是一位“忠诚的美国公民”，把他当成苏联间谍是不能成立的。但调查小组仍然拒绝恢复奥本海默参与政府绝密工作的权利，理由是奥本海默“对发展氢弹的态度冷淡”，“他的社会关系使人极其不安”。奥本海默蒙受不白之冤达 10 年之久。

（谭荣邦撰稿）

## 好莱坞艳星猝死——玛丽莲·梦露的生前死后

### 一、爆炸性新闻 一代艳星香消玉殒

时间：1962年8月5日

地点：美国美联社新闻处

发向世界和美国各地的新闻：题目：“一代艳星香消玉殒”。原文：“好莱坞著名女影星玛丽莲·梦露于5日清晨3时许，死于洛杉矶市郊布伦特伍德自己家中。警方公布，系服用过量安眠药致死。”

（请注意，这里选用的字眼儿是“致死”，既非“自杀”也非“被害”。细心的读者自然会进一步提问：安眠药是梦露自己吞服的？还是有人加害于她？）

美国各大报在得知该条新闻后，立即行动起来，主编们发出命令：“撤去其它稿件，将此条新闻登在头条位置上！”那些来不及撤稿的，则马上赶印“号外”。各报还挑选出自己最得力的记者奔赴好莱坞，采访玛丽莲·梦露生前的朋友、她的制片人、与她合作过的导演和演员以及她的数位前夫……记者们争先恐后，他们对这次采访所表现出的热情，甚至超过了关注总统竞选。他们每个人都明白，在美女如云的好莱坞圈子里，玛丽莲·梦露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她在世界影迷心目中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

玛丽莲·梦露生前所拍摄的那些令人百看不厌、精美绝伦的照片，此刻正在被精心复印。各类杂志的封面或夹页中又出现了她那光彩照人、魅力无穷的形象。它们再次成为喜爱她的影迷们和艺术收藏家的抢手货。

尽管玛丽莲·梦露参加演出的影片和她本人，部未获过奥斯卡奖的殊荣，然而，她在好莱坞仍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在众星璀璨的银河中，她仍属于惹人艳羡和招人嫉妒的“红星”。

她是世界知名的好莱坞超级“性感明星”，也是世界上无数男人梦寐以求的妙不可言的“女性偶像”。人们曾在50年代阵亡于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士兵的口袋里，发现过玛丽莲·梦露的照片；在中学生的书包里、华尔街大老板们的客厅里、少女们的卧室里、艺术影展的画廊里，随处可见她那娇艳动人的微笑，雍容华贵的丰姿。1962年，她年仅36岁，拥有如鲜花盛开般的美丽年华。喜爱她、崇拜她的人从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到肯尼迪总统，她拥有许多女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美貌、名声、金钱，她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为什么被幸运之神如此眷爱的人，会在黄金般美好的岁月中，撒手人寰、弃离人世呢？

人们提出了许多疑问，人们渴望知道事实的真相。在8月5日之后，报刊因登载有关玛丽莲·梦露的报道而销售量大增。在那个令人无限伤感的8月里，美国人如痴如醉般地关注着梦露的死因。有人投信“读者之声”栏目询问：“为什么找不出梦露香消玉殒的答案来？司法界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有的影迷甚至表示要为梦露复仇、献身，扬言只要能找到凶手，不管他是谁，即使法律惩罚不了他，他也逃脱不了厄运。

人们对玛丽莲·梦露深沉真挚的热爱，在她死后，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实在可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了……

陆续见报的文章透露：玛丽莲·梦露在8月4日下午5点15分左右，曾经和她的私人医生——神经病学专家拉尔夫·格里森博士通过一次电话。在

电话里，她告诉大夫说，近日心情欠佳，睡眠不好，有时烦躁不安。最后，她对着话筒颇为天真地问大夫：“您看，我该怎么办才好？”大夫说，她为什么烦躁不安，什么原因导致失眠，实属个人隐私，病人不说，医生是不便深究的，格里森大夫对她说：“你应该走出去，别老在家呆着，到海边散散步，或者驾车去兜兜风，试一试，也许当你再回到家里时，心情会感到轻松愉快的。”当时，玛丽莲柔声回答他说：“谢谢！”就放下了电话。

与玛丽莲同住在她乡间别墅里的专职护理护士尤妮斯·默里太太回忆说：“梦露其实并没有外出，放下给格里森大夫的电话之后，她对我说：‘要么，我俩就在周围转转？’可是说完这话，她略微迟疑了一小会儿，反而转身向自己的卧室里走去。在进门之前，她又转回头向我说了声‘晚安！’”

默里太太对前来调查情况的警方人员陈述说，那天晚上，她一觉醒来已是半夜。夜深人静之时，她发现梦露的房间里仍亮着灯，就想过去看看，但门是在里边锁上的，门内毫无动静。她感到奇怪，就跑到院里，绕到梦露的窗外，从窗帘缝里往里瞧。只见梦露正趴在床上，像是昏睡的样子，于是她急忙打电话把格里森大夫请来。据她说，格里森大夫行动迅速，不几分钟就赶到了。

他俩找到一根冬日使用的拨火棍，敲碎了窗子，进到梦露房间里去。他们看见玛丽莲·梦露趴着，一只手里还握着电话，身上裹着一条被单。格里森大夫发现玛丽莲·梦露已经失去了知觉，便立刻邀请当地另一位内科医生恩格尔·贝格来。经过这位内科医生检查确认，玛丽莲·梦露已经死亡。直到此时，他们三人才决定报警。

警方宣称：他们接到报案的准确时间是8月5日凌晨4点20分。警方到达玛丽莲·梦露的住所时，见到上述三人在场。而死者为裸体，无明显外伤痕迹，死者房间内整洁、清爽、井然有序，没有任何骚扰和打斗的可疑迹象。只是在死者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倒置的安眠药瓶，一个水化氯醛空杯。从尸体的软硬度推测，确切的死亡时间，应该是8月4日晚8时左右。

经过对卧室的全面检查，未发现任何留言或遗书。

玛丽莲·梦露的裸体尸身，在警方验查时，尚散发着她生前喜爱的“香乃尔5号”牌香水浓烈的香味。

验尸官在其登记本上写着：

验尸号码：81128 姓名：诺玛·琼·蓓克

种族：白人 性别：女性 年龄：36岁 身高：166.4公分 体重：53.2公斤 其他：胖瘦适度，营养良好在整个验尸过程中，在场的人无不惊叹地凝视着这位全美国最著名的标准美人，赞赏着她那无限完美的形体。此时，她那细腻、亮丽、尚有弹性的肌肤洁白无瑕，稍微散乱的蓬松金发半掩着她那宽阔饱满的前额，两道弯曲如画的黛眉下，犹如睡梦般垂下的眼皮上翘起长长的睫毛。面色如瓷。

人们再也无法唤醒这位美人儿，再也无法欣赏她那双蓝色的眼睛了。那双明亮的、射出媚人光彩的蓝眼睛，曾经魅惑过多少观众啊！那充满性感的丰润芳唇，让多少人曾经幻想得到它甜蜜的吻啊！……此刻这香唇已经冰冷，微微露出洁白如玉的牙齿。

此刻，她坦然无知地向一群陌生人最后展示自己的裸体——父母赐与她的宝贵财富。正是这美丽动人的躯体，才使梦露从拍裸照，到为画家当模特儿，最终被好莱坞星探发现，进入20世纪福克斯公司。在那里，他们几乎是

逼迫她拍了那些以出卖色相为主的片子，把她塑造成一名“性感超级明星”。她为 20 世纪福克斯公司挣了多少钱？谁也说不清。总之，她成了 20 世纪福克斯公司色情类型片的主角儿，成了他们的一棵摇钱树。然而，他们却始终没给过她公平的待遇。

她有幸成名的过去和如今的不幸早逝，都和这美丽动人的裸体有关……这大概是在场的人们共有的感悟。

然而那仍散发着香气的裸体，似乎在诉说着：“我是无辜的，我并不想死！我和你们每个人一样，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然而我实在无法挣脱命运对我的束缚，社会犹如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在我身上，现在，这张网对我收紧了封口，使我无法顺畅地呼吸，可我是清白的，我是无辜的……”

## 二、案情起波澜 诺古奇报告惹风波

在美国公众强烈要求和积极参与之下，有关玛丽莲·梦露死因的研讨以各种形式在报刊上展开，向报刊和警方询问此案动态的电话日夜不断。洛杉矶市警察局甚至不得不增加值班人员专守电话。

新的报导说：默里女士补充说——8月4日，梦露去世前一天的早晨，梦露是含着她那特有的迷人的微笑走出卧室的。当她到厨房去，见餐桌上摆着鲜桔汁时，眼光一亮，说：“啊，有鲜桔汁，这可真好啦！”此时，她脸上绽开了更动人的笑容，神情愉快。那天，她身穿一件蓝色的睡袍，与默里女士对面而坐，她们一边吃早餐，一边聊天，随意地东拉西扯，心情格外开朗。

中午时，默里女士听到前厅里有说话的声音，是玛丽莲的朋友，也是她的新闻发布人帕特·纽科姆，他昨晚在此借宿。默里女士听到梦露生气地对纽科姆说，是他拿走了她的安眠药，所以害得她一夜没睡好。默里此时才明白，梦露为什么今日比往日起得早。一般情况下，她常是睡到中午才起床的。紧接着就听到大厅的门砰地响了一声，关上了。大概是纽科姆生气走了吧？

那天下午，格里森大夫来过，和玛丽莲·梦露关着门，在房里谈了大约2个小时。

可当警方询问这位大夫他与玛丽莲都谈了些什么时，这位大夫却说：玛丽莲当时头脑并非十分清醒，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谈话中，她常答非所问，令这位大夫有“茫然无措”之感。总的印象是她有悲观失意、抑郁消沉的情绪。

默里女士的感觉正相反，觉得一切都和平日没有什么两样。玛丽莲不出门时一般都着一件睡袍，她喜欢宽松舒适的睡袍。而且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卧室的床上，用电话和朋友们聊天。总之，这一天默里女士认为没有什么异常，她本人没觉得梦露有任何意气消沉的表现或企图自杀的蛛丝马迹。

当晚7点半，她还曾听到梦露与其第二任丈夫乔·迪·马吉奥的儿子，小乔·迪通电话的声音，她对着电话又说又笑，仍很开心。为什么仅在半小时之后会命归黄泉呢？

如此说来，说她自杀是绝对不合情理的。

此外，默里女士又补充了一个情况：4日晚9时半左右，玛丽莲的生前好友、也是她的经纪人密尔顿·洛林先生曾打来过一个简单的电话，问她玛丽莲·梦露是否一切安好无恙？默里女士见此时玛丽莲屋里还有灯光，电话线还拖在门底下，就以为她没什么问题。她对密尔顿说：“您放心，一切平安无事。”玛丽莲·梦露有个习惯，一旦她服了安眠药打算睡觉时，总会把电话移出卧室。既然电话还在房里，说明她还没睡。默里女士的错误是她未亲自进卧室去看看，也没问密尔顿先生是否要玛丽莲亲自接电话，就把电话放下了。这是她有意的疏忽呢？还是完全无意而为？

密尔顿·洛林为什么此时有电话问玛丽莲是否安然无恙，难道他有什么预感吗？

事实是密尔顿先生接到了一位名人的电话，这位名人是谁，密尔顿先生说他无权公布。对方对他说：“密尔顿先生，玛丽莲·梦露刚刚和我通话，告诉我，她今晚不能前来赴约，原来她说本周末来我家打扑克的，可她在电话中说了一些不吉利的话，而且语音含混不清，我猜想她是否病了？本想亲

自去看看她，但又不十分方便，您是否和她通个话，问问她的健康状况？待一会儿，我再打电话问您，谢谢！”

密尔顿马上接通了默里女士的电话，然后他也就放心了。

那么给密尔顿打电话的人究竟是谁？这么说来，玛丽莲手拿电话最后通话的人就是这位神秘的人物了？为什么此时不公开站出来说明原委呢？背后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难言之隐吗？

杰克·克莱蒙斯警官如是说：“我从一开始就怀疑是谋杀！”他为自己的怀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8月5日洛杉矶市西城警察局的夜班值班主任是杰克·克莱蒙斯警官。他说，他接到来自玛丽莲·梦露乡间别墅格里森大夫的报警电话，立即做了书面登记，准确时间是1962年8月5日（星期日）凌晨4点25分。他因不敢确定是否真此事，还是有什么人以那位大名鼎鼎、漂亮的好莱坞明星的名字来吓唬他，跟他开玩笑，因此，他没有按照应有的惯例先派他的执勤巡逻车前去探看情况，而是亲自赶到了现场。

当他看到真是玛丽莲·梦露的遗体时，凭他的直觉当即有一种职业性反应，对周围的一切产生了怀疑和警觉。他对默里女士说的“半夜醒来”印象颇为深刻，按正常理解，半夜自然是零点，而他直到黎明时分才收到报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都干什么去了？格里森大夫说他们打电话通知了20世纪福克斯公司，以及梦露的生前好友们……默里女士又改口说，她说的半夜是3点钟。

但克莱蒙斯警官始终不信，他当时心想、在漫长的4个小时中，是否有人利用时间去做过什么手脚？去消除了作案痕迹？他们拖延报案时间一定是有原因的。玛丽莲·梦露不会轻生自杀！

而眼前这三个人：一个是沉默不语的内科大夫；一个玛丽莲的私人神经病医生（他既然下午在这里和死者谈了2个多小时，为什么早先不说，而先说5点钟那个电话）；还有这位默里太太（她是同谋杀手还是真正无辜），他们都在表演呢？还是在陈述事实？

因此，他坚持继续验尸，然后将尸体送去全面解剖处理，不赞成仅凭死者床头柜上的安眠药空瓶，就断定这位明星是因情绪低落忧郁而自杀。

杰克·克莱蒙斯警官向上级紧急汇报情况后，得到上级同意，立即将玛丽莲·梦露的遗体送往法学院解剖室，其他人随时等候开庭审讯，玛丽莲·梦露的别墅暂时派人看守，保持原有状态。

星期天早晨，年轻的医学博士诺古奇，像往常一样，充满自信，心情愉快，迈着轻快的步伐到法学院上班。法学院人手奇缺，他又没有家室拖累，正好趁机积累一些临床经验。所以，尽管今天是星期天，他也没打算休息，除了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之外，他希望在医学工作岗位上日后能有辉煌的成就，像那些培养过他的专家教授们一样。

但这位年轻的博士，绝没有料到今天在他的一生中将会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法学院里的医学权威人士是著名的柯菲博士，他是一个有丰富临床经验的解剖学医生。在他的诸多助手中，他最器重、最信赖的是洛玛·林达医学院病理系助教，曾获得临床病理解剖学学位的医学博士诺古奇。他常把一些有科学研究价值的重要病案委托给这位年轻人。当警方通知他，著名的影星玛丽莲·梦露的遗体须用解剖判断其自杀或他杀时，他立即想到了诺古奇。

这样重要的解剖任务，必须交给一个工作责任心强、细致和有高明解剖技术的人，他的判断必须是绝对可以信赖的。

当柯菲医生打电话到诺古奇的办公室时，诺古奇还在路上。接电话的人根据柯菲大夫的指示，给诺古奇医生留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柯菲医学博士请诺古奇医学博士为玛丽莲·梦露作尸体解剖。”这是再明确不过的留言了。

当诺古奇走进办公室时，立即有人提醒他看看桌上的留条，并告诉他，柯菲博士在电话中叫他来后立刻就去。

当诺古奇读着那张便条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名字与那位自己喜爱的超级性感明星有什么联系。她那生机勃勃、充满女性魅力的形象，无论如何不会与“尸体”这两个令人厌恶的字眼连在一起。对他来说，她永远是可望而不可求的梦中仙女，是上帝创造出来的最杰出的精灵。看了字条，诺古奇甚至笑了一下，耸耸肩、摇摇头，暗想：不知哪具老太婆的尸体，竟然“斗胆”与他心中绝妙的偶像同名同姓？

后来到工作室翻阅警方初步印象报告，关于一般性描述他没太留意，只在备注栏里发现了一条提示：“海曼·恩洛尔医学博士，住威尔希尔大街937号，前天曾给她开过一份戊巴比妥的处方；另外，一个神经病医生昨天曾与她交谈过，印象中，觉得她情绪十分低落。”由此，诺古奇判断，这位白人少妇多半是司空见惯的“自杀者”。

9点半钟，诺古奇医生像往常一样，从容地穿上白色工作服，平静地向弥漫着福尔马林味道的解剖室走去。

在那张他专用的解剖桌上，躺着一个曲线优美的躯体，床单下，那位可能因服了过量安眠药而“自杀的”少妇正等待着他去解开她的死因谜底。

在这个宽敞的大通间解剖室里，没有任何通向户外的窗子，它是封闭式的，瓷砖地洁白晶亮，日光灯照耀得像白天的阳光。每隔相等的一段距离，就安放着一张固定的高级不锈钢解剖桌，几位法医已经在他们各自专用的尸体解剖桌前工作了。无论是谁，在解剖过程中发出的任何声音，说过的任何话，都会被声控录音机准确地记录下来，最后成为破案的有价值的佐证。

使诺古奇医学博士感到惊异的是地方检察院与法医总队的联络员，那位偶尔光临的约翰·迈因纳先生，居然早他而来，正围着他的解剖桌徘徊，直到此时，年轻的诺古奇大夫，依然未曾意识到，他与他的随员们不是为了欣赏他的手术技巧，而是为躺着等待解剖的女尸而来的。

直到他用手轻轻掀起那张洁白的罩单，惊异得差点儿喊出声来！摆在他眼前的，正是他崇拜的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那美妙绝伦的裸体。他不由自主地楞了神儿，数秒钟之后，灵魂才得附体。他不是恐惧，做为一个医生，他早就适应了尸体，他吃惊的是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过会是真正的玛丽莲·梦露！

此时，他当然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无比重大，像梦露这样有国际声望的明星，如此令人垂爱的娇娃，她的死定会引起世人瞩目，她的死因定会引起社会上的轰动，而这一切全靠他来破解，真是重担千斤！想到此，他尽量用理智使自己有些节律不齐的心镇静下来。

他拿起放大镜，小心翼翼地在玛丽莲身上探寻，看看是否有什么可疑的麻醉针眼儿，或者施暴的痕迹。他的放大镜在梦露的身上一点一点地移动，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他立刻在尸体解剖报告上作了认真记录。

但他在翻动查找的过程中，却发现了玛丽莲·梦露的后腰上，背部的左下方有一块乌青，位置在髌骨处，这是一处轻度的面积不大的瘀斑。此时已呈深紫色，他判断系新伤所致，而且肯定是由于施加外力引起的。因为他知道，乌青瘀斑出现的原因，是由于肌肉和血管之间受到了猛烈撞击，同时，白血球涌到受伤的部位，执行保卫任务，控制损害的范围，并释放出大量酶，溶解蛋白质。在这一复杂过程中，瘀斑的颜色会逐渐改变，由深紫色转而渐呈暗褐色，淡褐色，草青色，而黄色则是瘀斑所呈现出的最后颜色。如果肌体是活的，黄色渐渐变淡而消失。

玛丽莲身上这块淤斑是深紫色，说明此伤是新伤，它一定是最近受了某种撞击造成的。可是这瘀斑面积不大，层次较浅，仅凭此，是不会对生命造成致命伤害的，这一个不正常的疑点，跟她的死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诺古奇对这块乌青看了又看，量了又量，思考着、判断着，其他地方均没有异常发现。最后，他认为乌青虽属外伤，但和其死因无关。

他在验尸报告中写道：“外部检查结果：尸体未经防腐处理，死者为一36岁白皮肤女子，体态丰盈，营养良好，体重53公斤，身高为1.66米，颅壳上覆有略显褪色之金发，眼珠碧蓝色……后腰之左下方，有一小范围轻度瘀斑。”

接下来，诺古奇对其解剖所见的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淋巴系统、内分泌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等都作了认真详细的描述和记录。

后来，对这次检查结果的争议，完全集中于其消化系统的有关结果上。

因为，诺古奇医学博士在玛丽莲·梦露的消化系统——无论是胃部还是大肠小肠之中，均未发现任何残留的安眠药或其他药物，更没有发现任何折射晶体状物。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这对一个真的服了一瓶安眠药致死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药不可能被吸收得这么快！检查说明：玛丽莲·梦露的死不可能是因为吞服了安眠药。

聪明的、滴水不漏的诺古奇医生在他验尸报告下边的附注项里所写下的文字，为自己的观察留下了重要的伏笔：“血已抽样，保持原状，以作酒精和戊巴比妥酸剂分析。肝脏、肾脏、胃及胃内物、尿及肠道，均已取样，以作毒理学分析。”

但解剖报告发表时，附注项目还没有结果。

诺古奇的解剖结论，果然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玛丽莲不是自杀而是被人谋害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了。

诺古奇为他这次解剖报告所造成的后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尤其后来的化验又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自己也在20年之后改变了看法，遭受舆论一致谴责。

### 三、自杀与谋杀 公众官方各有说法

自从报界公布了诺古奇医学博士的解剖报告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玛丽莲·梦露是被人谋杀的。但究竟是谁？又是什么原因杀害了玛丽莲·梦露，则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玛丽莲的好朋友们，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认为：玛丽莲·梦露绝对不可能自杀，理由是，她在电影事业上出现的低谷期早已平安度过。此时，从事业方面来说，正是她第二次“飞黄腾达”的上升阶段。她刚刚和20世纪福克斯公司签定了重拍搁浅已久的《濒于崩溃》一片的合同，并答应在百老汇上演的一部新编音乐喜剧中担任主角，一展她那甜美的歌喉，这是她早已向往的好事！她热爱喜剧，喜剧使她的身心感受到说不出的欣喜。尤其是舞台喜剧，可以使她与台下的观众直接交流，她犹爱这个！而且，拉斯维加斯州还特邀她在几场大型歌舞演出中登台亮相，答应给她的周薪竟然高达5.5万美金。这么多的好事在等待着她，她为什么去死？

有人立刻找出她临死前两天刚刚出版的《生活》杂志，那上边登着一篇该杂志记者对玛丽莲·梦露的专访文章。文中，玛丽莲以她特有的明快语调，洋溢着欢畅的情绪对采访她的记者和读者描述着她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她的原话是：“歌德说过，才干只能靠自己培养。你听，这话说得多好！一个演员首先应该悄悄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掌握全面的表演技巧，在演出时，才能一鸣惊人。在我的生活中充满了荣耀，有时，我随便带条围巾，穿着运动衣，也没化妆就到街上买东西，但即使这样，我也不会被芸芸众生所淹没，一些顽皮的孩子会悄悄地跟在我后面说：‘哎！’快来瞧啊，你知道她是谁吗？’接着他们高高兴兴地尾随着我，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反正他们来不及把认识的小伙伴都喊出来。老年人见到我则吃惊地喃喃自语：‘天啊！我碰到谁啦？这不是玛丽莲·梦露吗？我一定把这新鲜事儿告诉我的老伴儿。’是的，我高兴，因为我就这样改变了他们的一天。

“有时，清晨，收垃圾的工人经过57号大街时，碰巧我出门，他们就这样跟我打招呼：‘喂！玛丽莲，你看今天的早晨有多美啊！’对我说来，这就是一种无上的光荣，我为此充满自豪。因而我爱他们，那些喜欢我的所有人，无论是老人或小孩。

“真有趣，有些干活的人，只要看见我走过，就会高兴地吹口哨。开始他们吹口哨是因为远远看见我是个妙龄女郎，又有一头金发，身材也不错。但当我走近时，他们就会惊叹道：‘天啊，原来是玛丽莲·梦露！’你知道吗，这是我感觉最美妙的时刻！因为我觉得人人认识我，了解我，对我表示友好，而且觉得我对于他们来说是个重要的人……”

有这种自我感觉的人，有什么理由自杀呢？

事实上，确如她所说的，每当她那完美的体态出现，就会吸引众人的热烈目光，他们为她喝彩！她的朋友遍天下，从平凡的百姓到政界高级官员。她曾多次被白宫邀请参加重要的社会活动，会见过各国外宾。而且谁都知道，她和约翰·肯尼迪总统及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司法部长都是好朋友，她有什么理由自杀？

他们有千条万条理由证明：玛丽莲·梦露是毫无理由自杀的。她一定是被人谋杀的！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诺古奇医学博士解剖报告中的附注化验结果公布

了。诺古奇医生的解剖报告留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就是玛丽莲·梦露的五脏取样化验。这个结果是由法学院化验室得出的。解剖所见说明的是“观察印象”，而“化验结果”应该是准确的“最终结论”。

不过，实验室里的化验技师们可没有像诺古奇医生看见玛丽莲的尸体时那般惊奇，他们在做了血液和肝脏化验之后，已经得出了分析结果。因为在玛丽莲·梦露的血液和肝脏里，确实测出了戊巴比妥毒素，肝脏中的含量竟有13%毫克，在血液化验中，水化氯醛的比例则达到了8%毫克。这两个结果，足以证明死者确系因以上两种安眠药物中毒而死。这两种药物的含量大大超过了正常范围，足以证明是用剂过量致死的。再加上原要求解剖的附注说明曾指出死者的床头柜上有戊巴比妥空瓶和水化氯醛的空杯子，那么他们自然认为仅此两项化验结果就足以证明其死因与原来的推断相符合。因此，他们认为再化验其他内脏已无必要，不可能得出其他的结论了，故而，放弃了对胃、肠、胃液残留物和肠中残留物的化验，甚至把它们扔进了垃圾筒。这样，他们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因为这些毒素如果是经过肠胃消化溶进体内的，就说明玛丽莲是自杀身亡，而如果在肠胃中没有发现同样的毒素，就是被人用针剂注入体内的，那就无疑是谋害，是他杀！

这样一来，当诺古奇博士拿到化验结果后仍然无法推断是自杀还是他杀。他无法判断出，这两种药物是如何达到血液和肝脏的，他缺乏足够的证据！

结果公布后，自然又引起了全社会愤怒的谴责！这种明显的疏漏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是人们无法接受，无法原谅的……关注玛丽莲死因的人们，早已失去耐心，指责诺古奇及法学院的书信，雪片般飞来。

有人说他们有舞弊行为，说他们是被谋杀者雇用的；有人骂他们无能；有人要将他们送上法庭……但无论如何，这严重的疏漏再也无法弥补了。此项化验结果公布时，玛丽莲·梦露早已入土埋葬了……

对解剖报告和化验结果的攻击，有的来自医学界本身，使诺古奇处于无限尴尬境地，他无法为自己做任何形式的辩护，只有用沉默应付如雨点般的责骂和攻击。美国医学界的权威，著名的诺曼·梅勒大夫，发表文章不无讥讽他说：“凭诺古奇医学博士的解剖报告当然结论应止于‘自杀’之说，而要人们不必再在种种迷惘之中倾向于任何谋杀的假设，因为身为法医者，一旦得知当局是倾向于自杀结论的，那么，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强烈的愿望去得出谋杀的结论了。”更有人指责说：“公布的整个验尸报告都是在有人控制之下凭空捏造的，根据某某有名有姓人物亲自了解到的情况是，真正的那份验尸报告已被销毁，而最后公布出来的，签着诺古奇大名的报告，纯属胡编乱造。”

诺古奇自己无法澄清事实，还在于他对柯菲医生为什么不亲自主持这次解剖产生了极大的迷惑；柯菲医生是真正的出于对他的技术信任呢？还是有意嫁祸于他？或者表面上重用实则企图推卸责任呢？

当时的诺古奇医生太年轻了，他估量不出整个社会对玛丽莲·梦露的关注程度，而由此掀起的狂澜怒涛，几乎把他吞没了。

随着事态的发展，牵扯的面越来越广，揭露的真相越来越深透。诺古奇的名字，在整个事件中成为众矢之的。

就在众人对诺古奇的解剖验尸报告提出种种指责之时，法学院的权威柯菲大夫决定从另一个角度去证明玛丽莲·梦露究竟是自杀还是被害的——他

决定成立一个由心理学分析专家们组成的委员会。他认为通过这个委员会对玛丽莲身边所有的人，熟悉她生活方方面面的朋友和亲人们，进行广泛的调查和了解，能分析出她日常心理状态的轨迹，判断出她究竟有没有自杀的可能。她究竟是个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呢，还是自幼就有过自杀企图的悲观厌世者？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着她的日常行为，导致偶尔的反常可能性？

这个“心理分析专家委员会”由柯菲大夫主持，被群众讥笑为“自杀委员会”。在当时的美国，确属“新生事物”，是全国首创。

人们得知，这个委员会暗中得到了美国保险公司的支持和赞助，因为玛丽莲·梦露是加入了保险公司“人身安全保险”的著名人物，一旦法律真的断定她确属被人谋杀，那么，美国保险公司将要为这位明星的法定继承人付出巨额人身保险金，这将是他们难以承受的。

“自杀委员会”为了鼓励被询查人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地回答问题，答应对谈话人所谈内容严格保密。每份调查材料均被作为机密的文件处理，仅限于各委员之间传阅，阅后一律封存。所以只公布他们的分析研究成果，而不附任何其他文字说明。

经过一段时间的神秘采访之后，他们公布了研究结果，只有“应属自杀”四个字。

最为滑稽的是他们把这个结论放在了诺古奇的尸体解剖报告里。仅此一举，便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义愤。读者们纷纷在报刊上公开指责他们是在耍阴谋；用鬼花招欺骗人；是罪恶的“瞒天过海”行径；是替杀人元凶开脱罪责；是被幕后操纵者收买的；是拿了“保险公司”贿赂的；是有重要“后台”暗中指挥的傀儡……反映强烈。不一而足。

#### 四、爱情如朝露 与棒球冠军的婚姻

不管社会上对玛丽莲·梦露之死作何反应，“自杀”派和“谋杀”派之间如何争论不休，死者总是要安葬的。

在诺古奇医学博士把化验取样留下后，将尸体缝合完好，玛丽莲·梦露的葬礼就提上了日程。

依据玛丽莲·梦露生前流露过的遗愿：葬礼尽量简朴，只希望最亲近的人参加。因此，1962年8月8日在布伦特伍德举行的葬礼规模并不大。社会名流、影星一律未请，只有她的生前好友亲人23人参加。其中最感人的是宣读她的表演教师里·斯特拉斯伯格发来的唁电；另外，她的第二任丈夫乔·迪·马吉奥和他的儿子小乔·迪父子俩抚棺悲哭的情景也令人心酸。

乔·迪·马吉奥在纽约听到玛丽莲·梦露的死讯后，立即带着儿子乘飞机到达洛杉矶。在整个葬礼过程中，他始终痛哭流涕，不停地重复着：“我爱你！”这三个字，那情景真让人感动无比。

小乔·迪8月4日黄昏还和他亲爱的玛丽莲阿姨通电话，逗得她在电话那头格格直乐，第二天竟然失去了她！她是他最爱的人了。他永远记得他12岁的某一天，她成为他的继母……

乔·迪·马吉奥以他真挚的感情获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深切同情。有人悄声说：“假若玛丽莲不死，他们或许会破镜重圆的。”实际上，这绝无可能。

玛丽莲·梦露1954年和乔·迪·马吉奥结婚。那时他独身已近10年了，她则在好莱坞已有了稳固的地位，常常参加一些名人聚会。她与乔·迪·马吉奥就是在一次名人聚会时认识的。乔·迪是那年美国的棒球冠军，到处受到热烈欢迎。他对玛丽莲早就暗中倾慕，自从认识了她，在接触中领略到她的温和、开朗，十足的女性魅力之后，她的一言一语都令他兴奋。他想尽一切方法去接近她，对她诉说自己内心的冲动。1954年，他们在纽约举行了轰动全美的婚礼。

最初，棒球明星为自己征服了一个绝代佳人而自豪，他甚至在未经玛丽莲同意的情况下就洋洋得意地回答记者采访，宣称他的妻子嫁给他后将告别影坛，专心做他的家庭主妇。玛丽莲·梦露得知后曾对他说：“乔·迪，我可没说过这话，你为了我能放弃棒球吗？”使他无言以对。

他俩决定到亚洲旅游度蜜月，直到此时，马吉奥才悲哀地发现，出了美国之后棒球明星一钱不值，这里没人认识他，更没人为他喝彩、欢呼。可他的娇妻玛丽莲却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她那明星的桂冠出了美国依然光彩夺目。与她相比，他黯然失色。他那男性做岸的自尊心受到了意外的伤害，不由情绪低落。当人们为他的妻子欢呼时，他竟会在一边愁眉不展，每当狂热的影迷拥向玛丽莲·梦露时，他就感到无比的窝火。尤其别人在介绍他时，常常不记得他的姓名而把他称为“梦露小姐的先生”，连他的姓名都在妻子的盛名之下被忽略、被抹掉了，他感到真是奇耻大辱。

她的光芒太强了，他受不了！可是他又十分爱她。除了她太有名之外，他实在挑不出她有什么缺陷。而玛丽莲·梦露对他温情如初，她是个好女人、好妻子。

但她越在他面前温存、忍让，他的大男子主义就越是不可抑制，并常把内心积存的怨气向她发泄，急了，甚至拳脚相加。玛丽莲原本指望找一个能保护自己的男人，却不料找了个想奴役自己的人！起初，玛丽莲对这一切尽

量容忍，她不想使这次婚姻破裂，再回到孤独无援的境地。但在摄制影片《七年的思考》中，玛丽莲扮演女主角，有一个在火车奔驰时，风掀起衣裙，露出了内裤的镜头，乔·迪大光其火，不容不让！他俩真的闹僵了。

玛丽莲思前想后，她觉得自己必须在银幕和乔·迪之间进行最后的选择，她再也无法忍受乔·迪的粗暴！假如她仍打算演电影，那么她必须和乔·迪分手。

外柔内刚的玛丽莲·梦露终于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结束了和乔·迪的不幸婚姻。直到这时，前思后想的乔·迪才发现他将失去的这个女人，实际上是他心中唯一的爱。然而，事情已经无法补救了。乔·迪对她说：“玛丽莲，我真的很爱你！我知道我对你很不公平。难道，我不能改正吗？”

玛丽莲回答说：“乔·迪，我不是没忍耐过，没期望过，可你叫我太失望了。让我们做最好的朋友吧！我们毕竟相爱过……”

乔·迪无奈他说：“玛丽莲，请你记住，我永远爱你。只要你需要我，就订电话，我一定会为你牺牲一切的。”

玛丽莲含着热泪说：“乔·迪，我明白，我相信你。”

可是自他们分手后，玛丽莲并没求过他什么。她给小乔·迪的电话比打给他父亲的还多。

此刻，乔·迪的泪水是内心深处沉痛的内疚，他悲伤的是他永远失去了一个真正爱过他的好女人。

玛丽莲·梦露 1926 年 6 月 1 日出生于洛杉矶一家平民医院里。她的母亲叫诺玛·琼·格莱思蒂，在洛杉矶一家电影厂工作。格莱思蒂是她前夫的姓，玛丽莲是诺玛·琼和一位丹麦籍面包师蒙坦森的私生女，蒙坦森在女儿出世前已经去世。因此，她是个不幸的遗腹女。在她出生之后只好随母姓，因此她的原名是诺玛·琼·蓓克。

蓓克这名字是她的外婆琼·黛拉在洗礼时给她取的。外婆和母亲显然很爱她，但她们生活贫困。她母亲因爱情上屡受挫折曾犯过精神病，后来住进了疯人院。

梦露从小就没有享受过真正的母爱，先是在许多穷亲戚家寄养，8 岁后被送进了孤儿院。因此，她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12 岁时，因逃避孤儿院中非人的虐待出逃，被她母亲的一位朋友格里斯·安娜收养，她称她为“安娜姨妈”。直到这时她才有了上学读书受教育的机会，生活相对安定下来。小学读插班，15 岁中学毕业。安娜姨妈的生活虽也不富裕，但她喜欢梦露，而且心地善良。因此，对安娜姨妈，她始终保留着亲切良好的印象。

在安娜姨妈家里，她才有了自己的屋子，自己的小书桌。她心中最崇拜的人物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她把林肯的照片镶在镜框里，放在自己的小书桌上，望着他那充满了睿智的眼睛和慈祥的面容，她心里就会升起一种爱的感觉。她把亚伯拉罕·林肯当成自己的父亲，她崇拜他，喜爱他的深眼窝里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仿佛他能洞察她内心的各种秘密。她向他诉说自己在孤儿院中曾受的委屈，睡前吻他的大胡子，亚伯拉罕·林肯成了这小姑娘心目中的第二个上帝，真正的父亲。

1942 年，16 岁的梦露还是一个极其单纯的少女，她认识了一个在远洋船队工作的年轻工人詹姆斯·多尔蒂。他比她年长 5 岁，每当假日，他俩一块儿看电影，无拘无束地聊天。

不久，安娜姨妈要迁居外地，安娜考虑是否要把蓓克送回孤儿院去。

一听“孤儿院”就吓得发抖的梦露只好去找唯一的朋友詹姆斯求救，詹姆斯心中早就爱上了她，只是还没打定主意是否娶她。他不假思索他说：“那我来养你，用不着回孤儿院。咱俩结婚吧！”梦露高兴地拥抱着他，又笑又蹦。他们拉着手去见安娜姨妈。

就这样，刚刚 16 岁的玛丽莲·梦露就当新娘。新娘所幻想过的美满生活，并没有实现。21 岁的新郎出海远航去了，留给她的钱不足以供她温饱，她靠出卖苦力也难逃贫困的阴影。这时詹姆斯·多尔蒂开始对她厌烦了，认为是蓓克拖累了他，他们开始争吵，家庭生活出现了裂痕。

1945 年初，24 岁的多尔蒂应征入伍、参加海军。从此他既无来信，也再没有回到她的身边，是他有意分手，抑或战争中阵亡不得而知。从此蓓克孤身一人依旧挣扎在贫困生活中。

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位名叫戴维·诺瓦克的挎着照相机的人。他正在执行一个特殊的采访任务：报道前线战士家属的情况。当得知她的丈夫在海军服务时，就极力动员她拍张照片。梦露很犹疑，因为她拿不出多余的钱。当这位摄影师说“不收钱”时，她才兴高采烈地站在那儿，照下了自己生平最喜爱的一张照片。不久，摄影师给她送来了这张照片。照片上那个诺玛·琼·蓓克朴素又自然，天真清纯如一滴晶莹透亮的水珠！她多次对她的好朋友说：“只有这张照片上的女孩儿，才是真正的我。是我的本来面目！”无论是当了明星之后，还是死前不久，她的好朋友们几乎都看过这张她视为珍宝的照片，听过她略带凄楚、无限怀恋的表白。

后来，梦露的生活日益困窘，有时竟然到了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悲惨境地，不得不去求戴维。戴维动员她去做摄影模特儿，拍商业广告片。梦露去了，但这也是临时性的，不可能所有的商业广告都用一幅熟面孔。生活依然没有保障。

有时，这可怜的女人身上只有一角钱。此时她想起了另一位《生活》画报的摄影师托姆·凯利，他曾几次要求为她拍裸体照，说可以给她比较多的钱，但几次都遭到了她的拒绝，她认为那是有失自己尊严的可耻的买卖。然而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去找这位托姆·凯利先生。

见到凯利，她心慌意乱他说：

“假如现在我同意让你拍一张裸照，你还有兴趣吗？”

“当然，有兴趣！蓓克，我一直恭候你能允诺，我可以付你钱。”

“多少钱？”

“50 美元！怎么样？”

“好吧。”饿着肚子的蓓克就这样以 50 美元的代价拍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张裸体照。托姆·凯利为这张轰动一时的照片版权赚的钱成千上万。因为他把这张彩照配上日历，取名为《金色梦》，成为当年的畅销品。

而买到《金色梦》年历的人，未必了解，具有这出色线条美的女人是因为赤贫和对生活的绝望才被迫出卖自己的。

玛丽莲。梦露正是因这张照片，被星探请到了好莱坞 20 世纪福克斯公司，开始了她的电影生涯。

那是 1947 年，刚满 20 周岁的她，小心翼翼、充满了好奇心地走进了自己从小敬羨神往、带给她无限憧憬的好莱坞庄严的大门，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制片人深知一个美丽女人的价值，他们发现这是一块有待雕琢的璞玉。她不仅有出水芙蓉般的清丽，秀色可人，且音色动听圆润，笑起来，齿若编

贝，腮边那颗美人痣更添风采。那绝妙的身材，散发出无法抗拒的诱惑力。他们决定把她塑造成一名“性感明星”。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制片人问。

“诺玛·琼·蓓克。”

“这名字可不怎么顺口！要想当明星，必须起个使人喊起来响亮、好听、琅琅上口的名字，像葛丽泰·嘉宝、英格丽·褒曼、琼·克劳芙、蓓蒂·戴维斯……明白吗？取一个真正是明星的名字！”

“好吧！让我考虑考虑吧……”她怯怯地回答。后来，他们建议她叫玛丽莲·梦露，她同意了。

幼稚而单纯的玛丽莲，开始乖乖地在导演们的指挥下。扮演一些无关紧要的配角，不是勾引男人的坏女孩，就是被男人引诱的情妇，她实在没有喜欢过生活中这类不严肃的女人。可是为了保住这来之不易的饭碗，她必须服从一切命令。他们叫她穿那些领口开得很低的无袖透明裙子，裸露着胸口和肩膀，说是“剧情需要”，她不敢提出任何异议。

对于从贫民窟一步迈进好莱坞的玛丽莲·梦露来说，经历了多年的贫困生活后，突然有了固定收入，成为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一名正式合同演员，内心的感觉，无疑是幸运和激动的。周金达几百美金，对她来说已经深为满足了。完成一部影片有几千美金的报酬，过去，梦露连想都不敢想自己会挣这么多钱。

## 五、好梦难成真 与作家米勒的聚散

阿瑟·米勒 1915 年出生于纽约，是美国当时举足轻重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戏剧理论家。他是梦露的第三任丈夫。

他没有去洛杉矶参加玛丽莲·梦露的葬礼，曾引起了人们愤怒的指责。他躲在一个远离繁华城市的乡间农场里，拒绝一切来访和采访，把自己与整个世界隔离开来……

他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这种悲痛只有对玛丽莲有着深挚爱情和透彻理解的人才会产生。他把自己关起来，品尝和回味他深深爱过的这位绝世佳人与他相处的分分秒秒……3 个月后，他写出了剧本《明星之死》，以此寄托自己对玛丽莲·梦露的哀思，表达他对美国社会黑暗势力的强烈抗议。

梦露与米勒的一段姻缘，对于了解梦露，迫索梦露的死因，都是很重要的背景资料。

玛丽莲·梦露因为身世飘零，并未受多少教育，文化程度仅只是初中毕业。但她从小爱读书，人也很聪明。进入好莱坞之后，看到周围的编剧、导演、制片人都是大学问家，都是专业知识分子；演员同行里，在大学里读过表演系的也为数众多，更加激发了她对知识的向往。然而她自己的文化水平却只够读懂剧本，因此她一向敬畏和崇拜有高深文化修养和品格高尚的人。在好莱坞拍片之余，她回到自己的寓所，就埋头读书看报，以充实自己。阿瑟·米勒那时已经在美国艺术界名声大振，常被请进好莱坞，许多导演都想拍他的剧本。他与玛丽莲是在一个极其偶然的场合相识的。玛丽莲生前曾经对她的朋友艾米详细谈过她和阿瑟·米勒由相识到相爱的过程，以下是她的原话：

“我认识阿瑟·米勒还是在认识乔·迪·马吉奥之前，我们是在一个极其偶然的场合里相识的。尽管我早已知道这位瘦瘦高高、鼻梁上架一副眼镜的学者，就是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客人、伟大的作家、编剧阿瑟·米勒先生。可是没有人对我介绍过他，也就是说，我认识他，可他并不认识我。总之我们有时擦肩而过，却彼此冷漠，没喊过一声‘哈罗！’我们真正相识的那一天，我永远忘不了。实在是太偶然了，就像 20 世纪福克斯公司拍的那部关于狐狸的音乐片一样。噢，或许比那还妙！因为当时，正巧我一个人站在布了景的舞台上，整个摄影棚里空空荡荡。我是个富于幻想的女人，于是我就想象着自己此时正在跟好莱坞的男舞星弗雷德·阿斯特雷跳舞：一会儿是圆舞曲，一会儿跳探戈，一会儿是狐步舞……我闭着眼睛一个人转啊，转得入了迷，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正跳得起劲儿时，突然听见摄影棚的大门开了！真吓着我，我对自己说，我本该早走掉的，这一定是负责的门卫进来，要把我赶出去了。呀！真丢人！于是我灵机一动就躲到了一只破箱子的后面，紧张地注视着门口。我看见两个人走了进来，他们不是门卫，其中一个有著乞导演伊莱亚·卡赞，另一个就是阿瑟·米勒了。我不知他们在悄悄讲什么话，只是有说话的声音传入耳中。我想躲着等他们走了再溜出去，上帝可怜我，我因刚刚跳舞出了一身汗，此时在箱子的阴影中浑身冰冷，不幸打了一个响得惊人的喷嚏！他们立刻警觉起来，看来，他们是在谈一桩机密的事儿，因此都显得很不高兴。卡赞走过来，一边问：‘有谁在这里？’当他看见我在箱子后边瑟瑟发抖时，就厉声问：‘你是谁？躲在这里干什么？你听到讲话的声音了吗？’我只好从箱子背后走出来，胆怯他说：‘卡赞先生，我什么都’

没听见。我一个人正在跳舞。你们进来时，我以为是门卫来赶我出去的，所以就藏了起来。你们说的话，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我吓傻了！您明白吗？’

“卡赞先生终于认出了我，信了我所说的话，他说：‘原来是梦露小姐！一个人在空房子里跳舞……’总之，气氛缓和了，我甚至还和卡赞先生开了几句玩笑，说这真像是猫捉老鼠的游戏。我们从此倒成了真正的好朋友，因此，我相信了‘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

“当时，阿瑟只是略带腼腆地站在一边儿，我虽知道他的盛名，却从未看过他的名剧《推销员之死》，因为错过了机会。在我和卡赞聊天，两人都感到轻松之后，他才向我介绍了阿瑟·米勒。阿瑟对我礼貌地微笑了一下，这是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情形，我想，这伟大的戏剧家一定会嘲笑我荒唐的行为。

“这件事发生后大约两周，卡赞先生带我去参加一个晚会。当我躲开人群想到花园透透气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阿瑟。我们都比第一次相见时自然多了，像早已熟悉的朋友一般攀谈起来。不知为什么，他那瘦长的身材，他的嘴形和眼睛，都使我回忆起童年时神交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于是我把自己小时候心灵中的那个秘密告诉了他，我说我认为林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总统。我告诉他，如果他能写一部有关林肯的剧本，而我是个导演的话，那么我就会选他主演林肯！他回答说：‘那将是我最大的荣幸，可是谁来扮演玛丽·都德呢？阁下愿意来扮演吗？’我知道玛丽·都德就是林肯总统的夫人，我俩都哈哈大笑起来。我说，您不仅长相酷似林肯，还具有林肯式的幽默感！我们谈话的气氛更加活跃起来，就像有个小精灵从这头蹦到那头，扯着我们心弦上那根令人发笑的神经一样，我们面对面地哈哈笑着，他还告诉我，他曾在布鲁克林的亚伯拉罕·林肯高中学习过。我们那次交谈有几个小时。自始至终，他，阿瑟·米勒都牵着我的手，拉着我的一只大拇指，他那只手是世界上最温暖的手，又大又宽又厚，我的大拇指就这么安逸地躺在他的掌心儿里。我忽然觉得他又像是个园丁，而我就像是一朵美丽的花儿，享受着他的滋润……过后回想起来仍有种甜丝丝梦幽幽的感觉，就像我第一次坐在那头粉红色的小象身上的感觉一样：幸福、美好，令人终生难忘。

“自此，我再也忘不了这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男人，因为他有妻室儿女，他待我像待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儿。

“后来，你知道，乔·迪闯入了我的生活。然而，阿瑟·米勒，始终在我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成了我心中活着的亚伯拉罕·林肯——一个精神上永恒的偶像。

“当我和乔·迪分手后，再遇到阿瑟时，他并没有轻视我，反而对我不幸的婚姻表示了同情和理解。因此，我觉得和他交谈经常能引起共鸣，他的话总是对我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在我为自己被别人称做‘色情狂’而苦恼时，他教我大可不必，应该无视那些愚昧之徒的信口胡说。应该对自己的人格有自信，他真诚他说，他觉得我的内心是异常美丽纯净的！他的话鼓舞了我，给了我无比的勇气，去面对一切流言蜚语。”

正当玛丽莲·梦露因与乔·迪的婚姻破裂而惶惑之时，20世纪福克斯公司派她担任《绅士与金发女郎》一片中的主角“金发女郎”。此时，她的周薪是5000美元。可是在该片中为她配戏的女演员简·罗素却拿20万美元的总酬。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玛丽莲·梦露第一次真正感到恼火，对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感到屈辱和愤怒。

梦露和公司制片人及导演发生争执并闹翻，她离开了好莱坞，心境恶劣。她开始和自己崇敬的米勒在布鲁克林约会，并向他倾诉自己做人和当演员的种种感受，从阿瑟·米勒的友谊中吸取与社会抗争的力量。米勒不仅是一个头脑清醒、富有哲理的作家，他同时也是一个富有伟大同情心的热情洋溢的优秀男人。他一向重视自己或他人做人的尊严。正因如此，当他得知梦露心灵中深重的创伤之后，更无比怜爱她，他对他的信赖和敬仰之情不仅使他感动，也增加了他对她的一种责任感，她那小乌依人般的温柔依恋，也填补了他与妻子感情不和的空缺。他深知玛丽莲·梦露是一个离不开好莱坞的人，她除了心诚意善的品质和美丽的身段容貌之外，除了当演员演戏，她没有其他的谋生本领。因此，他奉劝她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到纽约里·斯特拉斯伯格夫妇所办的“演员表演训练班”中去学习深造，使自己的表演技巧能得到提高。这也正是玛丽莲·梦露自己所热切期望的。

这期间，他们仍然每周约会一次。

当他们坠入爱河后，他们之间的障碍使玛丽莲却步了，她意识到自己是个第三者。在给朋友的另一封信里她倾诉道：

“因为我一直住在康涅狄克，有时就瞒着艾米偷偷到纽约去过夜，为的是去看阿瑟，第二天下午再匆匆忙忙赶回来。每次我俩分别我都悲痛难忍，就像家猫在外面逛了一夜似的，离开时肝肠寸断！因为他虽是我此生遇到的最好的人，但他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孩子，有自己的家。我可不打算破坏别人的家庭，但谁又能理解我真挚的感情呢？小时候，在孤儿院里，我认识了不少小孩，他们原来都有家庭和父母的，他们呆在孤儿院，就因为有别的男人或女人插入他们的家庭，将他们的父母拆散了，而后，他们的父母再也未能走到一起。在父母各奔前程时，那些可怜的孩子只好被送进了孤儿院。我可不愿做这样自私狭隘的人，我不能落下这样的坏名声，让人们说是由于我的缘故才使几个孩子失去父母。尽管阿瑟总是向我解释说，他和自己的妻子早想离婚了，一切和我没有关系，我不是其中的破坏者。我真希望他说的是实话、真话。我有时就这样宽慰自己，有时就拒绝了和他定下的约会，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因为我从没有像爱他这样爱过另一个男人，虽然我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我年龄大小，真的还不懂什么是爱情，是为了怕回孤儿院，你知道吗？第二次是乔·迪拼命追我，而我要比他被动得多，当然喽，我也喜欢他，请你注意，我觉得喜欢和爱是有相当的区别的。他对我所说的一切关于爱的许诺我部深信无疑，可是他却对我拳脚相加，就差使用棒球棍了，可我从未招惹过他。在怒气冲冲的他的面前，我无可奈何。我一向珍惜婚姻，不愿老是制造婚恋新闻，给自己惹麻烦。可我相信我和阿瑟不会有悲剧的结尾，我俩是从心灵感应开始相爱的，而且爱得深沉，爱得发疯，爱得无法表达！”

1956年初，在密尔顿先生的建议下，阿瑟·米勒决走把《推销员之死》改编成电影，由玛丽莲·梦露扮演其中的女主角，片名改为《汽车站》，这样，他们必须经常碰头研究，也就有了多次自然而然的幽会的机会。

越是相处长久，米勒对她的柔弱越是同情，对她白璧无瑕的纯洁理解得也越深刻和透彻。作为一个具有思想深度、不同凡响的作家，他对她产生了热烈的同情之心，并非是玛丽莲·梦露用出众的女性魅力征服了他。他深深体会到她在好莱坞这架复杂的“赚钱机构”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受的伤害。20世纪福克斯公司只把她当成赚钱的机器，从没真正关心过她的命运，她做人的尊严。

1956年6月，米勒和梦露举行了结婚典礼。

这一对新人的婚礼，因事先毫无传闻，使举国哗然！虽然他们都是社会名流，但人们普遍认为米勒是伟大的天才，妙笔生花的作家；而性感偶像玛丽莲·梦露可能在知识上属浅薄之辈，这两个人怎么可能产生共同语言呢？于是有人说：“阿瑟·米勒一定是疯了！”但大多数美国人却认为：“玛丽莲·梦露一定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机智，富有才华，否则她怎能获得美国最伟大剧作家的爱情呢？”

然而，无论社会舆论如何，玛丽莲·梦露是沉浸在自己幸福无比的婚姻中了……

婚后，玛丽莲笑口常开，歌声轻快，走起路来飘飘若仙，洋溢着甜蜜的感觉。

可以说，这次婚姻是玛丽莲·梦露一生当中最称心如意的事情，也是她最美满的一段生活。

让我们听听剧作家阿瑟·米勒的心声：

“我和玛丽莲·梦露有5年幸福的婚姻生活。起初，我俩都陶醉在这种幸福中，恩爱、甜蜜、分不开、离不了、相互分享生活中彼此的欢乐和苦恼，从精神到肉体我们成了一个人。我欣赏她，她热爱我。正是为了使这种感觉永不消失，我被卷进了那曾吞食她的‘好莱坞机器’。

“陪她应酬那些永无完结的接见和茶会，为了她的影片，我出谋划策，亲自动笔，还要无数次和制片人、导演协商……

“我逐渐发现自己找不到任何创作的时间和灵感了，我失去了太多的自我。即使灵感的火花偶然降临，脑海中出现了戏剧的人物和场景乃至精彩的对话，可我却不能独自与笔纸相处。玛丽莲像顽皮的儿童需要保姆一样需要我的关怀、安慰、照顾、鼓励和推动……天哪，我还能写剧本吗？我不再是阿瑟·米勒了，仅只是好莱坞明星玛丽莲·梦露的丈夫了。

“1960年，我被玛丽莲·梦露折腾得身心疲惫不堪，决定与她分手。

“她哭得令人心碎，还说她会自杀的。

“我说你不必这样，你的一生注定和好莱坞分不开，而我的一生也是和戏剧不能分开的。我们谁也不必为另一个人而牺牲自己的事业。那么，我们只有舍弃彼此的爱情……

“我出于无奈，也是一种变相的残酷的自私。她已经那么习惯于把我做为她的神明、伟大的精神支柱。可我却退却了，把她留在黑暗的人世海洋中，使她如一叶孤舟在茫茫世界里，又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后来，听说她开始酗酒，开始沉沦，开始变成了上层政界要人的情妇……心里真难过……

“难道我没有责任吗？上帝宽恕我吧！”

## 六、情痴反被误 与总统兄弟的隐情

1961年上任、1963年遇刺身亡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总统出身于20世纪美国最有权势的家庭。他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原是伯利恒船厂的助理经理，1926年到1928年还曾从事电影事业，有在两年时间内拍出过76部电影的记录。早年有机会认识了罗斯福，后来，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时，约瑟夫·肯尼迪是他竞选班子中的得力干将。但当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因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对这位为他出过力的人漠然而视，使一心想当财政部长的约瑟夫失望之后转而弃政经商，从事卖酒生意。他利用罗斯福总统之子詹姆斯的关系，取得了苏格兰威士忌和杜松子酒在新英格兰的经销权，因而获利颇丰。他和妻子罗斯到英国寻求酒类经销权期间，又与黑社会有了来往。后来，罗斯福政府任命他为证券管理委员会主席。他进入了华尔街，干得很出色，不仅证明他真正具备行政能力，自我约束能力，还有非凡的工作热忱和充沛的精力。

1936年他出版了名叫《我支持罗斯福》的书。书一出版，他立即给罗斯福寄上一本。

不久就收到了总统罗斯福亲手写的收据，上面写着：

亲爱的约瑟夫：

我支持肯尼迪。书好，我很高兴。

富兰克林谨启这当然是比任命他当“证券管理委员会主席”更高的奖赏，他把它装在镜框里挂在客厅的墙上。

不久他又接任了美国驻英大使的职位，在二战中为罗斯福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

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小约瑟夫·肯尼迪；次子：约翰·肯尼迪；三子：罗伯特·肯尼迪；幼子：爱德华·肯尼迪。还有两个女儿分别叫凯瑟琳和帕特里夏。

1960年年尾，次子约翰·肯尼迪当选为第35届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第二次大战中参加过海军，负过伤，当过战斗英雄。但他从不以此自吹自擂，他是一个质朴无华，温文尔雅，富有幽默感的人。1952年，约翰·肯尼迪当选为参议员，从波士顿迁往华盛顿。那时，他还是个未婚青年，被视为华盛顿最有吸引力的单身汉。不仅因为他富有的家庭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更吸引姑娘们的是他的气质和风度。

她们常常找各种借口接近他，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杰奎琳·伯维尔。她是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优秀记者，整天挎着照相机四处采访，在她撰稿的专栏里，充满了幽默动人的语言。她文笔流畅、思想敏捷，梳一头深褐色的短发，在追求肯尼迪的女人中间，她绝不是最漂亮的。当时，著名影星奥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都曾是一位参议员的嘉宾，但杰奎琳以她的机智和朝气，良好的家族背景，胜人一筹，征服了约翰·肯尼迪。

他们于1953年6月订婚，1953年9月12日在罗得岛新港的圣母玛丽亚教堂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典礼。1961年，杰奎琳做为美国第一夫人入主白宫。约翰成为肯尼迪家族史上最显赫的要人。

但他们的婚姻并非完美无缺。1955年当杰奎琳住院生产时。肯尼迪却正在为他的竞选做准备，没有留在她身边。不幸的是她产下一个死婴，她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丈夫对妻子的忽视和失职，积怨于心。因为当约翰·肯尼迪为

他的腰伤动手术时，她曾寸步不离、为拯救他的生命而付出了全部心力。

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家族中最亲密的朋友是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这位罗伯特自从哥哥当上总统之后，在社会上自然处处受到欢迎，干什么事儿都得心应手。

当得知玛丽莲·梦露与著名戏剧家离婚之后，罗伯特频频拜访这位明星。并告诉她，现在当上总统的哥哥约翰·肯尼迪，还记得当年他身为参议员时，与她见面的种种情形。说他俩都喜欢她。

玛丽莲听了此话，深受感动，就拜托他向总统致以亲切的问候。当时，玛丽莲正处于强烈的感情失落中，她唯一深爱的男人阿瑟·米勒与她离异之后，她的精神支柱崩塌了。有好几个月，她独自哭泣、酗酒，没有一天不吃安眠药。严重的精神创伤使她的情绪很难稳定。她认为自己是因为电影的缘故才失去了心爱的丈夫，因而对电影产生了空前的恐惧。有时躲在化妆室里长时间地哭泣；有时某个情节使她想起米勒，她就坚决要求修改剧本情节；有时没拍完规定的场景，她却失踪了；有时她一个人能一天不吃不喝失魂落魄地呆坐着。她被严重的忧郁症折磨，人们只好把她送进医院治疗。

出院后，玛丽莲·梦露离开了好莱坞，到赌城拉斯维加斯度假，在这里她又遇到了罗伯特·肯尼迪。在他花言巧语的哄骗之下，玛丽莲终于成了他的情妇。罗伯特·肯尼迪生于1925年，他只比梦露大半岁，但此时已是声名大震的美国司法部部长了。

他极其真诚地表示，一定设法与妻子埃塞尔·斯卡凯尔离婚，但必须等待适当时机，因为此事举足轻重，不妥善处理，或许会影响到整个肯尼迪家族的政治前途和命运。他的一番表白，得到了玛丽莲·梦露的理解，玛丽莲轻信了他的许诺。

从此，梦露重振精神，幻想着未来更惊人婚姻的可能性。

罗伯特·肯尼迪开始经常光顾玛丽莲·梦露在洛杉矶郊区华丽的别墅，并帮她请了专职护理人员 and 私人医生顾问格里森大夫。还给她装上了直通他办公室的专用电话。

当他和当总统的哥哥谈及玛丽莲·梦露时，约翰·肯尼迪神秘地笑了。

不久，玛丽莲·梦露开始频频接到白宫发来的各种邀请，参加各种场合下的宴会和各种名目下的仪式，在这些场合中她应付自如，从容得体，人们在报刊上常见到她那依然诱人的风姿，闪闪发光的时装，她又成为公众注视的目标。

1962年5月19日晚，约翰·肯尼迪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举行盛大生日晚会。整个公园犹如神话中的水晶宫殿，灯火辉煌，四处是欢声笑语。肯尼迪更是神采奕奕，他发表了简短而有趣的演说：“45年前，我的父母把一位新的肯尼迪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来，那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我……”欢呼声、掌声轰然响起。总统的讲演结束后，身穿翠绿色紧身长裙，光艳照人的玛丽莲·梦露走上台，她那丰满动人、曲线毕露的夜礼服，使她在彩色灯光的照射下显得额外高雅、俏丽。在官宦满座、富豪如云的隆重仪式里，她演唱《祝你生日快乐》和肯尼迪最喜欢的《当艾里什眼睛含笑时》。那动情的歌声，甚至压过了第一夫人的光彩。一曲终了，欢呼声鹊起。玛丽莲·梦露的魅力使整个公园里的节日气氛更浓了。

玛丽莲·梦露暗中成了肯尼迪兄弟俩的情妇，这在情报局里几乎是尽人皆知半公开的秘密。

梦露更爱他们其中的哪一个呢？聪明的人不难情出。她爱的是总统约翰·肯尼迪。因为约翰·肯尼迪具有天生的幽默感，即使在“古巴危机”时，他也会说些令人捧腹的笑话给梦露听。他对梦露这样说起林肯：“我就睡在林肯住过的那间屋子里。每天看着他那神气的模样，第一个向我道早安的人是他，最后一个祝我晚安的人也是他。”

玛丽莲·梦露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你这是怎么啦？我的美妞？我说的是笑话，照片又不会开口说话。你为什么发呆？”

“可是，我有过和你同样的经历……”梦露说。

“你住过白宫林肯室？”肯尼迪哈哈大笑。

“不！我小时候也有一张亚伯拉罕·林肯的照片，我每天早晨也是第一个对他说早安，晚上最后一个向他道晚安的人……可是，你是住在白宫里，而我那时却是住在贫民窟里的一个可怜的孤儿院里……”说到这里，两颗晶莹的泪珠滴落在总统的领带上。

自从她家里安上了直通白宫和司法部的专线电话，除了极少数的朋友能在事先约好后来看她，她已经与外界隔离了。她再不去好莱坞上班，停止续签一切合同，而把自己封闭起来，直到她意识到自己上了当为止。

她期待着出嫁，但她知道，总统是不可能娶她的，她也不愿因自己破坏了他的政治前途。可是罗伯特是可以娶她的，他不仅信誓旦旦地保证过，况且他是司法部长啊，真想离婚，不是易如反掌吗？

可是他每次来寻欢作乐后，总是对此推三推四，当玛丽莲真的怀上了他的孩子时，他却让她打胎。再后来居然避而不接梦露的电话。

玛丽莲·梦露终于明白了，她想结婚，结束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只是一厢情愿的梦想。后来，她主动避开了他们，拒绝做他们的玩偶。她在想对策，她忍不了这口气。于是她自己向某个小报的记者放风：玛丽莲·梦露将要公开个人密恋的记录——她的日记。她还打算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她与某个官界人士的私情……

可以想象这种风声对肯尼迪家族产生了多大的震撼。

她通向白宫和司法部的专线立刻被拆除。梦露明白，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因此，她再不敢轻易走出家门，她知道那样会有被暗杀的可能，她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命多加小心……她把自己的一切记在了她那本粉红色的日记里。她决定再回到电影和舞台上去。

两位具有最高权势的肯尼迪兄弟，也许对玛丽莲·梦露都不想下毒手。他们真爱也罢，假爱也罢，总归从这位女人那里得到过快乐和满足。

但他们的所做所为，始终没有逃过老约瑟夫·肯尼迪的耳目，这位为肯尼迪家族建功立业的人还活着。虽然半身瘫痪坐在轮椅里，可是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他依然全身心地注视着儿孙们的一举一动，不容任何人败坏肯尼迪家族的名声。别忘了：他在电影界也是个老前辈，对付一个“小演员”，他有的是办法。他早在30年代初就和美国的黑社会有关系。

老约瑟夫·肯尼迪在两个儿子和玛丽莲·梦露的这场“游戏”中，始终怀着警惕在冷眼旁观。

当小报上的消息传出后，他会坐视不顾吗？

## 七、案情有进展 二十年后再掀波澜

玛丽莲·梦露死因始终是个悬案。经过 20 年的岁月，直到 1982 年 12 月，才有了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公布。当年接到报案即赶到现场的杰克·克莱蒙斯警官，是一个有正义感而性格刚毅的人，是他坚持要求对玛丽莲之死一案不做“自杀”结论，而送法院解剖的。他对几位在场人察颜观色的结果，使他认为其中必有谎言。尽管后来“自杀委员会”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应属自杀”写在了诺古奇的解剖报告里，他依然坚持自己对“谋杀”的怀疑。

另一个怀疑玛丽莲死于谋杀的人是洛杉矶市一个自称曾与她有 4 天婚史的作家罗伯特·斯莱沙。他认为被诺古奇医生忽视的那块乌青事出有因，说不定是在玛丽莲·梦露被轻微麻醉的情况下，从那儿强行注入了大量安眠药物致死的。因为注射少量麻醉剂的小针眼儿消失很快，几个小时后当然不会再发现。可是强制注射时，对方稍有反抗，就会在皮肤上造成损伤，这就是瘀斑形成的主要原因。另一种可能是被注射者虽不能反抗，但执行注射任务者心情紧张，用力过猛，也同样会留下外伤，因为那瘀斑的位置确在腰下髓骨处，与臀部注射部位十分接近，这一说法令许多人信服。

尤其让人生疑的是，与梦露同住一住宅区的一位妇女说她曾看到过罗伯特·肯尼迪同一个身背药箱的人一同进入过玛丽莲的家中。这种说法可能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干这种事，一个司法部长用不着亲自参与就能办成。但杰克·克莱蒙斯警官说，他在 1962 年，确曾在验尸官的办公室里见过那本传说中的粉红色日记本，可第二天就不见了。据说其中有些内容涉及到当时的国家机密，因此被国家安全局的人收走了。这更证明玛丽莲·梦露生前的确和肯尼迪兄弟有密切往来，否则她又怎能从何种渠道得知什么“国家机密”，而把它们记在自己的日记里呢？

玛丽莲·梦露死前不久曾向她的一位好莱坞女友透露：不久，她有可能再次结婚，对方将是肯尼迪总统的亲弟弟罗伯特·肯尼迪。

罗伯特·肯尼迪涉嫌玛丽莲·梦露之死的另一证明人是电话窃听专家伯尼·斯平德。他控告说，由于他知道玛丽莲·梦露曾拥有通向司法部的专线电话，他为某些其他事情搜集过有关罗伯特·肯尼迪的材料，因此而遭到过纽约州检查院的搜查。当时检查院院长弗兰克·霍根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好朋友，他们没收了伯尼·斯平德家中的全部录音磁带，其中包括涉及到玛丽莲·梦露死因的证据。斯平德 1980 年起诉，要求归还这些物证。因此可以认为关于玛丽莲·梦露死因的官方说法，始终是不可信任的谎言以上这些情况说明：玛丽莲·梦露的死因与当时的政界要人肯尼迪家族有直接关联。

另一位名叫詹姆斯·霍尔的人称，1962 年他曾在洛杉矶当过救护车司机，他说玛丽莲·梦露从她家抬上车时，的确还没死。在他正要把这位明星救活之际，跟她上车的一个医生给她打了一针，说是强心针，可是她却立刻死了。他至今记得那个医生留着络腮胡子，脸上好像还有麻子。可是洛里森大夫却没有麻子，那这麻子又是哪儿来的，跑到哪儿去了呢？这一说法似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杰克·克莱蒙斯对现场观察的怀疑。

于是旧闻重炒：关键证人，那位当时玛丽莲·梦露的专职护理人尤妮斯·默里女士，人们怀疑她肯定是被人收买后才沉默不语。以谎言掩盖事件真相的。还有玛丽莲·梦露死的前一天住在她家中的那位帕特·纽科姆，她的新闻发言人，是否也是被人收买的呢？据默里护士讲，他曾因为拿过梦露的安眠药

而与梦露发生了争吵,其间他做过什么手脚没有呢?解剖医生诺古奇 20 年前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诺古奇为了澄清自己,在 20 年之后,自己也发表声明要求重新审理此案。另外,当年负责验尸的助手罗兰·尤迪声称,他当年在玛丽莲·梦露的死亡证明书上签字是被迫的。

全国又掀起了一场要求重审玛丽莲死亡案的波澜。终于,洛杉矶地方法院表示要在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重新开庭审理。到重审那天,记者们再一次一窝蜂似的聚集在洛杉矶地方法院、等待现场采访。地方法院被警方重重包围,他们阻拦一切记者入内。出人意料的是还未开庭就传出了地方法院驳回了斯莱沙等人要求起诉的说法。至此,众望所盼的“水落石出”又化为泡影。

在记者和全国舆论界的不依不饶之下,洛杉矶地方检察院在 1982 年 12 月终于公布了其调查报告,报告原文如下:

“一宗谋杀案非同小可,其过程、结果必定需要密谋。

凡在 1962 年 8 月 4 日到 8 月 5 日之间,到过死亡现场的所有人,主任法医及验尸官,临时指定进行尸体解剖的外科医生,派往现场的所有的警方人士,以及洛杉矶警察局的高级官员等等……经过多方调查,反复查证,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支持某种谋杀假说得以成立的迹象。”

此报告还附带说明:“之所以进行这次调查,是因为 1962 年地方检察院对该事件未进行过彻底审查(不过诺古奇医生做尸体解剖时,地方检察院院长约翰·迈因纳在场)。”

这份报告公布后,如释重负的诺古奇医生最感激的是几位有社会地位的医学界名人对他的解剖报告给予了出人意料的充分肯定。但绝大多数持“谋杀”观点的人们并没有因这一报告的公布而疑虑全消,他们认为这是法学界无能的具体表现。

欺骗之说未能消除。有几位知名记者说,联邦调查局根据新闻自由的原则转给他们参阅的玛丽莲·梦露的档案,因缺页太多以致无法连接起来。一位受人欢迎的电影明星的档案,又何劳联邦调查局的大驾去删节呢?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1962 年监督诺古奇医生解剖的地方检察院联络官员约翰·迈因纳当年曾和杰克·克莱蒙斯警官有一致看法。他不仅观看了解剖,还亲自询问过玛丽莲·梦露的私人医生格里森大夫,这位大夫曾给他听过自己在梦露生前和她谈话的录音,迈因纳保证不向任何人透露,但是他后来对克莱蒙斯警官说:“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玛丽莲·梦露绝不是自杀而死的。”

但当 1982 年地方检察院公布了调查报告后,迈因纳对当年所说的话作了更正:他说当时的意思是,玛丽莲的自杀可能并非出于本意,或许是在某种意外情况下吃错了药……

对这一切均不屑一顾的是那位作家罗伯特·斯莱沙。他声称,即使把自己的一生都献出去,他也心甘情愿。他要继续进行单独的私人调查,要为曾做过她 4 天妻子的玛丽莲·梦露报仇雪恨。

## 八、意外的尾声 明星死于政治谋杀？

在 1982 年玛丽莲·梦露的疑案旧事重提后，又过了 3 年。1985 年 11 月 23 日，巴黎法新社发表了一条新闻：“有一应自称跟玛丽莲·梦露有过 4 天婚史的美国作家罗伯特·斯莱沙今日在罗马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说，他有证据表明，这位性感明星当年并非自杀身亡，而是因为她涉嫌跟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的桃色关系而遭杀害的……”

消息自然又通过越洋电传，传回了美国。1996 年，事隔 11 年之后，一本名叫《33 号地下室：玛丽莲·梦露传说最后章》一书在美国出版，该书是由两位美国作家合写的。书中说，当时已因中风而半身瘫痪的老约瑟夫·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秘密跟黑帮头子联络，由他派人下手杀了梦露。而后来的掩饰行动，据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及肯尼迪兄弟都参加了。

书中还说：玛丽莲·梦露在死前两周曾堕胎，打掉了她和罗伯特·肯尼迪的骨肉，当时，她曾威胁说要把他们的丑事公诸于众。如果梦露真的这样做了，当时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和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都可能终止自己的政治生命。

1986 年拍卖的玛丽莲·梦露的一个电话本被一个青年人买去，它只有 12 页，可是在其中的某一页上写着“11 点给杰克打电话”，杰克是肯尼迪的爱称。此事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相信梦露死于政治谋杀的人认为它是又一个有力的佐证。

梦露死后，肯尼迪兄弟也先后遇刺身亡，命运之神谁也把握不了，而且他们的死也成了历史之谜，至今无法破案。会不会是哪位倾心于玛丽莲·梦露的影迷干的？或者是玛丽莲·梦露那不朽的冤魂向她的谋杀者施行了报复？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梦露之死和肯尼迪之死一样，虽然在公众中引起过种种猜测，但至今谜底仍未揭开，也许它们在等待历史中的某一个契机，也许它们永远是一个谜，谁知道呢？

（王素萍撰稿）

## “新边疆总统”遇刺——谁刺杀了约翰·肯尼迪

“不要问祖国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要问你们能为祖国做些什么。”

这句名言曾伴随它的演说者在 60 年代的美国独领风骚。这位演说者以其干净利落、朝气蓬勃的风俗开拓着“新边疆”，探索财政政策，保证经济增长，扩大社会福利，加强教育、保险，缓和贫富悬殊，向贫困宣战，支持民权运动，缓和种族矛盾。在国际事务中他也不甘示弱，援助拉丁美洲的 10 年“争取进步联盟计划”，树立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新形象。在美苏激烈对峙的“古巴导弹事件”中，态度强硬，维护了美国霸权。正当他赢得民心，欲借内政外交频频得分之势争取连任，继续其新自由主义改革之际，突然饮弹身亡，遗恨千古。在他死后 30 余年里，人们对其死因纷纷置疑，各立“新说”，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使得该案疑云密布，谜团重重，至今尚无满意的定论。这位迅忽而逝的风云人物便是年仅 42 岁就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最年轻总统的约翰·肯尼迪。当人们徘徊于国家公墓肯尼迪墓前，默诵石碑上净净誓言，免不了会喟叹这位总统至今亡灵不得安息，也不免去追忆那纷纷扰扰的前尘旧事……

## 一、总统遇难 留下疑云重重

1963年，民主党、共和党的激烈辩论再次弥漫了政坛，新一轮总统竞选又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在任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年富力强，政绩不错，一心争取连任，干出一番事业来。回顾1960年大选，他获得59%的选票，以微弱多数取胜，而在得克萨斯州，他的得票数却低于40%，并且以达拉斯市问题最为棘手。达拉斯市是以开发石油而发迹的南部城市，石油大亨们由于肯尼迪大选前对黑人频频许诺而心怀不满。1963年9月，肯尼迪正式宣布将在11月下旬巡视达拉斯后，顿时举市沸腾。反对派纷纷跳出来指责他没有挽救令人忧虑的非洲局势，在刚果、加纳、葡属安哥拉，苏联人正扩张着他们的势力；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重要接触，也被视为“对美国德性的严重破坏”；其余如越南问题，反共法案问题，肯尼迪对共产主义的“绥靖”，俯拾皆是，怎能不使某些集团耿耿于怀？就在11月22日，总统访问达拉斯市当天，当地报刊《达拉斯晨报》还刊登了丑化总统的照片和文章。

对肯尼迪来说，达拉斯之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必须在支持者和对手面前展示出勇气和自信，必须在这场智力的角逐中取胜，才有希望再次问鼎总统宝座。“如果谁豁出命来谋杀美国总统，那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肯尼迪拒绝了别人善意的劝阻，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行。

总统巡视的日程早已安排好了。首先在圣安东尼奥的布鲁斯空军基地出席美国航空和航天医疗科研所成立庆典，然后在休斯顿出席民主党众议员阿尔伯特·托马斯举行的晚宴并发表演说，接着在沃恩堡出席商会代表举办的有两千位名流参加的早餐会，最后到达拉斯市的贸易中心发表演说。与此同时，保卫工作也井然有序地铺开了。州警察局把掌握在手的可疑分子照片分发到每个警员手中，一些最危险的人物还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在总统下榻的饭店，所有可能隐藏炸弹的角落、装饰物部经过了细致的检查；连饮食也由先行人员做了毒性检验。看起来，防范措施滴水不漏，总统应当是安然无恙的。

1963年11月22日上午10点45分，“空军1号”总统专机载着肯尼迪总统及其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徐徐降落在达拉斯机场。随后，总统夫妇坐上专门空运来的豪华林肯GG—3000防弹轿车。由于总统不喜欢车顶的笼罩，也为了更好地接近达拉斯市民，防弹车顶在总统的坚决要求下拆掉了。同车的还有坐在前排的康纳利州长及夫人、总统卫队长罗伊·凯勒曼，警察摩托车、“玛丽皇后”警车前后护卫，副总统、参议员、达拉斯市政官员和当地名流的轿车紧随其后，浩浩荡荡的车队穿行在挤满了人的街道上。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碧空如洗，微风轻拂，达拉斯市民倾城而出，更给这座城市平添了几分节日的色彩。总统似乎也被这种情绪所感染，春风满面，笑容可掬，时而停车和一群打着“总统先生，请在我们身旁停一下，同我们握握手”标语的小学生握手，时而下车与教堂前伫立欢迎的修女攀谈。看来，达拉斯人是喜欢总统的，这对肯尼迪真是莫大的鼓舞。

12点28分，车队驶离市中心，从休斯顿街拐向埃尔豪街，通过铁路下的地下道，向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驶去。警卫用对讲机通知贸易中心，5分钟后车队抵达。康纳利夫人扭头对总统夫人说：“我们快到了，就在前面车道那边！”话音未落，只听“呼”的一声枪响，总统身子一颤，抬头想要护住脖子，鲜血早已涌出！杰奎琳扭头一看，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得

目瞪口呆。罪恶的子弹还在射向总统座车，前排康纳利州长中弹滑下了车座，随后，致命的一枪正中肯尼迪总统后脑，他身子一歪，倒了下去。枪杀从天而降，总统卫队一片混乱，总统的司机在枪响时不知何故一个刹车停了下来，卫队长凯勒曼急得大声训斥，后卫车上的特工克林顿·希尔想跃上总统轿车护卫，却跌倒在行李舱舱盖上，被杰奎琳一把扶住。

12点38分，总统轿车来到离出事地点最近的帕克兰纪念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立即投入了对总统的紧急抢救：切开气管，按摩心脏，然而，子弹穿过了大脑，肯尼迪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13点，医生宣布：总统逝世。14点28分，“空军1号”专机载着总统遗体返回华盛顿。在同一飞机上，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按照美国宪法，宣誓继任总统。

在案发现场，特工和当地警察迅速控制了局面，并对周围进行了严密搜查。4分钟后，在一位目击者指引下，特工人员来到教科书仓库大楼，在5层楼发现了一支“卡尔卡诺38”型步枪，在6层楼又找到3个子弹壳和一些吃剩的烧鸡。另一位目击者介绍道，1分钟前一名行迹可疑的男子匆匆离去，仓库主任根据所描述的外貌确认，此人系仓库新雇员李·哈韦·奥斯瓦尔德，身高1.75米，年龄约30岁，瘦削，白人。这些线索立即被告知全市警员。无巧不成书，巡警蒂皮特驾车在大街上巡逻，发现一人神色可疑，于是上前盘问。此人张惶之际，拔枪射击，杀害了蒂皮特警官，随后夺路而逃。“得克萨斯”电影院旁的一家鞋店老板，无意中瞥见一名神色惊惶、步履匆匆的人闪进了电影院，他立刻报告了警方。13点45分，警车包围了电影院，逐人搜查，终于抓获了这个名叫奥斯瓦尔德的人。从总统遇害到凶手被擒，只用了100分钟，破案之神速令达拉斯市检察长都感到难以置信，下属警员也连呼走运。

刺客的子弹使风华正茂的总统猝然倒下，随之他所推进的事业也似乎戛然而止，人们寄予的美好梦想也瞬间破灭，整个美国都陷入了巨大的悲哀之中。11月25日举行国葬那天，当马拉的炮车把肯尼迪的灵柩载到圣马太教堂举行安魂弥撒之时，有100万人仁立在道路两旁，默然致哀，最后看一眼他们所景仰的总统；与此同时，有9000多万人从电视屏幕上观看了葬礼。

就在同一天，警署决定将奥斯瓦尔德从市监狱转移到1600米以外的另一座监狱，急于捕捉最新消息的记者闻讯蜂拥而至，把监狱大门围了个水泄不通。11点20分，警察押解着奥斯瓦尔德走了出来，镁光灯顿时“咔嚓”、“咔嚓”闪个不停。突然间，人群当中冲出一人，手握科尔特手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奥斯瓦尔德就是一枪，奥斯瓦尔德腹部中弹，送进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在警卫森严、众目睽睽之下，杀害总统的头号嫌疑犯居然被杀灭口，举国上下莫不对此感到震惊和疑惑。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杀害要犯？经查证，此人名叫杰克·鲁比，是一家夜总会的老板。由于和当地警察很熟悉，鲁比的在场并没有受到怀疑。受审时，鲁比自称为了不让杰奎琳夫人经历审讯所带来的痛苦折磨，故杀死奥斯瓦尔德以平心中之愤。此外，他没有再提供其它有利于案件调查的线索。

一时间，愤怒和不信任的气氛弥漫开来。为了澄清事实，1963年11月29日，约翰逊总统下令成立调查肯尼迪总统遇刺的调查委员会。这个被称为“沃伦委员会”的调查小组可谓阵容强大：委员会主任由美国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担任，下有肯尼迪总统胞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

迪、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以及后来的总统福特等6名参议员、14名顾问、20名律师和侦探组成了中心小组。这个委员会还拥有至高权威，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秘密警察机关的特工人员都要优先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命令。“沃伦委员会”先后动用了80名联邦调查局骨干，进行了26550次审讯，写出了2300份总计25400页的报告，调查了1550人，准备了800份资料，委员会主要成员也亲自出动，听取了552名证人的陈述。经过10个月的紧张工作，1964年9月24日，一份长达470页，后附26卷证词、像片、图表、详细描述凶犯本人和行凶过程的报告交到了约翰逊总统手中。报告认为，刺杀总统系奥斯瓦尔德一人所为。他借担任仓库职员之便隐身于大楼之中，从6层东南方向的窗户由后面向总统连开3枪。根据现场一名摄影爱好者拍下的录相，4名弹道专家认为，在4.7—10秒的射击时间内，第一颗子弹射出后击中肯尼迪背部，穿透身体后又击中康纳利州长，第二颗子弹击伤一位行人，第三颗子弹正中总统后脑勺，它造成了总统的致命伤。凶犯使用的“卡尔卡诺38”型步枪与子弹是吻合的。死亡的蒂皮特、杀死凶手的杰克·鲁比与奥斯瓦尔德素昧平生，毫无瓜葛。奥斯瓦尔德为什么要枪杀肯尼迪总统呢？“沃伦委员会”认为：奥斯瓦尔德对一切权力的仇恨；他不能和人们建立富有意义的关系；他强烈要求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他的暴力能力；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

如此简单的结论并不能使美国公众满意。总统的私人秘书、调查小组中某些人、历史学家、新闻记者从不同方面提出了质疑：

第一颗子弹射向总统的时候，司机——经验丰富的特工比尔·格里尔为什么没有驾车飞驰而去，反而一反常态刹住车使总统成为谋杀者的活靶？特工人员的训练有素、机智敏锐都到哪里去了？

录相表明，枪声刚响，几十名警察立刻向一个长满灌木丛的铁路路基奔去，这说明这附近一定隐藏着一个扣响扳机的狙击手。警察赶到后，一个手持特工处证件的人说这里一切正常，然而事后证明特工处并没有在这里安排人手。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一名铁路职工说，案发时他在一个14英尺高的调度塔上看见灌木丛中火光一闪，那里有两个男子，还有三辆轿车，很快就踪影全无。这些证明第二杀手存在的证词为什么没有得到重视呢？

有的专家认为，奥斯瓦尔德使用的枪是1940年制造的，没有自动装置，瞄准精确度也不高，在通短几秒钟内是不可能连发3枪的。现场分析显示，第一颗同时打中总统和州长的子弹总共留下了7个枪眼，子弹怎么可能如此转弯呢？无巧不成书，一位名叫玛丽·费雷尔的妇女录下了当时的一段声音，某些声学专家经过分析后认为，至少开了4枪。那么这个第二杀手是谁呢？

奥斯瓦尔德被捕后，警察对他进行了长达12小时的审讯，然而奇怪的是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记录。

至于杰克·鲁比，他对刺杀原因的回答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被捕后，他被拘禁在曾关押过奥斯瓦尔德的县监狱。鲁比多次向前来提审的沃伦院长和杰拉尔德·福特说：“我想向您讲真话，但不能在这里讲。”“把我带到华盛顿吧，也许有些人不想知道可能从我嘴里讲出来的真情。”显然，鲁比讲这些话是有苦衷的，如果他受雇于人，这些人再收买当地警察，一旦鲁比说出什么，就会和奥斯瓦尔德同样下场。“沃伦委员会”为什么不抓住线索深入调查呢？

诸多的疑点，都是“沃伦委员会”没有解释清楚的。于是，许多人从奥

斯瓦尔德开始重新审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促使他走上谋杀总统之路？他与其它集团有瓜葛吗？

## 二、杀手身世 牵动国际风云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1939 年 10 月 18 日出生在新奥尔良州。出生前两个月，他便失去了父亲。家中原来就有两个幼子需要抚养，现在又添了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母亲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不得不拖着孱弱的身体外出找工作，即使这样也难以维持艰难的生计，只有把两个哥哥送进孤儿院。奥斯瓦尔德两岁时，也步其兄后尘，直到 4 岁才被领出。这时，两个哥哥已经进入军校念书，母亲又嫁了一个男人，奥斯瓦尔德便和他们一起居住在达拉斯。在奥斯瓦尔德的回忆里，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平静、幸福的时光，继父的慈爱使他体味到从未享受过的家庭温暖。然而好景不长，3 年以后，母亲这次短暂的婚姻破裂了，奥斯瓦尔德又回到残缺的家庭生活之中。母亲玛格丽特为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奔波于达拉斯和新奥尔良市赚取微薄的收入，两个哥哥一到法定年龄也立刻去找工作，大家都在为糊口而挣扎，谁还顾得上搭理他呢？奥斯瓦尔德在孤寂中度过了童年。

1952 年 8 月，玛格丽特把家迁往纽约，在布鲁克斯区单独租了一套公寓房。那时奥斯瓦尔德刚上 7 年级，他是多么怀念达拉斯啊！那里有伴随他成长多年、熟悉的一草一木，更有朝夕相伴的好朋友。纽约虽然繁华，可奥斯瓦尔德难以融入这个环境。班里的同学纷纷讥笑他的南方口音，略显土气的着装，以及拘谨局促的举止。很快，学校发现奥斯瓦尔德经常逃学，总是躲在一个角落里沉迷于电视或杂志中。人们把他关进精神病医院进行检查，医生认为：“李是一个感情丰富却有问题的年轻人，他的感情受到孤立，甚至被剥夺。他缺乏被人所爱，缺少家庭生活，他的连自己也顾不过来的母亲更没时间去关心他，因此他实际上被他母亲抛弃了。”

因此，奥斯瓦尔德经常表现出“极度焦虑、害羞，经常产生不安全感。”这时，奥斯瓦尔德才 13 岁。

也有那么一段时间，奥斯瓦尔德表现出了他活泼、热情的一面，和同学们相处融洽，学习成绩也很好，并一度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但很快又故态复萌，最为严重的是他拒绝和同学一起向国旗敬礼。50 年代初期的美国笼罩在一片反苏反共的政治恐慌之中。二战刚刚结束，杜鲁门政府便把冷战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国内工人运动的高潮，海外士兵的骚动，战时经济转入平时轨道调整过程中引起的通货膨胀和人心浮动，给保守势力抬头带来了机会。参议院政府活动委员会主席和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约瑟夫·雷蒙特·麦卡锡顺势在美国制造了白色恐怖。上至政界要员下至平民百姓，都可能被控为赤色分子遭受无休止的盘查和残酷的迫害。社会上充斥着反对共产主义的叫嚣，许多社会名流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蒙冤入狱。1953 年，朱利叶斯和卢森堡案件终审，人们对审理结果议论纷纷。14 岁的奥斯瓦尔德得到了一本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书中抨击政府对卢森堡案件作了不公正判决，言语激烈，感染力强，深深打动了年轻而早熟、心灵孤寂而饥渴的奥斯瓦尔德。他认为，自己的童年悲苦困窘，并不能归咎于自己的母亲，他们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音。

不久，他们母子在纽约也难以容身了，只有迁回新奥尔良，奥斯瓦尔德又因为来自大城市而遭到同学的孤立。家庭的冷漠、童年的不幸、社会的遗弃，使他幼小的心灵过早地蒙上了阴影，他决定离开这里，去参加海军陆战队。

1956年10月，奥斯瓦尔德应征入伍。在军队里，他仍旧是那样落落寡欢。因为身材瘦削，嘴巴又薄又小，他被战友戏称为“小老鼠奥西。”这期间，他慢慢咀嚼着惠特曼的《草叶集》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同时学习俄文，阅读俄文报纸。由于不满某些条例和规定，他屡次与教官发生争执，终于有一次被送入军事法庭受审，判处28天禁闭。又因为违反规定私带手枪，枪走火打中手臂，他再度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受审和禁闭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终日受到严密的监视，被强迫做许多繁琐的事情，还经常遭到斥责和人身侮辱。这段经历像恶梦一般缠绕着奥斯瓦尔德，他下决心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不可能再给他希望而只留下一堆痛苦回忆的国家。

奥斯瓦尔德暗地里加强俄语学习。1959年的一天，他向上级提出提前退役，理由是母亲瘫痪，需要照顾。事情进行得异常顺利，他没费什么周折便拿到了退役证书，告别了军营。奥斯瓦尔德心中充满着对苏联之行的美好幻想，奔涌着脱离苦海的狂喜之情，毫不犹豫地花掉几乎所有的积蓄买到了前往苏联的机票。他想，自己应该作为弃暗投明者受到隆重的欢迎。

现实似乎总是在捉弄奥斯瓦尔德，苏联官员冷冰冰的面孔和怀疑的眼神令人战栗，而“苏联政府不欢迎你在我国停留”的通知则使他彻底绝望了。的确，50年代后期，苏联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实力增强，氢弹的爆炸成功又结束了美国核垄断地位，赫鲁晓夫有了与美国“平起平坐”谈判的资本。在美苏争霸愈演愈烈的关键时刻，谁会轻易接受一个来自敌对阵营的人呢？“我感到震惊！那是我的梦想，我等待被他们接受已经两年了，我的理想到头来是一场空，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奥斯瓦尔德求死未成，苏联官员最终勉强同意他留居下来，可是他从此一蹶不振，难以从失望的深渊中自拔。回美国显然不是良策，唯有在苏联苟且度日，他和几个苏联人交了朋友，并和一个名叫玛丽娜的姑娘结了婚。奥斯瓦尔德一度申请到莫斯科一所大学里念书，但没有被获准，于是他进了明斯克的一家电视机和录音机生产厂，一晃便是3年。

1962年，奥斯瓦尔德不可思议地携全家回到了美国。为什么他又回到了这个他所仇恨的国度？是因为理想的再次幻灭？在日记中，他的失望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在美国“你会为贫穷所困扰”，可是苏联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同样让你感到倍受压抑。“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国家”，“都不存在公正的社会制度，只是两种牌子不同的奴隶制度而已。”

总统遇刺后，人们对奥斯瓦尔德的回国，产生了新的猜度，他是否是身负苏联官方的特殊使命？

1964年1月23日，一位名叫尤里·诺森科的苏联克格勃官员希望投奔美国，并扬言有重要情报要告知中央情报局。据调查，自从1959年奥斯瓦尔德叛逃苏联以后，诺森科一直是克格勃管理奥斯瓦尔德档案的人，他也许能证实苏联克格勃是否和肯尼迪之死有牵连，但是，诺森科会不会是反情报间谍？这本身又是一个谜。

1963年，奥斯瓦尔德开始对第三世界国家，美国的拉丁美洲近邻古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50、60年代是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反帝争取独立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就在这期间，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被风起云涌的古巴人民革命推翻。1959年，成立了以卡斯特罗为首的临时政府。卡斯特罗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打击美帝国主义、本国庄园主和资产阶级势力的改革，并成功地粉碎了美国的武装颠覆，使美国在“猪湾事件”中丢尽脸面。他提出“拉丁美洲

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拉丁美洲”的口号，从而树立起了一面鲜明的独立自主、反抗强权的旗帜。高大魁伟的卡斯特罗以其英勇果敢、坚强独立的革命精神赢得了古巴人民的拥戴，也深深吸引了奥斯瓦尔德。或许在他心目中，古巴既不屈从于白宫淫威，又没有沾染克里姆林宫官僚主义作风，具有真正的革命精神吧！

古巴革命建设的蓬勃开展点燃了奥斯瓦尔德心中的希望之光，他开始寻找一切机会接近古巴。

在达拉斯居住着一位退休少将爱德温·沃克，一名极右翼反共分子。他仇恨民权运动，主张严加镇压；敌视古巴革命，鼓励入侵颠覆。沃克由于极端表现而被勒令退役，这反而使沃克有更多的机会宣扬自己的主张，从事反共活动。他的行为引起奥斯瓦尔德的仇视，他决定把沃克作为自己第一步行动的目标。

1963年3月12日，一支0.65口径、带有远射瞄准器的来福枪从芝加哥邮寄到达拉斯奥斯瓦尔德家中。他家的抽屉里则塞满了沃克住所各个角度的照片，其中也有一张奥斯瓦尔德英武的戎装照，一身黑衣，持枪傲立。这张照片分别寄给了《战斗者》周刊和《工人报》，并附题辞：“准备应付一切”。

4月6日，由于长期不满奥斯瓦尔德乖张、隐秘的行动，奥斯瓦尔德所在的摄影公司解雇了他。奥斯瓦尔德回到家中立刻全身心投入暗杀活动，一方面制订周密的行动计划，一方面为防备自己被捕或被杀，给妻子交待了后事。

4月10日晚9点，奥斯瓦尔德潜伏在一个最佳位置，把目标的一切尽收眼底。不远处，沃克酒足饭饱之后悠悠然踱进书房准备看书，就在他走向书桌的时候，奥斯瓦尔德扣动了扳机。他算准了此时有一趟车来接附近一所教堂里做完弥撒的教徒，于是不慌不忙地埋好枪，跳上车一溜烟回到了家。

第二天早上，报纸上刊登了沃克将军枪下逃生的消息，奥斯瓦尔德不免有些沮丧，但当他得知警方难以判断枪的型号，并揣测杀手驾驶小汽车逃走时，不禁哑然失笑。奥斯瓦尔德顿生自信，内心充满了对警察的鄙视。

此时，奥斯瓦尔德全家只能靠领取失业救济度日，他却慷慨解囊，自费印刷“为古巴而斗争”的传单，并亲自上街分发，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在政治活动上。由于经常阅读《工人报》这类激进刊物，他演讲起来也口若悬河，旁征博引。他写信给古巴正义事业委员会全国总部，要求在新奥尔良设立分部，总部复信答应了这个只有奥斯瓦尔德一名成员的分部成立。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使奥斯瓦尔德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政治活跃分子。在一次电台举办的辩论会上，他出尽了风头。他甚至因参加支持卡斯特的游行而被捕，抚养过他的叔叔莫雷特将他保释出来。莫雷特是一个背景复杂的出版商，与他合作的人中间有黑手党头子卡洛斯·马塞洛的司机，他本人也与马塞洛手下的人有直接联系。此次安排保释的正是马塞洛手下的人。此外，奥斯瓦尔德所租用的临时联络站兵营街544号是个鱼龙混杂之地，反卡斯特罗组织、与古巴流亡者和美国情报机关均有联系的盖伊·班尼斯特同事会、马塞洛的私人侦探戴维·弗里均使用这个地址。奥斯瓦尔德枪杀总统后，人们不禁提出疑问：难道，黑手党也插手此事了吗？

9月17日，奥斯瓦尔德申请了去墨西哥的签证。当时古巴和美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去古巴只有通过驻墨西哥的古巴使馆申请到签证才能前往。9

月 27 日，奥斯瓦尔德踌躇满志地走进了古巴使馆。为了证明自己是古巴人民的朋友，他一一列举了自己的壮举，并直言不讳自己与反古巴流亡者及黑手党的接触，说那是为了获取反卡斯特罗组织的活动情报。他甚至说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以图获得使馆秘书西尔维亚·杜兰的信任。但杜兰小姐不无遗憾地告诉他必须通过组织安排这次旅行，因此，他首先要照张照片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其次要到苏联使馆获得签证。奥斯瓦尔德强抑住心中的懊恼转身跑到了苏联使馆，却得知至少要等三四个月才能拿到签证。7 年前在苏联感受到的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再次浮现眼前。奥斯瓦尔德两手空空回到古巴使馆，只有撒谎自己拿到了签证。他虚弱无力的神色和闪烁不定的言辞使杜兰小姐起了疑心，她给苏联使馆挂了个电话，谎言被揭穿了。使馆工作人员毫不留情地对奥斯瓦尔德下了逐客令。

10 月 3 日，奥斯瓦尔德忍受了一路上长途汽车的颠簸和边界检察员喋喋不休的盘问，心力交瘁地回到达拉斯。几天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找到一份差事，这里地处日后总统来达拉斯的车队可能经过的三条道路中的一条。

11 月 1 日，一名不速之客来到奥斯瓦尔德家中。此人名叫詹姆斯·霍斯蒂，联邦调查局特工。实际上，自奥斯瓦尔德从苏联返回，他就在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中了。10 月初，奥斯瓦尔德曾被特工从公寓中赶出来，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继续化名从事政治活动。当联邦调查局获悉他的墨西哥之行后，便派霍斯蒂登门质询。碰巧这次奥斯瓦尔德不在家中，他住在贝克利北街一所新租的房子里，使用的名字是“O.H.李”，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周末，奥斯瓦尔德回到家中得知特工来过，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11 月 5 日，霍斯蒂再次找到奥斯瓦尔德的妻子玛丽娜了解情况，奥斯瓦尔德知道后勃然大怒。11 月 12 日，他在上班路上寄出了一封信，详述了他墨西哥之行的遭遇和目前联邦调查局对他的纠缠，收信地址是苏联大使馆。接着，他来到商业街 1114 号联邦调查局达拉斯办公室，南希·李·芬纳正在埋头办公。

“我找霍斯蒂！”奥斯瓦尔德怒气冲冲。

“没在！”南希见来者不善，也没好气。

“把这个交给他。”

一个信封扔到了南希面前，她扫了一眼露在外面的信纸，不由得大吃一惊。“如果你不停止骚扰我妻子，我会把联邦调查局和达拉斯办公处炸成一堆废墟。”

奥斯瓦尔德走出被自己斥为“臭名昭著”的地方，想到妻儿的安全可以有所保障，如释重负。大街上，人来人往，大家都有些兴奋，报纸上赫然印着：肯尼迪总统 11 月 22 日巡视达拉斯市。

11 月 21 日，奥斯瓦尔德突然回到家中。他一向游踪不定，两个星期没照面了，此刻突然出现，倒让玛丽娜吓了一跳。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为家人准备了早饭，并一一亲吻了两个女儿。他从手上褪下结婚戒指，放在玛丽娜的祖母送给他们作为结婚礼物的一套咖啡杯上，然后掏出身上仅有的 170 美元放在柜子里。“钱放在柜子里，你和女儿要买什么就上那儿拿。”玛丽娜在迷迷糊糊中哼了一声，她哪里想到这是丈夫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了。奥斯瓦尔德向自己的家投去最后一瞥，背转身大踏步地离开了。

紧接着，在达拉斯市发生了一系列震惊世人的悲剧，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几天后，凶手奥斯瓦尔德也在监狱中被刺杀。

在对奥斯瓦尔德进行的一系列调查中，又出现了许多疑点，使人们围绕“奥斯瓦尔德是否可能属于某个集团”展开了争论。

有的人认为，奥斯瓦尔德的叔叔莫雷特与黑手党有瓜葛，黑手党很有可能参与了暗杀；有的人认为，奥斯瓦尔德从苏联归来，中央情报局却未加讯问，联邦调查局注意到了他，却未向“沃伦委员会”提及此事，尤其是奥斯瓦尔德留给霍斯蒂的便条不翼而飞，看来两局也难脱下系；英国作家迈克尔·艾德沃斯甚至认为，奥斯瓦尔德在苏联时已被偷梁换柱，这个行刺总统的人是克格勃专门找到的与奥斯瓦尔德相貌一样、精心培训的特工。这些看法或是缺乏证据不能成立，或是耸人听闻不值一驳。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说：“总统遇刺案好比一个天平，但两端砝码的比重相差太大了。肯尼迪死得如此简单，不甘心的人于是杜撰出各种理由，来说明他是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来为无名小辈奥斯瓦尔德一边增添些重量。”詹姆斯·W·克拉克也认为，奥斯瓦尔德与黑手党、反卡斯特罗组织发生联系只是为了获取有价值的线索向古巴政府表明自己的忠诚，如果他是隶属于某个集团行刺总统，又为什么要扬言炸掉调查局以致引人注目呢？

难解的疑团和各式各样的猜测使案件云遮雾障，难窥其真。1964年，又一起谋杀案，给此案带来了新的线索……

### 三、系连黑帮 引来杀身之祸

1964年10月13日，一位美貌的女子正沿着古运河的船道独自漫步，却全然不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她。随着枪声响起，年轻女子的头部、胸部接连中弹，倒在血泊中当场毙命。由于没有找到杀人凶器，缺乏有力的证据，嫌疑犯无罪释放，此案不了了之。

这位年轻女子名叫玛丽·平肖·迈耶，是一位艺术家，华盛顿的社会名流。人们在调查中发现，她与美国总统肯尼迪曾有一段风流韵事。早在大学时代，两人便彼此相识，1956年玛丽离婚后，两人又重新来往，在肯尼迪举办的小型晚会上他们总是出双入对。但是，当时大多数人并未觉察，玛丽只把这件事告诉了密友特鲁伊特夫妇。更为重要的是，玛丽保存有一本日记，据说这本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大量有关肯尼迪的事情，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不久以前玛丽还想把这本日记销毁。玛丽身亡后，肯尼迪生前好友布雷德利夫妇得知这个消息，便和玛丽的姐姐共同寻找这本日记。几个月后，他们在玛丽的工作室里找到了它。布雷德利夫妇把日记交给了他们的一位朋友——中央情报局反情报处负责人詹姆斯·安格尔，从此日记便销声匿迹了。至于日记里究竟记载了些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玛丽遇刺案宛如一枚石子在幽深莫测的湖水中再次激起了小小的浪花，但随即又恢复了平静。值得深思的是，肯尼迪生前以放荡不羁、喜爱沾花惹草而闻名，从二战期间与德裔新闻记者阿瓦德过从甚密，到任参议员期间与办公室秘书关系非常，甚至与五六十年代好莱坞当红女影星玛丽莲·梦露也纠缠不清。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无疑会留下许多蛛丝马迹，成为日后人们追踪的线索。能够使案件调查有突破性进展的，很可能就是这些做过肯尼迪情妇的女人们。尽管一个玛丽死了，如果别的女人开口了呢？

果然，25年后，时光的流逝终于揭开了尘封的记忆。1988年春天，在一家私人医院里，许多新闻记者焦急地徘徊在走廊里，期待着病房里的消息。病房里躺着一位身患癌症、生命垂危的妇人，她双眼放射着兴奋的光芒，声音颤抖，终于吐露出埋藏心头多年的秘密：

这位妇人名叫朱迪丝·坎贝尔·埃克斯娜，20多年前，她是一个黑头发、蓝眼睛、聪明活泼的美人。一个偶然的场合里，朱迪丝经人介绍认识了风度翩翩的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两人很快坠入情网，朱迪丝成了肯尼迪的情妇。与此同时，同一个介绍人还把朱迪丝介绍给了一个名叫萨姆·贾恩卡纳的人，她哪里知道，此人乃是大名鼎鼎的黑手党头目。当肯尼迪得知朱迪丝与黑手党头目结识后，立刻安排了一次会面，由朱迪丝引荐了贾恩卡纳。自此以后，朱迪丝成了肯尼迪与贾恩卡纳之间的联络人。从1960年4月到1961年10月，在她的精心安排下，双方频频相会，不下10余次。当然，双方的会面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肯尼迪与贾恩卡纳究竟谈了些什么，她不得而知，但她心里明白，在竞选总统和暗杀古巴总统卡斯特罗这两件事上，贾恩卡纳帮过肯尼迪大忙。

朱迪丝的临终遗言和人们的一些偶然发现相互印证、补充，由此展开了一段总统和黑手党之间的恩怨纠葛。出身名门、贵为总统的肯尼迪怎么会与黑手党有联系呢？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瓜葛呢？要弄清这些，还得从肯尼迪家族开始说起。

肯尼迪家族的第一代美国祖先是因农业歉收遭受严重贫困而移居波士

顿、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和诸多的早期殖民者一样，肯尼迪总统的祖先历经艰辛，才在波士顿的一个大移民区定居下来。约翰·肯尼迪的祖父帕特里克·J·肯尼迪不仅经商有道，而且颇具政治头脑。他给人的印象是乐善好施，借着向投票者免费赠送自己酒吧里的啤酒，一跃成为麻萨诸塞州参议员，并以“东波士顿市长”的美誉被公认为当时波士顿四名最有影响的幕后政治家之一。此后，帕特里克娶了布罗克顿市市长之妹为妻，从而拥有了剑桥布赖顿和沃索姆大片土地的所有权，肯尼迪家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了巩固。约翰·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便以此为背景迈向更为广阔的商业界、政界和外交界。他娶波士顿市长的掌上明珠露斯·菲茨杰拉德为妻，凭着商人的务实与精明在 20 年代初美国银行业蓬勃发展的时代游刃有余，无往不胜。30 年代大危机到来之前，他敏锐地观察到股票市场的不稳定，果断地抛出了自己的全部股票，足见其老谋深算。然而，这个新崛起的爱尔兰天主教信徒组成的家族并没有为盎格鲁—撒克逊的美国人所接受，雄心勃勃的约瑟夫毫不退缩，他确信“古老的社会在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高傲的排斥态度后，终将会屈从于新生的财富和权力。”他一方面追逐权力，一方面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1933 年禁酒令废除，肯尼迪的萨姆塞特进口公司早已储满黑格与迪尤尔的苏格兰威士忌、戈登的杜松子酒、罗恩·里科的朗姆酒，美国人喜好烈酒的口味再次让老肯尼迪赚取了暴利。与此同时，黑手党的许多成员也想借禁酒令的废除大发一笔，他们在英国寻求酒类经销权，建立联盟商店与老肯尼迪抗衡，一场老肯尼迪与黑手党的激烈斗争拉开了序幕。不过，老肯尼迪也并不排斥接受黑手党组织的好处，和他们建立友谊。比如，弗兰克·西纳特拉，既是黑手党的老朋友，又是肯尼迪家族的座上客。老肯尼迪以双管齐下的方式和一群暴徒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既是他的高明之处，又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同时他还竭力去迎合处于上等阶层的英裔美国人，他积极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为罗斯福集资 20 万美元，还亲自陪同罗斯福四处奔走竞选。老肯尼迪的良苦用心终于得到了回报。1934 年，罗斯福任命他为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随后又担任了海运委员会主任。1938 年，政治上的辉煌岁月到来了，罗斯福任命他为驻英大使，老肯尼迪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英裔美国上层社会。虽然老肯尼迪最终因轻率粗暴、与总统政见严重不合而离职，但这段经历确实对他影响深远。他深切地感受到政界的奥秘，熟谙了通向总统之路的途径，于是把自己的野心灌输给四个儿子，不择手段地把他们推上迈向总统宝座的台阶。

1946 年，约翰·肯尼迪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竞选代表麻萨诸塞州剑桥的民主党选区的国会众议员获得成功。1948 年再次当选。1952 年又顺利进入了第八十届国会的参议院。他年纪轻轻，仕途一帆风顺，完全是靠了老肯尼迪的精心筹划和肯尼迪家族的大力支持。各种财物以约翰的名义捐赠慈善机关；约翰·肯尼迪二战期间勇敢救助同伴的行为被大肆渲染，妇孺皆知，这是因为肯尼迪家族对《波士顿邮报》主编慷慨解囊；甚至母亲露斯也抛头露面，频频出入于各类妇女慈善团体的集会，为儿子的政治生涯奔走。只要是金钱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肯尼迪一家便会不惜一切代价。接下来，约翰·肯尼迪信心十足地向白宫进军。他优雅高贵的气质，朝气蓬勃的外貌，坚定果决的语言似乎把人们带到了罗斯福时代，一位高瞻远瞩的领航员给了全国人民迎接一切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但是，约翰·肯尼迪有个致命的弱点，他信奉天主教。在美国，基督教信徒是天主教的两倍，在南部州基督教占据了绝

对的优势。宗教的力量是难以置信的，美国历史上尚无一例天主教徒当选为总统。在基督教徒占 95% 的西弗吉尼亚州与基督教徒休伯特·汉弗莱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横在肯尼迪面前的第一大关，谁都替他捏着一把汗。当选举结果出来时，分析家们全都目瞪口呆了：肯尼迪以 3 : 2 的优势击败了汉弗莱！人们也许会猜到肯尼迪挥洒的大笔金钱，但谁又能猜到黑手党也在此间助之以力，使选举结果出现奇迹呢？原来，老肯尼迪的故交西纳特拉向肯尼迪和黑手党头子贾恩卡纳同时引荐了一位美人朱迪丝小姐。这位贾恩卡纳 48 岁时成了芝加哥犯罪集团的王中王，对约一千名罪犯和他们手下的 5 万名亡命徒发号施令，他年收入约 20 亿美元，是世界上势力最大

的两三名黑社会头目之一。事后，贾恩卡纳曾向朱迪丝小姐夸口说，如果没有他，肯尼迪休想当选总统。

1960 年 11 月 8 日，美国总统大选日，肯尼迪一家聚集在海恩尼斯湾住宅里静候大选消息。民主党要取胜，必须于午夜前在东海岸取得绝对多数票，因为工厂工人和办公室职员喜欢晚上投票，此后的西部农场州就属于共和党的传统范围了。晚八点，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计算机预测肯尼迪以 56% 的选票取胜。果然，到 10 点半，捷报频传，肯尼迪在各工业州均有明显的优势。然而，形势紧接着便急转直下了，俄亥俄、威斯康星、田纳西、肯塔基，整个农业区都倒向了尼克松。特别是俄亥俄州，肯尼迪在这里活动最卖力，却收效甚微，不免令人沮丧。就在这时，肯尼迪的竞选队伴林登·约翰逊从得克萨斯州农场打来了电话。他一直忙于牵线搭桥，几笔交易做成后，才有空告诉肯尼迪，得州“票数是接近的，但是保险的”。话语简洁但暗含深意。司法部律师罗伯待·布赖基认为，得州选举委员会宣布为不合格的 10 万张大都市票中，绝大多数是尼克松的。肯尼迪随后又给伊利诺伊州的戴利市长打电话询问情况。这位伊利诺伊州民主党领袖、芝加哥市长乃是地方行政官员中不可小瞧的一名，他拍着胸脯向肯尼迪保证说：“靠运气，靠几位密友的帮助，你会在伊利诺伊州获胜的。”果然，几分钟后消息传来，肯尼迪在该州以 8858 票之差险胜。人们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尼克松在伊利诺伊州的 102 个县中胜了 93 个县，却以 8858 票负于肯尼迪，皆因肯尼迪在库克县的选票出奇的多。如果把库克县 5199 个投票点中的 4500 票给尼克松的话，尼克松可获该州 27 张选举人票，有望在全国取胜。共和党人也对库克县进行过非正式复查，尼克松净得 4539 票，足以取胜，当他们准备正式复查时，却遭到该县掌权人物戴利的阻止。实际上，库克县的大权操纵在黑手党头子贾恩卡纳手中。在芝加哥的某些选区，政治腐败与犯罪集团密不可分，多次投票、投假票、伪造选票统计表、威胁选民是家常便饭。戴利当选芝加哥市市长便是靠黑手党组织，那么，由他来帮助肯尼迪竞选就难免故伎重演了。

肯尼迪就任总统之时，正值美国、古巴关系紧张之际。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从独立开始，便被美国视为一大隐患，千方百计欲斩草除根，又恐难以面对国际舆论。艾森豪威尔总统秘密地开始让中央情报局资助、装备和训练在危地马拉的古巴流亡部队以备入侵古巴。现在这个计划又得到了肯尼迪的认可，并默许中央情报局与黑手党联手。不久以前卡斯特罗关闭了黑手党在古巴所设夜总会，使黑手党经济收入下降，活动受到影响，黑手党于是决定顺水推舟，借机报复。中央情报局找到了拉斯维加斯的黑手党头目约翰尼·罗塞利。1962 年 4 月，罗塞利和贾恩卡纳在枫丹白露饭店碰头，密谋投毒杀死卡斯特罗，总统的情妇朱迪丝当天也出现在该饭店。最后，这场阴谋以猪湾

登陆的惨败而告终。但黑手党在其中的确出了不少力。贾恩卡纳、罗塞利鞍前马后地为总统效劳，又通过朱迪丝和西纳特拉与总统保持着密切联系，为的是在今后的行动中得到联邦政府的庇护。知恩报恩，在黑手党内部是不言自明的规矩。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料到，总统的弟弟，后来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在1962年下令严厉追缉犯罪组织。早在参院麦克莱伦反犯罪活动委员会工作时，罗伯特就帮助揭露了15个工会和50家公司的贪污腐化行为，把小戴夫·贝克、詹姆斯·克罗斯和威廉·马洛尼等腐化的工会领袖逮捕入狱。现在，他把司法部反犯罪集团科扩大了4倍，开始了美国历史上空前广泛、猛烈的打击犯罪集团运动。当发现有组织的劳工和犯罪活动有关联后，他成立了“吉米·霍法追查小组”，开列了一份在逃罪犯名单，从此不遗余力地投入了这场斗争。1960年政府对犯罪集团的起诉只有19起，并只对少数人定罪，1963年被起诉的罪犯已达615人，定罪的达238人。被罗伯特控告的主要罪犯有芝加哥的安东尼·阿卡杜(罪名“逃税”)、新泽西州的安东尼·普罗文扎诺(罪名“勒索”)、新奥尔良的卡洛斯·马塞洛(罪名“阴谋诈骗”)、纽约的卡迈因·隆巴多齐(罪名“逃税”)。

首先受到追查的是马塞洛。马塞洛出生在突尼斯，后随父母移居美国，因此他只有危地马拉护照。1961年，他通过参与非法活动已拥有四千万美元的私人财产，成为路易斯安那州的豪富之一。他所领导的犯罪集团是在美国历史最长、隐藏最深的黑手党组织，他的组织无孔不入，不仅与警察、行政司法官、检察官、市长、州长、州立法委员会暗中勾结，而且还渗透到天主教堂。马塞洛的组织经常通过私人天主教慈善机关为州内政治运动捐款，也间接帮助过约翰·肯尼迪1960年的总统竞选。尽管如此，罗伯特还是决定把他驱逐到危地马拉。1961年4月4日，马塞洛被要求到当地移民归化局办公室报到，一架美国边境巡逻机把双手上铐的他押送到了危地马拉。马塞洛一面在热带丛林中艰难跋涉，一面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报仇雪恨。终于，他来到沿海的小城市，乘一架多米尼加空军飞机飞回迈阿密，再次非法入境。1961年6月8日，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控告他非法入境，几个月后，罗伯特宣布，新奥尔良联邦大陪审团控告马塞洛企图以伪造的危地马拉出生证欺骗美国。绝境中的马塞洛愤愤地说，如果割掉狗尾巴——罗伯特，狗还会咬人，但如果割下它的脑袋——约翰，狗就死了，它的尾巴和身子也就完了。联邦调查局监视黑手党的电子仪器也发现，罪犯们对肯尼迪司法部长及其总统哥哥进行过恫吓。

1962年5月，国际运输工会头子霍法在纳什维尔根据塔夫脱—哈特利法案被指控。1963年6月，霍法在芝加哥再次因贿赂陪审团被起诉。霍法操纵下的工会无恶不作，霍法本人也贪污了大量的会员养老金供私人使用。在审讯过程中，霍法的运输工会官员埃德·帕廷与霍法反目，提供了重要的证词，其中透露出霍法与他曾共谋暗杀司法部长。此后调查局又得到另外一些阴谋杀害罗伯特的证据，据说这事曾让总统深感不安。

黑手党杀气腾腾，罗伯特也绝非鼠辈，他能在而立之年胜任司法部长之职，就是凭着超群的勇气、智慧和坚韧。他继续追踪下一个目标：贾恩卡纳。1962年，贾恩卡纳因怀疑自己的一个情妇和喜剧演员丹·罗恩有染，便通过黑手党与中央情报局的牵线人罗伯特·马休要求窃听罗恩的电话，马休和中央情报局照办了。谁料窃听器被罗恩的女仆发现，罗恩向联邦政府报告，司

法部拟以非法窃听罪对马休起诉。但是，中央情报局在猪湾事件后仍然利用黑手党从事颠覆卡斯特罗的活动，所以要保护贾恩卡纳，于是派出总顾问专程拜访罗伯特，将实情合盘托出。罗伯特对此极为震惊和愤怒，他强烈反对与非法组织合作，坚持继续调查贾恩卡纳。但是，他最终无可奈何地取消了对马休的指控。1963年6月，联邦调查局加紧了对贾恩卡纳的监视，贾恩卡纳被激怒，他采取了黑手党历史上空前的举动：向法院控告联邦调查局。这样他就必须接受法院对他进行可能涉及他从事的一切贿赂、勒索、赌博、贩毒等活动的讯问，如不从实作答，便要受到蔑视法庭的指控，这对政府本为千载难逢的良机。然而当法庭上一片肃静等待盘问时，政府的律师语惊四座，他们自动放弃了讯问的权力。下命令的正是罗伯特，为了政府和兄长的声誉，他只能在关键时刻再次妥协。

一次次殊死角逐，加剧了黑手党和肯尼迪兄弟之间的仇恨，被激怒的黑手党认为肯尼迪们忘恩负义，既然兄弟俩不计前情，他们又何必手下留情呢？

70年代初，几名重要的黑手党头目因故被传讯，为求得宽大处理他们供出了当年与中央情报局联手暗杀古巴领导人的内幕。因为此事关系重大，牵涉了肯尼迪总统和政府的重要部门，参议院也插手了此案。1975年7月19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工作人员抵达芝加哥，为5天后贾恩卡纳到华盛顿作证做出安排。当天晚上10点左右，贾恩卡纳在芝加哥家里的地下室里被人打死，后脑、嘴巴和颈部连中7枪，这是典型的黑手党对泄密者的杀害方式。

暗杀肯尼迪的主要嫌疑犯霍法，1971年12月22日得到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行政赦免，1975年7月30日（即贾恩卡纳死后11天），霍法到底特律郊外的红狐饭店同新泽西运输工会官员安东尼·普罗文扎诺和暴徒安东尼·贾卡龙约会，此后便杳无消息了。后来，一个告密者说，霍法遭到他信任的人的暗算，遗体被装进55加仑的汽油桶，用卡车运到废品清理场由一部压实机压碎。

接下来遭厄运的是罗塞利。早在1967年他就让律师与《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联系，要讲述有关肯尼迪遇刺的重要情况。在1975年和1976年的几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罗塞利述说了他和贾恩卡纳、特拉菲坎特共同参与中央情报局——黑手党计划的情况，并指控与小桑托·特拉菲坎特相识的古巴人杀死了总统，致命的一枪来自长满杂草的山丘。3个月后，罗塞利在与特拉菲坎特吃饭后神秘消失了。1976年8月，迈阿密附近杜姆丰德林湾的一个渔民发现了一个55加仑的油桶，里面有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经确认，正是罗塞利。

三个与案情有关的黑手党头子在调查进入关键阶段时相继神秘死去，更加深了人们对黑手党的怀疑。当时，能为审讯提供有力证据的只有朱迪丝，但是，碍于黑手党的规矩，更出于维护肯尼迪总统在美国人民心中的形象，朱迪丝作了假证。20年后，在弥留之际，她终于吐露了真相，为的是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个真实，也是为求得灵魂的解脱。

不过，尽管黑手党组织卷入了此案，尽管他们多次扬言要对总统和司法部长进行报复，可迄今仍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是黑手党杀死了肯尼迪总统。就黑手党而言，对于谋杀政界要人这样的大事，一般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更不会四处张扬留下话柄。历史舞台上的主角都一一退出，他们都没有给后人留下可引以为证的东西。人们也许廓开浓雾看到了一角真实，也可能离事实更遥远了……

不断出现的新线索，连续发生的疑案，美国公众的种种猜测，使国会议员们也坐卧不安了。正巧，原白宫雇员罗伯特·格罗伊顿公布了他惊人的发现，最终使国会于1975年成立了“美国国会刺杀案委员会”，对肯尼迪之死进行重新调查。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时，格罗伊顿才18岁，正是这个案件所引起的社会震动使他下定决心成为一名犯罪研究专家。在收集整理大量的珍贵资料并加以深入研究之后，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根据现有证据，约翰·肯尼迪总统被刺可能是有人密谋策划的结果。政府有意掩盖真相！”

格罗伊顿何出此言？国会刺杀案委员会又有什么新发现呢？

#### 四、明争暗斗 谁主政坛沉浮

格罗伊顿出示的是触目惊心的医学证据：

总统在帕克兰纪念医院抢救无效后，被紧急送往华盛顿，由马里兰州贝西恩达海军医院进行尸体解剖。然而从尸体解剖所拍摄的照片来看，拍摄的技术不够要求，而且还有被篡改的痕迹。参与解剖工作的均是军事医学专家，但剖检程度不合格，连部队解剖手册规定的最起码的一些军事标准都没有达到。至今这些解剖照片和报告都被政府压住不得公之于众，其中部分证据或被销毁或踪影全无。参加剖检的人员也奉命对这次工作内容保持沉默，如果有人谁泄漏了剖检结果，就要受到军法处置。

在达拉斯医院的记录中，他们对总统头骨碎片拍摄了照片，为研究总统伤口周围组织进行采样，还准备了显微幻灯片。可是，如此重要的原始记录却至今不知下落。

在贝西恩达医院剖检时，总统的脑被取出，放置于福尔马林溶液中以备切片检查之需，检查结果能明确无误地显示子弹在总统脑子里的穿行轨迹，对判断凶手位置和所使用的凶器是至关重要的，还可以证明究竟是几发子弹击中了总统头部，但是没有任何遗留证据说明做了上述检查。照片和切样可能引出的线索一定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于是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阻止真相公之于众。

颈部的伤口也很重要，它同样可以说明子弹的射向和射手人数。但是总统的颈部没有被打开，所以它究竟是子弹入口还是出口便不得而知了。为什么贝西恩达医院医生不认真分析颈部伤口？同样，帕克兰医院也忽略了总统的背部伤口，这些不该发生的失误仅仅是由于疏忽大意么？陆军解剖医生皮埃尔·芬克上校曾宣布，在贝西恩达医院解剖过程中，比解剖医生级别高的“某个人”不准对总统背部和颈部的伤口进行分析。这个下命令的人是谁呢？

总统头部右侧伤势最为严重，伤口从太阳穴穿过头顶一直延至头枕部。参与剖检的贝西恩达医院医生詹姆斯·休姆斯和桑顿·博斯韦尔向国会特别委员会医学调查小组作证说，总统头部枪伤的子弹入口靠近头枕部突出处，“你可以透过伤口看见大脑。”但是，人们从官方显示的照片上只能看到完整无损的头皮和头骨。弗洛伊德·里伯是医学摄影师，他看到总统伤口后认为造成伤口的不是普通的军用子弹，而是一种极易炸裂的破裂弹。在他看了官方的剖检照片后，忍不住强烈抗议说：“错了，你们昨天给我看的不是这两张照片。”“这些照片和X光透视片有的地方被伪造了，是假的。”

格罗伊顿由此作出了自己的推论：肯尼迪在短短1000天里树敌太多，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反卡斯特罗的人、国际犯罪组织都对他怀恨在心。尤其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在案发前的防备和事后的调查中都反应冷淡，似乎急于结束案件的调查而不是撒开大网深入下去。

堂堂国家安全机构果真与谋杀总统有牵涉吗？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纠葛呢？

提起肯尼迪在政界的冤家对头，人们总是头一个就想起胡佛。埃德加·胡佛这棵“政界常青树”，从富兰克林·罗斯福任总统始到尼克松总统时期一直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职。眼见总统如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他却牢牢控制着调查局，掌握着从总统到庶民的背景资料，随时都可进行监视审查，谁不畏他三分呢？

说起来，老肯尼迪和胡佛还是故交，在日常工作中常对他出手相助，甚至一度把胡佛恭维为总统候选人。但胡佛对肯尼迪父子的态度是泾渭分明的，对肯尼迪兄弟总是百般挑剔。

二战期间，肯尼迪在海军情报机关工作的时候，与新闻记者阿瓦德关系密切。阿瓦德曾作为欧洲选美冠军受到希特勒、戈林的接见，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她一到华盛顿便受到了美国官方的严密监视。两个人的交往自然逃不过胡佛的眼睛。在一次监听阿瓦德电话录音的时候，谍报人员意外地听到了肯尼迪谈论海军部门人事情况的声音，为了拆散他们，海军领导把肯尼迪调离了华盛顿。以后，只要肯尼迪和阿瓦德一联系上，那么第二天肯尼迪必然待命出发，直到被遣往太平洋指挥一艘潜艇。从此后，胡佛开始密切注意收集有关肯尼迪的资料，双方的结怨也自此开始。

肯尼迪担任参议员的时候，又与办公室女秘书帕梅拉·特努尔打得火热。1958年，他们的约会被房主录下，并寄给一家报纸。不久，这盘磁带转到了胡佛手中。此时，从不同渠道收集的资料已在胡佛建立的肯尼迪专用资料室小山般地堆积起来了。

1960年总统大选时，胡佛支持约翰逊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同时在暗地里破坏肯尼迪的声誉。肯尼迪入选后，原不计划选择约翰逊作竞选伙伴。后来，双方就此进行过一次秘谈，不久民主党便宣布由约翰逊为副总统候选人与肯尼迪联袂竞选。这个转变固然有肯尼迪需要借约翰逊获得南部州选票的原因，另外，据说也和胡佛把自己掌握的肯尼迪材料交给约翰逊有关。肯尼迪就任总统后，只有强压心中的不满和厌恶任命胡佛继续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

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进入高潮。起初，肯尼迪关心、支持黑人完全是出于竞选争取选票，表现传统的民主党人的一种姿态，每每信誓旦旦，却又缺乏行动。然而，黑民众不会停留在华美的辞藻上，小马丁·路德·金牧师不懈的斗争唤起黑民众，使民权运动不断深化，终于和南方传统势力、种族主义者爆发了激烈的矛盾冲突。日益严峻的现实迫使肯尼迪总统采取措施。“自由乘车运动”在亚拉巴马州安尼斯顿、蒙哥马利遭到白人暴徒袭击，导致流血事件，使局势恶化。肯尼迪命罗伯特派出500名联邦警官进行干涉。金牧师乘飞机飞往出事地点时，又加派50名联邦警官到机场迎接，一路护送到蒙哥马利。事后，肯尼迪总统签署法令禁止州际公共汽车公司的种族隔离。1962年9月，罗斯·巴尼特州长宣布拒绝黑人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恩到密西西比大学注册。肯尼迪总统和司法部长罗伯特命令联邦警官陪同注册，全力支持梅雷迪恩。然而，南方种族歧视之根深蒂固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暴徒袭击了联邦警官，连总统的广播干涉也无济于事。总统当机立断，从孟菲斯调来军队方才控制了局面，但已有两人死亡，许多警察和学生受伤。梅雷迪恩在美国陆军的保护下终于在密西西比大学注上了册。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也惊醒了总统，使肯尼迪兄弟明白他们所要铲除的是承载了沉重历史、维系着多方利益的参天大树，而不是信手可捻的小草。1963年4月3日，更猛烈的对抗爆发了。金牧师率领上千名黑人男女来到种族主义最严重的南部城市——亚拉巴马州伯明翰举行反种族歧视示威游行，遭到手执凶器的暴徒和武装警察的袭击，许多人被抓进监狱，地面上血流成河。5月11日，金牧师的住宅被炸。肯尼迪总统忍无可忍，不顾华莱士州长的反对，调动该州国民警卫队平息事端，并进入校园护送两名黑人学生到亚拉巴马大学注册。当晚，

总统发表对全国广播：“一场伟大的变革（民权问题）即将到来。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义务是要使这场革命、这场变革对所有人都是和平的、建设性的。”6月19日，他提出了他的民权法案。肯尼迪总统顺应民心的举动不可避免地遭到南方传统势力和种族歧视者的忌恨，在政府中，首先就受到胡佛的反对。胡佛历来藐视黑人，对黑人民权运动及其领导者金牧师简直恨之入骨。一次罗伯特询问胡佛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中有多少黑人，胡佛怒气冲冲地回答没有。回来后，他背着总统和司法部长成立了一个反情报组织，目的是“揭露、干扰、欺骗或遏制”小马丁·路德·金和南部基督教领袖会议，并兼有收集肯尼迪兄弟情报的任务。1963年8月28日，金牧师领导黑人向华盛顿自由进军，并在林肯纪念塔前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胡佛此时已是怒不可遏，黑人运动的日益“张狂”使他下决心要搞垮金牧师和他所领导的运动，当然也包括用豪言壮语、民权法案同情支持黑人的肯尼迪兄弟。

此外，胡佛还同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格格不入。多年以来，司法部长之职总是形同虚设，而是由胡佛来操纵实权。自从罗伯特成为胡佛的顶头上司，不仅切断了多年以来胡佛和总统的特殊关系，甚至还对胡佛的一举一动指手划脚，令胡佛好不恼恨。不过，胡佛也不是等闲之辈，他能在联邦调查局任职长达30余年，让全国人都畏他三分，自有他的回天之术。政坛角逐，鹿死谁手，还得看今后的较量。

1962年8月4日，好莱坞著名性感女星玛丽莲·梦露一夜之间香消玉陨，公开说法是她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在这个震惊全国的消息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秘闻：肯尼迪兄弟都卷入了梦露的生活，并和她的死直接有关。1960年，还是在肯尼迪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梦露与他就有很深的交往。但是肯尼迪的总统名望和梦露的影星身份不允许这种关系发展下去，于是罗伯特作为哥哥的说客找到了梦露，提出要断交。糟糕的是梦露迷人的魅力使罗伯特怦然心动，禁不住拜倒在其石榴裙下。当梦露痴迷地幻想着和司法部长结婚时，为了政治前途不受干扰，罗伯特已决定退步抽身了。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梦露彻底崩溃，她给罗伯特打了最后一个电话，绝望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就在这个晚上，罗伯特神秘地出现在梦露住所附近，一架直升飞机隆隆飞过她的别墅，又有一辆救护车被神秘地派往洛杉矶郊区的一所房子。几个小时以后，人们才通过新闻媒介知晓梦露已在她的洛杉矶郊区别墅中自杀身亡。遮掩了罗伯特洛杉矶深夜之行的正是胡佛。他的一声令下，梦露死前24小时的电话记录被调走了。肯尼迪兄弟的丑闻在胡佛的帮助下得到掩饰，但胡佛关于肯尼迪个人资料的档案室也得到了充实。

1963年6月23日，纽约的《美国人日报》中午版登载的《美国大官同女人丑闻有牵连》一文，隐晦地向公众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英国发生的海军武官、陆军大臣与22岁的妓女马里拉·诺沃特尼的性丑闻案，与美国总统有牵连。当时肯尼迪正在欧洲会晤麦克米伦首相，急忙回电国内商议对策。罗伯特再度请来胡佛，也幸亏这家报纸并非引人注目的大报，肯尼迪总统才安度难关。

1963年10月26日，爱荷华州《得梅因纪事报》又揭丑闻：继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秘书、副总统的密友博比·贝克贪污案东窗事发后，司法部门在调查贝克组织的俱乐部的过程中又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经常参加贝克俱乐部的人中有一个名叫埃伦·罗默茨的女人，她的丈夫是在西德驻华盛顿军事使团工作的西德军官，这使她可能利用各种机会接近上层人物。“联邦调查局

的调查表明……她的活动可能同间谍有关，因为她交往的男友都是地位很高的。”贝克说，总统密友比尔·汤普森介绍罗默茨认识了总统，特工人员审讯了罗默茨，查明她参加过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因而怀疑她可能是共产党安插的人。在西德当局的配合下，罗默茨被遣返回国。给报刊提供稿件的人是胡佛的好友克拉克·基伦霍夫。鉴于此事关系国家机密，参议员约翰·威廉斯打算把有关报告提交调查贝克案的参议院委员会。可是总统坐不住了，在罗伯特的再三要求下，胡佛给威廉斯打了电话。等到贝克案开始审理的时候，威廉斯再也没提牵涉总统的议案一事了。

胡佛为抓住罗伯特的把柄也费尽了心机。罗伯特在访问芝加哥办事处的时候，胡佛故意让特工主任问罗伯特是否愿意听下属特工人员在一次刑事调查中收集的“敏感性”录音带。罗伯特本应婉拒而要求通过正常渠道呈递，但他欣然同意并坐下来聆听。这是一盘未经授权非法窃听的磁带，罗伯特的默许既意味着自己的卷入，这又给了胡佛一个口实，并有在场所有特工人员作证。胡佛颇为此事扬扬得意了一番。

表面上，胡佛一次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对肯尼迪兄弟出手相助，总统、司法部长也在公众面前对他称誉有加。实际上，胡佛无时无刻不在收集着败坏肯尼迪兄弟的材料，他手中掌握的材料越多，肯尼迪兄弟对他的厌恨也越深。双方的敌意是不言自明的。

胡佛和肯尼迪兄弟宿怨很深，他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在肯尼迪总统遇刺案中的表现更使人怀疑究竟他有没有参与谋杀，或者出于某种原因阻止真相公之于众？

胡佛手下的特工在黑手党组织的许多接头地点秘密安插了电子窃听器，有许多对话明显涉及黑手党对总统和司法部长的恫吓，胡佛却没有把这些情况通知有关部门以加强戒备。

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是胡佛第一个提出“必须让人们相信奥斯瓦尔德是唯一凶手”的断言，在疑点重重、证据不足的时候，为什么要急于结案呢？

奥斯瓦尔德有一本人名录，上面有特工人员詹姆斯·霍斯蒂的姓名、地址、汽车驾驶证号，但原件已失，联邦调查局所公布的与事实有出入。案发前几天，奥斯瓦尔德给霍斯蒂留了张条，达拉斯特工头子戈登·乔克林掌握着这个重要证据。但是11月24日奥斯瓦尔德死亡后两小时，乔克林便命令霍斯蒂把留言条放进马桶里冲掉，据说这是胡佛的命令。助理局长威廉·沙利文和马克·费尔特说，总部官员均知道这个便条，但胡佛不许他们对“沃伦委员会”讲，因此此事直到1976年才为人所知。胡佛还秘密惩罚了17个参与处理奥斯瓦尔德的特工和他们的上司。

也是在11月24日那天，新奥尔良地方检查官詹姆斯·加里森根据情报逮捕了戴维·费里，他是马塞洛的同伙，也与奥斯瓦尔德相识。费里后来转移到联邦调查局接受审问，一名负责监视马塞洛的特工证实费里没有在谋杀现场，联邦调查局便急不可耐地把他释放了。这显然很可疑，特工人员在奥斯瓦尔德的物品中发现了费里的借书证和表明奥斯瓦尔德最近在新奥尔良居住的文件，他可是个重大嫌疑犯啊！

此外，对鲁比稍事调查后也能发现他在达拉斯和新奥尔良跟马塞洛的联系。在鲁比击毙奥斯瓦尔德的前一天，鲁比给加尔维斯顿的一个人打电话，而费里则从加尔维斯顿给马塞洛打电话。鲁比又在受审时多次欲言又止。看来，马塞洛集团有最大的嫌疑，但胡佛又很随意地放弃了对该组织的追踪，

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另据调查，联邦调查局两名特工默奇林、韦布均认识鲁比。默奇林的好友、石油大王比利·拜厄斯与胡佛关系非同寻常，就在总统被害当天，胡佛给罗伯特·安全局头头、拜厄斯打过电话。

有一个名叫大卫·利夫顿的人经过 15 年的调查写了一本书，叙述了肯尼迪的尸体在运回华盛顿的时候，有人在机场与驾驶员发生争执，飞机因此延误了 14 分钟起飞。在这段时间里，肯尼迪的尸体从飞机上被转移，某些人对尸体作了手脚，换掉子弹，改变伤口，而对运送尸体负责的是联邦调查局。或许这样的说法有点耸人听闻，但是后来尸检伤口发生改变，肯尼迪的大脑不翼而飞，又当作何解释呢？

30 年来，联邦调查局一直芒刺在背，只要肯尼迪死因没有弄个水落石出，人们对它、对胡佛的怀疑就不会消除。

至于中央情报局，长期以来也是人们怀疑的对象。臭名昭著的“猪湾事件”使美国威信扫地，举国上下都愤怒谴责中央情报局的荒唐行径，然而，中央情报局却把责备的眼光投向总统。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肯尼迪宣誓就职的前一天，艾森豪威尔总统便向他透露了已秘密进行中的谋杀卡斯特罗、颠覆古巴政府计划，希望新总统继续予以支持。中央情报局的确对此事费尽了心机，一面加紧研制刺杀使用的剧毒药丸，一面派情报局办公室主任谢费尔德·爱德华兹上校联络犯罪集团，招募人手执行暗杀任务，同时还要武装训练古巴流亡人员，俟卡斯特罗死后大举入侵。起初肯尼迪对此计划不置可否，但是，为了清除以微弱优势战胜尼克松这一留在心头的阴影，为了像罗斯福总统那样任职百天内树立威信，他必须在走马上任之际有惊人之举。更何况主持这项事务的艾伦·杜勒斯和理查德·比斯尔是德高望重的政界前辈，他们的意见是理当得到重视的。

1961 年 2 月，肯尼迪总统开始认真审视入侵古巴计划。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思想斗争，他决定批准该计划，并有保留地要求美国不直接介入。

1963 年 4 月，当所有高层领导人敛声屏息等待刺杀结果时，消息传来，卡斯特罗突然停止去他经常下榻的饭店。下毒计划落空。但是登陆计划已定，只有冒死一搏了。4 月 14 日，总统批准比斯尔开始行动。原先比斯尔要求 16 架 B—26 飞机空袭古巴空军基地，掌握制空权以配合陆地行动。令人惊异的是，关键时刻，总统似乎变得迟疑、怯懦了，他只批准了 6 架。4 月 16 日，6 架印有古巴标记但不属于古巴的 B—26 飞机轰炸古巴的消息传遍全球、声讨谴责之声滚滚而来，同时，军事顾问的空援请求也紧随而至。迫于国际压力，肯尼迪总统下令，取消第二次空袭。军事顾问和古巴流亡分子的士气开始低落，但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等着他们呢。4 月 17 日凌晨，指挥部里急电请求总统批准在猪湾附近航行的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参战，然而肯尼迪总统再次拒绝了，还下令所有舰只一起退离古巴 30 海里。4 月 20 日，失去了有力支持的古巴流亡分子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惨败，114 个人陈尸海滩，1189 人成为古巴俘虏。

灾难降临，计划执行人和古巴流亡分子震惊、沮丧，深深感到被“出卖了”。中央情报局许诺的 B—26 空中掩护、海军支援、全因为总统的一再阻挠化为乌有，终将这次周密计划过的行动推上了绝路。中央情报局、美国军事顾问在顶着国内外压力的同时，心中充满了对总统的愤恨。

肯尼迪总统同样度日如年，事件的冒险和荒唐、结果的惨烈和严重损害

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也使刚上任 90 天的总统一瞬间声誉扫地。他三下五除二，撤掉了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比斯尔和副局长凯贝尔，“把中央情报局砸了个粉碎。”

中央情报局和总统的过节或许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他们在肯尼迪遇刺案中的所做所为就着实令人生疑了。

案发当日，总统车队走的是迪利广场右侧的豪斯顿大街，左转由埃尔姆大街到教科书仓库大楼和铁路路基，由于这里路面狭窄，车速减缓，血案发生了。可是总统车队原定走的是从中央大道穿过迪利广场，这样可以避开狭窄的路段。作出改变路线决定的人是市长厄尔·凯贝尔，他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查尔斯·凯贝尔的亲兄弟。

当“沃伦委员会”要求中央情报局提供奥斯瓦尔德的档案时，中央情报局拖延了四个月才送去了一份残缺不全的资料。1975 年参院调查中央情报局时，发现了奥斯瓦尔德的详细档案，原来他们有意隐瞒事实真相。

当“沃伦委员会”调查鲁比档案时，中央情报局六个月以后才迟迟作答，对委员会说没有鲁比资料。几天后“沃伦委员会”就匆匆宣布了调查结果。1976 年众议院再次复查时，发现这是谎言，中央情报局的确存有鲁比的档案。国会刺杀案委员会发现的 150—59 号文件表明，1959 年鲁比在哈瓦那监狱可能与小桑托·特拉菲坎特见过面，而谋杀卡斯特罗的中央情报局一黑手党联合行动计划中就有特拉菲坎特。

司法部在新的调查中还发现，一个化名为“莫里斯·毕索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直接领导了古巴流亡人员的活动。据一个古巴流亡者安东尼奥·维西阿那证实，1963 年 8 月底或 9 月初，“毕索普”把他召到达拉斯。双方会面时，他看见“毕索普”身旁立着一个年轻人。肯尼迪遇刺后，维西阿那根据报纸上的凶手照片认出了奥斯瓦尔德便是那个年轻人。

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官方人士声称知道“毕索普”此人，据说他是中央情报局华盛顿利兰总部一位军官的化名。为证实这点，侦查人员让维西阿那和军官见面，双方都进行了否认，但不久后维西阿那便遭到职业杀手的枪击，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头部受了伤。

国会刺杀案委员会的调查确实是卓有成效的，它使人们都更全面地去看待 30 多年前的总统及他被刺事件。遇刺前的肯尼迪总统正沉浸在光荣与梦想的光环中：夏季的第二次欧洲之旅使人们对他的美誉登峰造极，10 月 7 日签署的有限核试验条约更是锦上添花，他和罗伯特对犯罪组织的斗争硕果累累，美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民权法案亟待通过。权力、名望、财富、美满的家庭集于一身，他几乎成为天之骄子。然而，阳光下也有阴影。

追查犯罪组织和工会贪污的斗争在加紧进行，马塞洛被起诉将接受审判，贾恩卡纳被迫东躲西藏，特拉菲坎特正受到税务局的盘查，霍法再次被控欺骗和贿赂陪审团。他们和总统有过交易，握有足以毁灭总统前途的把柄，他们会忍气吞声下去吗？

暗杀卡斯特罗的新一轮计划又在进行，总统也在迈阿密发表了强硬的反卡斯特罗演说，古巴会置若罔闻吗？

联邦调查局听到了黑手党的恫吓却秘而不宣，胡佛守着一堆秘密，等待时机使肯尼迪兄弟身败名裂。中央情报局余耻未雪，对总统耿耿于怀，杜勒斯人走茶未凉，余威犹存。他们情愿肯尼迪连任总统吗？

南方传统势力和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民权运动恨之入骨，总统却还要通过

民权法案，他们会善罢甘休吗？

这么多的势力卷入了谋杀案，了解事情真相的，或沉默不语，或被人谋害。尽管人们疑虑重重，可是在整整 25 年的调查里，无论官方还是私人侦探，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以推翻“沃伦委员会”的结论。1988 年司法部正式宣布终止一切调查，将全部材料永久存档。也许还要等上几十年，新的线索出现，人们才有望看到真相的水落石出。

肯尼迪总统的猝死对他的家族的打击是旁人难以想象的，这个炫赫一时的家族立刻沉浸在悲剧的阴影中，背负着沉重的创痛。然而，多舛的命运似乎才刚刚开始……

## 五、余波未平 罗伯特遭枪击

1968年，肯尼迪家族打破了5年的沉寂，罗伯特·肯尼迪宣布参加总统竞选。

人们对他并不陌生。1953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司法部成为麦卡锡领导下的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成员，因功勋卓著被评为“1954年十大杰出青年”之一。1960年，其兄约翰入主白宫，罗伯特也升职为司法部长。他顶住各方压力坚决打击黑手党势力，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在1960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罗伯特建议回避苏联要挟条件，采取表面强硬、暗中妥协的灵活方式，帮助总统成功顶住了苏联的压力。作为一名饱经宦海沧桑的人，罗伯特深知政治生涯的危险，还有什么比哥哥的死更为惨痛的呢？但是，肯尼迪家的儿子只能前进，不能畏缩，他要去完成兄长未尽的心愿。

罗伯特曾为哥哥的总统竞选立下汗马功劳，如今重操旧业，对他来说自然得心应手。初选中，他就赢得了辉煌的胜利，除俄勒冈州外，他在各州均击败了对手。1968年6月4日，罗伯特结束了西海岸各州的巡回演讲，和妻子埃塞尔及竞选小组一起来到洛杉矶等待投票结果。

为缓解连日奔波、竞选所带来的紧张和疲劳，罗伯特和妻儿们一起来到马利布海滨浴场，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一天。直到夜幕降临，罗伯特才兴致勃勃地回到他的竞选总部和新闻中心所在地——著名的大使饭店。发布消息的516房间已被前来聆听消息的记者、家人、朋友挤得水泄不通。8点，消息传来，南达科他州50%的选票归罗伯特所有。该州是另一名候选人汉弗莱的家乡，胜利的意义不可轻视。10点半，加利福尼亚预选人得票结果也出来了，罗伯特又得了46%的选票，而对手麦卡锡落后了四个百分点，加州的投票结果预示着罗伯特将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直不动声色的罗伯特此刻终于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他大声宣布：今天晚上他将在大使饭店举行庆祝胜利的晚会，并向所有为他奔波的人发出了邀请。

好消息似灿烂的阳光照耀着罗伯特。6月5日零点15分，他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嘹亮的声音顿时回响在大厅：“让我们不分弱者和强者，黑人和白人，穷人和富人，大家一道工作吧！”“加利福尼亚是一片慷慨的乐土，我想把它变成我的基地……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芝加哥，我们要到那里争取同样的胜利！”他乐观自信的话语感染了听众，人们近乎狂热地向罗伯特挥手、鼓掌。

按事先安排，罗伯特应当去饭店舞厅接见记者。为避开拥挤的人群，他改道厨房旁边的配菜间去舞厅。一时间狭小的操作室挤满了人，罗伯特在保镖、记者、饭店职工的包围中吃力地往前挤，他妻子已经远远落在了后面。

“胜利属于您！肯尼迪先生！”厨师长向他热烈祝贺，罗伯特驻足回首微笑致谢。就在这时，“呼！呼！”枪声响起，罗伯特顿时倒在血泊里失去了知觉。距罗伯特1米远处，一个身材中等、面色黧黑的黑发青年正杀气腾腾地握着手枪，两名饭店职员扑上前去也未能阻止住他。奥运会冠军拉弗·约翰逊、作家乔治·普林顿和罗伯特的助手杰克与加利文也加入了搏斗，这才制服了凶手。这时，明净的地板上已是血流成河，秘书连忙托起罗伯特不断流血的头部，在上面放了冰袋，埃塞尔也挤了进来，轻声呼唤着丈夫。

23分钟后，罗伯特被送进了洛杉矶中心医院，他已停止了呼吸，牧师给他做了弥撒。医生们仍心有不甘，给他注射肾上腺素，按摩心脏，奇迹出现

了，罗伯特的脉搏又开始微弱地跳动起来！他很快被送入手术室，手术长达3小时40分，但伤口太深，医生束手无策，只有输送新鲜血液以维持生命。25小时以后，罗伯特终于没有再醒过来。

刺杀罗伯特的凶手瑟翰·瑟翰被当场抓住。经查明，他是一名24岁的约旦青年，身上带有竞选日程剪报，家中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肯尼迪必须在1968年6月5日前被杀。”6月5日是阿以战争周年纪念日，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致使约旦等阿拉伯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肯尼迪在竞选中许诺一旦当上总统就给以色列20架歼击机。那么，一定是罗伯特的亲以色列立场使瑟翰对他射出了愤怒的子弹。

但是，罗伯特的尸检结果却带来了意外的发现。罗伯特头发周围有“烟黑”，这意味着有人在离他头部7—8厘米处向他射击，而瑟翰在1米之外；在犯罪现场发现了12处弹痕，瑟翰手中的枪至多可容纳8颗子弹，除了反弹因素，当时至少开了9枪。这说明了第二杀手的存在。有人怀疑是黑手党。黑手党和罗伯特宿怨很深，而这次肯尼迪选择的活动中心大使饭店长期以来作为黑手党的活动基地，黑手党成员不仅对它的结构了如指掌，而且安插了许多人担任职工。事发前几天，饭店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文件丢失，有几名职工失踪……

罗伯特之死又成了个不解之谜。警方苦于没有证据，只有大事化小。瑟翰承认了自己开枪，法院决定判处他死刑。肯尼迪四兄弟中仅存的爱德华·肯尼迪代表家族请求赦免，于是改判瑟翰15年徒刑。

肯尼迪家族的做法看似令人费解，这个备受创伤的家庭也许想摆脱冤冤相报的轮回，宽恕别人，给自己留下一个广阔的空间。

肯尼迪家族的确非同凡响，他们团结在一起为着同一个目标奋斗，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老肯尼迪建立王朝、纵横政坛的野心和不惮冒险、执着求胜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几个儿子，使每个人的行动都带着父亲的希望和家族的荣耀。长子约瑟夫为此一意孤行，为完成一次不必要的飞行任务而牺牲了年青的生命；次子约翰身体多病，却以超人的毅力抗拒着病魔，成为万众瞩目的总统，写下肯尼迪家族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惜乎昙花一现，在任仅2年10个月零2天便饮弹身亡；三子罗伯特力图重振旗鼓，谁料在即将获得总统提名之际遇刺身死。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家族不惜代价去追求同一个梦想呢？是母亲露斯，每一次打击袭来她都默默承受，屹立不倒；更重要的是父亲老肯尼迪，他与众不同的家教培养了一群勇敢的儿子。肯尼迪兄弟从小就生长在争强好胜的环境里，过着紧张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孩子们在开饭前5分钟必须到场，迟到就要挨骂；饭桌上与父亲交谈时，必须作机智的回答；不许闲聊、说俏皮话；每天的活动和比赛都有计划，不仅要守时，还要力争取胜。虽然兄弟几个个性不同，但他们心中都有一条共同的信念，他们必须力争，他们必须是第一号人物，当二号就是失败。

雄心勃勃、争强好胜融铸进肯尼迪兄弟的秉性里，造就了一种富有魅力的领袖气质。它引导着满怀希望的人们开拓未知的领域，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宣言。所以，尽管肯尼迪总统许下诸多诺言而没有使之成为现实，但人们怀念其首创之功，痛惜其英年惨死，还是以各种方式美化着心中的偶像。纽约市市长把艾德威尔德国际机场改名为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国会把计划中的华盛顿自然文化中心改名为约翰·肯尼迪表演中心；杰奎琳筹建的约翰·肯

尼迪纪念图书馆崛起在波士顿；财政部铸造了半美元的肯尼迪金币；在英国出现了肯尼迪祠堂，爱尔兰有肯尼迪纪念公园，加拿大有肯尼迪山……肯尼迪家庭失去了爱子，却因此赢得了一世称誉。

这个家族还会有惊人之举吗？对后辈而言，前人留下的荣光既是财富，又是重负，他们还能在写尽了辉煌与悲剧的家族历史上留下些什么呢？

爱德华·肯尼迪是约瑟夫·肯尼迪夫妇最小和最受宠爱的儿子，过多的娇惯使他比三个哥哥多了几分粗鲁和草率。上大学时因为请朋友代考而被哈佛大学开除；多次严重违章开车而被警方拘留；驾机外出时不系安全带致使他在飞机坠毁事故中受重伤。1969年7月18日，爱德华参加马撒葡萄园岛上的埃德加敦赛艇会后，去附近的查帕奎迪克岛一个独门独户的别墅参加由其表兄乔·加甘和朋友保罗·马卡姆举办的晚会。午夜过后，爱德华单独带着28岁的玛丽·乔·科佩克内驾车离去。在经过一座狭窄的桥梁时冲出桥面坠入水中，科佩克内小姐不幸身亡，爱德华却若无其事地自己钻出水面，10余小时后方才向警方报案。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爱德华含糊其辞、欲盖弥彰的做法使他在公众中的形象大打折扣。这件事最终使这位一度成为1969年民主党风云人物的肯尼迪后裔与总统宝座失之交臂。

1984年，小罗伯特·肯尼迪因私藏海洛因被判两年徒刑（缓期执行），而5年前他的哥哥，23岁的戴维·肯尼迪因长期服用海洛因和地美露身亡，他们的父亲可是赫赫有名的美国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啊！

1984年7月，民主党代表大会上，26岁的小爱德华·肯尼迪（爱德华·肯尼迪之子）慷慨陈辞，令人耳目一新，他能给肯尼迪家族带来希望吗？

1991年3月，一名30岁的妇女向棕榈滩警察局报案说复活节周末她在肯尼迪家族的棕榈滩海滨别墅院内遭到强暴，事发前，她和联邦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其子帕特里克·肯尼迪和外甥威廉·肯尼迪·史密斯在一家夜总会饮酒。凌晨三时半，她受邀到肯尼迪家别墅继续欢饮，随后事件发生。经调查，此案的重大嫌疑犯是威廉·肯尼迪·史密斯。几天后，他在母亲、律师的陪同下到警察局投案，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四年半徒刑或缓刑的制裁。这件事对肯尼迪家族又是一击。

肯尼迪家族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成为人们瞩目的中心。或许由于它的兴衰折射着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个人奋斗崛起于商界，金钱收买步入政界，幕后交易问鼎总统，身陷重网终遭暗算，权力斗争隐瞒真相，千古谜团留下悬案，后辈无能丑闻迭出，显赫家族日见衰落。看过了肯尼迪家族几代人的大起大落，谁不说这个社会既能成为你的天堂又能送你到地狱呢？谁能不慨叹这个社会光怪陆离的背后隐藏着说不尽的罪恶呢？

## 六、枪声不绝 千古多少冤魂

其实，美国历史上遭到枪杀的政界要员，又岂止肯尼迪总统一人？在他前后，美国历史上遇刺身亡的总统共有4位，有惊无险的总统遇刺事件更多。罗纳德·里根总统的遇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认识美国的法律。

1981年3月30日，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晨，华盛顿康涅狄格大街希尔顿饭店人来人往，一派繁忙景象。10点左右，白宫特工处的丹尼斯·麦卡锡警官和同僚驱车来到这里。他仔细察看了既定的进出路线，然后向提前到达的25名先遣组成员介绍情况，分派任务。1点30分，麦卡锡警官从酒店大厅门口转到了“贵宾出入”口处，上岗执勤。他鹰一般锐利的双眼扫视着周围。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以名人的多次光临而小有名气，尼克松、福特、卡特都曾在此发表演说，保安人员对这里的一切早已了如指掌，布置起来也得心应手。

1点50分，一辆豪华的林肯牌防弹车停在饭店前，特工、警察簇拥着里根总统走进酒店。总统年逾七旬，仍然神采奕奕。他刚上任两个月，这次是应美国劳联—产联建筑工会的邀请向会员发表演说。

半小时后，演讲结束，里根总统从“贵宾出入”口出来时，他的轿车已停在5步以外，引擎发动，车门敞开，静候总统上车。白宫先遣组人员按计划分散开来，以汽车为中心四下游动，密切注视在场者的一举一动。

“总统先生，请在这儿来！”“总统先生！”记者们迫不及待地向总统发问，他们在设于总统车后侧的临时警戒线后面拥挤着，叫喊着。里根总统则面带微笑，径直向汽车走去。这是白宫特工队长杰里·帕尔多次提醒总统的，听到呼叫不要立即回头望去。与此同时，白宫新闻秘书詹姆斯·布雷迪迎上前去，代总统倾听记行提问。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身穿西装、外套棕色雨衣的金发青年蓦地从错落的电视摄像机中亮出手枪，对准总统扣动了扳机。一直伫立在总统座车后面的麦卡锡立刻循声望去，但高低错落的摄像机挡住了他的视线。枪声再次响起后，麦卡锡终于发现了那双握枪的手，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右手狠狠卡住凶手的脖子，腾出左手夺枪。扭打之中他被击中腹部，但他咬紧牙关，与凶手拼死对抗。搏斗中，子弹乱飞，新闻秘书布雷迪被击中右眉上方，血流满面，华盛顿警官托马斯·德拉汉蒂被击中胸部，痛苦地踉跄在地上。这时，总统已从愕然中惊醒，快步走到车门边，特工队长杰里·帕尔急呼：“往后！趴下！”猛地按下总统的头，重重地往车里一推。里根猝不及防，头在车门上撞了一下，然后便被挤进车里。帕尔闪身上车，趴在总统身上，用自己的身躯保护着总统。

“开车，快开车！”黑色轿车离弦的箭一般冲出了人群。

在现场，凶手很快被制服了，特工和警察不顾个人安危，重重叠叠地压在凶手身上，其余的人手持左轮手枪环立在周围，以防有别的凶手杀人灭口。几分钟后，凶手被铐上手铐押往哥伦比亚特区警察总署。

总统上车后不久便感到呼吸困难，殷红的鲜血从嘴角流出。帕尔一时找不到伤口，但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肺部的氧化血。他当机立断，命令司机掉头向白宫以西五个街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开去，并在车内向上级作了报告。

3分钟后，总统座车到达医院，医院全体人员立刻准备救护工作。经检查，子弹射中总统的肺动脉，深入左胸3英寸，离心脏仅1英寸。医院成功

地取出了子弹，总统脱离了危险。

里根身体渐愈后，开始询问凶手情况。凶手名叫约翰·欣克利，25岁，其父是俄克拉荷马州一家石油勘探公司董事长，他本人却是个街头流浪汉。他先是在洛杉矶好莱坞电影城鬼混，去申请摄影师资格却被问得张口结舌，去报社求职，却四面碰壁；后来，他又兴味盎然地跑到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地，原来，他狂热地爱上了当时正在耶鲁读书的18岁电影女星朱迪·福斯特。朱迪13岁时在电影《出租汽车司机》中扮演一名吸毒雏妓，她自然娴熟的演技使她本来清新秀丽的形象光辉四射，因而一举成名。朱迪在耶鲁攻读法语和外交史期间，欣克利对她穷追不放，电话情书频频袭来。朱迪对这类事早已厌倦，她把无数封署名欣克利的信扔在一边，其中三四封还交给了校警。

警察在欣克利身上搜出了朱迪的照片，在欣克利所住的旅馆，保安人员发现了一封写给朱迪的信：“朱迪啊，要是我能够赢得你的芳心，与你白头偕老，即使终生默默无闻，或遭不幸，我也愿意毫不犹豫地放弃行刺这种意念。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这封信是在我去希尔顿饭店前1小时写的。”

一名追星族为赢得对方的爱情铤而走险，刺杀总统，简直不可思议。美国政府以非法使用武器、击伤政府工作人员、谋杀总统等13条罪状向法院起诉，若成立可判终生监禁。

4月3日，欣克利的父母从科罗拉多赶到华盛顿，声称“约翰是个有病的孩子，”应当“先假定他是无辜的。”因为按照美国法律规定，精神病人对自己的行为是不负有法律责任的。他们四下奔走，不惜用重金聘请著名律师和精神病专家，千方百计为儿子开脱罪责。受聘律师不负重托，争得了让欣克利进入联邦教养院做为期3个月的精神病检查的机会。要断定一个人的精神是否正常实在很复杂，因此该案一拖便一年多，直到1982年4月27日，此案开始公审。欣克利的四名辩护律师和六名精神病专家拿出了长达1000页、经过反复论证的材料，说明欣克利的谋杀动机和刺杀过程全是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进行，他应无罪。接下来，原告和被告的辩护律师唇枪舌剑，辩论了7周，大陪审团又争论了4天，最后做出了如下判决：欣克利无罪，他将被立即送往华盛顿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受检查，如果他的病情于国家、社会及其本人无害，他可于50天内获释，否则继续留在精神病院。

听到这样的判决结果，欣克利目瞪口呆，其母喜极而泣，其父欣然一笑。他们为这场官司花费的1000万美元总算有了结果，还创造了美国诉讼史上证明被告有精神病耗资最多的纪录。

尽管总统夫人抱怨“岂有此理！”尽管76%的美国人认为判决不公正，90%的人认为欣克利不应获释，甚至司法部长威廉·史密斯也忍不住发点小牢骚，结局终难挽回。这与其说是民主和法律的胜利，还不如说是精神病医学的胜利。

此后，不少参议员和众议员发表谈话，要求修改法律中有关精神病患者免罪的条文。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进一步提出，应当禁止制造、装配和出售欣克利所使用的点22英寸口径“星期之夜特制”牌强杀伤力枪支。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美国政府曾宣布禁止进口此种枪支，但商贩改头换面使进口实际上有增无减。1981年，平均每4个美国人便有一支枪，平均每50分钟便有一人死于枪下。可是，“全国枪支协会”在国会中很有势力，使有关法案很难通过。刚刚尝过枪击滋味，在整个审判中由于多种原因一直保持

沉默的里根总统仍然坚持他一贯反对枪支管制的立场，他认为，罪责不在枪，而是人们在自相残杀。

“到底要发生多少起枪杀案我们才能做到取消那些枪支？”参议员莫尼汉大声疾呼。在犯罪动机千奇百怪，人人可能持有武器的条件下，谁能阻止暴力事件的一再发生呢？

在这个据说最自由的国度，在法治和道德自律的表面下，却掩藏着肮脏的交易，罪恶的阴谋，甚至借平等与公正之名谋求一己之私，难怪纵使贵为总统，也难逃权钱交易牺牲品的厄运。这只无形的黑手能把你托入权力的顶巅，也能把你抛进身败名裂的深渊，或者地狱。

（罗敏撰稿）

## 民权运动领袖遭难——马丁·路德·金案疑点重重

随着一声枪响，他倒下了。那一刻只有他一个人在阳台。无数次面临死亡的恐惧，而这一次，马丁·路德·金明白。死神终于抓住他了。

## 一、血洒孟菲斯 民权运动顿失舵手

1968年4月4日，田纳西州，孟菲斯。

这是一个春日的黄昏，在一场暴雨之后，起了丝丝寒意。马丁·路德·金的心头猛地掠过一片阴影。夜幕就要降临，黄昏笼罩着这位中年黑人男子。对于1963年《时代》周刊评出的风云人物和196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而言，这些年的感受是复杂的，尤其是这个春天。他在考虑今晚即将举行的群众集会。一切都难以预料。成败固然重要，他已倾注全力。时局的变化难以操纵，就像命运无法预测一样……一种隐隐的不安和忧伤缠绕着他。

马丁·路德·金这次到孟菲斯是应当当地民权组织邀请，来声援已陷入瘫痪的清洁工人罢工的；同时磋商即将于下个月组织举行的“贫民向华盛顿进军”。但形势的发展有些混乱，黑人被一种激进主义所蛊惑，使得金这次孟菲斯之行一开始就笼罩着阴影。

金这次下榻的是一家价格低廉的黑人汽车旅馆。本来，像他这样的社会知名人士理应住进与其身份相符的豪华的假日饭店，他前几次访问孟菲斯就是如此。但正因为这样，他受到了来自对手的指责与批评，他们说得太奢靡。他想最好的解释是行动，于是这次他选择了这家汽车旅馆——洛林饭店。

孟菲斯自1968年以来，局势一直不平静。罢工、游行示威和警察镇压已经扰乱了该市的秩序。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是与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原则不相符的。尤其是孟菲斯地方当局对待民权运动的强硬态度，更使得民权运动在这里的发展异常艰难。实际上民权运动早在3年前就走向衰微了。可以说，孟菲斯之行也是对金的非暴力思想的一次严峻的考验。

上午，他与远在亚特兰大的父母通了电话，告诉他们他昨晚在孟菲斯群众集会上的演讲反应不错，比原来估计的要好。只有跟亲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能扫除心中的种种顾虑。弟弟艾伦这次也一同到了孟菲斯，金再次感受到兄弟间儿时那种纯真的情谊。在电话里，兄弟俩不断地与父母开玩笑。金是个开朗的人。

洛林旅馆处于孟菲斯治安较差的一个区，金的助手担心金的安全在这里得不到保障，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金。但金却坦然一笑。是啊，他何尝不在意自身的安全呢？但他选择这一条路，一个牧师，转瞬成了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在当初，他的确不会料到以后日子里所遭受的恐惧与艰险。那么多的威胁、恐吓，甚至把他的家都给炸了，他的妻女也差点死于非命。他自己曾经也坚持不下去了，为形形色色的恫吓而沮丧，情绪低落。1956年在蒙哥马利，金接到一个恐吓电话：“黑鬼，不用到下一个星期，你们就会为到蒙哥马利来而感到后悔的。”金感到自己在精神上都快支撑不住了，他只有求助上帝：“上帝，我要走我认为正确的道路，但是我已山穷水尽，力量枯竭，到了我独自一人无法面对的境地。”上帝终究给了他力量、信心，在往后所有的磨难中，他再没有失去过信心。

现在，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早在10年前，他在一次布道中就说过：“历史把一项我无法躲避的使命压在我肩上，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离开你们。”金明白，在这样一个号称“自由”、实际上仇视黑人的国度里，作为一名民权领袖，危险时刻都在身边。死亡的预感无数次袭上心头，在他风华

正茂的年代，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一年他 28 岁，在一次群众大会的祷告中，他就领悟到了来自上帝的这一启示：“啊，上帝，我希望没有人因为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而死去。当然，我不愿意死，但是，如果有人得死，就让我去死吧！”在第二年的一次签名售书过程中，一个中年黑人妇女对金行刺，但金死里逃生。如今 10 年过去了，金站在这个小旅馆内，再次面临死亡。

下午，金给在家中的妻子珂蕾塔打了电话，他告诉妻子，自己心情很好，正准备晚上集会的演讲，他还询问妻子收到了他托人送的花没有。很多年之后珂蕾塔回忆起他们夫妇间的这最后一次谈话：“他以前很少以这种方式送花给我，我说花很美丽，只可惜是塑料花。马丁说：‘我是为了让它永远地开在你身边，让你永远记着我。’”

这是金最后一次送花给妻子。

命运攸关的时刻逼近了，很久以来，金就预感到了这一点，他曾对妻子说：“很可能我活不长，如果我去了，我希望你不要为我悲伤。你要意志坚强，好好过日子。”金知道，带着恐惧他无法生活，如果有一种恐惧他已经征服了的话，那就是对死亡的恐惧。

就要出发了，马丁·路德·金在作最后的准备。他跨出阳台，院子里停放着那辆凯迪拉克轿车。汽车旁站着著名黑人歌唱家本·布拉奇，因为刚与珂蕾塔通过电话，金显得精神振奋。他大声对本·布拉奇说：“今晚你一定要唱那首《上帝拉住我们的手》给大家听。”

“好的。”本愉快地回答。这时，司机从车内探出头：“金博士，天冷，你得穿上大衣。”

“我会的。”马丁·路德·金答道。

站在金身旁的助手拉尔夫进屋刮胡子了，就在此时，枪声响了，就像放燃了一只鞭炮，一声闷响。等到所有的人反应过来冲出去的时候，马丁·路德·金倒在了阳台的血泊中。

金仰面躺在血泊中，一条蜷曲的腿卡在阳台围栏的铁条之间。子弹是从右前方射来的，不偏不倚，正中右脸颊太阳穴。碗口大的伤口，血流如注，金已失去知觉，眼睛茫然地睁着，似乎还没能理解发生的一切。

拉尔夫扑上去跪在金的身边，血还在流，“马丁！马丁！”拉尔夫喊道。金的瞳孔越来越弱，嘴唇发乌，血流到阳台上，还在扩散，血模糊了金的面颊。一名助手徒劳地拿着一条毛巾，试图堵住血，但无济于事。拉尔夫紧紧握住金的手，金的脉搏正在变弱，他于是口对口对金施行人工呼吸，但却感到金的手越来越凉。

四分钟后，救护车将金送往医院。孟菲斯集中了最优秀的医生对金进行紧急抢救。然而子弹是致命的。一个小时后，沉痛的医生向静静等候在手术室外的人们宣布了金的死亡。

在亚特兰大的珂蕾塔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人们告诉她，金遇刺了，但不知死活。她意识到她和金共同生活中的又一个紧要关头来临了。她异常镇静，安慰哭泣的孩子们。很多朋友聚集在她身边。但她知道，在这最后关头，她必须赶到丈夫身边。这一次会怎样？这一次他能逃脱死亡吗？她的心被阵阵恐惧揪住了。

亚特兰大机场的候机厅一派慌乱，在珂蕾塔看来，一切都像个不真实的梦，突然她听到广播喇叭里在喊她的名字，珂蕾塔头皮都发麻了，那是孟菲斯传来的消息。一会儿，金的秘书朵拉·麦克唐纳慌忙地朝她奔来，从

她脸上的表情珂蕾塔知道，金死了。

这位浸信会的牧师，怀着诸般梦想，被人称为“梦想家”的黑人民权领袖，在刚过完他39周岁生日几个月时间即遭横祸，命丧孟菲斯这座杂乱而又充满罪恶的小城。所有未圆的梦都在血泊中破碎。举世皆为之震惊哀悼。

很多金生前的好友与同志，相识的与陌生的，都来到了金夫人珂蕾塔和四个年幼的孩子身边。对于与金并肩战斗追求自由的珂蕾塔来说，4月4日的夜充满了梦魇。她的心都碎了。

金的父亲老马丁·路德·金听到这可怕的消息后，老泪纵横。与金的母亲相抱而哭。“我总以为我要先去的。”他喃喃自语。

上帝没有拉住金的手，很多年来伴随着金的这种死亡预感，终于应验了。他知道，必须有人为自由献身，他不是第一个。

美国总统约翰逊亲自致电金夫人：“我要告诉你，约翰逊夫人和我对您和您一家的不幸遭遇心里十分难过。我准备在电视中发表一项声明。在这全国需要团结的时刻草拟一个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行动纲领。”

金的遇害震撼了一个民族，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就此事作了一次专题演讲：“在这艰难的一天，在对美国而言艰难的时刻，问一问我们是怎样的一个民族，我们要走向何方，或许不无裨益……或者我们能够——正如马丁·路德·金所做的——互相理解、用同一种爱心和同情去努力取代那种暴力行为，取代已染遍我们国土的斑斑血迹。”他向金夫人表示：“只要我能办到，我可以在任何方面给你帮助。”

金的死同样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许多国家政府、进步组织给金的家属发去了唁电，为民权运动丧失一位重要领导人深表同情；同时谴责谋杀的恶劣行径，要求美国政府尽快查明事实真相。

4月7日，金的遗体运回他的家乡亚特兰大，停放在斯佩尔女子学院，供人们瞻仰凭吊。约翰逊总统宣布这一天为全国哀悼日。4月8日，遗体移至埃比尼泽教堂，这里曾是金受洗、后来担任牧师的地方。数以万计的人们从全国各地自发地涌向亚特兰大，亲眼看一看金的遗容，表达他们的哀思。

4月8日，按金原计划组织的孟菲斯游行如期举行。孟菲斯沉浸在金遇难所引起的震惊和沉痛中，无数的人们，不论黑人、白人，冲破了不准示威游行的禁令，来到了大街上。珂蕾塔和四个孩子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沿途拥挤的人群静静地站着。天空飘起了小雨，但谁也没有离去，小雨淋湿了珂蕾塔和孩子们，却洗不去她一脸的庄严和肃穆。

4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出席了葬礼，包括罗伯特·肯尼迪、杰奎琳·肯尼迪、尼克松等。15万人参加了金的送葬队伍，这是金率领的最后一次大游行。

在阵阵哀乐中，大厅里回荡着金生前的演讲录音：“我希望有人在那一天能够说，‘马丁·路德·金。他以毕生的精力为他人服务’；我希望那一天有人说，‘马丁·路德·金，他始终努力去爱他人’……”这浑厚和磁性的男中音蕴含着死者全部的努力和梦想，寄托着生者对死者的哀思和怀念。金夫人的眼睛湿润了，她为丈夫的不幸遇难而痛哭，又为丈夫活着的价值而骄傲。

金曾经就读的莫尔豪斯男子学院院长梅斯博士为葬礼作最后颂词：“上帝向一个奴隶的子孙发出了号召，对他说，‘马丁·路德·金，向全美国讲话吧，讲战争与和平，社会正义与种族歧视还要讲美国对贫苦大众的职责’”

以及在这一充满野蛮和战争的世界里，非暴力主义是完善社会变革的唯一方法’。”棺木缓缓沉入墓穴中，许多人泣不成声，朵朵鲜花洒落在棺木之上，尘土盖住了他——这位曾如此热爱生命与正义，并将生命献给了民权运动的勇士。马丁·路德·金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马丁·路德·金，这位黑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的遇害激起了黑人心中怒火。各地都举行抗议、示威游行，100多个城市爆发了骚乱，局势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约翰逊总统宣布在首都华盛顿实行紧急戒严状态，芝加哥市市长在严峻形势面前，不得不命令警察“对一切纵火犯可开枪将其打死，对一切抢劫犯可开枪将其打伤和打残。”黑人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日趋白热化。金的遇害，使民权运动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非暴力原则逐渐被更激进、更有战斗性的思想取代，整个60年代最后两年充满了动荡与不安。

## 二、非暴力抵抗 为民权战斗的一生

马丁·路德·金短暂的一生是伴随着美国最动荡的年代度过的，这位佃农的后代，1929年生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父亲老马丁·路德·金年轻时一贫如洗，靠个人奋斗，勤俭好学，跨入黑人中产阶级行列。

金在1945年考入莫尔豪斯男子学院，从那时起，他决定继承父亲的职业，作一名牧师。三年后他进入宾夕法尼亚州克罗塞神学院就读，1951年至1954年他在波士顿大学深造哲学、神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担任蒙哥马利市一座黑人教堂的牧师。金的外表英俊魁梧，最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带有磁性的嗓音，谈吐风趣，修养极好。在上学的时候就曾经有很多女孩子找他约会。但金最终选择了聪明、美丽的珂蕾塔。珂蕾塔当时正在波士顿一所女子音乐学院上学。他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很快，珂蕾塔就为金的魅力所折服，1953年，他们举行了婚礼。

因为爱金，珂蕾塔放弃了作为一个音乐家的理想，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金所追求的事业中，成了金志同道合的亲密伴侣。1954年的蒙哥马利是一个种族对抗严重的地区，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种族歧视的现象。最显著的是市公共汽车公司的规定，尽管乘客中70%是黑人，可是该公司对待黑人像对待牲畜一样。车上的全部前座都留给白人。即使前座空着，后排座位都坐满了，黑人也得站在后面，理由是也许下一站会有白人上车。如果前排座位坐满了，还有白人上车来，坐在后面的黑人就得把座位让出来。公共汽车驾驶员经常把黑人乘客称作黑牛、黑鬼。

1955年12月的一天，罗莎·帕克斯太太——一个42岁的女裁缝，金把她描绘成“一个娇媚的女人，有闪闪发光的个性”——经过一整天的工作，最后登上公共汽车回家。车里很挤，帕克斯太太在黑人席的前排找到了一个座位。到了下一站，上来不少白人，司机下令要她让座与白人。她拒绝了，司机找来警察。警察逮捕了她。

“帕克斯事件”像一枚炸弹投放在黑人社会中、愤怒的烈火在每一个黑人心上燃烧。整个黑人社区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彼此交换信息，商讨行动方案。最后决定组织为期一天的抵制乘坐公共汽车的统一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这次抵制乘坐公共汽车行动中崭露头角。因为他非凡的口才，因为他作为一个牧师在黑人社区具有的号召力，还有他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使他成了这次统一行动的组织者之蒙哥马利的反抗惊醒了所有忍辱负重的黑人，黑人们意识到他们不能再等待统治者用汤匙将自由一勺勺地喂给自己，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金担任了蒙哥马利市政改善协会的主席，在第一天晚上的集会上，金对黑人群众作了一次激情洋溢的演讲，第一次提出了他的非暴力抵抗思想。

“我们应该采取的方法是规劝，不是强制性的高压手段。我们应该反复听取耶稣的话：‘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些咒骂你们的人祝福……’如果你们能够带着高尚的品德和基督的爱而英勇斗争，将来的历史学家会说：‘曾经有过一批伟大的人——黑人，他们在人类文明的血脉中注入了新的意义和高贵的品格’。”

这次演说为他从蒙哥马利开始并将一直领导下去的运动确定了基调。

但是蒙哥马利市政当局傲慢地拒绝了黑人提出的要求。金明白，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离成功还很遥远。最后，组织者决定抵制乘车运动将无限期延长

下去，直到黑人们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也正是在这时，金开始受到来自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威胁与恫吓。常常有女人打电话来，辱骂金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道德败坏者。”甚至有恐吓电话扬言：“你们不滚出城去，就杀了你们！”金开始意识到在今后生涯中他无法躲避的艰难与险恶。

在一次爆炸事件中，金与他的家人侥幸逃生。在沉痛的现实面前，金的非暴力原则经受了第一次考验。但金却异常沉静，他对聚集在他周围的人们说：“拿剑的，必死于剑下！……如果我倒下了，我们这一运动不会倒，因为上帝与我们在一起。”

不断有三 K 党徒午夜出来威胁黑人，他们身穿白长袍，戴着尖顶面罩，坐满四五十辆汽车，从黑人区驶过。黑人们在金的倡议下，给三 K 党徒以漠视的眼光，三 K 党想吓住黑人的用心破产了。

一年过后，黑人们的反抗终于有了结果，最高法院裁决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是非法的，蒙哥马利广大黑人雀跃欢呼。但金知道，这仅仅是斗争的开始。

金一夜之间成了美国黑人的英雄。1957 年 2 月，《时代》周刊以金为封面，里面有一长篇报导：“（金）一年多以前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者或黑人浸信会牧师，现在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著名领袖。”

1957 年，金组织成立了南方基督教领导联盟，金当选为主席，总部设在亚特兰大。它是民权运动前期主要的领导中心。

是这场运动造就了金，金又赋予它以自身的特色。金的成名来得太快了，他的支持者愈多，他的反对者亦愈多，生命危险每天都存在。

1958 年，金决定在纽约哈莱姆举行一次签名售书，金的著作《奔向自由》新近上市。那一天，蜂拥的人群快把书店挤破了，一名黑人中年妇女挤到金的身边：

“你是金博士吗？”

“是的，我是。”金回答这位妇女。

“路德·金，”这位妇女用低沉的、报复性的声音说，“我追踪你已经 5 年了。”

突然间，闪过钢刀的一阵寒光，那女人从衣服里抽出一把非常锋利的日本拆信刀，刺进了马丁·路德·金的胸膛。人群顿时大乱。

凶手当场就被制服了。金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刀柄露在胸膛外面，他并不觉得怎么痛，心想这下性命完了，无意中他碰着了刀刃。手指被割破，渗出了缕缕血丝。

金被送往医院，几千人聚集在哈莱姆医院外的大街上，他们在为金祷告。外科主任梅纳德博士在两个助手配合下，成功地给金动了手术，取出了那把刀。在长时间的手术过程中，金始终保持镇静。“如果他惊吓了，或感情冲动，就会影响手术成功的机会，”梅纳德博士说，“刀尖正好顶着主动脉外壁，万一他突然动一下。打一个喷嚏，他马上就可能死。金博士高度的自控能力救了他自己的命。”

在女凶手身上，警察还搜出一支手枪，有人怀疑这是一起阴谋，但法院最后宣判凶手系精神不正常。

金死里逃生，但同时也意识到，就像印度的甘地一样，杀害自己的也许是来自内部的人。

金最崇拜的是印度的圣雄甘地，1959年，他访问了甘地的祖国印度。在那里，他拜见了印度总理尼赫鲁，也见到了甘地的女儿，后来的总理英迪拉·甘地。这次印度之行，更坚定了金的非暴力信念。

1960年，金移居亚特兰大，领导了静坐示威运动。

事情起因于北卡罗来纳州的葛底斯堡，四名黑人大学生到伍尔沃思饭店，很文明地要求就餐，但遭到了拒绝，可是他们也拒绝离开。后来其他学校的学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每天去这个饭店静坐。愤怒的火焰迅速蔓延到其他州，其他城市的黑人和白人学生也举行了声援式的静坐示威。

金参加了亚特兰大的学生静坐示威，他与参加者一共75人都被逮捕。对金和学生的逮捕舆论大哗。所有被捕者都拒绝保释，金说：“如果种族隔离要10年才能废除，我就在监狱里呆10年。”

第二天，所有的被捕者都释放了，唯有金例外。法院以两个月前金的一次超速驾驶为由，判处他6个月的强制劳动。

此时的金夫人珂蕾塔已怀有5个月的身孕，对金的判刑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在珂蕾塔最困难的时候，一名在政坛上初露锋芒的政界要人向她和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就是约翰·肯尼迪。尽管有人说肯尼迪插手这一事件是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金还是很快被释放了。金从此建立起与肯尼迪兄弟的友谊，肯尼迪也在整个黑人社会中获得了10万张选票，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对手尼克松。

出狱后的金声名大震。1963年到了，这正是林肯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颁布100周年纪念，民权运动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金和他的同伴们决定组织一场“向华盛顿进军”的纪念活动。

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集会，8月28日，25万黑人与白人参加了这次自由与平等的大游行，活动的高潮是25万名群众聚集在林肯纪念馆和华盛顿纪念碑的广场上，聆听金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我今天对你们说，我的朋友们，尽管眼下困难重重，颇多挫折，我仍然有一个梦。它深深植根于美国梦。

“我梦见总有一天这个国家将站立起来，实现它的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见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原先的奴隶的儿子们与原先奴隶主的儿子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共叙手足情。

“我梦见有一天甚至密西西比州遭不公正和压迫的酷热煎熬的沙漠将变成自由与公正的绿洲。

“我梦见有一天自己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不是根据肤色，而是根据品德。

“我今天有一个梦。

“我梦见有一天亚拉巴马州——其州长最近大谈干预，鼓吹拒绝执行国会的法令——将会大变样，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携手并肩，亲如手足……”

金的演说飞越高山，飞越大海，他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他的梦想触动了美国的“良心”，自由的呼声响彻云霄。这是金一生的高峰，全世界都知道了他，这位和善、说话缓慢、有着极具感染力的口才和出色的组织能力的年青人——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美国人之“向华盛顿进军”留在了每个人的记忆之中。在巨大的压力下，新任总统约翰逊于1964年初促使国会通过了新

的《民权法案》。此时，虽距上一次大规模的民权立法已有近 100 年，但是，即使如此缓慢的进展，仍是以巨大的努力换来的，而金在这场漫长奋进的运动里，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

由于金对民权运动的贡献，他获得了 1964 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年他只有 35 岁。民权运动在这几年当中，尽管取得不少成就，在很多领域，种族隔离已被废除，但在种族主义者心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仇恨情绪却非几年时间可以消除，黑人离真正的解放还相当遥远。

就在“向华盛顿进军”胜利结束的两个个月后，伯明翰一座黑人教堂被炸，4 名黑人女孩被炸死。金深切地体验到斗争的艰难。

1964 年的漫漫长夏充满了暴力，一个警察下班后杀死了一名黑人少年，引起纽约市的暴力行动。反对警察暴行的抗议示威蔓延到其它地区，往往还伴随着骚乱和抢劫。形势急剧恶化，很多人开始批评金的非暴力思想，一种激进主义思潮控制了民权运动。

黑人民权运动被分成众多的派别，黑人的凝聚力被削弱了。金为形势的恶化而忧虑。

在金生命的最后几年，美国公众的注意力被引到一场无望的海外战争——越南战争中，反战情绪日益强烈。金也投身反战运动，多次发表演说抨击越南战争。“一个美好社会的诺言已在越南战场上被粉碎了……我们应该把民权运动的热诚与和平运动相互结合起来。”“一个国家年复一年地不断把无数的钱用于军费开支，而不用用于社会改善计划，等于走向精神死亡。”

金的演讲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的同志、他的敌人都为他的演讲吃惊，约翰逊政府对此也极为关注。金与执政者的裂痕正在悄悄扩大，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的结合是政府不愿看到的事情。

金信念中的战斗精神丝毫没有减弱，他看到了民权运动的最大阻碍是决策阶层的保守势力，改革步履维艰。没有执政者积极主动的配合，金感到他所主张的非暴力思想正面临深刻的危机。

金在战斗中慢慢走向成熟，但仍有令他十分痛苦的事。自从成名后，有关他的流言从没有停止过，谣言不外乎涉及性、金钱、共产党，无数的中伤给他和妻子带来很大伤害。但他逐渐学会如何应付这些危机，他不能为谣言压垮。

金预感到所剩时间不多，走过的每一步都伴随激情、渴望、苦难与死亡，有多少的磨难、打击部挺过来了，有多少的朋友、同志、无辜者都已在这场斗争中死去。1963 年，肯尼迪总统，这位黑人眼中代表改革、进步的总统遇刺身亡；1964 年，另一位黑人领袖马尔科姆·X 在一次集会上遭人暗杀……还有更多的人。但这一切都没有使金丧失信心，他还有很多事要做。然而，致命的子弹射向了他，一切都嘎然而止。

### 三、跨国大追捕 国际警察联手行动

在谋杀发生之后，警方立即封锁了出事地带。据目击者称，子弹是从洛林旅馆阳台对面的一幢楼房射出的。洛林旅馆的对面是贝西·布鲁尔太太经营的一家出租公寓。布鲁尔太太在回答警方提问时说，案发当日下午来了一位自称约翰·威拉德的客人，此人大约35岁，身高1.8米左右，体重80公斤上下。这位客人表情冷漠，很少说话，主动要求住在公寓后部的5—B号房间。警方发现这个房间的浴室正对着金的房间阳台，是一个瞄准射击金的理想场所。

这位约翰·威拉德先生预付了一天的房租，案发后就销声匿迹了。另一名房客也声称枪响之后，看见一男子匆忙往楼下跑去。他所描述的该男子特征与布鲁尔太太说的约翰·威拉德一致，这名房客同时证明曾看见那位男子携带一只包袱，神包慌张。

孟菲斯警察局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因为暗杀的是马丁·路德·金这样的知名人士，于是把案子移交给当地联邦调查局分局。分局长罗伯特·詹森将案情向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汇报。出于职责，也迫于舆论与政府的压力，联邦调查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展开了一场盛况空前的大追捕。

本案的重大嫌疑犯是那位“约翰·威拉德”，可是，这位“约翰·威拉德”究竟是谁？他在哪里？

案情很快有了重大进展，洛林旅馆附近的一家游乐场工作人员于案发第二天在大门口发现一个丢弃的包袱，特工人员检查了其中物品，包括一支步枪、一架望远镜，还有一些衣物。包袱是布鲁尔太太公寓的床单。很明显是那位约翰·威拉德遗留下来的。步枪的口径是30.6毫米，雷明顿牌。步枪上面留有指纹。联邦调查局只有这唯一的线索来查找约翰·威拉德。依靠其雄厚的技术力量，联邦调查局把范围缩小在30岁至40岁之间，身高1.8米左右的白人男子。根据那支步枪上面留下的指纹，调查局在其保留的数以百万计的指纹间，查出了这些指纹的主人真名叫詹姆斯·厄尔·雷。

现在，一个大概的轮廓勾勒出来了，詹姆斯·厄尔·雷就是案发当天在布鲁尔太太公寓以约翰·威拉德登记住宿的中年男子。雷在逃窜中，情急之下将留有他指纹的凶器遗留在作案现场附近。这使他成了本案的唯一重大嫌疑犯。

现在来看看这名嫌疑犯的档案：詹姆斯·厄尔·雷，1928年生于伊利诺伊州，是一个贫困家庭中九个孩子的长子。15岁的雷在一家制革厂做小工，1946年入伍并被派往德国，他在那里显示出后来一系列劣迹的发端：酗酒、打架、玩妓女、在黑市倒卖香烟，后被遣送回国。他档案中第一桩犯罪记录是1949年在洛杉矶盗窃一台打字机，此后他抢劫过出租汽车司机，1955年他在密苏里州的汉尼巴尔盗窃汇票，并用它到佛罗里达州作了一次舒服的旅行。一连串的得手使其胆量大增，1959年他抢劫了圣路易斯超级市场；同年，他从克罗格市场现款收入记录机中偷了120美元，而后东窗事发，被判20年徒刑，押往密苏里州立监狱。

从詹姆斯·厄尔·雷的斑斑劣迹中，人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惯偷犯，盗窃物品价值不大，是一个为了120美元而蹲20年大牢的倒霉蛋。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偷小摸，又是如何神秘地卷入了马丁·路德·金这桩政治谋杀案呢？这桩谋杀案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很多无法回答的问题。

雷是不会甘心 20 年的囚徒生活的。他曾于 1960 年、1966 年两次越狱，但都失败了。但他在 1967 年 4 月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藏在一辆运送面包的卡车里逃出监狱，这次他成功了。

联邦调查局根据雷的照片，在全国范围内通缉他。可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漫长的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毫无雷的线索。这时突然有人想到，凶手在作案后最大的可能性是逃往国外。而凶手在出逃护照上不大可能使用真实姓名，仅仅根据照片，要在这一个月内发放的众多护照中找出雷，无异于大海捞针，凶手还有可能易容，这就给调查增加了相当大的困难。

然而，调查局在发放护照的记录上发现一位“威廉·里斯”的男子的照片与雷基本一致，可以确定的是他已逃到加拿大。调查局请求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协助调查。6 月初，皇家骑警队致电联邦调查局，声称已找到了詹姆斯·厄尔·雷，他们非常辛苦地查阅了 25 万份领取护照的申请书，通过核对照片和笔迹，最后发现了雷。

但此时他已离开加拿大，到了伦敦。联邦调查局请求英国警方将其抓获，但在最后关头，他又逃离伦敦到达里斯本，在他再次返回伦敦，也许是挥霍光了——企图抢劫英格兰一家银行时最终落网，并被引渡回美国。这是 1968 年 6 月 6 日。

这是联邦调查局历史上盛况空前的一次大搜捕，涉及到加拿大、墨西哥、葡萄牙、英国等许多国家，出动了国际刑警，调查局也先后投入 3014 名特工人员，累计行程 50 万英里，花费了 140 万美元。

詹姆斯·厄尔·雷是开着一辆白色野马车逃离作案现场的，随后不断变换姓名领取护照，从加拿大到葡萄牙，到英国，一路挥霍，并有不断更换的美女相陪。正如联邦调查局对其追捕花费了大量金钱一样，雷的出逃也是以巨额开支作铺垫的，而且，每一步计划似乎都在事先有周密的考虑和安排，似乎有人在暗中操纵并从金钱上资助雷。然而，那看不见的第三只手是谁？

#### 四、神秘拉乌尔 真凶究竟何许人也？

詹姆斯·厄尔·雷，一个惯偷，越狱者，杀害马丁·路德·金的重大嫌疑犯，在案发两个月并周游列国之后，终于落入了法网。他的外表并不具备一个杀手的特征，尽管身材高大，表情冷漠——那是因为不善言语的缘故，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但终究掩盖不住其气质中的愚笨和失意。这是一个社会下层者，饱受过贫穷，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渴望发财，实现“美国梦”，但眼光短浅，往往得不偿失。几次盗窃屡屡失手，最终被投入监牢。但无论如何，现在他是马丁·路德·金案件中的唯一嫌疑犯。

在雷被捕之后，众多记者蜂拥而至，希望能从雷的嘴里掏出些什么。但雷一言不发，最后是资深记者威廉·布雷福德·休伊使雷改变了主意。休伊许诺将付给雷1.5万美元，以购买他的发言。雷为钱心动，在狱中写了一份书面材料，详细记载了他越狱以后的生活。休伊对雷这份书面材料，作了实地调查，在验证无误之后，在《纽约时报》上连载发表。在休伊整理的材料中，人们第一次接触到一位神秘的“拉乌尔”。

雷在材料中交待，自越狱后他仅与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那位拉乌尔联系过。在他越狱之后，1967年8月，他从拉乌尔那里收到了4500美元，并按照拉乌尔的指示行事。在雷看来，这些钱似乎得来很容易，他只需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甚至出国。10月，雷用这些钱在伯明翰购买了一辆白色野马车，随后，他按拉乌尔的要求，开着这辆新车，到墨西哥旅行。他无法明白拉乌尔要他去墨西哥的真实意图，也许是贩毒，他只是这样猜测，或者是去做色情生意，但这些猜测后来都被他自己否定了。

1967年12月，雷在新奥尔良从拉乌尔那里领取了500美元。之后他返回洛杉矶。但在1968年2月，他接到拉乌尔的电话，要他在3月返回新奥尔良。3月17日，雷离开了洛杉矶，他所邮寄的包裹的最终地址是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的家乡和总部所在地，而不是他声称的新奥尔良。

直到1968年3月23日，雷在伯明翰第一次见到这个神秘的拉乌尔。他们在亚特兰大一起呆了一天，拉乌尔走了，直到3月底才回来。这个时期，雷在一张亚特兰大地图上把金的家、办公室及周围的教堂都用笔圈了起来。

雷这段时间的行程路线是从洛杉矶 塞尔马 伯明翰 亚特兰大 孟菲斯。这与马丁·路德·金同期的活动地点惊人的一致。可以看出，这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跟踪。

3月29日，雷从拉乌尔那里收到了750美元，在去孟菲斯之前，雷在伯明翰购买了一支口径24.3毫米的雷明顿步枪，但随后稍晚，雷对那家公司说要求更换一支口径更大的步枪。于是就换成了那支在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后遗留在作案现场的雷明顿长枪，口径为30.6毫米。据雷的律师珀西·福尔曼称，从那以后，雷一直是一个人在一起。

联邦调查局的原则是，在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之前，任何嫌疑犯都是无罪的。然而，对雷不利的证据在一点一滴的堆积，雷无法证明他的清白。他一直在跟踪马丁·路德·金，他购买了武器，他在洛林旅馆阳台对面租了房间，作案现场附近留下了他的那支步枪，更重要的是步枪上有他的指纹。果真是雷扣动了扳机，瞄准和杀害了金吗？

雷的交待材料中有多少真实的成份？如果真的存在一个“拉乌尔”，那么他又是谁？他是在雷越狱后冒出来的一个神秘人物，在案件发生后又消失

得无影无踪。雷不能清楚交待这位拉乌尔的真实身份。也许是拉乌尔指使雷杀害了金，雷只是一个替罪羊，拉乌尔才是真凶；也许“拉乌尔”是雷蓄意编造的，为了替自己开脱罪责；也许事情本身很简单，就是詹姆斯·厄尔·雷一个人策划并谋杀了马丁·路德·金。

## 五、不公开审判 结案并非水落石出

在詹姆斯·厄尔·雷被捕之后，他的父亲对记者说：“我认为我的儿子不会去杀人，他没有那样的能耐。”确实，在雷以往的作案记录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大精明、总是在紧要关头出错的笨贼。他在盗窃打字机逃跑后，发现存折掉了，又折回原路寻找，最后落入警察之手；还有一次在行窃之后，为躲避搜捕的警察，躲进了电梯间，情急之中，却忘了将电梯门关上。就是这样一个背时、倒霉的窃贼，却独自策划了一起政治谋杀案，并逍遥法外达两个月之久，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更令人吃惊的是雷拒不认罪的态度，他坚决否认他杀害了金，但在众多证据面前，他依然不能摆脱凶杀的重大嫌疑。

法院为雷找来了律师阿瑟·哈尼斯，哈尼斯是南方人，主张种族隔离。所有的人都明白，雷如果杀死了马丁·路德·金，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一桩谋杀案了，更是一场种族纠纷。阿瑟·哈尼斯也许能改变雷的命运，因为有太多的证据证明雷是谋杀金的唯一重大嫌疑犯。

正当哈尼斯苦心收集材料准备为雷作辩护之时，国际著名犯罪律师琅西·福尔曼主动提出要为雷辩护。雷相信珀西·福尔曼的名气，于是辞掉了阿瑟·哈尼斯，珀西·福尔曼能化腐朽为神奇，经他之手的案子都能胜诉。人们关注这一次珀西·福尔曼能否再创奇迹，期待开庭审判的到来。

由于中途更换律师，原定的开庭日期被延迟了，珀西·福尔曼说他需要3个月时间来作准备。

3个月时间过去了，公众期盼的审判没有进行。又是3个月。漫长的半年过去了，而舆论对此案件的关注却丝毫没有减弱。法庭宣布再次延期开庭，最终日期定在1969年3月10日。

因为受害者是马丁·路德·金，一位如此受人爱戴的黑人民权领袖，没有人会同情杀害他的凶手，没有人相信詹姆斯·厄尔·雷是完全无罪的，因为铁证如山：他一直跟踪金；他购买了谋杀武器；他租了一间窥视金的房子；致命的子弹是从这幢公寓射出的；证人看到一个酷似雷的人逃离现场；步枪上留下的唯一指纹是雷的。但是人们怀疑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没有哪一桩政治谋杀案系个人冲动所为，人们想知道的是何种政治背景、政治势力使雷卷入这起案子。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开庭公审的最后一刻，法庭对外宣布，公诉一方和辩护一方已达成协议，詹姆斯·厄尔·雷承认自己杀害了马丁·路德·金。

这样，凶手确证了，常规的审判不再进行。1969年3月10日，在孟菲斯进行了一场简单的审判，詹姆斯·厄尔·雷承认杀害了金，辩护律师珀西·福尔曼则力图向人们证明，马丁·路德·金案件系雷一人单独行动，只是一桩简单的谋杀，其动机是为了出名。珀西·福尔曼请求陪审团考虑到凶手的认罪态度较好，考虑到他仅仅是为了出名才去行刺一位政界名流，他固然杀了人，但鉴于田纳西州法律的人道主义原则，不要将詹姆斯·厄尔·雷送上电椅。陪审团最后判决雷99年刑罚，押往田纳西州立监狱服刑。

这个结果使公众大为吃惊，一切居然如此简单？人们疑云满腹，是谁使雷从拒不认罪到承认自己是凶手？这当中有什么内幕？一件轰动一时的大案就以这样的审判结束，凶手被投入大牢，动机仅仅为了出名。案子结束了，

官方已有定论，但留下的种种疑点却使得官方的解释不能自圆其说。

与此同时，威廉·布雷德福·休伊的《他杀害了梦想家》正式出版，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这本书中，休伊的观点与原来发表在报纸上的论调大相径庭，休伊同意珀西·福尔曼的观点，认为雷是为了出名才杀害了金。最重要的一点是，休伊在书中一反其以前的观点，认为雷所说的“拉乌尔”系凶手编造，意在逃脱责任，而且向读者证实，并无一个神秘的“拉乌尔”的存在。

本案看来已经结束，人们的种种猜测和怀疑似乎没有根据。联邦调查局最为痛恨的是有关这个案子的流言满天飞，局长埃德加·胡佛的日子不好过。甚至有谣言说联邦调查局参与谋杀了马丁·路德·金，这令联邦调查局大为恼火。现在，真正的凶手已找到。动机也具备，这样的结局对于约翰逊政府和胡佛的调查局，都是令人满意的。

然而，整个案件从始到终都充满了疑点。法庭的最后结论除了政府与联邦调查局外，没有多少人信服。在本案宣判结束后，人们对它众说纷坛。

对于珀西·福尔曼的解释——认为凶手是为出名而杀害了金，没有多少人赞同。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詹姆斯·厄尔·雷是一名种族主义者。因为在60年代的黑人民权浪潮中，一名种族主义者暗杀一名民权领袖并不少见。为此有不少文章把雷说成一个狂热的种族分子，在其早年的言行中，就已流露出对黑人，尤其对马丁·路德·金的仇恨。

假如法庭的宣判成立，雷自始至终是个人作案，不存在阴谋，按照推论，雷是出于种族仇恨杀了金。然而这样的结论也站不住脚。因为在这个年代的南方，雷只是代表着普通下层白人的种族情绪，像雷这种情绪的人很多，但他们并没有去杀金。雷是怎么从一个盗窃数额较小的惯偷犯突然变成一个政治谋杀犯？是什么促成雷挺而走险？

很多人都相信存在一个被掩饰了的阴谋，雷只是一个牺牲品，是被推到前台的替罪羊。本案一系列离奇古怪的现象更坚定了人们的看法。

太多的迹象表明雷不可能单独作案。雷自越狱后到谋杀到被捕，一系列活动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是什么力量给予雷胆略从一个小偷变成一个凶杀犯？雷在这么长时间里花费的大量经费又源于何处？谁替雷安排了计划周密的潜逃方案？雷所说的那位神秘的“拉乌尔”是谁？果真如珀西·福尔曼律师所言是雷编造的？雷编造这个人物的动机是什么？

在审判过程中的怪事更令人不解，大律师珀西·福尔曼主动要求为雷辩护就令人不解。福尔曼为何要劝说雷认罪？又为何劝说记者休伊改变原来的观点，赞同雷的作案动机是为了出名的说法？更重要的是，法庭为什么极力回避、压制“阴谋”的说法？为什么没有进行公开审判？是什么力量在支配案件的审理过程？

团团疑云，雾海茫茫，詹姆斯·厄尔·雷随后又对判决提出反对，要求上诉，但被驳回。马丁·路德·金死了，雷被关进了监狱，人们更加相信这个案子并没有结束。

真凶是谁？

是谁要杀害马丁·路德·金？为什么？

## 六、谋杀的背后 种族纠纷由来已久

60年代黑人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在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愈演愈烈。这场斗争所展示的深厚历史背景，使人们真正了解金为什么被害。

19世纪的南北战争和南部重建以妥协而告终，结果维护了联邦的统一，形式上废除了黑人奴隶制，但广大的黑人却依然被束缚在枷锁中。由于南部各州对联邦政府的强烈抵触情绪，黑人离真正的自由仍很遥远。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本世纪50年代。尽管美国已获得了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尽管美国以自己的价值观为自豪，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但在号称最自由的国家里，黑人仍是低等公民，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一如往昔，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现象比比皆是。

1956年3月5日，亚拉巴马州托斯卡路萨根据1954年“布朗诉教育局案”，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种族隔离教育是不平等的。这一天，黑人女学生奥瑟琳·露西显得异常兴奋，因为亚拉巴马州立大学已接受了她的入学申请。能与白人一样，依据联邦法令，进入这所白人学校就读，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露西憧憬着未来。

露西不是没有想到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可以使他们对黑人做出任何事。在亚拉巴马州，白人处死一个黑人甚至不算犯法。想到这些露西不寒而栗。但一想到她的身边还有警察和学监的护卫，她又觉得事情也许不会那么坏。

可是，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她从没见过学校门口聚集起那么多人，他们都是学生和市民，他们以蔑视的眼光盯着她，尖叫狂喊：“黑鬼，滚出去！”露西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这一切，暴风雨般的石子向她的车子袭来，甚至有些人跳到她的汽车顶上——尽管有层层荷枪实弹的警察护卫和女学监的陪伴。她第一次感到跨入校门的路是那么漫长。

露西最后因为暴力而被迫停学了。她愤怒地向地方法院控告大学当局合谋把她排斥在大学之外，结果她被学校董事会开除出校。

露西的遭遇在每一个黑人心中燃起了愤怒之火，此时金正在蒙哥马利领导抵制乘坐公共汽车运动，发生在亚拉巴马的骚乱使他看到这个国家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黑人们还能忍受多久这些加在他们身上的歧视？

在就此事件作的一次布道中，金说：“我们今晚聚在这里，向那些长久以来对待我们不公正的人说，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不能忍受被隔离被污辱，不能忍受被人欺凌。对于所有这一切，我们一直默默忍受。今晚我们聚在这里，把我们自己从沉默中拯救出来。除了自由和正义以外，别的什么我们也不能忍受。”

1957年9月23日，阿肯色州小石城要求取消种族隔离的呼声最先是从教育界发出的，最高法院宣布隔离教育违宪。然而在南部各州要执行这个裁决，却碰到了史无前例的阻挠。

阿肯色是处于西南部的一个偏僻小州，经济发展相对全国而言比较落后，一直实行种族隔离。在1957年，它是对隔离教育违宪抵触最强烈的一个州。

在阿肯色州政府所在地的小石城，人们对是否在学校里取消种族隔离这个问题讨论得最为激烈。州长奥瓦尔·福伯斯是个强硬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在他的鼓动下，阿肯色州通过了对最高法院裁决拒绝执行的决议。最高法院

对此藐视联邦权威的做法迅速作出了反应，宣布阿肯色州决议无效，并强令在小石城中心中学实行黑白混校。

阿肯色州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分子为抵制最高法院的命令纠集到一起，他们聚集在学校门口妄图阻止黑人学生入校。福伯斯州长调派国民警卫队把守中心中学，冠冕堂皇地称此项举措意在维持秩序。小石城顿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伊丽莎白是个15岁的黑人姑娘，当时她曾想进入这所学校读书，请看她的自述：

“我们打算去学校的头一天，学监告诉我们暴徒会怎么说，怎么干，但是他从来没提到不会有任何人来保护我们。他告诉我们的家长不要来，因为如果孩子要来，他设法保护他们。

“那个晚上，我是那样兴奋，无法入睡。第二天早晨我差不多是第一个起来。我正在熨我的黑白两色衣服——这是为了上学，头天专门做的。这时候，弟弟打开电视机。电视里开始说有一帮人集结在学校附近。电视里的人说，他不知道我们是否早上会去上学。妈妈在厨房做早饭，她喊道：‘把电视关上！’她是那样不安和担心。我想安慰她，我就说：‘妈妈，不要担心。’

“爸爸来回走着，从这间屋到那间屋，满脸愁容。他叼着烟斗沉思，手上还拿着一支雪茄，可没有点燃。实在叫人好笑，他是那样紧张。“我离家前，妈妈把我叫到起居室。她要我们做祷告。然后我搭上公共汽车，离学校一个街区我下了车。我看见一大堆人站在街边，对面是士兵警卫着的中心中学。我往前走的时候，这一大堆人突然静下来。我望着所有的人，心想如果我走过一个街区在警卫队的身后走进前门，可能会安全。

“一会儿我听见的只是一大堆人的混乱脚步声。接着有人喊：‘她来了，准备好！’我离开人行道上的人群，走上大街。只要暴徒来追我，我就可以跑回街那边，国民警卫队会保护我的。

“人群越走越近，然后开始跟着我，用各种难听的话叫我。我仍旧不害怕，只有一点点紧张。突然，我膝盖开始发抖，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走到还有一个街区远的中心校门口。这是我一生中走过的最长一个街区。

“即使这样，我还是不太害怕，因为这个时候我始终认为警卫队会保护我的。

“我走到学校前面的时候，又朝一名警卫队士兵走去。但是这次他直盯着前面，一动不动，不让我穿过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站在那儿望着学校——好大一所学校！就在这时候警卫队士兵闪开，让一些白人学生走进去。

“人群里没有声音，我猜想他们在等着瞧会发生什么事。等我能稳住我的膝盖时，我朝那个让白人学生进校的士兵走去。他还是不挪动。我正要从他身边挤过去时，他端起了刺刀，接着其他士兵走拢来，他们都端起了刺刀。

“他们用一种鄙视的眼光盯着我。我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转过身，此时人群向我走过来。

“他们越走越近。有人开始叫嚷：‘吊死她！吊死她！’

“我想从人群里找到一张友善的脸——也许会有人帮助我。我望着一个老太太的脸，看样子是仁慈的。但是，我再看着她时，她啐了我一口。

“他们走近了，嚷道：‘不准黑鬼进我们的学校，滚开！’

“我转身向着国民警卫队，可是他们一张张脸告诉我，我从他们那儿得不到什么帮助。于是我朝公共汽车站走去，我想如果我能到那边去，我就会安全的。

“我终于到了那边，我想我实在不能再多走一步了。我坐下来，暴徒们集结过来，又开始乱叫乱嚷。有一个人使劲嚷道：‘把她吊到这颗树上去，我们来收拾这个黑鬼！’就在这时，有个白人坐到我身边，用胳膊搂着我，他托起我的下巴说：‘不要叫他们看见你哭。’

“接着，一个白人妇女——她心肠很好——她走过来坐在凳子上。她带我上了公共汽车，坐在我身边……我只记得我后来站在盲人学校的门口，我妈妈在那儿工作。……

“妈妈站在窗前，低着头，但是她一定是意识到我来了，因为她转过身来。她看起来好像一直在哭，我想告诉她我没事，可是我说不出话来。她用手臂搂住我，我哭了。”

《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一事件，全世界均获悉一名 15 岁的黑人女孩子于 1957 年被逐离“小石城中心中学”的事件，一个国民警卫队人员将她驱至一群狂呼乱叫的白人暴徒中，“吊死她！吊死她！”全世界人民均了解此事，黑人亦了解。马丁·路德·金——蒙哥马利一所黑人教堂的牧师，他亦了解这一事件。小石城与整个民权运动紧密连系在一起，金对所有渴望自由的黑人说：“我们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在公共汽车、在餐馆、在一切公共场合，在蒙哥马利、在小石城、在全美国！”小石城事件对金的启迪是民权运动要从一个城市走向一个国家。

发生在小石城的事件，是对联邦政府权威的挑战，艾森豪威尔对此再也不能无动于衷。9 月 24 日，他动用了联邦军队，派遣两个空降师到小石城，将阿肯色州的国民警卫队收归联邦编制。黑人儿童终于被准许进入中心中学，但这并不意味着白人对黑人的敌意已经消除，从黑人儿童一连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受到白人学生及家长们的恫吓和折磨可以看出，白人的对抗是何等强烈。

1964 年 6 月 21 日，密西西比州黑人民权运动在 60 年代中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安德鲁·古德曼和迈克尔·施沃纳是两名参加民权运动的白人青年，这次他们从纽约到密西西比州参加黑人选民登记工作。当他们同梅里迪安的黑人民权活动家詹姆斯·钱尼驱车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附近行驶的时候，当地的一名副治安执法长官以汽车超速为由将他们逮捕了。内肖巴县的治安执法长官劳伦斯·雷尼称，这三个人为等待保释被关押了 5 个小时，然后就被释放了。可是从那以后，人们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们，也再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当地警察说不出这几个年轻人在什么地方，也说不出他们的尸体在哪里。

这起案子顿时轰动全国，金出面交涉，要求联邦政府必须调查此案。在民权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约翰逊总统责成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这起事件。

然而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工作没有任何进展，尽管他们意识到这是一起谋杀，但确实找不到尸体。

这个案子成为全国一大丑闻，约翰逊政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调查局最后花了 3 万美元收买了一个告密者，破获了这起案子。

原来，在那三名民权活动分子离开监狱以后，一个 19 人的三 K 党组织就将他们拖出车外，在一片灌木丛中把他们击毙了。尸体被埋在了 30 英尺深的地下。在案发前几天，人们在修一道大坝时挖过一个坑。凶手们利用它掩埋了尸体。一两天之后，推土机又往坑里填了数百吨的泥土把它重新填平。谁也不可能发现埋得这么深的尸体。

然而，对肇事者的指控是阴谋剥夺古德曼·施沃纳和钱尼的民权——而不是谋杀，罪犯中没有一人被判处 10 年以上的徒刑。

人们对事实真相感到震惊，约翰逊总统宣称要向这种他称之为“历史遗留下来的偏见和陋习，现实存在的血腥暴力”的事件战斗。因为破获了此案，金增加了对调查局的信任度，然而从三名遇难者的身上，他预感到自己可怕的未来——要置他于死地的人很多很多，他在明处，凶手在暗处。

最后的宣判鼓舞了那些暗藏的凶手们，对这类凶杀案的审判并不是杀人偿命，量刑不可思议地轻，为以后的暗杀埋下了伏笔。

金没有被吓住，在此事之后发表的一次演说中，他说：“现在我们在不断前进，种族主义的逆流无法阻挡我们。我们目前暂时仍处在苦难之中，还要忍受多久？快到头了，因为谎言迟早会被戳穿，我们的圣主在前进。”

种族歧视的积淀如此深厚，以至于种族主义分子、三 K 党可以为非作歹而不受处罚。而民权运动的高涨，引来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疯狂的仇视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金的遇害不难理解。后期披露的一些材料表明，如果存在一场阴谋，就一定有种族主义的阴影在其中晃动。

## 七、阴谋大曝光 调查委员会再质疑

在马丁·路德·金遇害后的最初几年，各种传言不绝于耳，有人说是三K党杀害了金，也有人说是南方某个种族主义秘密组织，或者是黑手党杀害了金。更有消息说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亲自下令杀害了金，胡佛对此暴跳如雷。但不论联邦调查局在这一案件中清白与否，人们对它的印象都十分糟糕。

审判早就结束了，法院早有定论，雷要在监狱里了此一生。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77年秋天，詹姆斯·厄尔·雷在田纳西州立监狱服刑转眼到了第九个年头，自他记事起，似乎三分之二的的时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不能想象的是自己再也不能走出铁窗。也许他是糊里糊涂地卷入了谋杀；也许他掌握真正的内幕，出于某种原因，他不能说；也许他是甘心情愿被利用了，真凶躲在他的后面。可他已经认罪了，上诉已被驳回，翻案已无希望，真凶逍遥法外，而他要付出一生的光阴。

在深秋的一个月夜，雷经过长期的准备，再次逃出了监狱。消息一传出，公众哗然。这一桩似了未了的疑案，加之凶手的越狱，把公众的目光重新聚在一起。

3天之后雷被发现，重新投入大牢。雷在这3天之内的表现与上次越狱相比判若两人，再没有大把的钞票，没有跨国旅行，没有了原先的从容，他已到穷途末路。

尽管距离案发时间已有10年，社会上关于此案存在“阴谋”的说法却越传越盛。人们有理由相信，雷不可能为了出名而独自去谋杀一位民权领袖，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从来不是一位狂热的种族主义者，不可能把金视为眼中钉。他杀金的目的看来只有一个，为了钱，可是谁跟他达成了这笔金钱交易呢？

1978年，国会成立了谋杀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此案；委员会最终结论是确认阴谋存在，但不能确定何许人参加了阴谋。虽然雷在这次调查中一再否认杀害了金，声明原判决是在律师的诱使下达成的。但由于无法查明密谋者，雷的罪名证据确凿，他的上诉再次被驳回。

但这次调查发现了很多令人震惊的新内幕。圣·路易斯的一位黑社会人物拉塞尔。拜尔斯在回答委员会调查时声称，1968年初，曾有两人主动找到他，想与他达成一笔交易，条件是用5万美元换取马丁·路德·金的性命。但被他拒绝了。几个月后，金被杀害，他将此事告诉了他的律师，律师劝他保持沉默。1974年，他无意中与联邦调查局一名特工谈起此事。但不知是否故意，调查局压下了这个情报，没有进行追查，此后那名特工也退休了。

拜尔斯提到的两位人物是约翰·考夫曼和约翰·萨瑟兰。两人均是当时南方社会名流。前者名义上是经纪人，实际上是一名黑社会显要人物，从事倒卖脏物的行径，但最主要的活动是通过他经营的一家合法药店进行毒品交易，牟取暴利。萨瑟兰是圣·路易斯的一位律师，1905年出生在弗吉尼亚，事业上卓有成就，并以享受祖先遗留下来的巨额遗产而自豪。他满头银发，看上去高贵富有，交游广泛，是一名坚定的种族主义者，1968年支持华莱士州长竞选总统。

考夫曼找到拜尔斯，后者在圣·路易斯黑社会小有名气。考夫曼问他是

否有兴趣赚 5 万美元，拜尔斯为这笔大额交易心动，表示可以考虑。于是 1968 年初的一个晚上，考夫曼把拜尔斯带到了圣·路易斯郊外一所富丽的寓所。

这正是萨瑟兰的家。当他们俩被带入萨瑟兰的书房时，考夫曼和拜尔斯被屋内的气氛惊呆了。房间里装饰着一百多年以前的服饰和纪念物品，墙上还挂着一面南部联邦旗帜的复制品。萨瑟兰身穿一套南方联邦军官制服，头上戴着一顶上校军帽。考夫曼和拜尔斯感到时光在倒流。

萨瑟兰早年曾从军校毕业，获得上尉军衔，他以一副南部联邦军人的姿态在这里接见他们。他用缓慢的语调对拜尔斯说，他们有责任在南方维护白人的传统地位。黑人的造反已经扰乱了旧有的秩序，白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而罪魁祸首是那个鼓动家——马丁·路德·金。他愿意看到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为此他愿意支付 5 万美元的酬金。

拜尔斯对萨瑟兰的话大吃一惊，他知道金这个风云人物，早在 10 年前就知道了。作为一个南方白人，他有理由厌恶金，但没有想过要除掉金，用自己的双手。

拜尔斯沉默了一会，对萨瑟兰说，他想知道这 5 万美元的来源。萨瑟兰以傲慢的口吻回答了拜尔斯，他说经费出自一个秘密组织，拜尔斯完全不用对它担心，交易绝对可靠。

在经过一天的考虑之后，拜尔斯回绝了这笔交易。慢慢的，他忘记了此事。几个月后，传来了马丁·路德·金遇害的消息。拜尔斯顿时忆起了这笔没做成的交易。

谋杀调查委员会传讯了考夫曼和萨瑟兰，但他们都已去世。他们两位的遗孀出席了听证会，她们以家族的名望担保，断然否认她们的丈夫曾参与此事。

委员会调查了拜尔斯提到的秘密组织。当时南方存在两个种族主义组织，一是种族隔离委员会，萨瑟兰是这个组织的组织者之一；一是南方工业委员会，萨瑟兰是其成员，这个组织的主席在金遇害后曾发表过一番令人乏味的演说，认为金被谋杀是自找的，并认为凶手固然犯了法，但这个法律是不公正的。萨瑟兰对他的发言表示赞同。

委员会的深入调查还发现更多被忽略了的线索。当年，詹姆斯·厄尔·雷的妹妹卡罗在圣·路易斯一家小酒馆工作，这里经常出入当地的黑社会人物，也是华莱士的独立党密谋的一个据点。卡罗是酒馆的女招待，一度是考夫曼的情妇，她对圣·路易斯的黑社会了如指掌。

拜尔斯的一个姐夫是密苏里州立监狱的医生，因为拜尔斯的缘故，考夫曼认识了他的姐夫。通过这位医生，考夫曼在监狱里贩卖毒品，而詹姆斯·厄尔·雷正好被关押在这所监狱，与拜尔斯的姐夫关系很好。雷在监狱里常与他的妹妹卡罗联系。

萨瑟兰以他的高贵身份，是不太可能光顾卡罗的小酒馆的。但考夫曼、拜尔斯却是那里的常客。至此，人们有理由怀疑，考夫曼、拜尔斯、萨瑟兰与雷的越狱有关。

拜尔斯认为“某个南方秘密组织”把他找去，实际上是把当作一个容易受骗的人，以便担负暗杀金的罪名，雷无疑就是一个牺牲品。

有人推测，在考夫曼、拜尔斯、萨瑟兰等人的安排下，当年，雷成功地逃出了密苏里州立监狱，双方都各有用心，萨瑟兰是为了寻找一个替罪羊，雷是为了那 5 万美元。雷的弟弟曾对记者说过，如果没有金钱交易，雷不会

去杀人。

但是，由于当事人大都死去，这种假设也仅仅是一种怀疑。时过境迁，物换星移，事隔 10 年之久，甚至联邦调查局也换了人马，老局长胡佛也早已去世，一些关键材料不是被销毁了，就是故意隐匿了，谋杀调查委员会失去了很多有可能使真相大白的机会。

不过，谋杀调查委员会明确了在金遇害的背后，存在一桩阴谋。认为雷是为了得到那 5 万美元的报酬，制造了这起谋杀。同时委员会向公众宣称，调查的结果澄清了一个事实，排除所有关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当局的情报部门参与暗杀金的可能性——尽管调查委员会谴责联邦调查局滥用其合法权利对金进行粗俗下流的攻击与监视。

联邦调查局果真如调查委员会说的那样清白吗？对拜尔斯在 1974 年透露的情报置之不理，仅仅是管理上的失误吗？是否有人故意支使？

诚然，马丁·路德·金遇害一案有浓厚的种族主义因素。但是从金生前的经历到死后一连串的怪事之中，人们不难看到，始终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这股神秘力量究竟是谁？联邦调查局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谋杀调查委员会对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仅限于对它发表一个谴责声明。调查工作至此全部结束。詹姆斯·厄尔·雷是唯一服刑的人。但悬在人们心中的谜仍未解开，纵使拜尔斯所说属实，金的遇害仍是一大疑案。

让我们看看晃动在这桩疑案当中的第三只手——联邦调查局的真实面目。

## 八、寻根追真凶 联邦调查局被卷入

在马丁·路德·金遇害之后，各种流言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其中大部分是关于联邦调查局的。随着詹姆斯·厄尔·雷的认罪，珀西·福尔曼律师的解释，调查局认为已证明了自身的清白，但仍没有减轻舆论对它的怀疑，1978年谋杀调查委员会的结论似乎也排除了联邦调查局参与阴谋的可能性。然而直至90年代，不断有材料证实联邦调查局的确卷入了这桩大阴谋，甚至是主动策划了阴谋。

联邦调查局——美国最大的特务机构之一，1908年成立初始，只有几十人，经过埃德加·胡佛几十年的努力经营，到70年代已发展到2万余人，其机构遍布全国。它是联邦政府在国内的重要耳目，被政府所利用；但在其权力鼎盛时期也是要挟总统的工具。它隶属于司法部，权限却十分广泛，国会规定它的职责是对美国的犯罪行为进行侦察与起诉，它有权对一切已发生、正发生或认为将发生的违法事件进行调查。

联邦调查局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它自身的历史中，既有光辉灿烂的记录，也有臭名昭著、不光彩的一面。随着现代情报技术的发展，联邦调查局拥有一整套高科技的侦讯调查系统，利用这些最发达的手段，联邦调查局可以获取任何它需要的情报。60年代民权运动高涨时期，它就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

在联邦调查局的历史上，人们不能忘记它对马丁·路德·金的迫害，正因为此，联邦调查局始终不能从各种流言中脱身。

联邦调查局的荣辱是与埃德加·胡佛的一生休戚相关的。几十年来，调查局由小变大，由兴至衰，都与胡佛密不可分。他担任局长并牢牢把持这个职位长达48年之久。他是调查局的国王。在他任内的几个总统对他的态度也都是爱恨、敬畏掺杂在一起的。

胡佛是位神秘人物，笼罩着他的阴影越厚，关于他的传闻也越多。他终身未婚，早年一直与母亲住在一起。他有一个很要好、与之终生保持友谊的朋友，那就是克莱德·托尔森。从1928年起，克莱德·托尔森就成了胡佛一生密不可分的伙伴。胡佛分外青睐这位比他年轻5岁、有一双湛蓝眼睛的英俊男子。他提拔托尔森担任调查局副局长，每天共进午餐。在他死后，全部财产留给了托尔森。没过多久，托尔森也抑郁而死。这是人们传言胡佛是一名同性恋者的重要依据。

尽管胡佛权倾朝野，到处抛头露面，但仍遮掩不住他个性中的弱点。他心存偏见，思维狭隘，易为阿谀奉承所左右，对自己所受教育总有点心虚和敏感，脱离变革时代的现实已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关于他的笑话一大箩，例如环球航空公司一个飞行员批评了调查局，胡佛的反应则是从此以后禁止调查局员工乘坐环航航班，同时他向环航总裁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详细列举了他所搜集的那位飞行员的种种劣迹。

胡佛对民权运动不感兴趣，他一直引以自豪的是20年代驱逐黑人领袖加维这一“光辉业绩”。他甚至厌恶黑人，他曾说过：“只要我当一天调查局局长，黑人就别想进入调查局。”当然他的生活离不开黑人，他有黑人司机、黑人杂役、黑人女佣，他顽固地认为，有黑人的服务，才是上流社会的标志，一个白人不能让另一个白人为他服务。尽管他出生在华盛顿，但从小到他所参加的团体都流露出以排斥有色人种来显示自身贵族地位的气息。此外他

与南方上流人物交情笃厚。

民权运动逐渐引起胡佛的不安和警觉，像其它造反一样，胡佛认为这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威——警察、政府以及在很多情况下对联邦调查局的挑战，尽管对民权运动的支持者来说，运动很明显是关于黑人自由、关于公正的问题。民权运动注定一开始就得不到胡佛的支持。

作为一个联邦调查机构，调查局有责任处理涉及民权的案件。但胡佛要求他的手下巧妙地逃避这类案件，除非压力特别大，调查局对这类案子是漠不关心的。例如 1955 年的蒂尔谋杀案。蒂尔是芝加哥的一位黑人青年，他在密西西比州的莫尼市被绑架和谋杀，据说因吹口哨调戏一个白人女孩。胡佛对全国的广播听众说：“由于没有违反联邦法律，所以我们无权调查此案。根据司法部规定，如事实上没有违反联邦民权法令的话，联邦调查局就不能进行调查。”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然而，涉及民权的案件越来越多，联邦调查局不得不接手这类案子。一批特工被派往南方，同时调查局也开始在南方招募和培训特工。但实际上，这些工作人员在重大种族冲突爆发时，只充当旁观者，他们忙于拍摄、记录，基本上不介入调解冲突。

联邦调查局的不合作态度，受到了来自民权运动支持者的抨击。这无疑是对胡佛毫不留情的指责。为了回应这些攻击，胡佛炮制了许多关于民权运动受共产党控制的报告，呈交给总统。共产主义是胡佛的死敌，什么事情只要在他看来与共产党有关，就能触动他警犬一般的嗅觉，而且要不遗余力地将其消灭。当调查证实，共产党对民权运动的影响不大，胡佛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说，那是因为共产党的阴谋破产了；当确实在民权运动中发现一、两名领袖与共产党有关系，哪怕是最微弱的关系，都令胡佛大喜过望，终于有文章可做了。他对金的迫害就始于这点。

然而，肯尼迪上台了，他当选总统对胡佛无疑是一场灾难。无论如何，胡佛也掩饰不住对肯尼迪兄弟的厌恶。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胡佛对他了如指掌。胡佛太了解肯尼迪的底细了，这个花花公子总是克制不住拈花惹草，这正中胡佛的下怀。40 年代，渐露头角的肯尼迪与一美貌妇人有关，胡佛掌握了这一情报，参了肯尼迪一本，于是肯尼迪被派往海外战场。

意想不到的的是肯尼迪以战斗英雄的姿态回到了国内。这位年轻人的名声如日中天，他年轻、英俊，一位天主教徒，开朗的性洛。给美国人一个崭新的印象。尽管他风流成性，不断制造各种桃色新闻，但美国人容忍了他，毕竟在他当总统后，他所做的一切，使他赢得了改革家和进步派的荣誉。

胡佛与肯尼迪代表两个不同的时代、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骨子里，胡佛拒绝任何变革。肯尼迪对民权运动的支持使胡佛对他的憎恶到了极点，而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担任了当时的司法部长，成为胡佛的顶头上司，这令胡佛痛苦不堪。但胡佛从没想过要放弃在调查局的权势，他与肯尼迪兄弟的关系是斗争大于合作。

肯尼迪兄弟给黑人留下的印象就要好多了，由于插手马丁·路德·金被捕的案子，他们也成了金的好朋友。他们提防和畏惧胡佛，因为知道胡佛握有可置他们兄弟于死地的秘密材料，但在关键问题上，也绝不让步。

金看到了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阻力不仅来自南方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的顽固抗拒，更来自华府的保守势力——比如联邦调查局和它的主子胡佛。

在一次南部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上，金说：“奥尔巴尼（佐治亚州）的黑人对联邦调查局在当地的雇员很不信任……在奥尔巴尼黑人看来，作为目击者，调查局的人对不公平的事漠不关心。他们除了胆怯地写下抱怨之外别的什么也没干。”他还认为，“在南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调查局的雇员都是南部白人，他们受当地道德观念的影响，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得不与当地警察和支持种族歧视的人保持友善关系。”

胡佛被惹恼了，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指责他和他的调查局。“这个黑鬼，一个鼓动家，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胡佛是这样看待金的，他居然敢向他挑战。胡佛对民权运动的憎恨从这时起就集中到了它年轻的领导人身上。

胡佛 60 年代思考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整垮金，调查局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憎恨金。这个久经沙场的老特工，阴沉的双眼，紧闭的双唇，一副老奸巨滑的样子，谁都懂得，只要落于他的掌心，谁都休想逃脱。

在那个年代的美国，最引人注目的指控，尤其是对政治家，其中之一莫过于把他说成是受共产党控制，最好说他就是共产党。麦卡锡主义淫威犹在的 60 年代，这是致命的一招。

胡佛调动了他的大小喽罗，煞费苦心从金的祖宗几代查起，不放过一个细节，力图找到哪怕一丁点儿的共产主义痕迹，包括金的思想、金所有的举动，只要沾一点边也行。可惜胡佛老头几乎要折磨死他的部下们，因为在琐碎、乏味、费时、费钱的调查中，他们确实找不到一点金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迹象。

特工们胆颤心惊地把报告递交给胡佛，他们可以想象得到胡佛看完报告后的沮丧，同时他们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因为局长心情不好的时候，“为了调节情绪，”他对他招人怀疑、关系暧昧的副局长托尔森说，“你可以把某些人调离华盛顿或者解雇。”

胡佛果然对这份报告大为不满，这怎么可能？胡佛的预测会错吗？胡佛对此是有 100% 的自信的。金一定是共产党！一阵暴怒之后，他大声训斥这些可怜的部下：“我过去一再说卡斯特罗是共产党，可是你们那些人不肯相信我的话，现在你们又说金不是共产党。就像你们对卡斯特罗的看法一样，你们这次也错了。”

众特工不断点头：“局长说得对”、“对极了”，“局长就是比我们看得远，看得高。”一阵阿谀奉承，方才平息了胡佛的怒火。他们知道怎样对付胡佛。

“要是我任命的是别人，而不是你们这些废物，我早就得到我想要的材料了。”胡佛一阵叹息，“如果不是你们的无能，金不会达到他今天的地位，他也不再会是一名杰出的全国性人物。”

他的手下心领神会，经验告诉他们，为了迎合局长的需要，可以把白说成黑，把下雨说成天晴，一句话：无中生有，捏造事实。

胡佛终于达到了目的，获得了他想要的情报。事情很简单，特工们得到的情报是这样的：

1958 年 9 月，金被介绍给一个共产党黑人领袖本杰明·戴维斯。

1962 年，调查局发现金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在 50 年代曾是美国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和顾问，这个人就是斯坦利·莱维森，纽约的一个辩护律师。

胡佛对这两个发现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尤其是金与莱维森的友谊，就

凭这一点，胡佛就可以大做文章。

胡佛认为莱维森是一名共产党，但调查结果表明，莱维森在 1955 年就已与共产党脱离关系，这实在令胡佛失望。一计未成，又生一计，如果能收买莱维森，使他成为调查局的密报员，随时监视金，岂不两全其美，胡佛正为此妙计而得意时，没想到莱维森不识趣，居然拒绝了与联邦调查局的合作。

胡佛认定莱维森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此时的他，一口咬定莱维森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为此，不惜人力、物力，在长达几年时间里连续不停地跟踪莱维森，包括装窃听器，夜间行窃。事实上，调查局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说明莱维森不是他自己表现出来的那样——一个民权运动的忠实支持者，民权运动最有影响的领导人金的忠实支持者。

但是在胡佛给白宫、司法部长和国会的众多报告中，以及调查局向新闻界透露的情况中，胡佛和调查局始终把莱维森作为一个活跃的共产党代表人物来对待，以此来说明他们对金的攻击是正确的。

随后，调查局又获得了一重要情报，得知在莱维森的建议下，金的南部基督教领导人大会雇佣杰克·奥德尔负责该组织设在纽约的办公室工作。胡佛认为，奥德尔和莱维森一样，也是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

1962 年 5 月 11 日，胡佛在联邦调查局紧急扣押处的名单上加上了马丁·路德·金的名字，在发生敌对行动时可予以逮捕的人物黑名单中，金也被列了进去。

胡佛不愧为一个特工老手，非常善于利用新闻界，他总是在适当时候，授意联邦调查局往外透透风，故意渲染金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一时，各种传言纷纷出笼。

胡佛对金的指控，把肯尼迪总统置于一个两难处境，他们知道胡佛的矛头不仅是指向金，也指向肯尼迪兄弟，如果胡佛得势，他们就会为这一指控拖垮。以前不是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肯尼迪总统不愿看到这样的结局，除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们尽量避免在一些细节上与胡佛针锋相对，于是他们向金发出了讯息，要他停止与莱维森的交往。而金对此没有充分注意。

有关金与共产党的关系顿时成为围绕民权运动的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国会在 1963 年准备讨论肯尼迪总统提交的民权法案时，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一个坚持种族隔离的死硬分子，伙同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巴尼特在听证会上作证。说金是共产党人，而且整个民权运动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国会动摇了，他们要求政府在支持金是否保险的问题上给予指点与进一步保证。肯尼迪兄弟几乎被胡佛设计的这一阴谋逼入绝境。

在一个晴朗的夏日，肯尼迪总统把金请到了玫瑰园。肯尼迪非常婉转地开始了这场谈话。

“你一定知道普罗富莫性丑闻。”总统很谨慎地提到了当时轰动世界的一桩英国政治丑闻。

金望着这位比自己年长几岁的总统，不知他卖的什么药。总统接着说：

“你也许注意到了有关你和共产党关系的传言，我希望这不是真实的。正如普罗富莫丑闻搞垮了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传闻一旦得到证实，那么这对你本人、民权运动以及我的政府都会是一次彻底的打击。”

金至此完全明白了总统的意思，他理解肯尼迪的良苦用心。他沉默了，最后表示，他会让大家看到一个满意的结局。

结果是，金被迫终止了与莱维森长达7年之久的友谊，金的运动中，失去了一位得力助手。

关于金是共产党的指控破产了。但胡佛仍不罢休。是的，他还有两个杀手铜没有使出来，他不信所有这些加起来还击不垮金。

有充分的材料证实了胡佛对金的迫害，不论是胡佛的反对音还是支持者都承认这一点。

胡佛对金制造的另外一些丑闻是金钱问题和性丑闻。关于第一点，胡佛大放厥词，利用一些不真实的材料·指责金生活奢侈·侵吞公款，滥用从其支持者那里收集起来的大笔金钱。据胡佛一位手下事后回忆，胡佛希望把金“揭露无遗”，指示特工们要把一切能够损毁他的情报都利用起来，把这些情报告诉金在财政上的重要后援人、重要的实际工作人员、有影响的牧师和社区领导人，甚至国会议员。

金对来自胡佛的攻击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白自己在经济上无愧于人，同时，金也在实际行动中检讨自己，厉行节俭。有关金的“经济丑闻”的谣言慢慢不攻自破。

胡佛拿出了最后一招，制造有关金的“性丑闻”。他不信金这次能逃得过去，而这又是胡佛的拿手好戏，有多少名流显贵，因这一招而从此一蹶不振，甚至肯尼迪兄弟，也得处处看着他的眼色行事，这不全都是他抓住了他们私生活不检点的马脚吗？

为得到金私生活方面一点一滴的情报，胡佛下令在金的家、办公楼、交通工具、沿途旅行时的居住点，都安装电话窃听器，日夜跟踪。据胡佛手下工作人员称，仅仅在1964年1月开始的17个月时间内，在金到全国各地旅行、从纽约到底特律、华盛顿、圣克拉门托和檀香山的过程中，他们在15座旅馆里搞了15次接线窃听电话。金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都曝露在胡佛的眼底。而这些监听活动，是得到约翰逊总统的首肯的。

胡佛认为他已得到足够毁灭金三次的重要情报，有关金的社交宴会的情报，喝酒的情报，发生性关系的情报，全部被递到了胡佛的办公桌上。胡佛一向以迷恋色情材料而著称，他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些录音带，不时加一些评论：“金是只着迷的、堕落的、性要求强烈的‘雄猫’”。

在这些材料中，胡佛非常欣喜地发现金除去其妻子之外的性伙伴，“这与一个已婚男人和牧师的身份极不相称”。胡佛指示手下将这些录音带寄给金夫人珂蕾塔，目的是破坏他们的婚姻。与此同时，胡佛还给约翰逊总统和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寄去了一盘复制录音带，据称，录音带展示了金兴高采烈地描绘他的朋友们进行性交、群交和宗教隐喻以及讲述关于约翰·肯尼迪包括肯尼迪夫人的性生活和总统葬礼的笑话。胡佛的用意在于使约翰逊总统和罗伯特·肯尼迪相信金是“当今美国社会最应受到惩罚的人物之一。”

姑且不论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因为凭借联邦调查局的技术能力，移花接木、借尸还魂，是他们的惯用伎俩，这种低级下流的攻击就足以使人恶心。可见，胡佛的淫威已渗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所有这些材料都被以匿名方式提供给报界、政界和总统·甚至在金去罗马谒见教皇之前把它们寄给教皇、寄给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

金的名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一封寄给金夫人的录音带里，还夹有一封匿名恐吓信：“金，你的末日来到了……你完蛋了。再说一遍，你完蛋了。你，一个邪恶的畜牲！你注定要完蛋！你，只有一件事需要做，你知道是什

么事。你只有三十四天的时间去做。你只有一条出路，你最好在你污秽的欺骗本性暴露在国民面前之前选择它。”诺贝尔颁奖仪式结束后，金从瑞典返回时看到了它。

一时有关金的“私生活丑闻”传得沸沸扬扬，金被淹没在流言的海洋里。很多人意识到谣言来自联邦调查局。胡佛整日忙于在华盛顿为政府官员和记者们放录音带，这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反感。一位著名政论记者对此深感不安，他告知约翰逊总统关于胡佛的胡做非为，但总统并未阻止胡佛的行为，而是传话给他，让他小心，说这位记者并不可靠。

可是金并没有被击垮，教皇没有理会那些匿名材料；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给金颁发了诺贝尔和平奖；一些机构授予金荣誉称号；金的演讲在全国各地依旧受到热烈的欢迎。可以说，金是一种象征，他代表了60年代全部的文化变革。这实在令胡佛忍无可忍，他终于决定自己公开向金进攻。

由老资格的记者萨拉，麦克伦敦带领的一群女记者出席了1964年11月18日胡佛召开的记者招待会，这是一次对金的声讨会。胡佛对金的仇恨到了顶点，以至于这种情绪压倒了正常的判断力。在招待会上，胡佛公开指责金是“最臭名昭著的说谎者”和“这个国家最下流的人物之一。”胡佛的狂言乱语使得坐在他身边的助手、公共关系顾问德洛奇觉得为难，深感一场灾难正在酿成。他立即向胡佛递了一个条子，请求他将“说谎者”一词从录音中抹去。胡佛不予理睬。德洛奇又递上一张条子，这次仍未被理睬，最后，当第三张条子递上去后，胡佛对记者们说：“德洛奇多次提醒我将涉及金的谈话从录音中抹掉，但这与他无关。我把它记录下来，你们可以使用它。”

胡佛的“最臭名昭著的说谎者”的攻击成了国内的头条新闻，胡佛与金的不和突然公开了，这令约翰逊总统不安。金对胡佛的攻击没有再次沉默，他向外界发表的谈话中称胡佛已“在可怕的负担、复杂的工作和他有限能力面前表现出脆弱。”在一封致胡佛的信中，他说：“我对你发表声明诽谤我的诚实感到吃惊和诧异。对我来说不可思议的是什么促使你作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谴责。”他要求一次会见。

胡佛对此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在随后几天，他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发表的有关民权运动的讲话时，含糊提到金“行为放荡”。金对胡佛这种下流攻击感到愤怒，他声明必须与胡佛见面，结束这场争斗。

在约翰逊总统的干预下，1964年12月1日，两位对手在华盛顿胡佛的办公室里首次会面，这次见面时间约一个小时。事后双方随行人员对会谈内容说法部不一样。据胡佛助手声称，金用55分钟，感情奔放地赞扬了局长，并收回对调查局的一切批评——这一看就是胡佛的谎言。而金的助手安德鲁·扬回忆这次会面。除了胡佛用了55分钟滔滔不绝地表述调查局的成绩外，只进行了短暂的和礼节上的相互问候。不管真相如何，会面后公开的论战平息了。但胡佛暗地里对金的迫害却在加紧进行。

胡佛对金的迫害用尽了他对待共产党的肮脏手段。不惜采取一切非法、卑鄙的下流方式，真可谓用心良苦，但却得不偿失。在迫害之前，人们对胡佛的印象不算太坏；但自从胡佛忙于给社会各界提供捏造的金的各类“丑闻”后，公众对胡佛的支持率迅速下降，对金的支持率上升了，二者是234对518。金的扬名从某个角度说，胡佛助了“一臂之力”。

胡佛从来不是一个妥协的人，公开的攻击没有了，但并不意味着迫害停止了，只能表明胡佛改变了方式。他从没改变过对金的看法，正如他始终敌

视肯尼迪兄弟一般。他把金看成肯尼迪兄弟的政治盟友，众所周知约翰逊与肯尼迪是一对政治敌手，约翰逊赞同联邦调查局打击对手的盟友，胡佛也死心踏地支持约翰逊，二者串通一气，互为利用。

有材料证明胡佛有袭击金的秘密企图，包括胡佛支持者所提供材料。金在 1968 年 4 月 4 日遇害本身就是个谜。这个国家里有一部分人对金的死是幸灾乐祸的，胡佛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在金死后，胡佛还一度拒绝接手该案件的调查，理由是这不是联邦案件，但被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驳回。在公众和政府的强大压力下，联邦调查局才极不情愿地接手了这个案子。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关联邦调查局谋杀了金的说法开始传开。胡佛用尽心机表白自己的清白，也没能消除人们心中的疑惑，加之本案审理过程中的种种疑点，更使人们加深了对胡佛和他的调查局的猜疑。

## 九、《杀人命令》 九十年代再起波澜

70年代的阴谋曝光，谋杀调查委员会的结论依然解释不了蒙在马丁·路德·金遇害一案之上的层层迷雾。可以确认胡佛及其调查局是迫害金的主要势力之一，但仍缺乏确切的材料证实联邦调查局参与了谋杀。难道金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吗？谁明了真相？何时才能将真相告知世人？

历史迈进了90年代，这当中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马丁·路德·金已成了昨日之梦。而一本书的出版又把人们带回了遥远的过去，让人们忆起了这桩似了实未了的疑案。

这本书就是1995年在美国出版的《杀人命令》。各大报以醒目的标题介绍了这本书：“美国新书《杀人命令》披露——美特工枪杀了马丁·路德·金。”怀疑终究是怀疑，而一旦被证实，公众仍免不了为此大吃一惊。

更让人吃惊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替凶手詹姆斯·厄尔·雷辩护的律师珀西·福尔曼。

福尔曼说，1968年4月4日下午6时，正当金和安德鲁·扬步出洛林旅馆的房间时，美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两名狙击手已把枪口对准了他们。作者认为，虽然在技术上而言，杀手是一名接受黑社会金钱的“平民”，但他却是由美国情报组织控制的——这显然是指联邦调查局。

作者称，提供这个新看法的人士包括两名当时在孟菲斯执行任务的“阿尔法184”杀手队的成员，他们承认小队接到指示，要杀死金和扬。另一名特工，在1979年遭谋杀的希尔，和美军副情报参谋长办公室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人士的证词，亦与前两者的说法吻合。

高度神秘的“902军事情报小组”的指挥官挑选了一支由8人组成的“阿尔法184”杀手队。胡佛于1968年3月15日与这个杀手队秘密会面，珀西·福尔曼说，会面的目的是协调军方的“袭击”和胡佛通过他在黑社会的联系而策划的谋杀行动。

谋杀金的原因是安全部门恐怕金进行的黑人民权运动会演变成美国反越战运动，此外，安全部门亦关注到计划在1968年6月在华盛顿举行的“贫民向华盛顿进军”。

作者提供了向杀手队发出的命令的复印件，虽然字句并不清晰，但可以看到其中四份文件的对象为“白宫”，显示约翰逊总统可能知悉此计划。

《杀人命令》在全美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作者是马丁·路德·金遇害一案的辩护律师，人们会注意到此案审理过程中珀西·福尔曼令人费解的举动，似乎倾向于肯定此书的真实性。如果此书所说属实，各种疑点也将迎刃而解。

美国官方对此书的观点没有表态。既未否定也未肯定。当然，真相不能仅仅依靠某一本书的说法而走。因为，如果政府和其情报部门果真卷入了谋杀——那需要政府公开它保存的相关档案。鉴于在谋杀发生近30年之后，政府仍未能将秘密公之于众，此案仍是一桩疑案。

人们期待真相大白的时刻到来，马丁·路德·金的遇害不应成为一桩永远的历史疑案。

历史在艰难地前进，金为美国黑人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洒下了满腔热血。人们并没有忘记他。每年金的诞辰日（1月15日）前后，黑人群众都要举行纪念活动，人们爱戴他，缅怀他。在广大黑人和主持正义的白人群众强烈要求下，美国政府决定自1986年起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马丁·路

德·金全国纪念日，它从此成为美国的第十个全国性节日。

1986年1月16日，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在各地自发举行了纪念活动。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举行了花圈安放仪式，人们在银幕上目睹了当年“向华盛顿进军”的盛大场面，聆听了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的录音，唱起了民权运动的歌曲。

在很多地方，新设了马丁·路德·金纪念馆、塑像，国会也在华盛顿举行了悼念活动。然而，美国南部的三K党组织蠢蠢欲动，策划举行抗议活动。

1986年1月20日，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宣布，从1987年起，金的诞辰也将成为联合国纪念日之一。

1988年1月20日，又是一年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的到来，华盛顿各界代表举行了游行、报告会、演讲和歌咏会，当3500名集会者来到市会议中心时，霓虹灯上闪烁着“祝马丁·路德·金生日愉快！”“您的梦想仍在！”林肯纪念堂里又一次回响起金博士永垂史册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讲录音。在费城，纪念活动在罗莎·帕克斯太太敲响“自由钟”后正式开始，帕克斯太太已步入垂暮之年。

应当承认，今天美国黑人地位同20多年前相比确实有了许多改善，这是与金率领的民权运动的斗争分不开的。如今，在首都华盛顿，在芝加哥、费城等黑人较集中的城市，市长和部分政府官员已有黑人担任。但是种族歧视的现象还远远未能根除，美国黑人还没有得到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马丁·路德·金憧憬的“人人生而平等”还远未得到实现；甚至直到1987年，仍有10个州拒绝承认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在金的家乡亚特兰大，人们在高金牧师墓地不远的地方举行纪念性游行时，遭到三K党徒袭击，“不要黑鬼！”“权力归白人！”的口号仍时有所闻。

马丁·路德·金死了，但他的梦想仍在，激励着黑人群众奋发斗争，获取真正的自由。

（林永清 撰稿）

## “水门事件”丑闻曝光——尼克松总统险遭弹劾

1972年6月17日,5个企图搞窃听的人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所在地——水门大厦,被警察当场逮捕,这一事件因其发生地点而被称为“水门事件”。经调查,此案牵涉到白宫众多官员,甚至还有总统尼克松,由此引起一场权力与法的大战。最后,为免遭弹劾,尼克松含恨引退,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自己宣布辞职的总统。

## 一、暗施阴谋 谁下令破门而入

“水门事件”发生后，不仅美国朝野上下哗然，甚至震惊了世界！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闯入者偏偏选中民主党总部而不是其他 189 什么地方？为什么尼克松在连任总统已是胜利在望时却会卷入水门丑闻？他果真参与了幕后策划吗？20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追究这些问题。有关“水门事件”的原因，众说纷纭，这里择其要逐一介绍。

“水门事件”是越南战争的产物，这场战争为水门窃听播下了罪恶的种子。这是一种说法。

1968 年，正值美国军队在越南战场上屡战屡败，人民怨声载道之时，理查德·尼克松获得了共和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在竞选纲领中为适应形势提出一个所谓迅速结束越南战争的“秘密计划”，他向选民承诺：“新的领导班子将结束越战，并赢得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也许是他的演说真的打动了选民们的心，他在 32 个州中获胜，获得 301 张总统选举人票，当选为美国第 37 任总统。

人民渴望尼克松能给他们带来安宁与和平，然而，尼克松当选后却把自己的许诺丢在了另一边。事实上他心里并没有什么秘密计划，这个许诺不过是为拉选票而做出的姿态。他上台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下令对柬埔寨进行地面轰炸，以扩大战局。有人估计：当时大约有 4 万越军在那里扎营。总统的命令在秘密中进行。但是，尼克松没能料到，在华盛顿是没有秘密可言的。1969 年 5 月 9 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五角大楼文件》，这是份有 47 卷的政府关于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根源研究的绝密文件。一个叫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前国防部军官向报界透露了轰炸柬埔寨的真相，向公众揭露了政府在战争早期的那些蒙蔽、欺骗公众的行径，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反战情绪。尼克松为此相当恼火，他指控《纽约时报》严重地危害国家利益。但最高法院根据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关于对言论和出版不得实行“事先限制”的规定，以 6 票对 3 票的多数裁决《纽约时报》可以继续刊登此类报导。作为报复，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国家最高机密文件”再被报界透露，尼克松下令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在 17 名政府官员和记者的电话上安装窃听装置。

尼克松政府的这些行动都是在暗中进行的，但尽管这样，泄密还是没有被制止住。大量有关政府扩大战争的消息被揭露出来，激起国内人民的反战情绪。到 1970 年，美国国内激进分子的活动又开始公开化，大学校园里也举行示威抗议，这些热点问题成了新闻界大肆渲染的最好资料。尼克松认为这些内乱不可能完全是自发的，他觉得他们即使不是受到共产党国家的煽动，至少也受到这些国家的援助和教唆。于是他命令白宫的高级助理约翰·埃利希曼：“如果我们不能让这个该死的政府里的什么人做些堵漏工作的话，那么，上帝做证，我们只好自己来做了。我要你立刻在白宫成立一个小组。注意别让人察觉，要弄清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如何加以制止。”在他的授意下，以埃利希曼为首组织了一个情报搜集小组，以便更好地防止国家机密的泄露，并刺探激进分子与反战团体的情报。

1970 年 6 月，“特别调查小组”（又称“管子工”小组）在白宫地下室的一间办公室里宣告成立，它的成员被称为“堵防泄密人员”，由埃利希曼及其助手埃吉尔·克罗、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律顾问戴维·扬和尼克松的特别顾问及活动家查尔斯·科尔森等人负责。实际上它专门从事窃听、搜集情报

等活动，是尼克松政府搞窃听活动的工具。后来这个组织又吸收了一个曾因参与“猪湾事件”而著名的前中央情报局官员 E·霍华德·亨特和前联邦调查局官员戈登·利迪。“特别调查小组”成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搜集有关埃尔斯伯格及其与民主党联系的情报。为此，他们先制造谣言诽谤埃尔斯伯格的名声，然后把他和肯尼迪家族扯到一起，以防止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出山和尼克松争夺总统职位。

1971年9月3日，“特别调查小组”采取了第一次行动，由亨特和利迪在外面当警卫，另外三个古巴人潜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办公室，偷拍埃尔斯伯格的病历表，企图从中找到能够控告他有盗窃和间谍罪的证据。如果说“特别调查小组”的这种行动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话，那么它的合法性似乎无可置疑。但在1972年，随着大选的来临，“特别调查小组”转入了国内政治，这一年，它以民主党总部为目标进行了多次政治窃听活动，此时他们已远远超出了“国家安全”的范围，走上非法活动的道路，他们的目的是要搜集尼克松政敌的情报，这时，个人利益代替了国家利益。窃听活动在“国家安全”名义的掩护下悄悄进行。“水门事件”正是这种非法活动发展的顶峰。

因此，有人做出了推论，如果没有越南战争中政府文件的泄秘，就不会有“水门事件”前的窃听活动，水门窃听这类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这样，越南战争似乎就是“水门事件”的根源了。

但是“水门事件”发生的原因毕竟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尼克松本人在该事件中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就是“水门事件”源于尼克松本人性格的一种说法。

尼克松在美国家喻户晓，然而对此人的性格，没有接触过他的人或没有与他共过事的人是无从得知的。在《尼克松对尼克松》一书中，美国心理学家戴维·亚伯拉罕森博士把他描绘成一个被内心矛盾所折磨的人，一个落落寡合、神经过敏、自我陶醉、生性多疑和沉默寡言的人。也许正是这种充满矛盾的性格，才使他对所有的人都怀有戒心，他没有真正的朋友，他对所有的人都是满腹猜疑。

有人认为，之所以养成这种性格，大概与尼克松早年经历有关。1913年1月9日，尼克松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地方的一个农场里。他的父母都是开杂货铺的平民百姓。而他们的儿子尼克松却从小聪明好学，而且多才多艺。1934年6月他毕业于惠蒂尔学院，随后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杜克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但当他到纽约的一些律师事务所申请工作的时候，却连连碰壁。因为美国的东部在相当程度上是排斥异地移民的，所以尼克松在那里第一次感觉出作为一个外来人的滋味，他对政府和官僚机构感到失望，他开始不相信任何人，接下来的政治活动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尼克松提供了一次升职的机会。1942年6月2日，他参加了海军，由于他工作勤恳、干练，很快从海军上尉升为少校。他在海军部队服役未毕，就被加利福尼亚州的百万富翁和共和党的地方官员看中，成为该州共和党竞选众议员的候选人。这是尼克松求之不得的事，所以从海军退役后，他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竞选活动。

虽然尼克松在此之前并没有从政经验，但在竞选中，他却像个经验十足的政治家，采用一种精心策划的伎俩，即用诽谤和中伤将他的对手与某种为

人反感的目标或事件联系在一起,迫使他们处于守势。他在 1946 年与杰里·沃尔希斯竞选众议员及在 1950 年与海伦·道格拉斯竞选参议员时,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利用共产主义来陷害对方,捞取政治资本。反共成为他早期政治生涯中的最显著的特点。1947 年他曾参与起草了反对劳工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随后又制定了镇压共产党的《蒙特——尼克松法》,因而他获得了“白领子的麦卡锡”的称号。40 年代他还参加了反共产主义的组织——非美活动委员会,尽力效忠。尤其是在 1948 年至 1950 年初的“希斯案件”中,尼克松第一次崭露头角,闻名全国。

阿尔杰·希斯曾是美国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出席过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雅尔塔会议、旧金山会议以及联合国第一届大会。1947 年他辞去政府官职,出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有人认为他是个无可指责的体面、尊严的人。然而 1948 年 8 月 3 日,他却被《时代》周刊编辑、前共产党员惠特克·钱伯斯指控为共产党间谍,两天后,希斯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否认这一指控,他坚持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众议院所有委员都认为他讲的是真话,甚至连杜鲁门总统也称“希斯案件”为“转移目标的不相干的事”。但只有尼克松表示怀疑,他不断地搜寻证据,后来他找到了“不可辩驳”的罪证。当事人钱伯斯也展示了在其农庄的南瓜洞里发现的希斯以往给他的国务院文件的微型胶卷,并以此作为指控希斯的证据,致使希斯在 1950 年 1 月以伪证罪被判了 5 年徒刑。尼克松这种指控他人对美国不忠诚的做法使他的反对派十分不满。他们把他斥为“诡计多端的狄克”。

尽管如此,在当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严重对峙的情况下,他的坚定的“反共”立场还是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赏识。1952 年 7 月,他被选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伙伴,接受副总统提名。但是在竞选过程中,《纽约邮报》在“秘密的尼克松基金”的标题下,刊登尼克松接受贿赂的事件。它揭露了尼克松有一笔私人捐赠的 18000 美元的贿赂基金。对一个初入政界的人来说这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民主党就此向共和党发起了攻势,共和党内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开始说三道四。面对这种形势,尼克松要么挺住,要么退出。9 月 23 日,他发表了一次感情充沛、激动人心的电视演说,为自己辩白。在演说中,他承认基金的存在。但是一分钱也没有花在他本人身上,只是用来“支付政治开支”。他说:“我并不想让美国纳税人来承担这笔费用。”他向选民保证,在任公职期间他并没有损公肥私。接着,他公开了他的资产目录:1950 年的老式汽车,在加利福尼亚家产净值 3000 美元,华盛顿家产 23000 美元,4000 美元的入寿保险,没有股票、公债和负债。加利福尼亚的家产押款 10000 美元,华盛顿的家产押款 20000 美元,有 4500 美元银行现钞,借双亲 3500 美元,有 500 美元到期的人寿保险。在演说即将结束时,他承认:就在我动身竞选旅行的前一天,我们确实得到过一件礼物——一只矮脚长耳狗,我的女儿给它取名叫“切尔克斯”。他还说:“我现在只想说,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仍要养这条狗。”尼克松这篇长达 30 分钟的演说赢得了广大选民的支持,他非但没有再被责难,反而在艾森豪威尔的政府里当了 8 年的副总统。这次演说的成功使尼克松相信谎言也能博得人们的同情,为他在水门事件中接二连三他说谎提供了经验。

1960 年,尼克松担任副总统两届期满,获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尽管他大力开展竞选活动,还是以不到 12 万张的选票败给了肯尼迪。尼克松在总结失败教训的时候认为,肯尼迪家族的成就应归诸于手腕,而不是信念,

使肯尼迪兄弟变得这样厉害的是冷酷无情的政治策略和处世诀窍。并且他相信，在 1960 年竞选期间，肯尼迪武器库中最主要的武器是窃听。这次竞选失败后，他又回到了家乡，做洛杉矶亚当斯—杜基—里兹尔但律师事务所的顾问。

1962 年，他又参加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竞选，结果在普选中，以 52% 比 47% 的选票败给爱德蒙·布朗。在一次庆祝选举的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尖刻地挖苦采访记者说：“你们为我的失败而兴高采烈。”他又说：“自希斯案件以来的 16 年中，你们也够高兴了，因为你们一有机会就攻击我，但我想我付出的和我得到的一样多……但是当我离开你们时，我想你们该明白——我走后你们该失掉多少呀！你们再也没有尼克松可供你们捉弄和逗乐了，因为，各位先生，这是我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了。”

人们以为尼克松从此将退出政治舞台了，可他却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出头之日，他向往着有总统的权力和做总统的辉煌。而从出身卑微的平民百姓艰难地爬到权势集团，动辄受到冷遇和白眼，这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养成了幽僻而孤独的性格，除了家庭成员和亲密的朋友之外，他远离所有的人。特别是几次竞选的失败使他认识到，任何人都不值得信赖，要达到目的，就要不择手段，否则任何事情都不会成功。抱定这种信念后，尼克松又积极投入到竞选的大潮中去。如前所述，越南战争给了他又一次政治生命，1968 年他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当选为美国总统。

从议员到副总统再到总统的 20 多年时间里，尼克松经历了政治的风风雨雨，体会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1962 年，在他撰写的《六次危机》中，他把自己政治生涯中的每个重大事件都视为一场危机，而在各种危机中，他总是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他“深信在这个国家到处都有处心积虑想把我搞垮的仇敌”。因此，他怀疑周围的一切，他把人生比作战场，稍有风吹草动便会胆战心惊。他对自己的政敌更是恨之入骨。有一次，尼克松在对科尔森谈到他的政敌时说：“我们总有一天要收拾他们，我们要在我们选择的地方把他们打翻在地，站在他们身上狠狠地踩踏他们。”正因为充满敌意的思想支配着尼克松，使他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国家机器去整治他的政敌们。

1972 年春，四年一度的总统竞选活动又拉开了序幕。在共和党内，形势朝着有利于尼克松的方向发展着。他在第一任期内的两项外交战绩是有口皆碑的，这位先前的反共先锋一上台就一反平生的言论，并断言：不可能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排除在国际秩序之外。他克服重重困难，第一个访问了中国，促使中美两国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中美上海公报》；同时，他又积极主张缓和美苏关系，并访问了苏联，与之签定了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的条约，这些成果成为尼克松参加竞选连任总统的强有力的武器。这样，获得党内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对尼克松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而现在的情况是，威胁来自民主党而非共和党内。尼克松和他的部下都清楚这样一个事实，自从杜鲁门政府以来，民主党在政府机构和国会中越来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总统有权任命各部、局、署的首脑，但联邦政府官员约 90% 是按文官制的规定录用的，总统无权任意解雇、降职或调动。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1970 年，在行政部门的高级职业官员中只有 17% 是共和党人，47% 是民主党人，36% 是无党派人士，而这些无党派人士常常是倾向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这就使以尼克松为代表的共和党政府的政策无法贯彻执行。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

剧，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又千方百计地要控制总统，使他成为自己统治的工具。尤其在 70 年代初的中期国会竞选中，许多共和党候选人纷纷落选，选民中反对越战的呼声也不断高涨，而此时民主党既控制着国会，又提出了结束越战的政治纲领，这不能不使尼克松政府为之震惊，他和他的部下非常担心 1972 年的大选将是一场生死决战。

尼克松为了获得总统职位几乎奋斗了一生，他可不愿只任一届便罢。因此，在再次竞选的一年前，即 1971 年 5 月，尼克松就决定要毫不留情地破坏其民主党对手的竞选计划。在他的授意下，成立了一个独立于全国党派之外、直属白宫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目的是摆脱国会的控制，专门为他的竞选连任活动服务。这个委员会由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1972 年 2 月他辞去司法部长一职，正式到委员会任主席一职）负责，由利迪任总顾问（后改任为财政委员会顾问）。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成立后的任务是筹集竞选资金和搜集所谓“政敌”的情报等。这样，指挥尼克松竞选连任活动的大本营形成了。为达到目的，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从造假信、贴假标语到暗中监视、秘密渗透，从流言诽谤到电话窃听情报、无所不为。

“水门事件”就是在这个委员会直接策划下发生的，它成为尼克松总统竞选连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的事实说明，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尼克松参与了“水门事件”的预谋，但是他的充满矛盾和敌意的性格却在白宫制造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促使他的部下去搞非法活动。白宫顾问约翰·迪安曾回忆说，当时的白宫“对游行示威的政治影响估计过高，对泄密事件小题大做，对搜集政坛情报永不满足”。难怪有人评论说，若不是尼克松喜欢让人诋毁他的政敌，若不是尼克松对搜集的情报贪心不足，也许就不会有竞选连任委员会闯入水门大厦的阴谋，“水门事件”也就可以避免了。

虽然上述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而人们还是对选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搞窃听感到疑惑。近年来，一种新的说法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了。这种说法认为：民主党头目拉里·奥布赖恩是尼克松长期以来的政治劲敌，所以成为尼克松攻击的主要目标。

早在 1960 年，奥布赖恩就抓住了尼克松的把柄，他指控尼克松的兄弟唐纳德从工业巨子和影视业巨头、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此人自 50 年代以后从未在公众面前出现过）那里接受过 20.5 万美元的贷款。在 1960 年的总统竞选中，由于没能解释清楚这笔贷款的来源，尼克松因此败给了肯尼迪。尼克松深知奥布赖恩的厉害，此人是肯尼迪家族的一个亲信，曾做过休斯家族的代理人。而在迎接 1972 年大选前，休斯家族又给了尼克松的好友查尔斯·雷博佐 10 万美元，作为尼克松将来竞选连任的捐助。因而，在大选前激烈角逐之时，尼克松首先想到曾做过休斯家族一员的奥布赖恩很可能知道此事，如果他把这件事情与前一次联系在一起，作为攻击总统个人财务问题的武器之一，那么尼克松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总统竞选活动也将前功尽弃。一想到这些，尼克松就不寒而栗。于是，他把奥布赖恩看成了眼中钉，1971 年 1 月 14 日，在“空军 1 号”机上尼克松口授的备忘录中，他曾竭力想要通过下令对这位民主党领袖的活动和财产记录进行广泛的调查，以报一箭之仇。这样才有后来的水门闯入行动，这一行动的两个目标就是民主党总部奥布赖恩的保险柜和被认为藏有奥布赖恩同休斯交往材料的保险柜。

至此，关于“水门事件”产生的原因有了一个圆满的解释。“水门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说它是越南战争的产物，或是尼克松个人性格的产物，

抑或是来自奥布赖恩的因素，均有一定道理。所以，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共识：“水门事件”是这些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越南战争为它提供了行动的起因，尼克松个人的性格成为它行动的指导思想，而奥布赖恩则成为它行动的目标。由于这些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才产生了水门窃听的阴谋，“水门事件”是尼克松政府阴谋窃听活动发展的最高峰。

## 二、夜闯水门 窃听计划遭失败

前面提到，为了确保 1972 年竞选连任活动的胜利，尼克松政府成立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该委员会一成立就着手筹集竞选资金，诋毁尼克松对手的活动。因为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公司和工会不得向政治竞选捐款，所以该委员会就建立了 450 个空头委员会和阵线团体，收集来自各地公司和工会的捐款。这些捐款大部分是在一些墨西哥银行“转帐时打埋伏”后，再放在未经查帐的基金中，最后被用来支持阴谋破坏和间谍活动的。这种集资方式有时是强制性的，有时则以给予优惠条件为交换，如美国国内的 3 家主要乳制品公司为尼克松竞选提供了 41.7 万美元，政府就宣布牛奶补贴价上调到平价的 85%；当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为竞选提供了 40 万美元后，政府即允许该公司拥有哈特福德公司，免被反托拉斯法起诉。竞选连任委员会就是用这些秘密资金雇佣一些人搜集有关尼克松的政敌的情报。

在竞选策略上，该委员会早就计划着如何在民主党众多的候选人当中，打击势力较强的候选人，让最软弱的人当选民主党候选人，来与共和党的尼克松较量。为此，针对民主党的一个个对手，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遭到攻击的是民主党人埃德蒙·马斯基，这是一个讲话温和的进步主义者，在 1968 和 1970 年他给选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依照哈理斯民意调查，1971 年 1 月，马斯基的声望高于尼克松，以 43 比 40 领先，2 月又以 44 比 39 领先，4 月竟达 47 比 39 的差距。面对马斯基咄咄逼人的气势，尼克松的私人秘书德怀特·蔡平推荐其大学同学唐纳德·塞格雷蒂对马斯基进行攻击。塞格雷蒂首先雇佣了 10 名左右的间谍，组织一个间谍网，搜集选举情报。从 1972 年开始，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又雇佣了 100 名左右的间谍，正式对马斯基进行内部渗透作战，结果马斯基在初选的第一战就受到莫名其妙的挫折。首先是他的竞选行程表册及有关选票统计的基本资料不翼而飞，接着，又有自称是“马斯基委员会的黑人代表”深夜打电话，扰乱新罕布什尔州白人的睡眠，说马斯基如何为黑人的权益奋斗。新罕布什尔州的地方报纸《联盟领袖》又刊登了一封信，信中描述马斯基侮辱居住在新英格兰的加拿大移民为“加拿大佬”。在佛罗里达州，又有大标语出现，上写“支持马斯基，支持我的黑孩子同坐巴士”。虽然马斯基赞成黑白同校，但总不至于愚蠢到在种族偏见根深蒂固的南方，举出这种标语来丧失选票。很明显，这是对马斯基的故意拆台。共和党这一连串的战略，使马斯基一时招架不住，只好退出总统竞选。

马斯基的退出消除了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的一个重大威胁，一切在按他们的预想进行着。接下来的任务是对付民主党新推出的候选人乔治·麦戈文。开始，尼克松认为他是“最容易打败的敌人”。然而根据民意测验，他也正越来越受公众的欢迎，他的关于结束越战的竞选纲领使尼克松及部下感到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竞争者。况且他把 1968 年支持罗伯特·肯尼迪和尤金·麦卡锡的两班人马联合到了一起，力量相当雄厚。于是白宫的矛头又开始转向了麦戈文。

当 1972 年 5 月尼克松政府封锁北越海防港时，麦戈文等反战派借机攻击共和党政府的战争政策。据《华盛顿邮报》报导，这时竞选连任委员会使用 1 万美元的秘密资金，假造“支持封锁，支持尼克松”的舆论。当时华盛顿的 WTTG 电视公司调查舆论，竞选连任委员会就有计划地邮寄 4000 名支持封

锁的回信，因此舆论调查的结果，赞成的有 5157 人，反对的有 1158 人，压倒多数支持尼克松的政策。5 月 17 日《纽约时报》的社论刊登了半张“人民对抗纽约时报”的广告，内容说《纽约时报》的社论批评封锁海防，但人民则支持封锁政策。这则广告是以 10 个老百姓的名字刊登，但实际上是总统的特别顾问起草的。另外，争取连任委员会还雇佣职业学生潜入反战学生之内，搞离间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向报界披露，麦戈文的竞选伙伴伊格尔顿隐瞒了精神病史，使麦戈文难堪。

争取连任委员会对麦戈文的进攻果然奏效，使麦戈文大为受挫，尼克松当选总统似乎十拿九稳了。但在尼克松看来，除非能赛过他“所嫉恨、畏惧同时又钦佩的肯尼迪兄弟，否则这种胜利就不够彻底”。对此，他的部下也一清二楚。

1972 年 6 月，共和党和民主党已基本选定了自己的候选人。共和党是尼克松，民主党是麦戈文。尽管共和党对民主党进行了一系列诋毁、渗透、窃听，麦戈文还是以进步的姿态出现。他极力叫嚷着要结束越南战争，因此，当选总统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此时争取连任委员会还没有搜集到民主党有关竞选的任何实质性的情报，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奥布赖恩从休斯那里接受钱财的资料。竞选连任委员会的负责人们开始坐立不安了，刺探民主党的参选策略和活动情况就显得更加紧迫，于是他们策划了一系列闯入民主党竞选总部的行动。

1972 年 5 月 26 日，以亨特和利迪为首的一伙人第一次闯入民主党总部，由于打不开楼梯和门，只好撤回。第二天夜里，这伙人再次闯入，一扇上锁的门又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在这同时，“特别调查小组”企图潜入麦戈文总部的行动也受挫。5 月 28 日，他们又一次闯入，结果成功了。他们在奥布赖恩的秘书和民主党官员斯宾塞·奥利弗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还偷拍了有关会议安全措施方面的文件的照片。虽然这次行动获得了成功，但由于窃听器失灵，窃听的效果令人非常失望，录下来的情报毫无价值。多次行动的失败，使争取连任委员会的负责人非常恼火，他们责怪手下人办事不力，以至把事情办得如此糟糕，这就促使一个更大规模的闯入计划诞生了。

这次闯入行动发生在 6 月 17 日夜，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他们带去了一位开锁专家，结果轻而易举地就闯进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所在地——水门大厦。尽管这次行动相当谨慎。但还是被负责巡逻的黑人警卫弗兰克·威利斯发现，大厦地下室门上贴着的胶带引起了他的警觉，他以为是有窃贼，于是打电话报警。警察搜查了整幢大楼，结果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里，警察抓到了 5 个人。他们带着橡皮手套和电子窃听装置，正在翻查民主党总部有关选举的资料，并且正要安装窃听装置。接着警察又发现，这 5 个人随身还带着照相机、步话机以及钢笔型瓦斯枪。随后又在窃贼们下榻的水门饭店搜出将近 6000 美元的钞票。从财源巨大这一点看，他们就不是一般的窃贼，警察逮捕了他们。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水门事件”的闯入行动。

经审查，这 5 个人分别是詹姆斯·麦科德、费兰克·斯特吉斯和 3 个古巴人：伯纳德·巴克、弗吉尔·冈萨雷斯及尤舍尼亚·马丁内斯。当天，在当地的地方法院，他们自称是反共产主义分子，麦科德还故作神秘地对法官说他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他们想以此蒙混过关，逃避法律的制裁，不料新闻记者们却早已认出了麦科德正是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安全顾问，这引

起他们极大的兴趣。

6月20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以醒目的标题报导:白宫顾问与窃听人物有牵连。文章说,根据“与调查此案关系密切的联邦官员”提供的消息,在民主党总部内逮捕的人中有两个人的通讯地址录上发现霍华德·亨特的名字。而亨特是中央情报局的前特工人员,1972年3月29日以前一直在白宫工作,充当科尔森的顾问。实际上亨特虽然离职,但仍在白宫保留着一间办公室,警方在那里搜出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图表及一些窃听器材。几天之后,联邦调查局人员又从窃贼们的财源上查出了另一个嫌疑犯利迪——争取连任委员会的财务顾问,这样,“水门事件”直接牵涉到了白宫。随后经多方调查,白宫众多官员参与了此事的策划和掩盖,尼克松总统也卷入掩盖的丑闻之中难于自拔,“水门事件”成为美国轰动一时的重要新闻。

### 三、欲盖弥彰 白宫难逃其干系

其实，在美国，像水门窃听这类事情是司空见惯的，窃听是两党相争时常用的一种手段。只要白宫当时承认错误，开诚布公地向公众检讨一下，并对有关的人员做适当处理，尽管这样做会对尼克松的竞选不利，但也不至于导致他下台。可是，“水门事件”的策划者担心如果以连任委员会为线索进行调查，还会查到尼克松手下的其他犯罪行为，他们害怕新闻界添油加醋地把这一事件扩大化。导致准备工作失败。因此，“水门事件”发生后，他们立即进行了一系列的掩盖活动。

6月18日，“水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米切尔就立刻声明，麦科德只是白宫雇佣的临时顾问，而且早在一个多月以前就被解雇了。6月19日，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在新闻发言中也宣称这是一起“三流的盗窃案”。与此同时，白宫所有的电话被回收改码，他们试图伪造一个亨特早已不在那里任职的事实。另外，有关埃尔斯伯格泄密案和其他有关此类的文件被统统销毁。

6月20日，白宫又以古巴人和麦科德、亨特互有牵连为由，指出这实际上是古巴人的行动。其实这是白宫使自己脱身的又一伎俩。尼克松曾认为这样做“既能使白宫不因暴露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与此事有牵连而在政治上蒙受影响，又能使人注意到美国古巴侨民为麦戈文对卡斯特罗的幼稚无知的政策（麦戈文曾在竞选纲领中提出要与卡斯特罗修复关系）担忧，从而削弱民主党的力量”。6月22日，尼克松又声明“白宫毫无牵连”。6月23日，当得知联邦调查局已根据被捕人员的财源追踪到争取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头上时，尼克松要白宫办公厅主任哈里·霍尔曼和国内事务委员会主任埃利希曼通过中央情报局向联邦调查局施加压力，说联邦调查局继续调查被捕人员身上的钱可能危及中央情报局在墨西哥的资产，并转告联邦调查局立即“停止调查此案”。同地，被捕人员收到了大量贿赂，为的是要他们服罪，并保持沉默。自尼克松以下所有知道真相的人也统一口供，在公开和私人场合都说，“水门事件”仅仅是那些被当场捕获的几个人的个人冒险活动。8月29日，尼克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又宣布：“总统顾问迪安先生已根据我的指示进行了调查……我可以明确他说，他的调查表明，无论是在白宫工作人员还是本届政府目前的雇员当中，都没有一个人卷入这一离奇的事件。”事实上，迪安根本没有做过这样的调查或报告。但是这次声明还是在公众中反应良好，只有民主党人中间有些异议。

几个月来，民主党的候选人连遭攻击、诋毁，他们不可能不怀疑到共和党头上，他们何尝不想找机会报复一下？如今可谓天赐良机，“水门事件”给他们提供了大做文章的机会。假如借“水门事件”使共和党人在整个秋季“忙于应付法院，使案件为公众瞩目”的话，那么必将“破坏看来势不可挡的共和党竞选活动”，搞垮尼克松，总统的宝座自然非民主党莫属。于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奥布赖恩发表声明说：“这个窃听事件……提出了我在20多年政治活动中所遇到的关于政治过程是否诚实的最吓人的问题。”他称“水门事件”是一次“令人难以相信的政治间谍活动”。同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对争取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提出诉讼，控告它侵犯私人秘密，违反民权，要求赔偿100万美元。民主党的候选人麦戈文，更是大声疾呼“这是尼克松的政治阴谋”。

然而，大多数选民对这些指责无动于衷，他们把“水门事件”看成是两

党之间的勾心斗角而不去管它。9月15日，联邦大陪审团对亨特、利迪以及在民主党总部逮捕的5个人起诉，罪名是非法侵入私宅、窃听、盗窃等。看来调查就到他们为止了。“水门事件”被暂时掩盖起来。

就在大选前12天，尼克松又宣布越南即将实现和平，在最后一刻抽掉了麦戈文手中的王牌。1972年11月7日，他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再次当选总统。

如果没有联邦调查局的继续调查，如果没有《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罗伯特·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对此案的穷追不舍，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水门事件”中的阴谋。然而，情况却恰恰相反，1973年，案情又发生了新的转机，“水门事件”再次掀起轩然大波。在许多方面的调查又有了新的进展：《华盛顿邮报》不断向舆论界披露最新消息；民主党的国会领导层也确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应对“水门事件”进行公开调查；在司法部，主持审判水门盗窃案的法官约翰·赛里卡表示他对有关的事实材料全部交给陪审团极为不满，所有这些都预示着白宫企图掩盖真相的阴谋凶多吉少。

当时的《华盛顿邮报》曾第一家刊登了关于“水门事件”的消息。据伍德沃德自己说，一个不愿暴露身份的人向他提供消息。在比尔·加利口述的《白宫秘闻》中也提到过此人，他说“大喉咙”（即指这个不露形迹的人）是一位幻灭的浪漫派，不爱出风头，然而他却拉着两名记者干了导致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辞职的事。每天凌晨2点，“大喉咙”都在停车场和伍德沃德碰头，把有关调查进展的情况告诉记者、让他把这些公之于众。《华盛顿邮报》根据他提供的消息拼凑了一个关于“水门事件”的完整的故事。

1972年8月1日，《华盛顿邮报》报导说，人们追查“水门事件”中一个窃贼在银行的存款时，发现它与一笔未公开的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竞选资助有关联，这一笔款项是通过墨西哥国家贪污而来的。此后几周，它又登载了一连串文章，暗示可能有一笔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秘密基金存在，以用作特务活动和其他非法活动之资，并说这笔款项的使用得到了官方的批准。10月16日《华盛顿邮报》再次报导说，总统的个人律师、4月7日前担任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代表主席的赫伯特·W·卡尔姆巴赫曾批准从这笔基金中支付各项费用。为了形象他说明这笔钱到底派了什么用场，10月10日，它又报导说“水门窃听事件来源于为争取尼克松重新当选而进行的大规模政治侦探和破坏活动，并由白宫官员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进行指挥”。

《华盛顿邮报》报导这些消息时正值大选来临之际，所以“水门事件”没有成为大多数新闻媒介的重点，公众也似乎相信了白宫的发言，而把它的报导看作是麦戈文的竞选做宣传。白宫原来也担心窃听案会影响尼克松的连任，可是很快这种担心就随着尼克松的大选获胜而烟消云散了。

但白宫的好景不长。大选结束不久，被送到外面躲藏起来的亨特又转了回来，并以全体水门窃贼的名义对他们保持沉默索要更多的报酬，掩盖的堤坝大有决口的趋势，白宫参与掩盖真相的人顿时又惊慌起来。

1973年1月8日到30日，法院开始了对“水门事件”的第一轮审判，由赛里卡法官主审。由于几名窃贼对幕后指挥者、巨款的来源等问题仍缄口不言，法官没有发现新的罪状。2月2日，赛里卡表示，他对案情所披露的状况“不够满意”，要求作进一步的调查。

2月7日，参议院又表决通过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1972年大选中的舞弊问题。这个委员会由4名民主党和3名共和党参议员组成，而由参议员萨姆·欧文担任了该委员会主席。欧文当年76岁，他是一个老资格的北卡

罗莱纳州民主党的代表，也是一个朴实的乡村律师和宪法专家。他的仰慕者都称他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接着，从这个参议院“水门委员会”时时传出这样那样的最新消息。这样法院和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同时进行。

3月，政府首先宣布了对“水门事件”中6个人的判决。判罪都相当的严厉，其中判处利迪20多年徒刑，亨特35年，而另外几个古巴人巴克、冈萨雷斯、马丁内斯和斯特吉斯则分别被判处40年。另一方面，政府还声明对这几个人的判决只是暂时性的，要视他们今后与参议院“水门委员会”与联邦大陪审团即将进行的联合调查中表现的好坏再加以修正。3月23日，赛里卡法官表示，政府对他们的审理过问，他很不满意。同时，面临重刑威胁的水门窃贼们，一想到未来牢房的漫长岁月，就不寒而栗，他们开始清醒了，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前程保护那些真正有罪责的人，如果再沉默下去，他们就要面对几十年的铁窗生活。终于，有人打破了这种沉默。3月23日，詹姆斯·麦科德第一个站出来讲话了。他写了一封信给赛里卡法官，透露：有人对他们几个被告施加政治压力，要他们服罪，并对其他真相保持缄默；有更高层的人物牵涉此案；如果泄露内情，他们的生命恐怕有危险。赛里卡法官在当天的法庭上宣读了这封信，宣布延期对麦科德的判决，并豁免了对他的进一步指控，将其从狱中放出来。而对其他6人则宣布：利迪6年8个月以上20年以下徒刑，罚款4万美元；亨特50年以下徒刑，罚款4万美元；其余4名都是55年以下徒刑，罚款5万美元。赛里卡声明：这是“临时性的最重判决”，被告如果在以后的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据实作证发言，则可以酌情改判。他的目的在于诱使其他罪犯也讲出真相，掩盖的堤坝从此决口，其他人先后步麦科德之后尘，开口讲话了。

3月26日，在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的秘密听证会上，麦科德讲出了事实的真相，他揭露，为了尼克松争取连任总统成功，曾有一个窃听民主党总部的计划，由争取连任委员会主任米切尔、副主任马格鲁德和总统法律顾问迪安以及另外两名被告亨特和利迪参与制定了计划，不久之后，米切尔签字批准了这个计划。计划中列举的窃听目标，除了民主党总部之外，还包括麦戈文的选举事务所、迈阿密的民主党全国大会场3个地方。他还指出，霍尔德曼、科尔森等事先也知道此事。麦科德的证词证实了白宫并不像其表白的那样清白，有众多的人参与了“水门事件”。法官获得了新的线索，下一步就该顺藤摸瓜了。

就在不久前的2月28日，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对提名任命帕特里克·格雷为联邦调查局终身局长举行的听证会中，也曾追究到水门事件的调查责任。格雷承认，在其任代理局长期间，将调查水门事件的原始资料和报告，包括窃听民主党总部电话所获得的资料，全部交给了白宫法律顾问迪安，而且联邦调查局查问白宫官员时，迪安始终在场监视。于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一面谴责联邦调查局的做法，一面要求迪安出庭作证。麦科德的证词和格雷的话使调查的焦点一下子又集中到迪安身上，在此之前，还很少有新闻报导提到迪安，但是在此之后，他却要成为揭开“水门事件”真相的关键人物。

白宫在“水门事件”发生之初是想让利迪及其手下人担当罪责，由于格雷的揭发他们不得不把防线退到迪安这一层，但他们又深知让迪安去作证的不利。于是，3月14日，尼克松以“行政特权”为理由，拒绝让白宫行政人员到国会宣誓作证。4月2日，欧文委员会否定了“行政特权”的说法，认为这是“行政胡说八道”。欧文指出，白宫官员不是“贵族或皇室”，委员

会有权传唤任何证人，如果他们不肯接受传票到参议院作证，那么他就授权参议院拘捕他们。鉴于这种压力，4月17日，尼克松总统不得不宣布：“水门事件”的调查有重大的发展，白宫官员被起诉者必须辞职，这次为特例不行使“行政特权”，白宫官员须应召前往国会作证。

本来迪安还想趁此机会加强他在白宫的影响，但局势的发展使他预感到他将被人用某种方式抛出去做替罪羊。3月21日，他对尼克松说：“我们生了癌，在我们内部与总统近在咫尺的地方生长着一个癌。它每天都在生长、扩散。”他毫不掩饰地道出了他对自己受到责难的忧虑。他告诉尼克松，是他派遣利迪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充当白宫的耳目；他知道是马格鲁德特意命令利迪两度企图把一些窃听器安装到水门公寓里去；他曾经当着米切尔的面安排卡姆巴赫把霍尔德曼弄来的钱付给“水门事件”的几个被告。迪安还提醒尼克松说，亨特又在索要更多的钱，并且要把埃利希曼与闯入埃尔斯伯洛的精神病诊所的关联翻腾出来等等。最后他又说为了“拯救总统”，他和霍尔德曼、埃利希曼三个人，应承担“水门事件”的责任而认罪。然而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则表示反对，认为如果他们两人认罪的话，白宫秩序必然大乱。他们极力劝说迪安写个书面报告，把“水门事件”的一切罪责都揽过去，为此，迪安深感自身的危机，他担心自己会被当成牺牲品，因此迟迟不肯动笔，后来干脆向司法机关自首了。

霍尔德曼的助理马格鲁德看情势不妙，生怕引火烧身。便于4月14日，主动到司法部交待：米切尔在1972年的春天批准了窃听计划；是米切尔和迪安要7名被告保持缄默并付给他们很多钱。他的目的在于把责任推到米切尔和迪安身上。

4月15日，迪安也开始与检察官们合作，揭露霍尔德曼收买被告和埃利希曼销毁亨特保险柜里的文件。此时的白宫害怕迪安继续揭露下去，4月17日，尼克松宣称白宫的任何官员都无法得到豁免，显然这是想以此压服迪安紧紧地依靠他给予宽恕。然而，事与愿违，迪安为了赢得检察官们的豁免权，还是讲出了全部事实真相。4月19日，迪安发表了“我不要当替罪羊”的声明，他说：“一些人希望或者说是认为我应该成为‘水门事件’的替罪羊。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不了解我，不了解事实的真相，或者说是了解我们的司法体制。”接着，他又道出了许多白宫的秘密。

根据迪安和马格鲁德的供词，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计划被公布于众。1972年1月27日，米切尔、马格鲁德、利迪和迪安几个人开会。利迪在会上介绍了他的称之为“宝石行动”的计划：为争取总统竞选连任的胜利，他准备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包括使用破坏、敲诈勒索、绑架、闯入内宅及电子监视等手段，预计需要100万美元的财政支出。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米切尔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个计划过分浪费而且牵扯面太广。于是利迪又提出一个修正意见，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安装窃听器和进行电子监视上。3月30日，米切尔默许了利迪的计划，准许他开始实施，并拨给25万美元财政支出。后来米切尔本人尽管承认曾经与利迪等人开会讨论，但他坚持说从未给予利迪这种行动的权利。而马格鲁德则说，米切尔是极其勉强地同意了这项计划的，因为当时他一方面面临他的生病的妻子给他带来的麻烦，另一方面又牵扯到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反信任案上面，同时，他还受到白宫催问关于竞选准备工作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米切尔分心四顾，已无暇去顾及利迪怎样去做，只有任其自由发展。也许是由于米切尔忽略了对利迪的控制，

所以才会有前面的几次闯入行动直至“水门事件”发生。但不管怎样解释，米切尔参与了“水门事件”的策划，这一点不容置疑。

接着，人们又断断续续地知道了这个事件背后的很多丑恶的东西：是利迪、马格鲁德将有关埃尔斯伯格一案和其他有关文件销毁的；米切尔、马格鲁德和迪安在“水门事件”发生之初立刻把责任推到利迪身上，他们宣称利迪只是雇佣来做合法的情报搜集工作，水门闯入行动完全是他贪功倨傲、独断专行的结果。而私下里，他们又付给水门窃贼们一大笔钱，来换取他们的缄默。他们认为这样一来，损失就会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之后，有人按照迪安的命令，打开了亨特在白宫的保险柜，并把其中比较敏感一点儿的文件材料全部转移了。这些材料涉及破坏设备、关于埃尔斯伯格的资料以及亨特假造的将前总统肯尼迪与1963年的南越总统垮台及遇害一事联系起来的海底电报。后来迪安供称，埃利希曼要他将这些文件撕毁，将那些破坏设备埋入地下；由埃利希曼在场作证，迪安把另一些亨特的文件转交给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格雷，并且告诉他，这些东西要“永远不再见天日”。也许是格雷误解了迪安的意思，他以为迪安这句话是让他销毁这些文件的暗示，因此他照办了，这样他也涉嫌到掩盖真相的案件中去。1973年4月27日，他因此而引咎辞职。

白宫参与掩盖真相的人以为，掩盖可以使他们躲过舆论的监督和法律的制裁，谁知越是遮掩，“水门事件”越是像恶疾般地蔓延扩大，隐藏在深处的阴谋更是暴露无遗。总统手下的大多数人都被牵涉到“水门事件”中去，为了推卸责任，他们又互相揭发，企图寻得自身的安全。尼克松总统周围危机四伏，但即使这样，他仍不愿主动承担责任，迅速结束这场斗争。4月30日，在一次电视讲话中，他仍坚持说他不断地接到从事调查“水门事件”的司法人员的保证，绝对没有任何白宫官员参与此事，并且他对此很信任。同时，他宣布霍尔德曼、埃利希曼以及司法部长克莱因丁斯特和迪安的辞职。他还表示：“我将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使有罪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对白宫的部下我将不会做丝毫的掩饰。”同时，他宣布提名埃利奥特·理查森为司法部长，负责领导调查“水门事件”，并宣称理查森有全权任命一位独立公正的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

人们以为尼克松这次是痛下决心要将此案调查清楚，谁想在后来的日子里，更加针锋相对的斗争开始了。

#### 四、四面楚歌 尼克松险遭弹劾

根据麦科德、迪安等人的供词，历时近一年的“水门事件”的审理工作终于有了眉目，尼克松的大部分高级助手都卷入了这场案子之中，人们不由地发生质疑：既然总统周围的人多数都参与了此事，那么总统怎么会蒙在鼓里呢？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一直坚持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他说，1972年6月18日，当他从《迈阿密先驱报》上看到标题是“企图窃听民主党总部，几个迈阿密人在哥伦比亚特区被拘留”的小消息时，他“当它是开玩笑，不加理会”。假设尼克松事先并不知道这次闯入行动，但事后他至少也能得到报告，不可能一点儿不知道。尽管他一再说“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并进行窃听是件愚蠢透顶的事”，可是“水门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他就授意霍尔德曼把这一事件与古巴人反卡斯特罗的行动联系起来，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要转移人民的视线，既掩盖共和党搞窃听的丑闻，又打击他的对手麦戈文。随着调查牵涉到白宫，他又企图让米切尔出面承担责任，然而米切尔却退避三舍，以照顾生病的妻子为由辞职了。

1972年7月23日，霍尔德曼对尼克松说：“由于联邦调查局不听指挥，我们又已陷入困境。”尼克松立刻要他转告联邦调查局：“不要对这个案件再作任何调查了。就是这句话！”他企图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联邦调查局施加压力，以掩盖“水门事件”。同时他又多次公开声明，白宫无任何人牵涉此案。

当尼克松在1972年的大选中获胜时，他却体会不到胜利的喜悦。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选举结束几天以后，我在日记中描绘了一种奇怪的情绪……它使我感觉不到胜利时的喜悦……我简直说不清为什么在胜利之夜竟会产生这种忧郁情绪。”如果真像他所说的他对“水门事件”一无所知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灾难临头”似的感觉呢？由此可见，尼克松当时是心中有鬼。

正是由于他运用总统特权对调查施加了某种压力，所以“水门事件”案迟迟没有进展。当调查追及迪安时，白宫在1973年3月21日召开了会议。尼克松后来也承认，在和迪安的这次谈话中，他第一次得知水门舞弊一事。据迪安的供词和后来的谈话录音证实，尼克松知道并参与了掩盖“水门事件”，并且他许诺，只要亨特保持沉默，他一定给他特赦，他还试图建立一个由白宫控制的新的“水门事件”大陪审团以推翻司法部的调查。4月，他运用行政权力拒绝让迪安出庭作证，结果被欧文严辞驳斥。无奈，他再次声明“水门事件”与己无关，同时表示要将此案的调查彻底进行下去。但事实上，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并没有给司法部门的调查开绿灯，而是千方百计地阻挠调查。

5月17日，欧文委员会开始举行公众听证会，每次均通过三大电视网向全国广播。与此同时，正在等待任命担任司法部长的理查森在参议院的压力下，答应任命一名持独立见解的特别检察官。他提名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担任这一职务。此人曾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司法部副部长。从此，欧文和考克斯竞相展开了调查。

1973年4月15日，迪安又谈及尼克松曾想到募集100万美元来贿赂几名嫌疑犯以使他们保持沉默。4月27日，迪安又透露，白宫将其政治敌人都

列入了黑名单，迪安还提供了详细的名单和有关的资料。但尼克松仍然坚持他事先不知道“水门事件”。5月22日，他否认亲自指挥了任何掩饰和作伪证的行动，他声称这一切背景完全是在埃利希曼的控制之下；虽然他一再否认自己批准了这一违法行为，但他承认“由于我一再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这可能导致他们对某种具体行动细节上的理解失误”。尽管尼克松一再为自己的行为表白，但在6月25日，迪安的证词却使他无可辩驳。迪安说，尼克松掩盖“水门事件”已达8个月之久。1972年9月15日，当亨特等人被起诉后，迪安被召到总统办公室，尼克松对他说：“霍尔德曼告诉我你处理‘水门事件’的事，你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这工作是相当困难，而你竟能处理得好，我很高兴案件止于利迪。”迪安的不利指控，通过电视广播传到千家万户，公众对尼克松的信任消除了，要求调查总统的呼声随之而起。

于是，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要求尼克松到委员会作证，并调阅有关的白宫文件。7月7日，尼克松以“总统行政特权”为由，拒绝到欧文委员会作证，并拒绝提供白宫文件。总统权力的运用使调查再次陷入僵局。7月16日，霍尔德曼的助理、负责白宫内部安全工作的巴特菲尔德到特别委员会作证。当询问到1972年9月15日迪安和尼克松的谈话是否有记录时，巴特菲尔德说：“为了记下谈话与电话往来，总统在1971年初曾下令在他的白宫办公室里安装窃听设备，许多秘密谈话，估计全录在磁带上。”这一发现使调查人员及美国公众都很震惊，因为此事除巴特菲尔德和安装窃听设备的专家外，只有尼克松、霍尔德曼及其一名助手知道。况且，白宫的录音带很可能记下了尼克松参与掩盖的全部活动。于是，围绕着白宫的录音带，一场以尼克松为一方、欧文和考克斯为另一方的争夺战开始了。

7月17日，尼克松禁止其安全人员再到特别委员会为录音系统的装置作证。同一天，欧文写信要求总统合作，并交出录音带及其他白宫文件。18日，特别检察官考克斯也要求总统交出录音带。他说司法部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因此“三权分立的原则”不适用。23日，尼克松再次以“总统行政特权”为理由拒绝欧文和考克斯的要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他是层层设防，以行政特权为理由阻挠调查工作的进行。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人们通过录音带之争已察觉出尼克松总统参与了“水门事件”的掩盖活动。

就在白宫录音带一事成为众矢之的、欧文与考克斯又穷追不舍、尼克松政府已岌岌可危之时，又一桩丑闻使尼克松的声望再次受损。马里兰州的联邦律师经调查，发现副总统阿格纽在任马里兰州州长时及后来担任副总统期间都接受过贿赂。尽管尼克松在8月份还说：“我对他诚实正直的品质的信任并未动摇。”但是，证据确凿，无可辩驳。10月，阿格纽辞职，并供认他曾涂改自己的所得税申报单。他被罚款一万美元并被判处3年“无监督缓刑”。根据1967年通过的宪法第25条修正案，尼克松任命众议院少数派领袖杰拉尔德·福特继任副总统。在阿格纽丑闻中，考克斯以一位公正的执法者身份追查不已，这使尼克松感到十分恐惧。阿格纽辞职后，尼克松对司法部长理查森说：“既然此事已经了结，我们就可以摆脱考克斯了。”谁知，考克斯还是咬住尼克松不放，而且越逼越紧了。他和欧文部向尼克松发出了传票，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国会第一次如此向总统挑战。

7月30日，霍尔德曼也在特别委员会作证，说他在本月初曾听过去年9月30日和今年3月21日的两盘录音带。然而尼克松还是拒绝交出，他强调说，如果国会传唤能够迫使总统公布享有特免权的情报，那么总统的职位就

会受到损害，就会危害到国家的安全。面对如此僵局，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和特别检察官不得不于8月9日将其提交到地区法院来裁决。8月29日，华盛顿地区法院法官赛里卡驳斥了尼克松的观点，并命令他交出录音带。然而尼克松仍借口享有“行政特免权”而拒绝交出。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涉及总统、国会与法院三者的关系。9月7日，考克斯又向哥伦比亚地区的美国上诉法院申请，要求判决尼克松总统交出录音带。10月13日，上诉法院以5比2的多数票，支持赛里卡的决定，并认为“总统特免权”不保护可能涉及犯罪活动的材料。上诉法院给尼克松一周的时间考虑：或是交出录音带，或是向最高法院上诉。尼克松被逼得走投无路，10月19日，他接见了欧文，表示愿意将录音带的“摘要”部分提供给欧文委员会和赛里卡法官，并请较有声望的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居间核对“摘要”部分是否充分和正确。欧文表示可以考虑接受，但考克斯坚决反对，公开声明拒绝接受这种妥协方案，他认为这是总统借口删掉享有特权和不相关的部分来掩盖其参与“水门事件”的事实。考克斯仍逼迫尼克松交出全部录音带，这使尼克松恼羞成怒。

10月20日，星期六，尼克松总统命令司法部长理查森撤掉考克斯，理查森拒绝执行，并和另一位也拒绝执行总统命令的副部长拉克尔肖斯相继辞职。结果，位属第三的副部长罗伯特·博克执行了这个命令，将考克斯免职。这次行动被称之为“星期六晚上的大屠杀”，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有近50万封电报涌向白宫，谴责尼克松的行为。几个主要法学院的院长寄出一份请愿书，要求国会“考虑”弹劾的“必要性”。

录音带之争，到此达到最高潮，举国哗然，弹劾总统之声四起。据盖洛普民意调查，尼克松的声望降到27%的空前低率。10月23日，参众两院两党领袖初步协议是否弹劾总统。尼克松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公众的反应，面对舆论咄咄逼人的形势，尼克松也深恐弹劾正式进入程序，将对自己极为不利，于是他让新上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小亚历山大·黑格发表声明，表示总统同意交出录音带，这才使举国沸腾的情绪稍稍缓和了一些。

11月1日，法院发现被传调的9盘录音带中有两盘不知去向，而另一盘录音带则出现18分半钟的空白。据说，丢失的两盘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们分别是尼克松与米切尔、尼克松与迪安的谈话录音。尼克松解释说这两次有关水门案的谈话因录音机操作失灵而未录音。这再一次引起舆论的哗然，《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等报纸纷纷撰文，要求尼克松辞职。而尼克松则一再声明：“不论遭遇多么激烈的批评和多大的困难”，绝不辞职。11月12日，尼克松又宣布，他将交出其他的录音带和备忘录给赛里卡法官，以便使他判断两次未录音的有关“水门事件”的重要谈话内容，这些新资料也足以证明“二次谈话从未录入”。11月17日，尼克松又发表电视演说，辩称“我绝不是一个骗子”，白宫的录音带将证明他在“水门事件”中是清白的。他还解释说，白宫缺少两盘录音带，是因为记录谈话的录音机并不是构造精密的机器，而只是一架质量较差的新力牌录音机，故难免有故障发生。

11月26日，尼克松的私人秘书伍兹又告诉法官，她当时因为不小心踩上踏板，不慎洗擦了一盘录音带的一部分，而这部分却正是1972年6月20日尼克松与霍尔德曼二人关于“水门事件”的谈话录音。尼克松和伍兹的话似乎有理有据。但随后，破绽又暴露出来。经过专家鉴定，伍兹说是不小心

洗擦的录音带实际上却是被洗擦 5 次之多，伍兹说当时是不小心洗掉的，而实际上都是以手工故意洗掉的。这些就足以证明，尼克松和他的手下仍然在掩盖事实真相，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关键性的磁带和录音怎会不翼而飞？疑窦重重，人们更加怀疑这位高喊“我不是骗子”的总统了。

正在此时，随着对许多参与“水门事件”的白宫人物的调查，尼克松的许多不法行为又被揭露出来：一是尼克松利用竞选经费等财源，购置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私产；二是他的朋友雷博佐代表他经营一笔 100 万美元的投资；三是他有许多逃避所得税的嫌疑，例如：1970 年尼克松只交了 792 美元的联邦所得税，1971 年只交了 878 美元等等；四是尼克松批准提高牛奶价格，以报偿牛奶生产联合公司对他争取连任的捐款；五是他曾运用总统手中的权力，保证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可以持有哈特福德公司，免除司法部长反托拉斯法的起诉，以回报该公司的竞选捐款，等等。尼克松的种种行径，使美国人民看到了政府的腐败，而对尼克松的信任率也降到了零点，要求弹劾总统的呼声再起。

1973 年 12 月，以众议员彼得·罗迪诺为主席、约翰·多尔为首席顾问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讨论有关弹劾尼克松总统的问题。按照宪法的规定，众议院根据多数票可以对总统某项罪行进行弹劾或控告——其行事方式很像美国司法制度中的大陪审团。然后，参议院作为审讯法院和陪审团举行会议，由美国首席大法官主持，需要有三分之二的票才能定罪，才能罢免总统的职务。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授权罗迪诺可以传唤和调查有关证人，包括总统在内。这样，尼克松的命运就像基辛格说的那样成了一道算术题：在众议院赞成弹劾的是否占多数，在参议院是否可动员三分之一加一票的参议员予以反对。

联邦大陪审团于 1974 年 3 月 1 日对米切尔、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科尔森等人提出起诉，指控他们从事阴谋活动、撒谎和妨碍司法工作。大陪审团把尼克松定为“未被起诉的同谋犯”，他之所以没有被起诉是“因为起诉人方面对于能否审判总统尚无把握”。司法委员会向尼克松索取 40 盘录音带。新上任的特别检察官利昂·贾沃尔斯基也向尼克松索取他同主要助手谈话的录音带。5 月 20 日，赛里卡支持贾沃尔斯基并命令尼克松交出 64 盘录音带。尼克松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只好交出了录音带。然而尼克松交出录音带后的反响比“星期六晚上的大屠杀”还要强烈，因为“录音带显示出尼克松的自私卑劣、优柔寡断、固执己见、寡廉鲜耻以及他使用的——尽管录音带上所记录的大量的所谓惊叹用语已被删去——肮脏的语言。”尽管尼克松还一再说他是 1973 年 3 月 21 日与迪安谈话后才知道“水门事件”的，但人们已不再为这些谎言所迷惑。舆论的大潮涌向尼克松，要求弹劾总统的呼声更力 00 向亮，连共和党内也有人提出要弹劾总统。

此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加速了弹劾问题的公开辩论。7 月 27 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以 27 票对 11 票通过了弹劾案的第一款，6 名共和党议员和全体民主党议员一起投了赞成票。指控的罪名是阻挠司法——对调查人员发表虚假和骗人的声明、扣留证据、搞伪誓、阻挠司法的调查、批准封嘴的贿赂、试图滥用中央情报局和司法部门的情报来帮助被调查的人员逃避罪责、对公众公布假声明、给一些宣告有罪的人许愿将来给予好处来换取他们的缄默等。7 月 29 日，司法委员会又通过了弹劾案的第二款，以 28 票对 10 票指控总统滥用职权——调用国内收入署、联邦调查局、特务组织和其他行政人

员；在总统办公室内设置一个非法的秘密调查组（“管子工”小组）；对部下的犯罪行为未能告发；干涉“水门事件”的调查。7月30日，众议院的委员会以21票对17票表决了弹劾案的第三款，指控总统违反宪法，抗拒传讯。最后，委员会得出结论：“所有这些，可以看出理查德·尼克松的态度已经违背他作为总统所得到的信任，并破坏了宪法政府，是对法律和正义事业的巨大损害，明显地损害了美国人民。由于这些行为，而批准对理查德·尼克松实行弹劾和审讯并解除其职务。”

面对众议院的弹劾，尼克松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自己决定辞职，另一条是按他自己的话“硬着头皮顶着”。他十分害怕并抵制辞职，所以直到8月2日，他仍岿然不动，既想凭借自己的意志来延长辞职时刻的到来，又想尽快结束此事。正在尼克松举棋不定的时候，他才发现硬顶下去是多么的难！最后一盘录音带又给了他致命的一击。8月5日，尼克松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交出了1972年6月23日他与霍尔德曼谈话的录音带。这盘录音带被称为“冒烟的枪”，它表明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尼克松曾指示霍尔德曼让中央情报局制造一次“国家安全”行动，并不让联邦调查局插手“水门事件”。这就说明，尼克松不仅对此案十分清楚，而且还下令掩盖真相。尽管在发表这盘录音带的同时，尼克松又做了一些解释，他承认基本的事实真相，并坚持要向有罪的人进行全面的调查和起诉，他说：“我坚信，全部记录不足以使弹劾和罢免总统的极端做法合法化。我相信，随着宪法程度的演进，这种看法将占上风。”但说这些话已为时过晚。这一事实真相的曝光，使尼克松又失去了国会中为数不多的支持者，在众议院435人中有425人投票赞成对他的弹劾；在参议院最后的表决中，推翻弹劾案需要34票，而尼克松只得了15票。尼克松在民众中信誉扫地，看来被弹劾是不可避免的了。

尼克松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在交出最后一盘录音带的同时，他又派一名助手去看看公众对录音带的反应是否像他担心的那样糟糕，结果确实令他大失所望，他无法摆脱弹劾和离职的命运。此时，他心里矛盾重重，在8月6日的内阁会议上，尼克松还试图取得内阁的信任，他表示：倘若他在压力下辞职，他便会把美国的总统制变成议会制，即总统只有在立法机构投信任票的情况下才能保持职位。然而事实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弹劾总统不同于在议会里投不信任票。内阁成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布什说，共和党乱成一团，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势将大败，“水门事件”必须尽快结束。虽然他没有明说，但谁都明白，他的言外之意是：迅速结束“水门事件”的唯一办法是尼克松立即辞职。

同一天晚上，基辛格也对尼克松说，他报效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辞职。他认为，如果进行弹劾审讯，会占用总统几个月的时候，也会困扰全国，还会使美国的外交政策陷于瘫痪。这对国家来说太危险，对总统也不太体面。在尼克松交出最后一盘录音带后，白宫办公厅主任黑格也在私下里开导尼克松辞职。他指出，既然尼克松已不可避免地要结束总统的职务，那么不如尽快地结束，避免一场宪法危机，这才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虽然这些活对尼克松来说是无情的，但他自己也感到已到了穷途末路，最后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思想斗争，尼克松终于决定辞职，并交待撰稿人雷·普赖斯着手起草辞职讲话稿，8月8日下午，尼克松向全国人民宣布了他的辞职演说，从1974年8月9日正午生效。

尼克松在告别辞中显得格外平静和克制，除了承认判断错误外，他什么也没有承认。当他走到摄像机前宣布他辞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职务时，他说，这是因为“在未来的岁月中，当我们的整个注意力集中在国外和平和国内没有通货膨胀的繁荣等大事上时，如果继续为我的辩白而斗争，则将会把总统和国会的时间和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

直到最后一刻，他仍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但这已无法挽回“水门事件”给人民心理上造成的伤害，这场戏就在总统的辞职声中谢幕了。

尼克松的辞职使人们无法确定他犯罪的程度。但是，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表明，尼克松政府确实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一个政府”。有人统计：在这个案子中，政府中有40多位官员受到控告，其中为首的就是高喊维护法律、秩序的副总统阿格纽和前司法部长米切尔。一名副总统、两名内阁成员和白宫班子里的12名工作人员以及在其他行政部门中任职的近15名官员参与了此案或在事后参与掩盖真相。

尽管9月8日，继任的福特总统宣布，对尼克松总统在任期间对美国犯下的一切罪行给予“完全的、无条件的和彻底的赦免”，但这还是无法弥补这届政府欺骗诡诈、故弄玄虚所造成的政治损害。

人民，将永远记住“水门事件”！也将永远记住“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政府的腐败！

## 五、玩火自焚 自食其果丢官印

“水门事件”虽然结束了，但它的政治影响至今远未消除，而且长期以来，它成了窃听的代名词，一提起它，人们不由得想起尼克松——一位被丑闻拖下台的总统。同时，又一个问号提出来：窃听并非从尼克松时代才开始，为何直到水门窃听时才被揭露出来并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呢？

的确，非法的窃听现象在美国历史上并非罕见，而是屡见不鲜。正如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自发明从电话线上窃取情报以来，政治窃听几乎没有中断过：“近在1970年，一名前艾德森·史蒂文森竞选活动的成员公开说，他在196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在肯尼迪组织的电话线上装了窃听器；林登·约翰逊认为肯尼迪家族曾对他搞过窃听；巴里·戈德华特说，有人窃听他1964年的竞选活动……”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也曾对尼克松说，约翰逊曾命令联邦调查局在竞选期间窃听尼克松的电话，并且说，约翰逊曾指示联邦调查局在尼克松的竞选飞机上装窃听器，而且他也这样做了。可见，窃听在美国本是一件不足为奇的小事，那么水门窃听案何以被闹得满城风雨、举国哗然呢？

首先，这应该归于总统与国会之间以及两党之间的矛盾斗争的结果。根据美国宪法，一方面，总统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具有缔约、任命、外交、军事、建议立法等较大的权力；而另一方面，总统在实际生活中又要受“三权分立”原则的制约。自美国建国后，特别是两党制形成之后，各派政治力量通过总统和国会参、众议员的竞选，争夺权力，因而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关系，不断出现协调、斗争，再协调、再斗争的局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的权力迅速扩大，总统开始主管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尤其是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总统事实上已取得了决定权。1961年12月11日，肯尼迪未经国会同意就派遣两队美国陆军直升机，向南越游击队直接进行作战。约翰逊时期又将越南战争逐步升级，他煽动并劝诱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并以此作为他大规模干涉越南内政的依据。难怪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把合众国总统称为“帝王式的总统”。到尼克松上台后，这种权力又急剧扩大，他竟撇开国会，擅自取消了东京湾决议，于1972年命令恢复对北越进行停止了四年之久的大轰炸，并派兵入侵柬埔寨。对于总统权力的扩大，国会并非没有反应，而是反应相当强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就曾在1972年写的《跛足巨人》一书中，谴责美国总统单方面的宣战权和外交权是“篡政”。

而对尼克松来讲，他当选总统的时候，民主党已保持了他们对参议院的控制和众议院的多数派地位，尼克松要推行他的政策，就不得不应付民主党控制下的参、众两院。有人称他是“120年来第一个就职总统必须同完全由反对党控制的立法机构进行周旋的行政首脑”。显然，这种斗争必定相当激烈。

在多次交锋中，尼克松都使用“总统行政特权”驳回国会通过的法案，或是根本蔑视国会的决议案不予执行，使得很多国会的议案被束之高阁。1972年竞选连任获胜后，尼克松又决心在第二任期内改革预算，停止那些浪费而且无效的计划。为此，他大砍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的许多庞大计划，公开向国会挑战，这使国会非常震惊和恐惧。于是他们抓住了“水门事件”这根辫子，并把这起似已平息的“三流盗窃案”又推向新的高潮。当尼

克松运用“行政特权”拒绝让白宫官员到国会作证时，参议院就举行听证会，逼迫白宫官员，不论在职或辞职，都要到国会作证。在这种压力下，1973年4月，尼克松不得不宣布放弃某些行政特权，允许白宫官员出席国会作证，随后又交出了录音带及有关文件，这些都削弱了总统的行政特权。1973年11月，国会又不顾他的否决，通过了“战争权力法”，要求总统派遣美国部队到海外从事敌对行动时，必须在48小时以内将此种行动的全部情况与细节报告国会。并且规定，除非国会明确批准继续作战，敌对活动必须在90天内停止。这项法律成为美国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限制总统在战争问题上的权力，被称为70年代国会“复活”的最重要标志。1974年初，国会又通过了控制预算与搁置法，规走参、众两院任何一院的决议都可以否决总统拒绝使用国会拨款的决定，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总统的权力。1974年7月，国会又通过了对总统的弹劾调查，终于迫使尼克松宣布辞职。

这种总统与国会之争实际上是美国两党之间勾心斗角的一种表现。尼克松代表的是西部和南部财团的利益，而国会和官僚机构的大多数以及东部的舆论界都是代表东部财团利益的民主党自由派。尼克松及其助手们似乎感觉出了在他们周围民主党的气味太浓，因而在第二任期尚未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提出要大规模改组和精简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按照“新多数”的方针重振共和党。尼克松企图通过改组内阁和其他官僚机构，“用忠于他及他的政策的人代替那些不完全忠实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排除东部财团的阻挠，实行有利于西部、南部财团利益的政策。因此，在大选后的第二天，即1972年11月5日，尼克松就要求白宫和内阁官员必须辞职，这就引起了摩根、洛克菲勒等东部财团的不满，于是他们指使报界，特别是《华盛顿邮报》，不断报道一些小道消息来扩大“水门事件”的影响，吸引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在尼克松身上，使尼克松被丑闻所缚，无法脱身；同时，他们又操纵国会，运用“分权制衡”原则，把尼克松赶下了台。

尼克松总统的辞职正是这种权力斗争的结果。美国的两党之争犹如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在水门丑闻中共和党一败涂地，民主党得意一时。然而他们哪里会想到，几年以后，民主党也遭遇了和共和党一样的经历，两党相争的恶果也同样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其次，目前关于“水门事件”又有了新的推说，这种说法认为：“水门事件”之所以被搞大，实为联邦调查局所为。

1972年5月2日，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去世，此人创办并经营该局将近50年之久。在他的领导下，联邦调查局有一批忠心耿耿的高级官员，胡佛也有一手遮天的本领。他可以到处插手，指手划脚，却没有人敢动联邦调查局一根毫毛，该局俨然成了独立王国。尼克松早就对此不满，无奈有胡佛在，他就无法控制联邦调查局。胡佛死后，尼克松立刻意识到，他控制该局的时候到了，因此，5月3日，他指定格雷为该局的代理局长，企图通过自己的人达到控制它的目的。

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曾认为胡佛的继任者必将在他们之中产生，尼克松对格雷的任命使他们感到凶多吉少。很明显，总统要直接插手联邦调查局了，他们岂能甘心？他们希望维持传统的独立，而不想失去往日的威严。正在此时，“水门事件”发生了，于是在联邦调查局负责“水门事件”的调查与白宫要把它纳入自己的轨道的明争暗斗中，联邦调查局开始了抵制活动，一个被称为“大喉咙”的人物应运而生了。伍德沃德当年的同事詹姆斯·曼通过对当年华府机构运作的基本分析提出，“大喉咙”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位

或几位官员。这种说法认为，对一位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来说，把消息捅给新闻界是一种绝妙的方法。它可以保障调查不受白宫的干扰，解除来自总统方面的压力，更进一步说，使联邦调查局摆脱政治控制，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

从表面上看，“水门事件”调查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权力与法的斗争，总统的辞职似乎也证明宪法制度在美国起了作用，实际上，“水门事件”却是总统与国会及联邦调查局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结果。由于尼克松提出加强中央集权，使国会看到总统是要扩大自己的权力，摆脱国会的制约，这是违反“三权分立”原则的。因而它与法院联合发动了对尼克松的调查，名为限制总统的违法行为，实为限制总统权力的扩张。参议员欧文曾说：“政府中三权分立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很难使三套机构同时腐化。”事实上，三权分立原则只是国会打出的一个幌子，它的真正意图是要达到控制总统的目的。而总统与联邦调查局的矛盾也同样如此，联邦调查局虽然没有像国会那样公开抵制总统，但暗中施展的阴谋更是毒辣，它最终导致尼克松的下台。可以说、在这些斗争中谁也没有获胜，虽然总统辞职了，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也只是一时得意。随后它也经历了与共和党一样的丑闻，联邦调查局也同样失去了胡佛时代的独立性。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尼克松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确实有超出法律范围的行为。例如：他为击败政敌而不择手段，从诽谤、监视他人到窃听他的政敌；为掩盖事实真相，他又下令贿赂证人作伪证，通过执法机构干预调查，以行政权力阻挠审讯工作的进行……经过国会的调查，这种腐败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水门事件案的审理过程看，尽管美国的总统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同样要受法律的约束，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三权分立”原则的制衡，正体现了这种约束力。

## 六、无独有偶 情同美似比利门

也许我们的叙事到这里该结束了，可是，“水门事件”的余音又促使我们想起了一个与其名字极其相似的事件——“比利门”事件。事实上，二者岂只在名字上有相同之处，而且二者之耸人听闻亦在伯仲之间。

1974年，民主党抓住“水门事件”这根辫子，硬把尼克松赶下了台，共和党被整得溃不成军，名声扫地。1977年，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又击败在任的共和党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当选为第39任总统，民主党更加得意。可是，这种好景也不长，没过几年，当卡特参加连任选举时，民主党也遭到了与当初尼克松一样的“政治休克和耻辱”，最后，卡特被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所击败。

致使卡特遭受如此惨败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同胞弟弟——比利·卡特。

别看卡特的这位弟弟在能力上不如其兄，而在“惹事生非”上却远远超出卡特。比利从小娇生惯养，不求上进，贪图享乐；长大后更没有什么成就，只是一个说话粗鲁、嗜酒成性的乡巴佬。在其兄走向总统宝座的路上，比利非但没有助其一臂之力，反而处处给卡特找麻烦，不时地给反对卡特的人提供攻击他的借口，而比利本人却不以为然。

一次，报纸刊登了比利和利比亚人表示友好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他坐在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保留的席位上，与一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军火供应商很亲密”。当有人批评他与利比亚亲善会影响犹太人对卡特总统的支持时，比利轻蔑他说：“什么犹太人，去他妈的蛋！”顿时，他的这番谈话招来美国犹太人的进攻，舆论哗然。最后，卡特不得不出来收拾局面，为比利开脱。他说：“我控制不了我弟弟的言行，就像我弟弟控制不了我的言行。但我深知他不是反犹太主义者。”有时，卡特也拿他这位喜欢炫耀、不懂世故的弟弟没有办法。这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

报纸又登出了关于比利的小道消息。从1978年9月开始，比利秘密地向利比亚提供援助，并于1979年12月从利比亚得到2万美元。1980年4月，又得到20万美元。尽管比利后来解释说，这是利比亚政府借给他的50万美元贷款中的两笔分期付款，但消息传出，还是引起全美国的轰动。时值总统大选迫在眉睫，发生这种事情显然对卡特极为不利。况且，一些报纸又添油加醋，使这个开始不起眼儿的小事一下子扩大开来。有些报纸把事情说得相当严重，声称“案情不仅仅限于比利·卡特接受利比亚政府的金钱，代表利比亚政府在美国从事有利于利比亚的活动，而且案子还涉及白宫，涉及总统本人”。

1980年7月20日，《纽约时报》又刊登一条重要消息。这则消息说，司法部早已注意到比利与利比亚政府的来往，并于1980年5月开始调查。可是，当司法部为22万美元的贿赂找比利询问之前，比利则提前委托一名律师代表自己同司法部进行了联系。这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司法部的调查是秘密进行的，比利怎么会事先知道呢？《纽约时报》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之口，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位政府官员认为，可能是司法部或白宫有人暗中向比利通风报信。这一消息的传出，比一颗定时炸弹爆炸引起的反响还要强烈，全国各地都知道了这件事。

共和党更是不肯放过这次机会，他们不由得又想起水门之耻，如今，报

仇的机会终于到了，比利事件使他们如获至宝。有人正式给这个事件起了名字，叫“比利门”事件，目的是为了把它同“水门事件”相提并论，把它说得跟“水门事件”一样地严重。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多尔还发表谈话，要求“卡特总统公开讲清楚他的弟弟同利比亚来往的全部经过”。这使卡特明显感觉到，他才是人们要攻击的对象。无疑，共和党要利用这一事件大造声势，使他在大选中处于不利地位。为了不给共和党留下攻击的借口，白宫和卡特本人立刻发表声明。

7月22日，白宫透露，在1979年，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提出一个计划，鉴于比利同利比亚政府有关系来往，美国政府能否通过比利的关系，请利比亚从中帮助解决美国人质问题，因为利比亚与伊朗关系不错。比利表示非常愿意做这件事，他把利比亚驻美的首席代表阿里·胡德里引进白宫，同布热津斯基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讨论解救人质问题。此后，利比亚政府曾正式向伊朗领导人霍梅尼提出过释放美国人质的要求，但是没能奏效。白宫还透露，总统第一夫人罗萨琳·卡特也曾提出一个利用比利个人和利比亚的友好关系帮助解决美国人质问题的计划，但这个计划也没有实现。

卡特于7月22日也发表声明，声称在1980年7月14日之前，他并不知道比利接受了利比亚政府22万美元这件事。他还说，当他得知这件事后，他立刻督促比利到司法部登记注册，让他做一个合法的外国代理人。因为美国的法律规定：“美国人当外国人代理人，替外国政府办事，只要到司法部登记注册，定期报告自己的活动，就是准许的，合法的。”

白宫和卡特的声明表明，白宫通过比利同利比亚政府接触，是为了营救在伊朗的美国人质，总统原来并不知道比利同利比亚的关系和他接受利比亚的金钱，一旦获悉，就督促比利去登记注册。显然，总统在为自己开脱责任，白宫也在为总统开脱，他们把这件事说成是符合国家利益的，目的是要抑制事态的扩大。可是，共和党哪肯这么轻易放过卡特。7月22日，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共和党议员、外交委员会委员杰西·赫尔姆斯，要求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调查“比利门”事件，并且要求成立一个类似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委员会。7月23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开会辩论，最后决定：指定4名委员对“比利门”事件进行初步调查，并迅速提出报告。委员会收到报告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同一天，众议院有76名共和党议员联名提出一项决议案，也主张调查“比利门”事件。

7月24日，在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的提议下，成立了由9位参议员组成的特别小组委员会，负责调查“比利门”事件。这个委员会由两党共同参加，它的任务是在10月4日之前，就该事件向参议院全体会议提交调查结果的报告。这一天，司法部长西维莱蒂也表示，对比利·卡特案件的调查，“司法部没有任何事情需要隐瞒”。

于是，围绕“比利门”事件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共和党公开把矛头对准了卡特，实质上也就是对准了民主党；而民主党内的一些反卡特派也在暗地里支持了共和党的斗争，他们部在巴不得卡特早点儿下台。这种来自内部的危险给卡特造成更大的威胁。7月25日，约40名民主党众议员秘密开会，专门讨论撇开卡特和爱德华·肯尼迪，而推选第三者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问题。这批人的发言人迈克尔·巴恩斯说：“显然，如果今天举行选举，吉米·卡特将遭到失败。”7月7日，巴恩斯再次发表电视讲话说：“许多民主党众议员强烈要求，准许已经表示支持总统的各地民主党代表在党的全国

代表大会上有投票选举别的总统候选人的自由。”接着，他又宣布了几个可以取代吉米·卡特的人选。7月28日，巴恩斯又宣布：一个称为“争取召开不受约束的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的组织，已在民主党内诞生。

来自民主党内部的进攻对卡特来说是出乎意料的。接着，7月25日，参议院特别小组委员会主席伯奇·贝赫宣布。这个委员会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8月11日开幕前，就“比利门”事件。举行两次听证会。了解内情的人一听就知道，贝赫这个决定的目的是为了剥夺卡特198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资格。《华盛顿邮报》也发表文章说：“比利·卡特因为同利比亚建立关系而走了运，他的哥哥吉米·卡特也从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捐助人那里得到了财政上的好处。”这对卡特来说无异雪上加霜。

7月30日，康涅狄格州米尔福市市长、共和党人波维内利宣布，他给白宫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卡特学习前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为了国家的团结”，辞去总统职务。卡特也象当年的尼克松一样，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好在卡特比尼克松的态度好得多，他向公众表示愿意与参议院合作，查清“比利门”事件，并且公开承认“总统的一个亲属为外国政府承担任何义务都是不适宜的”。1980年8月4日，他向参议院特别小组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说明白宫计划通过比利解决美国人质问题是个错误的判断。晚上，他又举行了一次电视记者招待会，他发表长篇声明，并回答了一个小时之久的提问。他强调，比利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没有施加任何影响。他说，无论是比利还是政府官员，一旦破坏法律，就要受惩罚，如果比利破坏了法律，理应受到惩罚。

卡特的报告和记者招待会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它给来自民主党内部和共和党的攻击以强有力的回击。虽然8月4日，参议院特别小组委员会开始对“比利门”事件举行公开听证会，但在总统的直接参与下，参议院小组委员会最后得出结论，比利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但应该批评他的行为。这个案子就这样了结了。

虽然“比利门”事件没有像“水门事件”那样导致卡特的辞职，但由于卡特的频繁干涉以及白宫对比利的放纵都大大挫伤了选民的自尊心，卡特的信誉也一再下降，他只能背着这个包袱去参加竞选，最终被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德·里根所击败。

“水门事件”和“比利门”事件使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资产阶级两党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内幕。虽然美国标榜自己是典型的民主国家，两党制是民主的真正体现，但实际上他们有时沆瀣一气，有时又为争夺权力展开殊死拼搏，不惜采取诽谤、攻击、谩骂和窃听等违反民主原则、侵犯他人民主和自由权力的非法手段。在这两个案件的调查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暴露了这些手段的卑劣性，也是美国民主的真实写照。

（张春梅撰稿）

## “伊朗门”泄露天机——里根总统有惊无险

### 一、祸见端倪 白宫遭受突然袭击

1986年11月3日是一个星期一，成千上万度完周末的美国人奔走在华盛顿特区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位于这条大街1600号的总统官邸像往常一样宁静。经历了枪击和肿瘤切除的里根总统此时正是春风得意：公众的信任百分点在上升，国内经济在发展，美国的实力不断壮大，似乎足以让这位被称为“罗斯福之后最伟大的总统”的人心满意足了。然而，就在这一天，距美国首都华盛顿9800公里之遥的中东古城贝鲁特却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据该城一家阿拉伯语杂志《船桅》透露，美国违背了自己不和恐怖分子作交易、不插手两伊战争的承诺，一年来一直在向伊朗提供武器，企图通过该渠道与黎巴嫩恐怖分子接触，以换取被他们扣押的美国人质的释放。

1986年11月4日，消息传至美国，几家新闻社同时转引了上述文章；同日，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消息公开予以证实。一时之间，美国朝野舆论哗然，一件把备受美国人民信任的里根总统推上“被告席”的政治丑闻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动作迅速的新闻界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条可以大炒特炒的新闻。一周之后，各种流言蜚语和小道消息充斥了华盛顿的大街小巷。心怀不满而又好奇的国会议员、在显然该当属于其管辖的外交事务上却被排斥在外的国务院、提供武器却又被蒙在鼓里的五角大楼、加上嗅出可疑气味而兴高采烈的记者和莫名其妙的公众，白宫被“包围”得水泄不通。

白宫必须打破沉默，有所动作了。

11月12日，在白宫一间装满通讯设备和保密装置的地下室里，里根向国会两党领导人承认，确有武器运往伊朗，但数量极少，而且绝不是为了交换人质。从议员们的表情和眼神看，没有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谁也没有说话。

11月13日，里根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再次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们过去没有，再说一遍，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出售武器或其他任何东西以换取人质。”民意测验表明，只有14%的美国人相信总统在说真话。

尽管如此，美国曾通过以色列将武器运往伊朗的事实已经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政府上层也出现了裂痕。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格火上浇油，向新闻界坦言“我们从来不支持这种做法”，惹得白宫大为恼火，很多人建议把舒尔茨“踢出”国务院。直接负责向伊朗运送武器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遮遮掩掩，拒不承认事实。11月20日，伊朗行动的策划者、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麦克法兰公开宣称“里根政府用武器换人质是个错误”，白宫上下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根据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的建议，司法部长埃德·米斯受命调查伊朗事件。没想到，这一调查反而使情况更加复杂化了。

11月2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伊朗行动的执行者奥利弗·诺思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受命调查的两名司法人员。早在几天之前，诺思已经得到了麦克法兰的命令，和他的女秘书弗思·霍尔一起把18英寸厚的文件和备忘录塞进了碎纸机。望着可能带来“灾难”的纸片变成一堆碎屑，诺思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23日下午2时，司法部长米斯走进了诺思的

办公室。两人随便聊了一小时，米斯突然问道：“有没有什么危害到总统利益的？”诺思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那么，这是什么？”米斯递给他一份长达9页的文件。诺思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1986年4月间他写给波因德克斯特的一份备忘录，里面详细记载了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计划。更要命的是，其中还提到了出售武器得到的钱的一部分将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妈的，”诺思不由得在心里骂了一句，“这正是我想要销毁而没有毁掉的东西。”

已经晚了。11月24日，米斯走进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的办公室：“我必须立刻会见总统！”他先对里甘透露了这个惊人的发现，“这将是一个坏消息！”当两人一起走入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时，里根正搓着手站在办公桌前等着他们的到来。

米斯开门见山但却一语惊人，他向总统证实：经过调查发现，伊朗人从美国手中购买了价值3000万美元的武器，而美国政府只收到了1200万美元，其余1800万美元根据诺思的坦白，已被转交给了尼加拉瓜反桑地诺的武装分子。

里根的脸色霎时由红转青，就连里甘也感到一阵战栗，全身的血液都冻结了：“我的上帝，这可真是一次可怕的打击！”

事情已掩盖不住了。

11月25日，面无表情的里根总统与米斯走入白宫新闻发布室。面对成群的记者和闪烁不停的闪光灯，总统首先宣布：关于向伊朗出售武器一事，已由司法部长进行了调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中将已辞职，诺思中校已被解除了职务。说完这些，里根转身走出了房间。米斯走近麦克风，用缓慢低沉的声音宣布：“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军火，而以色列把这些军火转给了——实际上是出售给了——伊朗的代表。在此过程中，伊以交易的一部分款项被取走，转到了中美洲反对桑地诺政府的力量手中。”

“这是什么意思？”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实记者们一时没有转过弯来。突然，人群骚动起来：“这是丑闻！”“又有一个总统要自行毁灭了！”“我的上帝！真不可思议！”记者们开始了连珠炮似的提问：

“总统是否知道此事？”

“在我向他报告之前，总统对此一无所知。”

“那么谁知道此事？”

“美国政府中唯一确切地了解此事的人，唯一的人，是诺思中校。”

至此，“伊朗门”丑闻公开曝光。此后，新闻界穷追不舍，政府内部沸沸扬扬，当事人互相推诿，公众困惑不解。然而。这一切不过刚刚开始。

## 二、寻根问底 谁该对此负责？

埃德·米斯的声明向公众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可是盒子里的秘密却不能让公众满意。舆论强烈要求澄清事件责任人问题。像对待“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一样，政府高级官员的反应就是：让我们成立个委员会来查查这一切吧！

1986年11月25日，米斯新闻发布会的同一天，由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托尔任主席，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前国务卿埃德蒙·马斯基为成员的“伊朗门”事件总统特别调查委员会成立，这就是通常所称的“托尔委员会”。委员会受命调查事件真相，并在60天之内提交一份报告。在此期间，委员会可以查阅一切文件，询问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工作人员的任何一个人。

可惜这种特权并未给调查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大部分的有关文件已被做了手脚，而且许多命令是口头发布或认可的，没有书面证据。当事人的态度更是千奇百怪，里根总统早已明确否认他知道此事，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拒不开口，唯一的证人就剩下罗伯特·麦克法兰了。

麦克法兰是伊朗计划的始作俑者，在事情败露之后，他转而向新闻界承认这一计划是个错误，并且否认知道武器交易款被送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一事。他向“托尔委员会”承认，他曾几次与总统讨论过向伊朗出售武器以争取人质获释的建议，并且得到了总统的口头批准。但是在另一个场合，麦克法兰又表示总统并不了解内情。如此反复、矛盾的证词使调查委员会如坠云雾。

尽管如此，调查还是有了突破性进展。诺思和波因德克斯特销毁了的文件的副本被发现，给揭露真相带来一线希望。而坚决否认参予尼加拉瓜行动的麦克法兰却因此被逼上绝路。文件的发现表明，他确曾支持并参予了这一行动。1987年2月9日清晨，在去“托尔委员会”作证之前，麦克法兰吞食了25—30片镇静剂企图自杀，幸被及时发现送往医院，麦克法兰的行为在公众和调查人员的眼里成了一个悲剧性形象。

经过3个月的努力，1987年2月26日，“托尔委员会”正式向里根总统递交了一份长达300页的调查报告，其中包含了对50多位高级官员询问的证词。报告称：总统出于对美国人质的关切，采纳了一些高级助手的“错误建议”，致使秘密执行的政策与总统制定的公开政策背道而驰；总统要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动及其后果负责云云。总统的责任被定位于“不知道白宫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话锋一转，转而指责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在事件发生后处理不当，造成白宫的混乱，应负主要责任。这对已经备受新闻界围攻之苦的里甘无疑是火上浇油。2月27日，托尔报告公开发表的第二天，愤怒的里甘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亲爱的总统先生：我特此辞去美国总统办公厅主任职务”，离开了白宫。

托尔报告完全开脱了总统的责任，把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的行动定为没有上司命令的单独行动。但是这两人在调查过程中一言不发，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在保护什么大人物；加上麦克法兰的证词前后矛盾，更使事件混淆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公众仍不知情。无怪乎舆论把这个报告称为“伊朗门”事件中的“重要一章”，而不是“最后一章”。

与总统特别调查委员会同时开始工作的还有国会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和

1987年初开始的特别检察官的刑事调查。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的白宫官员无可奈何地承认：“伊朗门”事件的阴影将继续笼罩首都。

1987的3月18日，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宣布举行一次听证会，并批准给予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有限豁免权，即他们2人在调查过程中所作的证词不得用于刑事调查和起诉中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国会是想通过这种办法逼迫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开口。

1987年5月5日，“伊朗门”事件的中心人物之一、退役空军少将西科德作为第一个来到国会调查委员会作证的人，他承认参与了将美伊武器交易额中350万美元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一事，并且说：“我还认为，里根政府了解并批准了我的行动。”

从5月5日到6月中旬，国会调查委员会结束了第一阶段的调查活动。除西科德外，先后有17人到国会作证。委员会主席汉密尔顿为此大发感慨：“我们目睹了美国国会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一次听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麦克法兰、承包商哈基姆、西科德和诺思的私人秘书霍尔的证词。麦克法兰作证说，里根总统“曾多次表示不愿背弃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哈基姆承认他曾用武器交易款为诺思的家属在瑞士银行存了一笔“抚恤金”。霍尔认为，诺思中校命令她销毁大量秘密文件“肯定是有充足而正当理由的”。

1987年6月23日，国会听证进入第二阶段，准备调查总统在此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里甘、温伯格、舒尔茨均被传唤到国会作证。里甘一反他在一月份对“托尔委员会”的证词，承认他与里根总统都十分清楚1985年11月向伊朗运送“隼”式导弹一事；温伯格则说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向伊朗出售武器，但是没有来得及阻止这一计划的实现。最引人注目的两位关键性人物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尤其是后者）在听证会上“大放异彩”，成为全美国关注的焦点。

1987年7月7日，诺思在他的律师布伦丹·沙利文的陪同下，身着海军陆战队军服走入了国会“秘密会议厅”，几十名记者和新闻评论员像一群等着猎物送上门来的狼一样瞪起眼睛、竖起耳朵，手里还一刻不停地作着笔记。

诺思在此之前一直保持沉默，此刻在听证会上却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大谈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民主自由的信念，令5000万美国电视观众大受感动。由于西科德等人的作证和国会给予的有限豁免权，加上律师的帮助，诺思在听证会上处于有利地位。他动辄援引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该案规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被告自证其罪），拒绝回答牵涉重要情节的内容，一遇到关键问题就以“奉命行事”或“记不清了”搪塞过去，回避了议员们的尖锐提问。但是，诺思的证词还是隐约透露了几点重要情节：

1986年1月起，他曾起草了5份备忘录送给波因德克斯特，要求总统批准把向伊朗出售武器的部分款项转给尼反政府武装。后来他四出活动执行这一计划是因为彼从未告诉他计划遭到了否决。5份备忘录中的4份已被他销毁，剩下的一份也被撕去了封面。诺思表示他已记不起备忘录上是否有总统的批示。

1986年11月中旬，诺思参与伪造了一份伊朗行动大事记，以帮助白宫逃避国会调查，而且据他说，麦克法兰、波因德克斯特、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和司法部长米斯等人，都知道这一掩盖活动。

凯西已于听证会召开之前，1987年5月6日因患肺炎去世。在“伊朗门”事件败露之初，这位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声称自己在伊朗计划中“作用甚小”，

随着事情进一步揭露，中央情报局在其中的活动已是不言自明的了。但是凯西的突然去世，却使许多事情无从对证。

这样，事情仍停留在差不多开始的地方，证词所能“澄清”的事实是：

第一，1985年7月里根总统口头批准通过以色列向伊朗运送第一批反坦克导弹，目的是与伊朗政府内的温和派建立联系；1985年11月，凯西送给麦克法兰一份备忘录，建议向伊朗出售武器，以换取扣押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获释。随后，波因德克斯特将此备忘录亲自交给里根总统，总统12月5日签署了该文件，授权向伊朗出售武器。事情败露后，该文件被波因德克斯特亲手撕毁；

第二，与伊朗武器交易利润的1800万美元中的350万美元通过一家瑞士银行的帐户转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350万美元用于向伊朗运送武器，100万美元用于其它开销，800万美元仍留在瑞士帐户上，另有约200万美元去向不明；

第三，援助尼加拉瓜行动计划最初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诺思提出的，波因德克斯特自作主张，批准了这一建议。但是他又说，如果他又向总统提出这一要求，总统是会批准的。并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执行总统的中美洲政策”。

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丹尼尔在作总结发言时说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故事已经讲完了。”

8月12日晚，里根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以便为早已落幕的“伊朗门”事件再加上一个尾声。在讲话中，里根第一次承认对“伊朗门”事件负有“领导上的责任”。但是人们注意到，尽管里根反复声明伊朗武器交易是“一个错误”，但他从未直接说过是他自己犯了这个错误，以及他个人将对这项政策及其结果负责。在谈到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一事时，里根再次否认他事先知道此事。由于国会调查委员会没有取得直接证据来证明总统是否说慌，公众只能暂时承认总统的“清白”了。

11月18日，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发表了最后调查报告，认为里根总统应对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和将所得款项转移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事件负根本责任。这份长达690页的报告不仅详细叙述了伊朗—尼加拉瓜事件的经过，而且揭露了政府高级官员在事发后企图隐瞒、欺骗公众的行为以及对法律和宪法的蔑视。

调查报告发表后，白宫新闻发言人说，里根总统已认识到其下属在执行政策中犯有错误，并愿意承担责任。发言人说，“伊朗门”事件已经过去，应当向前看，去解决更为紧迫的问题。

至此，这次历时11个月、耗资400万美元的马拉松式的调查。在听取了500多人的证词、分析了30多万份文件、举行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听证会之后，终于有惊无险地结束了。是真相大白水落石出？还是悬而未决真伪难辨？答案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旁人无从解答了。

里根总统避免了当年尼克松被迫辞职的不光彩结局，安然度过了他任期的最后一年半。而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等人却没有这样的“好运”。“奉命行事”和“记不清了”可以搪塞过国会议员的质询，却不能使他们逃脱法律的审讯。

从1987年初开始的刑事调查由前司法部长、美国律师协会主席沃尔什主持。与国会调查一样，司法调查也是阻力重重。麦克法兰再次以一纸“认罪

求情协议”逃脱了指控，转而成为控方的主要证人。

特别检察官沃尔什知难而上，不屈不挠，终于在 1988 年 3 月 16 日以欺骗政府和掩盖非法活动等罪名，向波因德克斯特、诺思、西科德和哈基姆 4 人提出共计 23 项罪名的指控。

在国会和在法庭上判若两人的诺思坐在被告席上沉默不语，听任原告“竭力让每一名证人讲关于他的骇人听闻的事情”，而他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埋头记笔记，“像中世纪的僧侣一样乱涂乱画”。在共计 23 项罪名中，诺思一人独占 16 项，成为案件的重头戏。

1988 年 6 月，格塞尔法官决定对 4 人的案子分别处理，西科德和哈基姆在指控减少后表示认罪伏法；波因德克斯特上了法庭，被判处 6 个月监禁。

1989 年 1 月，诺思案即将开庭，由于涉及“国家安全”，需传唤总统与副总统出庭作证，白宫与诺思的律师冲突又起，使一度沉寂的诺思案再次成为公众的热门话题。检察官以向国会提供假情况、私自篡改、转移、销毁政府文件、妨碍国会调查等 14 项罪名向诺思提出起诉。诺思对于其中最为重要的两项指控：阴谋罪和盗窃政府财产罪拒不承认，坚持要求引用白宫秘密文件和总统、副总统的出庭作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里根总统拒绝了赦免诺思的请求，同意考虑以书面形式答复“合理的问题”，布什副总统稍后也做了同样的表示。但是白宫及司法部都坚决反对传唤总统，称此举“史无前例”。格塞尔法官要求白宫提供不加任何删节的重要文件，以显示“审判的公正”。司法部长索恩伯格再次设置障碍，称文件关系到“国家安全”，不能公开。原告缺少证据，被告又咄咄逼人，万不得已之下，沃尔什检察官放弃了这两项主要罪名。《华盛顿邮报》对这一波折发表社论，认为这种避重就轻的审判，不能解开笼罩在“伊朗门”事件上的谜团。

1989 年 7 月 5 日，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对诺思案作出最后裁决，12 项指控中 9 项被确定无罪，只剩下妨碍国会调查、销毁、涂改或转移文件等 3 项罪名。法官据此判处诺思 3 年监禁，罚款 15 万美元和进行 1200 小时的社区服务。

诺思的律师布伦丹·沙利文律师为撤销全部罪名继续奋斗。1990 年 7 月 20 日，3 项罪名中又有两项被取消。1991 年 9 月 16 日，诺思最后一次走进地方法院，5 年来从司法部长办公室开始的恶梦在 10 分钟之内走到了终点。格塞尔法官只是简单他说了四个字：“案件撤销”。

“一切终于结束了。”诺思作为一个自由的美国公民走出了法庭。“伊朗门”事件似乎也可以降下帷幕了，因为主要演员部已经退场。

然而，“案件撤销”四个字并不足以澄清事实真相。真正的问题并没有在听证会上明确提出，更没有在法庭中得到解答。

### 三、否认一切 罗纳德·里根：“我记不得了。”

“水门事件”以来，“总统知道多少？”“总统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已成为新闻界对白宫重大丑闻发生后使用频率最高的提问。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水门事件”最严重的过失，即导致尼克松总统不光彩的下台的过失并非窃听本身，而是事发后的掩盖。“伊朗门”事件之所以成为丑闻，也是因为其中包含的大量隐瞒和掩盖活动。事件刚一暴露，全国响彻了那个著名的“水门问题”：总统知道多少？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不仅是公众和舆论的焦点。也正是此案扑朔迷离之处。

公众要求知道真相，而“真相”不仅包括出售武器和款项转移的具体行为，还包括导致这一行为的政策错误及由此而引起的法律、道义后果。推为这一错误负责？诺思这样一个小小的中校可能在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私自行动吗？这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又一秘密行动吗？我们把武器卖给了被我们称为恐怖分子的伊朗人，他们真的能解救我们的人质吗？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不是违反法律吗？总统触犯法律了吗？总统向公众撒谎了吗？……问题越多，问题的答案也就越多；正如事实揭露得越多，我们距离事实真相也就越远一样。

有趣而奇特的是，每个当事人都对上述问题给予了答案，有时相同，有时矛盾。让我们从总统开始吧。

70%的法国人认为，他们不会选举一位演员作自己的总统。但在1981年大概有50%的美国人却这样干了。他们以信任和期待的心情迎接美国历史上第40位总统，相信他能够“创造奇迹”。而这位总统本人对此也颇为自信。在他任期的前几年，他复兴了美国经济、入侵了格林纳达、轰炸了利比亚、改善了美苏关系、度过了人质危机。然而就在这些成就的光环之上的一点污迹却几乎毁了他的前途。

1986年11月，当“伊朗门”丑闻刚刚曝光之时，里根并未显得惊慌失措，然而随着事件调查的深入，他的记忆力与自信心都开始“衰退”了。

里根的第一反应是否认一切，坚持自己对向伊朗运送武器和这次交易是为换取人质获释一事毫不知情。而对武器交易的收入一部分被转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一事更表现出茫然无知甚至恼火的态度。米斯调查还未开始，里根就开始指责新闻界，认为“新闻报道中关于人质和伊朗的整个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已经完全不可控制，媒体好像是想要制造又一个‘水门事件’。”同时，又以财政预算、控制军备等政府“重要工作”有待完成企图转移新闻界和公众的视线。

1987年1月16日，里根对托尔调查小组说，他曾反对1985年11月向伊朗运送“隼”式导弹的行动，这些导弹后来被运回了以色列；2月11日他又改变口吻，说他和里甘都已不记得运送导弹这件事了。但是如果有人说他曾批准过这一行动，他也无法予以否认。2月20日，托尔报告发表前6天，里根致信托尔，声称“我没有个人笔记或记录可以帮助我回忆起这件事。”（指1985年8月批准或没有批准向以色列运送武器一事。）“因此我的回答和明了的事实是：我就是不记得——其他没有什么好讲的了。”

时隔3年之后，在他的回忆录中，里根却对伊朗行动大书特书，不仅详细谈到麦克法兰和波因德克斯特向他建议向伊朗运送武器以换取人质获释一事，并且坚持说“我不认为这件事是一项‘武器换人质’交易，而且从来不

曾这样考虑过，因为事情不是这样。”

他搬出了他那套“人质理论”：我们当然不能与恐怖分子作交易，因为这会助长他们的气焰。问题是，这就像我的一个孩子遭到了绑架，有人要求给赎金，我们当然不会付；但是如果有人能与绑架分子接上头，使我们不答应他们什么条件就能把我的孩子弄回来，这种事我肯定会干。“如果那个人把我的孩子弄回来了，我给他一点报酬是完全合适的。这不是给绑架者赎金。”

唐纳德·里甘对此哭笑不得，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恐怕这和把武器卖给伊朗人（让他们去搞恐怖活动）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总统的“同情心”占了上风，使他“敢于”冒违法和违背誓言的风险。妙就妙在，里根在伊朗武器交易问题上大作文章，反复描绘人质的生活是如何痛苦，总统对此是如何关切，仿佛一切只是由于总统对人民的关切之心而造成的。错误演变成总统情感上的弱点，似乎稍稍能为武器交易留下一点颜面吧。

那么款项转移呢？总统是否事先知道？

诚然，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已为此承担了责任。前者声称他并没有将此事汇报总统，因而“总统并不知情”，但是听证会前后却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证词。

卡尔·钱内尔是全国保卫自由基金会的负责人，该组织由诺思筹建，负责筹集民间捐款，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钱内尔承认，他与诺思合伙，而他的工作是负责安排捐款人与总统见面的机会。仅1985年初，此类会晤就有7次之多。

麦克法兰证实，里根曾对中美洲某国首脑（据说是洪都拉斯）做工作，要求该国政府放行被扣的一批运给尼反政府武装的武器。他还承认，他向总统通报了“他所能得到的有关援助尼反政府武装”的一切重要情报，前后达10余次之多。

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证，这些说法部在波因德克斯特承担全部责任后被湮灭了。听证会并未确认里根知道此事，里根闻知结果，耸了耸肩膀说：“这算什么新闻？7个月以来我一直这样说。”并不止7个月，5年以来（指从1986年至1991年里根出版其自传《一个美国人的生平》），里根始终坚持对款项转移一事毫不知情。他描绘了最初听到款项转移一事的反应：“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彼因德克斯特和诺思做这类事情是不会不告诉我的——这里边一定有什么地方搞错了。”他再三强调，援助尼加拉瓜反桑地诺派（他从不把他们称作反政府武装，虽然甚至在白宫内其他人全都这么说）是绝对必要的，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抛弃反桑地诺的“民主力量”，“但是任何人，包括总统在内，都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对于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的行动，里根表现出既惊讶又理解的态度，他说：“我起初的反应是，啊，也许他们以为自己做了应当做的事，并且努力要保护我，我对他们两个人有一种同情之感。”而公众并不这么认为，这使这位总统“感到不顺心”，因为他“讲出来的话没人相信”。

许多人会问，就算总统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能对事情知道得更多一点呢？里根为自己辩护说：“中美洲只是我当时要做的许多事情中的一桩……我手头还有其他很多的事情，一个总统根本不可能把他所有下级日常办的事都记下来。”

因此，尽管里根在书中许诺：“在这本书里，关于伊朗——反桑地诺派事件、我一定要把我记得的一切都讲到。”但是由于有了上述种种原因，里根也不得不承认，对于整个事件“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得不到全部的答案。”

“总统曾企图掩盖这件事吗？”很多人这样问。

里根会十分痛快他说：“哦，不，当然没有。”“我曾经一再告诉他们（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讲出实情，不要做任何保护我的事。”

诺思在里根的自传中读到这一段时大为吃惊：“你们收到过这样的口信吗？”他问布伦丹·沙利文。“没有。”

1987年1月的某一天，保罗·拉克索特——总统最亲密、最长久的朋友给诺思辩护小组的一位律师打电话，建议诺思公开声明总统不知道“转移”一事。在此之前，得克萨斯的大企业家、总统竞选的主要捐款人佩罗特亲自来找沙利文。“你看。”他说，“为什么臭利不了这件事？他可以对联邦调查局的人说总统不了解内情。如果他蹲了班房，我会照顾他家里人的。”

是谁派他们来的？他们只代表他们自己吗？

1986年11月25日，诺思在被公开解职后几小时接到了总统的电话，总统称他为“民族英雄”。此后，总统又对新闻界反复使用这个词。这是什么意思？里根写道：“我想到了他在越南的服役。”可是，总统根本不可能知道一个中校在越南战场的记录，诺思的军事档案在他被解职之后很久才被调入白宫。诺思一直认为这句话是对他执行伊朗——尼加拉瓜行动的最高赞扬。可是总统为什么这样说呢？

而另一句话，使真相更加模糊了。

“奥利，你得理解，我过去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总统不说：“奥利，我不知道这件事。”却用如此婉转的话呢？这句话让诺思琢磨了整整5年，就在今天，诺思和每一个读到这句话的人大概仍然是困惑不解的。

#### 四、白宫争吵 纷纷洗刷自己指责别人

1986年11月，就在“伊朗门”事件开始被新闻界层层剥皮的时候，白宫内部的矛盾也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唐纳德·里甘，这位原华尔街上的金融巨子、里根第一任期内的财政部长、第二任期内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在风暴来临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在新界、国会，甚至白宫竟有那么多的敌人，似乎每一个人都要置他于死地。

新闻界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里甘对“伊朗门”事件是否知情。报纸开始用“里甘参与了军人交易”这样的标题大造舆论。更激烈的是有些报纸把“参与”改成了“策划”，开始攻击里甘应为武器换人质事件负责。每逢国会议员造访白宫，必有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不认为应该有人为此事负责，需要赶他出门吗？”一些议员含糊其词，另一些则表示很有必要。随之而来的问题往往是：“应该是里甘吧？”

里甘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他能告诉人们真相吗？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白。

白宫办公厅主任主要负责白宫日常事务和行政管理，权力很大，里甘也被人称作“白宫大总管”。在记者的笔下，他不仅控制了白宫的人事、总统的工作日程，而且爱出风头，经常摆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架势，还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到了1986年的11月，首都华盛顿盛行的是流言蜚语和小道消息。有人说波因德克斯特的活动曾向里甘报告过，因此他该为此负责。里甘再三解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动是独立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文件都是亲自交给总统，不经他之手，当然也不经他过目。但记者们根本不理这一套，用《华盛顿邮报》的话说，里甘“认识落在白宫草坪上的每一只麻雀”。“独裁”、“专断而又傲慢”的里甘好景不长了。

“伊朗门”事件刚一露头，敏感的里甘立刻意识到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正如他在听证会作证时所承认的那样。他与里根完全了解1985年和1986年几次向伊朗运送武器一事。他的观点是：既然事情早晚要泄露，那么不如趁早坦白，主动澄清事实。这是个策略问题，肯尼迪当年这样做了，挽回了声誉；尼克松没有这样做，名誉扫地。可是事情并未如他所愿，所有人在一开始都竭力隐瞒事实，弄得这位白宫大总管也是出尔反尔，一会儿说总统不知道。一会儿又说总统知道。终于到了1987年6月，里甘在听证会上最终承认了里根知晓向伊朗出售武器这件事。但是对于事件的第二部分——款项转移，里甘这样认为：“不论罗纳德·里根对这件事的回忆如何，也不论别人对此事的回忆如何，我相信，我所认识和为之工作的总统在其思想和行动上绝不会参与军售货款转移的计划。”

那么有人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吗？

“没有，”里甘这样说，“我一直坚持让总统站出来说出真相。”的确，里甘在事发后极力主张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公开讲话。但是这却与极力不让里恨抛头露面的第一夫人发生了冲突。

一件事总会带来正效应和副效应，或者叫额外的效应。“伊朗门”事件的曝光就像拉开了舞台的帷幕，白宫内部的勾心斗角突然暴露在公众面前。

南希·里根和唐纳德·里甘的矛盾由来已久。这位在自己的自传中总是把里根称为“罗尼”的第一夫人，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工作上都要“无微不至”地“关心”着自己的丈夫。可能是深感自己的力量微弱，南希不得不借

助一位女星相家来加强这种“关心”。琼·奎格利是旧金山的一个女星相家，在一次偶然的场合里，第一夫人结识了琼，并很快信任了她。第一夫人亲切地称她为“我的朋友”。这位“朋友”曾经预言过欣克利刺杀总统，预言过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被炸，甚至1986年11月和12月会发生“可怕的事件”。南希对此深信不疑。每个月，南希会交给白宫行动处主任比尔·亨克尔一张表，上面用彩色符号来表示吉凶：绿色表示吉日，红色表示凶日，黄色表示“凶吉不定”。总统的日程安排：外出访问、公开演讲或与外国领导人会面的日期就由这张时间表来制订。谁能够想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首脑会晤竟掌握在一个女星相家手中呢？里甘用嘲弄的口吻谈到这件事，显然她“已成为我工作和国家高级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了”。

正因为如此，当里甘强烈要求总统在事件曝光后作出公开表态时，遭到了南希的坚决反对。因为她的“朋友”说总统那几日“不宜出行”。里甘与南希的矛盾公开化了。尤其在新闻界开始攻击里甘之后，白宫东翼（总统夫人及其工作人员的办公地及住所）开始掀起了一场赶走里甘的运动。报纸添油加醋地报道里甘与第一夫人失和的消息，并引用消息灵通人士或“总统身边的人”的猜测、暗示或公开提出，里甘快被轰出白宫大门了。

1987年2月26日托尔报告公之于众，将主要责任归咎于里甘，指责其对白宫管理不善造成总统的失误，这给了里甘致命一击。虽然他早已做好了辞职的准备，但是没想到里恨夫妇竟然不给他面子，没有事先通知他，就向电视台透露了他被解职和霍华德·贝克将出任办公厅主任的消息。里甘那有名的脾气如火山爆发，他草就了辞呈，在15分钟之内怒气冲冲地走出了白宫大门，一去不复返。

拉里·斯皮克斯在他的回忆录中但言了对里甘遭遇的看法。在他看来：“里甘只是华盛顿无数政治替罪羊中的一只。作为一名出色的办公厅主任，他直言力谏完全是为了维护总统利益，但操之过急，冒犯了不容他人对总统指手划脚的第一夫人，因此付出了惨重代价。”“现实的情况是，高级官员中必须有人替总统受难，以把伊朗门丑闻抛到身后……”这一回被“抛到身后”的不是丑闻，而是唐纳德·里甘。

第一夫人终于如愿以偿。但是新闻界也并没有对她名加“优待”。舆论风暴之中，对南希·里根干预政务的指责也很多。在此之前，人们就普遍认为南希是里根政府中真正掌握人事实权的人，她先后促成了不少政府要员的下台，如前国务卿黑格、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和克拉克以及前内政部长瓦特等人。在与唐·里甘的较量中，第一夫人显然又占了上风。

在南希·里根的回忆录中，“伊朗门”事件并不占很大篇幅。反之，它的作用仅仅是把里甘的不称职暴露到极点。南希显然认为。从里甘当上白宫办公厅主任的第一天，就埋下了一场政治灾难的祸端。她极力描绘了里甘在白宫的独断专行，对待她以及白宫工作人员的粗暴态度，在她看来，里甘不适合他的工作，因此当“伊朗门”事件发生时，里甘就应该为此负责。而总统呢？南希·里根坚持认为总统对此一无所知。她责怪波因德克斯特没有把全部真相告诉总统，又责怪里甘没有及时了解所发生的事，甚至不可思议地用较多的篇幅来写威廉·凯西脑部的肿瘤，想以此证明凯西是“在一个他不能清楚地思考的时期卷入伊朗一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事事件”的。这样，总结为一点，第一夫人眼里的“伊朗门”事件的主要原因就是“罗尼手下的人没有为他做好工作”。

第三个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证人”是拉里·斯皮克斯，前白宫新闻发言人。斯皮克斯为里根当了6年的新闻发言人，可以说对政府内部情况了如指掌。他称自己不是作为政府中的一分子，而是作为一个记者来观察、描绘白宫的。

在他看来，导致“伊朗门”灾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内部互不信任、不协调合作。政府就像筛子，每天漏出成堆的秘密。出了事后，国务院指责白宫，白宫又抱怨国防部，而大家又都逃脱不了中央情报局的责备。麦克法兰和波因德克斯特不懂外交事务却偏偏冒充内行；凯西和诺思醉心于秘密活动，凡事都想瞒过国务院和国防部；混乱之中，政府内部又不团结一致，反而互相埋怨、推卸责任……种种原因才使丑闻越演越烈，几致酿成大难。

斯皮克斯一方面证实了里根确曾口头批准了麦克法兰等人的行动并签署了3份秘密报告，时间分别是1985年12月5日、1986年1月6日和1月17日，内容即批准向伊朗运送武器以换回人质。另一方面，他又说，总统曾亲口向他证实，他对货款转移一事确实一无所知。从而基本上支持了里根的说法。

斯皮克斯对诺思并无好感，在他笔下，诺思是一个“十足的军人”，“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不可捉摸的味道”，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他“刚愎自用、油嘴滑舌”的性格，斯皮克斯从不信任诺思。虽然诺思一再宣称他与总统接触很多，经常亲自向总统汇报情况。但据斯皮克斯回忆，总统与诺思的单独会面完全不存在，1985—1986年间两人同时在场的活动只有20次左右，而且都有第三者在场。这样看来，诺思几乎像一个虚张声势的狮子，但是对这样一个角色，里根为什么要称他为“民族英雄”呢？斯皮克斯并未多作解释。但是在谈到诺思的责任时，他与里甘的看法颇为相似，认为诺思一定是误以为总统知情，所以才能放手行动。这其中的关键性锚误就在于波因德克斯特，是他向总统隐瞒了实情，又转而对诺思保证总统批准了行动计划。这样，诺思对此事的责任减小了，波因德克斯特似乎又成了真正的“罪魁祸首”。

波因德克斯特，1985年12月麦克法兰离任后接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不仅接替了麦克法兰的职务，也接替了他的秘密工作——向伊朗运送武器。后来，波因德克斯特又在诺思的建议下组织了用出售武器的钱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活动。作为“伊朗门”事件的直接策划者，他在事情暴露之初，就采取了完全错误的立场：隐瞒事实——对一切人隐瞒，对新闻界、对国务院、对总统本人。以至谁也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约翰，告诉我，”总统有一天这样问道，“我们到底向伊朗运送了多少武器？”

波因德克斯特从烟斗里吐着烟圈，不紧不慢地回答：“我想，一共也只能装满一架运输机。”

站在一旁的里甘有些疑问，他请波因德克斯特再核实一下。后者不好意思他说：“我是指一架C5A型飞机，大概相当于两架普通飞机的装载量。”这就是典型的波因德克斯特的作风——镇静自若，但是守口如瓶。甚至在米斯发现货款转移时，他仍然保持了风度。当里甘带着总统希望他辞职的命令找到他时，他正在按照平时习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吃火腿蛋和面包，甚至请里甘也尝尝咖啡。

但是，镇静的风度并不能掩盖基本事实。早在“伊朗门”事件之前，波因德克斯特就公开对舒尔茨说谎，否认美国在向伊朗运送军火；当国会询问

诺思关于向伊朗运送武器一事时，诺思对国会撒谎，波因德克斯特却称赞他“干得好！”丑闻暴露后，他最初否认知道款项转移的细节，但证据很快表明是他直接指挥了诺思的行动；在国会听证会上，素以记忆力超群而闻名的波因德克斯特竟先后 184 次请求质询者重复问题，故作懵懂。

然而，波因德克斯特在名誉扫地之前仍然做了件让白宫大感放心的事。在听证会上，他承担了一切，以一种军人式的宽宏大度的牺牲精神承担了一切。“整件事情到我这里为止”，他宣布，“我作出的决定，我觉得自己有权这样做。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确信，总统最终也会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的。”他又说，总统一贯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因此这一计划肯定会得到批准。而他之所以有意不报告总统，是为了以后总统可以明确地否认知道此事。这种在事前保护总统的做法是否延用到了事后呢？波因德克斯特为总统做了所能做的一切：营救人质、支持反对派和免除责任，而他所得到的仅仅是 6 个月的监禁。

这样，我们已经了解到除诺思以外几位主要当事人的看法了。他们代表着这样一种观点：运送武器给伊朗和把钱交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这两件事本身的出发点是良好的，其目的不外乎是解救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和支援尼加拉瓜“民主力量”的“正义斗争”。但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有害的和非法的。它之所以实现，在于总统的高级助手向总统提出了“不适当”的建议并且在总统不知情（指后一项内容）的情况下私自付诸实施，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相信这种解释。奥利弗·诺思就不相信，他有自己的话要说。

## 五、诺思中校 “替罪羊” 还是 “民族英雄”

关于奥利弗·诺思其人，人们似乎各执一词，褒贬不一。这位前海军陆战队中校、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一夜之间成了全美国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伊朗门”事件给予一个人的生活影响之大充分地体现在诺思身上。

1986年11月25日，诺思在自己的家中听到司法部长米斯宣布了解除他的职务的命令。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名字前面被冠以了“唯一的知情者”这个可怕的字眼。

第二天一早，当他像往常一样6点钟出门遛狗时，数十个早已恭候多时的记者举着摄像机和弧光灯冲上前来。猎犬麦克斯不知所措，狂吠起来。这招儿在最初几天吓退了几批记者。但却并非长久之计。从1986年11月26日到1987年7月听证会结束的前后228天里，记者们每天早上5点准时守候在诺思的房子外面。他们星期天来，感恩节也来，甚至连圣诞节也不放过。“有一次我开车出门，没走几步车胎爆了。我下车来换车胎。记者们也呼啦一下围上来，不是帮我的忙，而是拍摄我换车胎的镜头。”碰到这种事。谁又会感到愉快呢？

记者们像“一群蝗虫”粘在诺思和他的家人身上，而流言蜚语则直接浸入了诺思的卧室。报纸、电视和广播把从各种渠道挖掘出来的小道消息作为重要新闻播发，有时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有人谣传，诺思和他的金发女秘书曾计划一起逃往沙漠；诺思为了给反政府武装筹资，参与了贩毒……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被卷进了这场漩涡。他的4个孩子泰特、斯图尔特、萨拉和多宁，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5岁。诺思和妻子订了规矩：家里不许看电视新闻。5岁的多宁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些事。有时他在电视上看到爸爸，会高兴地跑去告诉妈妈：“我看到爸爸了！”贝特茜·诺思总是这样对他说：“宝贝，把你的耳朵捂上，去把电视关掉。”

国会调查和司法调查开始之后，他的日子更不好过了。调查人员传唤了他的每一位朋友和邻居，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诺思夫妇吵架吗？他们外出旅行吗？诺思夫妇不在时，养马、猫和狗需要多少钱？等等等等。

1987年初，联邦调查局获悉，可能有人准备暗杀诺思。五角大楼有人建议把诺思全家搬到阿拉斯加，多亏诺思的律师沙利文律师出面才阻止了这件事。

事情也许有好的一面。当诺思的脸一连6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多了许多素不相识的同学、战友、结婚介绍人。许多早已失去联系的越战老战友从远方寄来了贺卡，许多从未见过面的人给他打电报祝贺他和妻子结婚20周年。7月9日，仅《华盛顿邮报》就刊登了23张诺思的照片。一时间，诺思热席卷全国。出现了奥利弗·诺思T恤衫、纪念章和贴签，甚至诺思洋娃娃；有人举办比赛，内容是看谁长得像这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

诺思徒劳无益地想躲开这一切，可是时至今日，无论他走到哪里，仍总会有人走上来说：“你长得太像O·诺思了。”“许多人都这么说。”诺思有时会用这句话蒙混过关。但是经常，他不得不掏出笔来为对方签名。

这些事也许与“伊朗门”丑闻本身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也许这也算是丑闻的一个“额外效应”。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诺思确实是私自行动违

反了法律，他本人理应受到处罚；如果是总统或别的高级官员策划了这一切，那么他们理应负责。无论哪种情况，诺思的妻子和四个孩子都是无辜的。他们没有义务去听任新闻界散布的谣言和恶意中伤，他们有权维护自己的私生活权利。这也说明了新闻自由被滥用的危害。捕风捉影和捏造事实虽然是受谴责的，但是很多记者仍把它作为报道新闻的手段；其次，报道真实准确的消息也并不意味着要日夜守在人家门外，拍摄他们吃饭、散步、上班、上学等等活动。把他人的隐私作为自己的素材，这是对人权的践踏。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诺思所能给予的对事实真相的答案吧——

“五年后的今天，我甚至更加确信：里根总统知道一切。”（摘自诺思回忆录《遭到指控：一个美国人的故事》）

这更像一个宣言，一个对抗美国总统和政府的宣言，它向世人宣布：一个总统对人民说了谎，而一个政府却企图掩盖它。为什么？

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并不是对伊武器交易的唯一受惠者。秘密活动无处不在，而诺思的任务不仅是实施，而且必须要保证每个行动都是得到批准的。每产生一个计划，无论最终实施与否、诺思都要写一份备忘录或打一份情况介绍送给波因德克斯特，以说明钱的用途。他毫不怀疑这些文件都会按惯常方式送给总统。但是波因德克斯特却否认了此事，说他并没有告诉总统。那么总统就不知道这件事了吗？

十分可能的是，会有别人告诉总统。第一种可能性：麦克法兰。这位已卸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对尼加拉瓜行动一清二楚，而且他与里根私人交往甚密，他会对总统说吗？麦克法兰自己似乎也弄不清了。他一会儿说总统并不知情，一会儿又承认他把所有情况都报告了总统，甚至向调查委员会暗示，罪责在最上面。

第二种可能性：威廉·凯西，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他直接参与了伊朗—尼加拉瓜计划，不仅为诺思提供情报人员，还亲自教诺思如何在银行开户、记帐和转帐。他称赞尼加拉瓜行动是“最重要的秘密行动”，或者说“最大的嘲讽”，因为伊朗一直在为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提供军火。凯西会与总统一起分享这个笑话吗？诺思认为，肯定会。

第三种可能性：其他高级官员。政府高级官员虽然多次声称对武器交易毫不知情，可是据诺思讲，对于武器交易所得的钱的余额，国防部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局局长都十分清楚它的存在，他们只是装作不知道这笔钱用到了哪里。

尽管存在着这些可能性，可是谁也无法证实它们，相反，如前所述，更多的是支持总统的人，诺思不过在书中提出几条可怜的疑问而已。为什么？难道唐·里甘真的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下令——“保护总统”？或者，诺思在说谎。事实上，让事件至今仍是谜的正是这个问题：没有人从头到尾都说真话。

里根先否认知道向伊朗运送“隼”式导弹，后来经过帮助显然“又记起来了”；麦克法兰矛盾百出的证词当然更不在话下；波因德克斯特早就是个对国会撒谎的人；唐·里甘也曾对国会说他和总统对武器交易不知情……如果一个人在一个问题上撒了谎，我们还能相信他说的第二个问题吗？（尤其是，那问题更为关键。）

再来看看诺思本人，他是个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人吗？

听证会上诺思的慷慨陈词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同情。人们开始用各种方式对他表示支持：电话、信件、甚至汇款。有人在信中写道：“我也许不赞成你的价值观。但你在听证会上说得很有道理。显然，那些大人物把你推下了水。”还有数以万计的电报：

下一个男孩将起名叫奥利弗。

上帝保佑你。钱随后寄出。

致贺，但不要再引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已是非难分。

你干得漂亮。吻你的夫人及孩子。我 81 岁。

这里的朋友相信你。

最具想像力的行动则是由布伦丹的一句话引起的。听证会上，布伦丹抓住时机，向国会呼吁要求公正。参议员井上答复说：“如果证人有此愿望，请他自己提出来。”布伦丹脱口而出那句名言：“先生，我不是盆景。我是作为律师而来的。这是我的工作。”

第二天，律师事务所盆景遍地，布伦丹的办公室里甚至垒起了花台。

这种效应显然是调查委员会始料未及的。诺思在人们眼中成了英雄，成了勇敢、忠诚的化身，备受美国人青睐。

仅仅招人喜爱是不够的，法庭需要的是证据。而整个过程中，最缺的也就是证据。诺思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总统知道一切；里根和斯皮克斯等人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总统不知道一切。调查成了一个追逐证据的游戏。

诺思和他的律师们曾得到一份十分有趣材料——盘录音带。磁带原是纽约城市银行曼哈顿两个办事处之间工作人员的常规通话录音，其中夹杂着两个男人谈论“伊朗门”听证会的对话。诺思辩护小组的巴里·西蒙到 1988 年夏天才拿到带子，里面的内容令人大吃一惊。两个人中的一个完全熟知“伊朗门”事件内情，他甚至用了“证据确凿。里根知道。”的句子。这正是诺思需要的。1988 年 7 月 28 日，布伦丹和巴里拿着带子找到总统顾问卡尔瓦豪斯和他的一名助手。卡尔瓦豪斯听到磁带，脸色霎时变得苍白。他拒绝了帮助查找带子上的人的要求。由于辨不出声音，诺思不能在法庭上使用这盘磁带作为证据。这盘奇特的录音带就这样不了了之，没有人再提到过它。

里根在赞美声中度过了第二任期，里甘被赶出了白宫，诺思虽然度过了 5 年的艰苦岁月，但这也给了他一个难得的成名机会。有的时候，他想起“伊朗门”事件，也会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总统把他称作民族英雄，却又把他推上了法庭几乎送进了监狱。是民族英雄还是替罪羊？谁也说不清。

就在 7 年以前，即 1980 年，挑战者罗纳德·里根许诺，如果他被选入白宫，他将“昂首挺胸为美国奋斗”。7 年以后的 1987 年，美国人简直不敢相信政府竟然一直在和恐怖分子打交道，“里根总统使自由神像大放光明的灯塔光芒之上，突然罩上了一层在德黑兰焚烧美国国旗的令人难忘的阴影”。

“总统知道多少？”的呼声响彻全国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民意测验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结果表明：对白宫怀有信心的人由 66% 降至 43%；79% 的公众认为里根总统“故意漏掉许多关键以免受进一步批评”。3/4 的美国人深信，里根的错误在于没有将秘密武器交易告知国会。

对于向伊朗运送武器，84% 对 12% 的多数公众持反对态度；67% 的人认为伊朗事件是总统最严重的错误；当白宫一口咬定奥利弗·诺思中校可以不经上司命令就将钱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时，70% 的美国人坚决拒绝相信这种“无稽之谈”。

“伊朗门”丑闻成为里根任内最不光彩的一页。它不仅使里根失去了公众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它使人们对总统处理外交事务、制订外交政策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总统知道多少？”这一问题只不过是公众对事件败露后的反应，而由于某些人的掩盖活动，这也成为“伊朗门”丑闻的最大疑点。但是更深一层的问题被忽略了：政策错误的根源在哪里？伊朗——尼加拉瓜计划是怎样出笼的？为什么计划泄露时会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如此等等，只有探寻一下这项政策制订的始末才能得到答案。

## 六、德黑兰之行 武器换人质一举几得

“伊朗门”丑闻并不像“水门事件”那样简单，仅仅是为了国内竞选而进行窃听。它已经延伸到美国国土之外，从中东到中美洲。军火、人质、反政府武装……足以构成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了。

1985年5月，戴维·雅各布森，贝鲁特美国大学校长成了被扣押在黎巴嫩的第七名美国人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关注着美国政府的反应。卡特政府以来，人质问题成为最令总统头疼的问题之一。人质的家属、新闻界、公众每天都在呼吁，请求总统采取措施救出人质。

1981年里根当选为总统之后，向美国人民郑重宣布：美国再也不会去讨好阿亚图拉·霍梅尼了；美国绝不向恐怖分子低头，不与他们作任何交易。因为交易，不论是物质上的妥协还是政治上的妥协，都只会进一步刺激绑架者的口胃，导致更多的绑架事件发生。这一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

那么还有其他办法可以使人质获释吗？

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间谍卫星可以知道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有一个巨大的情报机构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但是，要找到一个远在几千里之外、被藏在山洞里、沙漠里的人质，这些手段仍是不够的。情报人员不断地寻找，反恐恐怖突击队也组织起来了。但是仍没有用。

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7月，当麦克法兰带着一个解救人质的方案来到贝塞达斯海军医院看望生病的总统时，一个行动计划诞生了。

麦克法兰向里根汇报了以色列人正在与伊朗接触的情况，并说伊朗政府内部有一批温和的实权人物希望与美国建立联系。以色列人说，这些伊朗温和派为了表示他们的诚意，提出愿意去说服黎巴嫩真主党恐怖分子释放7名美国人质。里根说：“好吧，我们试试看吧。”

在接触过程中，伊朗人很快提出了武器要求，以色列在其中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以色列的军火库中有大量的“陶”式导弹，它将把这些武器运给伊朗的温和派，然后伊朗人付钱给美国，由美国补充以色列的导弹储备。在里根和麦克法兰看来，交易纯粹是在以色列和伊朗间进行的，从而并没有违反美国保证不参与两伊战争、不出售武器给任何一方的承诺。

还有一个问题：美国人民会答应与恐怖分子妥协吗？里根搬出了他那套人质理论，说服自己也说服公众：美国并没有真正与恐怖分子打交道，我们只是找到了一个可靠的人许诺能够救出我们的人质，然后我们就把钱作为报酬给了他。舒尔茨尖锐指出，恐怕美国人民是看不出其中的区别的。他和国防部长温伯格一起强烈反对这个计划。但是，在里根的首肯下，第一批508枚“陶”式导弹于1985年9月从以色列运往伊朗，以色列随即得到了美国的补充供应。9月15日美国人质本杰明·弗尔获释。1985年11月，在以色列方面的请求建议下，刚刚卷入伊朗计划不久的诺思根据麦克法兰的命令，亲自监督将一批“隼”式导弹运往伊朗，并事先计划好万一消息泄露，就谎称是石油钻井设备。

1986年5月，麦克法兰、诺思等5人乘坐一架经过伪装的以色列707飞机秘密飞往德黑兰，与伊朗代表进行直接交易。谈判围绕着武器与人质进行。诺思急于达成交易换取人质的释放，对伊朗人许诺说：“只要能使美国人质获释，我们就将第二架飞机的‘隼’式导弹部件运过来。还有，我们还准备再卖给你们两套雷达设备。”没想到伊朗人无动于衷，他们传达了绑架分子

的要求，条件甚为苛刻，甚至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和戈兰高地撤军。

诺思等人大为吃惊，经过伊朗调解，要求降到只剩一项：释放因 1983 年爆炸科威特使馆而被捕的 17 名恐怖分子。麦克法兰重申了指令：“除非无条件释放人质，否则我们就回国。”

经过几个小时的讨价还价，伊朗人又带来了新消息：“我们能给你们两名人质。”“我们无法让全部人质获释、我们已尽力而为了。”谁也没料到这种结果。麦克法兰能够决定的是：全部（人质），或一个也没有。他拒绝了诺思接受条件的建议，准备离开德黑兰。伊朗人几乎是哭着请求：“再给我们几个小时，就把两名人质释放。”麦克法兰置若罔闻，毫不让步。德黑兰之行终以失败告终。

诺思对这种结果十分恼火。在他看来，能救出一个是一个。而且武器换人质早已是既成事实，在紧要关头再去考虑“那早已被玷污了的清廉政策”，简直是毫无意义。

尽管德黑兰之行没有取得预期成功，但是此后仍有两名美国人质劳伦斯·詹科和戴维·雅各布森获释。就在雅各布森获释的第二天，黎巴嫩《船桅》杂志登载了披露美伊秘密武器交易的文章，伊朗计划被迫终止。

在“伊朗门”事件调查过程中，里根被描绘成一个对人质的关心超过对宪法和法律的关心的仁慈总统。“那些人就像是我的孩子，”他这样告诉公众，“所以当我听说有一个计划能够把他们弄回来时，我明知道有很大的风险，仍然给予了支持。”这似乎成为犯错误的主要理由，但却绝不是全部理由。就像麦克法兰向调查委员会承认的那样：“就算是没有人质，我们也迟早要与伊朗的温和派发生接触。”接触的动因是战略利益，而并非对人质的关心。

中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国争夺的战略要地。60 年代以来，美苏相继染指这一地区。1979 年伊朗霍梅尼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以霍梅尼为首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敌视政策。1980 年美伊正式断交，这一事件被称为卡特政府最重大的外交失误，它使美国最终失去了伊朗。而苏联自 1979 年入侵阿富汗以后，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共产主义的扩张、伊朗成为第二个阿富汗的可能性、中东富饶的石油资源，都迫使美国加快弥合与伊朗裂痕的脚步。

正如诺思所但承的那样，德黑兰之行是为了人质，“但此行真正的、重大的原因是同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利益有关”。人质问题不过是原因之一，甚至远远不是主要原因。里根一班人之所以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对人质如何关心，希望人质获释的心情多么迫切，其目的不过是要为真正的动机拉一块遮羞布而已。

英国一位外交大臣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国际关系中，既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为什么伊朗会与被称为“大撒旦”的美国进行秘密谈判呢，答案也在“利益”二字。

霍梅尼革命以来，伊朗奉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支持恐怖主义行动，在中东打两伊战争，这样在世界上和中东地区都处于孤立状态。与美国谈判也是为了打开封闭的外交局面，改善一下自己的国际处境，尤其是希望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

两伊战争已持续多年，双方都投入了百万以上的兵力。伊朗的实力消耗很大。伊拉克一直得到苏联的武器补给，伊朗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军火库

越来越空。军火，正是促使伊朗与美国接近的最直接原因。

但是，在伊朗政府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这就是“伊朗门”事件败露的原因。这一交易一泄露，在伊朗政府内部引起轩然大波，“激进派”趁机向议长拉夫桑贾尼发难，8名议员甚至联名致信霍梅尼要求严惩破坏秩序的人。幸而霍梅尼不愿政府发生分裂，及时出面制止了骚乱。

美伊秘密交易并不是仅在美国掀起了风波，整个中东地区也陷入了风波之中，有人沉默，有人愤怒，一时间风云变幻莫测。

以色列作为武器交易的中间人，充当了“掮客”角色。处境最为尴尬。阿以矛盾历史悠久，以色列怎么会成为伊朗的支持者呢？这其中也是大有文章。首先是钱，“军火掮客”利益第一；其次，伊朗境内还有5.6万犹太居民，以色列讨好伊朗也是为了保证这些人的安全；第三，与伊朗相比，伊拉克对以色列的威胁要危险得多，就算是“两害取其轻”，也足以使以色列加入到这场交易中来。

阿拉伯世界好像从未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对美伊武器交易反应最为强烈的伊拉克大声叫嚷“被出卖了！”何为“出卖”？——两伊战争中，美国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暗地里一直在支持伊拉克。战争一开始，美国就积极努力切断伊朗的武器供应。当里根总统对这一行动仍嫌不足时，就命令情报部门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情报。无怪乎“东窗事发”后，伊拉克人对“骑墙”的美国人大大为不满了。

埃及总统萨达特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公开批评了美国的政策，认为此事“使华盛顿丧失了它在这一地区的信誉”。

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虽然在两伊战争中一直支持伊拉克，对美国的做法不会不恼火。但是想到自身的安全和海湾地区的稳定。就选择了闭口不言。

美国的盟国反应如何呢？

两伊战争刚刚打响，安理会就通过了谴责战争、要求双方停火的决议。西方各国也纷纷表态：为了尽早恢复和平和维护公正，我们将严守中立，不向交战国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可是，如果每一个国家都严守中立了，世界上就不会有什么军火交易了。

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一直在偷偷把武器运往海湾。他们和美国的区别在于：他们没有指手划脚地对别人说不许这样做。而美国呢？一方面把自己打扮得比任何人都爱好和平和公正，严厉监督他国；另一方面却私下里大行其事。结果一朝丑闻曝光，不仅国内舆论哗然，连西方盟国也纷纷指责美国言而无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里根政府对此自有解释：武器是卖给伊朗政府中的温和派的，而这些人期望和平的，他们会结束战争。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和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且据说，不多几枚“陶”式导弹是不会使伊朗对伊拉克的武器对比发生多大变化的，因此大概也不会有支持战争一方之嫌。再说，还有大笔的收入和可能获释的人质。钱带来物质利益，解救人质带来声望，此一举不知有几得？无怪乎里根总统会下如此大的“赌注”了。

事发之后，公众的注意力被巧妙地吸引到人质问题上。人们除了批评总统对恐怖分子妥协违背了誓言之外，却很少想到500枚“陶”式导弹换来的不只是一条人命，还有一条通往波斯湾的大道。

在特拉维夫的机场跑道上，对德黑兰之行大失所望的麦克法兰满脸的诅

丧之情。诺思想安慰一下他，说道：“好了，巴德，这并不是彻底失败。它的光明面就在于这些交易挣得的钱是用来帮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麦克法兰脸上露出令人难以捉摸的神情，他一言不发地望着黑漆漆的跑道。也许失败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他心头了。

## 七、援助巨政府武装 利益还是民主？

伊朗行动的曝光导致了公众对里根总统信任度的大幅度下降。但是这基本上还属于一个违背诺言的道义问题。当司法部长米斯的调查揭露出丑闻的第二部分——对伊武器交易额的一部分被用来支持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时候，大量的法律问题出现了。事情的背景更加复杂了。

美国与尼加拉瓜的交往可以一直追溯到 20 世纪初。羽翼初丰的美国觊觎拉丁美洲已久。1925 年，美国在尼加拉瓜策划发动了查莫罗为首的军事政变，建立了亲美的迪亚斯独裁政权。尼加拉瓜人民在民族英雄奥古斯都·桑地诺领导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美民族解放战争。战争取得了胜利，桑地诺却被国民警卫队总司令索摩查杀害。1937 年 1 月，索摩查出任总统，开始了长达 42 年的索摩查家族的亲美独裁统治。

1979 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以桑地诺命名的人民武装力量）在丹尼尔·奥尔特加领导下推翻了索摩查政权，建立了亲苏的共产主义政府。美国大惊失色，这是它在拉美丢失的第二个堡垒了，首先是古巴，然后是尼加拉瓜，然后也许还会有更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共产主义威胁”近在眼前了。

罗纳德·里根的反共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在第一届任朗内，中美洲的焦点是萨尔瓦多。在美国的直接武装干涉下，较为温和的杜阿尔特当选为总统。美国的注意力随后转向尼加拉瓜。尼加拉瓜被描绘成苏联在中美洲的滩头堡。里根政府的任务就是要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力量，把“民主制度”带到那里。里根认为，奥尔特加的最大罪状就是公然宣布要搞共产主义，甚至要支持整个中美洲搞马克思主义革命，这是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就是对美国的威胁。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国会议员在内，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一些人指出，古巴距美国仅 90 公里（尼加拉瓜距美国 800 公里），总统并没有下令进行第二次猪湾入侵。

中美洲的战略地位对美国是显而易见的：美国进出口货物的一半要经过这一地区，中美洲也是美国商品的一个出口市场。为了利益，美国也绝不能让共产主义“占领”中美洲。

但是，国会中的反对势力一直占上风。1982 年后期，国会议员蒂普·奥尼尔和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爱德华·博兰（当时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开始掀起了一场反对美国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运动。1982—1986 年间，国会先后通过 5 个独立的“博兰修正案”，开始禁止将中央情报局、国防部或涉及情报活动的任何美国其它机构的经费间接地或直接地花在支持尼加拉瓜的军事行动或准军事行动上。有效期截止到 1985 年 12 月前。

在此之前，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活动都是在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下公开进行的。由于博兰修正案的限制，这一行动不可能再继续了。里根总统在此形势下仍公开和私下表示“不想失信于尼加拉瓜反桑地诺分子”，准备绕开国会行动。他指示手下人要“保证反政府武装继续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直到国会同意再次支持他们为止”。

怎样支持？拿什么支持？总统并没有明确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开始探寻各种可能的途径。诺思在国内成立了所谓“全国保卫自由基金会”，募集民间捐款。

博兰修正案通过前后，中央情报局也曾组织过一次秘密援助活动——“倾

覆的水壶”行动。

这次行动是威廉·凯西的主意。1982年和1983年以色列缴获了大批巴解组织的武器。经过美以秘密协商，1983年5月和1984年，武器分两批送到了国防部仓库。随后由中央情报局分发给尼反政府武装。“倾覆的水壶”行动是一次成功的秘密行动，这似乎鼓舞了凯西。更大的秘密行动酝酿产生了。

用伊朗的钱去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到底是谁的主意？诺思否认这是他的发明，虽然国会和公众已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但是，这的确不是诺思的主意。想法最初产生于一个伊朗商人的头脑。

马努切儿·戈尔巴·法尼尔被里甘称作“可疑的伊朗商人”。他原籍伊朗，后来一直居住在巴黎，在全世界各地做军火生意。他喜欢交际，爱吹牛，是一个一意孤行而又诡计多端的人。在伊朗—尼加拉瓜行动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麦克法兰等人与德黑兰的政府官员保持联系的唯一渠道。

但是，没有人信任戈尔巴，甚至包括最初把他介绍给麦克法兰的以色列人。据报告说，他三次都未能通过中央情报局的测谎器，除了名字和国籍，他所说的一切全是撒谎。在国会听证期间，很多议员问诺思：“你们怎么能和那样一个人共事？”回答很简单：他是能找到的唯一的合适的人——一个熟悉军火交易、熟悉政府高级官员的人，一个不伪装自己拼命想赚大钱的商人。

1986年1月，伦敦，丘吉尔饭店。诺思和戈尔巴·法尼尔一起讨论运往伊朗的“陶”式导弹问题。戈尔巴·法尼尔突然站起身走进了洗澡间。诺思心领神会跟了进去。戈尔巴拧开水龙头防止窃听。

“奥利，如果我们做成这笔买卖，你就能得到100万美元。”

“这是行贿吗？”诺思的脑子里一闪而过。“这不可能，别再提这件事，否则事情到此为止。”

戈尔巴是个老练的商人。如果你没有接受他的第一个建议，他总是立即提出另一个。

“没关系，我能理解。我知道你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让你在尼加拉瓜的朋友们得到一笔钱。”

显然，戈尔巴·法尼尔早有内线知道了诺思在参与援助尼反政府武装的活动，就是戈尔巴在洗澡间提出的这个建议最终演变成“款项转移”。

诺思回到华盛顿，直奔波因德克斯特的办公室：“将军，我想我们找到了支持尼加拉瓜反对派的办法。”波因德克斯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卖给伊朗武器所得利润的1800万美元中，350万美元存入了瑞士银行的一个秘密帐户，后来被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人取走。

与此同时，退役空军少将理查德·西科德组织人马，成立了“南方航空公司”，直接向尼加拉瓜边境及境内的反政府武装空投物资。直到1986年10月5日，西科德手下的一架飞机在尼加拉瓜领空被尼政府空军击落，机组人员哈森福斯被捕。眼看事件就要败露的凯西急忙通知诺思：行动该结束了，赶快进行“清理”。一个月以后，“伊朗门”事件曝光，尼加拉瓜行动也暴露在公众面前。

尼加拉瓜行动涉及到里根政府是否违反法律的问题。许多国会议员指责政府违反了博兰修正案。而里根和白宫官员却说，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是情报机构，不在博兰修正案的禁止范围之内。一位议员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活动已使它在实际上具有了情报机关的职能，因此在修正案约束范围之内。双方围绕法律问题争吵不休。里根又拒不承认对此事知情，更加剧了事情的复杂化。

里根在回忆录中大谈特谈尼加拉瓜人民的自由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美国有责任帮助他们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而国会中“目光短浅”和“不懂外交事务的议员们却看不到现实的威胁，屡屡阻挠和破坏对尼加拉瓜‘民主抵抗力量’的支持”。他必须与国会作斗争，又必须保证“民主力量”继续得到援助。这似乎是矛盾的：一个人不可能既遵守法律又超越法律。当里根得知诺思等人的行为后，急忙表白总统的原意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持反桑地诺派作为一支力量的存在”，而不希望任何人僭越法律。结果，诺思等人吃力不讨好，被送上了联邦法庭。

里根的中美洲政策是导致“伊朗门”事件的一个重要根源，从一开始，尼加拉瓜政策就处于摇摆不定的困境之中。

1983年，66%对23%的多数公民反对美国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1984年，反对人数的百分比上升至68%。即使在1986年国会同意拨款1亿美元支援尼反政府武装时，公众仍以60%对30%的多数反对给他们任何军事或非军事供应。同样，关于里根总统中美洲政策的评价，不赞成的比例也在上升。1986年哈森福斯驾驶的一架从萨尔瓦多秘密基地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的飞机被击落，国内公众以61%对25%的多数认为哈森福斯确实是一个中央情报局间谍，与桑地诺政府的声明不谋而合、令里根政府大为丢脸。

美国人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他们最担心的是再来一次直接的武装入侵。也许里根会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号，把4万个美国人的生命投向中美洲某个不知名的战场。黎巴嫩200多名海军官兵的死亡让人记忆犹新：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不过是20多年前的事。没有人愿意为政府中少数人的野心或是愚蠢的想法去白白送死了。有趣的是，高唱着民主自由和人权的里根总统把人民这种珍惜生命的权利视为“孤立主义情绪”。可是，尼加拉瓜并没有轰炸珍珠港啊！

由此而看，“伊朗门”事件的出现绝非偶然。里根一上台就采取了对苏的强硬遏制政策，准备大张旗鼓地与苏联在全世界进行角逐。中东和中美洲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战略要地。里根所大力渲染的所谓“共产主义的扩张”，不过是为美国全球干涉制造舆论，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霸权，排斥苏联势力。诺思也好，里甘也好，尽管在“伊朗门”事件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以至于对里根本人颇有微词。但是，他们都是里根主义坚定不移的信奉者和支持者。所以，他们仍把里根奉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从中也不难看出，美国的反共扩张政策是大有市场的。

## 八、倾斜的民主制 国会与政府权力斗争内幕

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行政权归于总统；总统领导下的政府负责内外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国会有立法与监督权。总统和政府国会负责，接受它的监督。国会内设有 5 个专门委员会分管外交、财政、司法等等。三权分立制度的运行是依靠权力的相互制约与平衡实现的。历史发展到 20 世纪 80 年代，尽管国家的权力结构没有本质性变化，但是在权力的分配与运用上却开始有了改变。这一变化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政策制订与实施摩擦增加，国会的监督作用日趋减小。

随着伊朗—尼加拉瓜行动的败露，政府内部、政府与国会之间的矛盾也展露在公众面前。

外交事务一向不是里根的长项。除了提出强硬遏制政策作为指导外交的基本方针外，在具体做法和具体事件的处理上，里根往往需要助手们的帮助。

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格都是老资格的外交家。他们不仅熟谙外交事务，也充分了解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向。但是，在伊朗—尼加拉瓜行动中，他们却坐了冷板凳。

“伊朗门”事件一曝光，舒尔茨立刻在电视上对记者公开表态，他一直认为对伊朗的行动是错误的；温伯格也向舆论界透露，他一直反对与伊朗打交道。

的确，舒尔茨和温伯格对伊朗的厌恶之情恐怕是他们所能达到的很少的共识中的一件。美国在两伊战争中长期采取偏向伊拉克的倾斜政策实际上就是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意见。舒尔茨甚至鼓励国务院从恐怖主义支持国的名单上划掉了伊拉克；国防部则源源不断地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情报。

在人质问题上，国务院与白宫的分歧就更大了。舒尔茨再三警告总统与伊朗的武器交易从本质上就是以武器换人质，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1987 年 7 月 31 日，温伯格作为最后一名证人被传唤到国会听证会作证。他首先承认自己对武器交易一事早已知情，但是一直持反对态度；直到 1986 年 1 月在白宫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与舒尔茨仍对向伊朗运送武器表示反对。他称之为“一个愚蠢透顶的计划”，“它将把我们引向毁灭”。但是波因德克斯特称总统决心已下，制止了进一步的讨论。此后，温伯格也没有再过问此事。

应该说，舒尔茨和温伯格的意见是正确的。在事发后，他们作为“反对派”成了新闻界的“英雄”。但在白宫，两人的日子很不好过。丑闻摇撼下的白宫四面受敌，舒尔茨的电视讲话倒像是从背后射来的一支冷箭，令白宫大为恼火。一时之间，要求舒尔茨辞职的呼声响彻白宫。里根并不想失去这位外交专家，更不愿冒受新闻界指责之险。他让斯皮克斯放出口风，表示总统不希望舒尔茨离职。一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面对此种情况，有人惊问：美国的外交政策到底是由谁制订实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能超越法律私自决定外交行动吗？

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原则上是总统的咨询机关，负责帮助总统了解有关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和国际形势的基本情况，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制定或实施政策的权力。

但是，在华盛顿有一个规矩：谁离总统近，谁就有权。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办公室设在白宫之内，距总统办公室仅 80 码；国务院当然也不远，距离白宫只有两个街区，但显然是无法与前者相比了。正如斯皮克斯所言，国务

卿与国家安全顾问的最大区别，第一是位置，第二是位置，第三还是位置。

国家安全顾问的权力因此而增。1982年起，国家安全顾问每天有30分钟的时间可以面见总统，而当时的国务卿只有经过办公厅主任的批准才能进入白宫。舒尔茨经过一番斗争，终于被允许每周见总统两次，每次30分钟。

这样，重大的外交政策往往在白宫里面就由里根主义的支持者们制订完毕。国务院和五角大楼被赶到了一边坐冷板凳。

政府内部的权力失衡是导致决策错误的重要原因。而错误发生后，大家又互相埋怨，推卸责任，使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大。好象舒尔茨的“背叛”还不够似的，麦克法兰也一改初衷，承认武器交易是个错误。报道传出后，麦克法兰又给斯皮克斯打电话，指责记者歪曲了他的原意。乱上加乱，里甘与南希吵得不可开交，被捅到新闻界引起轰动。里甘辞职之前，白宫的几个重要官员相继离去，斯皮克斯辞职去了梅里尔·林奇公司；政治事务顾问朱切尔·丹尼尔斯决定回印第安纳州开他的私人律师事务所；通讯事务助理帕特·布坎南在3月1日辞职而走。白宫像一艘即将沉没的大船。公众满怀兴趣地注视着上层人物的倾轧。新闻界在旁边添油加醋，从而演出了一场“民主制度”下的闹剧。

美国建国以来，国会与政府的斗争从未间断。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等待他的是更为艰难的局面——国会的控制权几乎掌握在民主党手中。1986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完全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在众议院也失去了7个席位。“跛鸭总统”的形象不可避免地要被新闻界宣传开了。就在这时，“伊朗门”事件曝光了。

民主党议员抓住有利时机，准备给予里根和共和党致命的打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要求组织一个小型委员会召开一次全面的电视听证会。大部分共和党参议员希望在共和党还能部分控制参议院时结束调查，而民主党人则希望把它拖到新年以后，因为那时将召开第100届国会，届时两院所有的委员会主席都将是民主党人了。

国会对里根总统及其助手的秘密行动大为不满。首先是因为伊朗—尼加拉瓜行动自始至终都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擅自进行的，事前既未与国务院商议，更没有及时通报两院情报委员会。这种行为已逾越了法律限度；其次，尼加拉瓜行动在根本上与国会于1984年10月通过的博兰修正案相抵触，是明显的蔑视法律的行为；第三，国会调查期间，里根政府妄图对国会隐瞒真相。阻碍了调查的顺利进行；第四，关于总统本人的责任，国会调查报告指出，作为白宫的领导人，他应对白宫里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而且他应该及时了解并知晓他的手下人在干什么，而不是在事件发生后逃避责任。

国会调查期间，两党权力斗争也达到白热化。调查委员会由26人组成，15名民主党议员和11名共和党议员。1987年11月发表的最后调查报告实际上也体现出两党角逐的内幕。报告由民主党议员和3个共和党议员签署的“多数派报告”以及8个共和党议员签署的“少数派报告”组成。多数派报告指出，“伊朗门”事件的根本责任必须由里根总统承担。而且指责“里根总统的行动和声明有欺骗之嫌”。“少数派报告”则声称，错误只是“判断方面的失误”，“并不存在宪法危机、对法制的亵渎、重大阴谋和政府范围内的欺诈与掩盖”。并且批评“多数派报告”作出了“歇斯底里的结论”。有人认为，国会与政府外交政策的分歧是导致“伊朗门”事件灾难性后果的根源。

实际上，政策的分歧并非要点，要点在于权力的斗争，伊朗—尼加拉瓜事件为民主党扩大影响以便有朝一日重掌白宫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而对国会来说，这又是一个限制总统权力、扩大国会权力的良机。

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政府与国会、国会两党的权力斗争在“伊朗门”事件中时隐时现，所谓“民主制度”在疾风暴雨的冲击下支离破碎，这一切是里根始料未及的。

## 九、案情并未了结 沃尔什报告生风波

“伊朗门”事件之所以成为丑闻，主要包含了以下3个因素：里根总统的食言——武器换人质，恐怖主义得到纵容；

掩盖真相的努力——当事人含糊其词，总统或许知情？

权力与权力的斗争——国会指责政府，政府四分五裂。

从1986年11月4日美国通讯社第一次披露美伊秘密武器交易、一直到1991年9月16日诺思案的最后了结，将近5年的时间里，每一次新发现都会唤起新闻界的热情，引来公众的关注。但是经过了司法部长米斯、约翰·托尔的总统特别调查委员会报告、国会的公开听证会和特别检察官的刑事调查，甚至还要加上里根总统、唐纳德·里甘、奥利弗·诺思、南希·里根和拉里·斯皮克斯各执一词的回忆录，一切似乎应该水落石出了吧？可是现在，如果你在街上随便拉住一个美国人，或者随便翻开一本美国当代历史书，问一下，“伊朗门”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总统到底知道多少？人们会说：“哦，我想——”，书上会写“没有确凿证据”，难道调查、报告、听证和审讯，都不能揭示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真相吗？不能。于是丑闻在热闹了几年以后沉寂下去，似乎就要作为“悬案”藏在历史年鉴中了。

几年之后，又换了两位总统，“悬案”被重新翻了出来。沃尔什检察官的一份报告使沉寂的丑闻风波再起。

1994年对克林顿总统来说实在是开门不利。1月17日凌晨4点31分，轰隆一声，地动山摇，里氏6.6级的大地震撼动了天使之城洛杉矶。与此同时，寒流袭击了美国东部和中西部，纽约气温降到华氏零下2度（相当于摄氏零下20—30度）。全美国因低温死亡的人数达到79人。仿佛天灾还不够似的，人祸接踵而至。1月18日，克林顿提名的司法部长英曼突然辞去提名，并指控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多尔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合谋破坏他的名誉。此事大有造成丑闻之势，舆论一时又热闹起来。但是，这些与随后的消息相比，可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1994年1月18日，英曼辞去提名的同一天，独立检察官沃尔什发表了关于“伊朗门”事件的最后报告。历时7年、耗资3760万美元的调查至此才算是落下帷幕。

沃尔什检察官以如此顽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耐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调查，就是为了给美国人民一个公正而客观的结果。

沃尔什报告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细节，但是它把文献证据、证人证词汇集起来，分析、整理，向公众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公众从1987年的听证会上所得的印象（似乎“伊朗门”丑闻全是下面的人自说自话瞒过了最高当局搞出来的）是错误的。事实上，里根总统“给他的下属犯罪创造了条件”，并且“有意参与、至少是默认掩盖了这一罪行”。曾经主持掩盖罪行的前司法部长米斯站出来对沃尔什大肆攻击，指责他浪费钱财，作出了不负责任的推断。

但是公众不理这些。已经沉寂了3年的“伊朗门”丑闻从公众的脑海深处被唤醒。美国人民突然发现自己受骗了，或者说又一次受骗了。第一次，里根总统告诉他的人民他没有做违反法律的事；第二次，国会和政府又向人们保证总统没有说谎。可是今天，突然有人站出来告诉他们，总统一直在说谎。经历过水门事件的美国人还记得尼克松总统当年掩盖丑闻的活动曾导致

多么大的信任危机；而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难道又有一位总统重蹈覆辙？

然而，沃尔什报告并没有像新闻界预计的那样引起轩然大波。它就像在早已平静的水面投下几粒小石子，激起几圈波澜，很快又平静下来。是因为美国人对丑闻和谎言早已习以为常？还是因为大家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国会的调查报告？或者是克林顿执政以来的多次丑闻曝光已使美国人把注意力投向了更切近、更现实的问题上了？

无论美国人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接受沃尔什报告，他们在丑闻发生 7 年之后终于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满的答案了。事情像里根说过的、像诺思说过的、像很多人说过的那样结束了。

“伊朗门”丑闻在沃尔什报告后似乎是真相大白了，但是它只解决了那个老问题——总统知道多少？大量新发现的事实已经使事件远远超出了伊朗—尼加拉瓜的范围，向更不为人知的深处展开了。

早在 1991 年，调查国际信贷和商业银行某案件的官员就发现，“伊朗门”事件与该行丑闻有关。这意味着“伊朗门”与金融诈骗活动挂钩，也许是里根任内一项更大规模的非法活动的一部分。是否如此？结果是不了了之。

1994 年，《新闻日报》前记者约翰·卡米斯和美国空军情报机构前官员特里·里德合作出版了《妥协：克林顿、布什和中央情报局》一书，书中披露的大量情况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据说，位于阿肯色州最西端的小镇米纳曾是 80 年代诺思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一个基地。那时，各种武器从这里被空运到尼加拉瓜，然后飞机又载着大量毒品从中美洲回到米纳，再从这里分售到美国各地。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活动都是在美国政府主使下进行的。

当时身为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从高达数亿美元的毒品走私利润中可以分到 10% 的赃款。这些钱在一天深夜从天而降。落在小石城郊外的一个小牧场里。清一色的百元面额的美钞，全部装在一个个小背包里。克林顿收到钱后，交给当时阿肯色州的大企业主、后来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捐助人丹·拉斯特，由他通过银行把钱洗干净。先后参与实施或提供帮助的知名人物还有前总统布什、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和著名的奥利弗·诺思中校。

尽管书中提到的所有人物都对上述说法加以否认，但里德描述得是那样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不能不使公众又一次发出惊叹之声。正如美国《洞察》杂志所言，这些惊心动魄的画面哪怕只有一半属实，也足以引发一起美国政坛上以往任何一起丑闻都无法比拟的特大丑闻了。

对于里德书中的指控，国会的一位高级助手直言不讳他说，尽管这些指控看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他毕竟不是唯一进行这种指责的人。我们既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也不能在不经调查的情况下全盘予以否定。”

很明显，这已不是一个伊朗—尼加拉瓜行动引起的丑闻了，它牵涉到了两位总统主持下的美国政府的内幕活动。

当恐怖活动猖獗一时、无辜百姓替政府受过的时候，美国政府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打着解救人质的招牌，大肆贩卖军火；

当里根叫嚷着公正、民主、平等的口号时，美国政府却公然出兵镇压萨尔瓦多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

当美国总统用慷慨激昂的声音赞美“我们的制度”是如何民主，“我们的政府”是如何为公众服务时，人民却发现，“公众利益的代表者们”一直在对公众说谎。

“伊朗门”丑闻并没有结束，美国政府不会放弃自己在中东的利益，更不会放弃在中美洲的霸权；国会与政府的权力斗争在“民主”的口号下还会继续；一旦需要，政府还是会隐瞒一切。

“伊朗门”丑闻暴露出里根政府内部的弊病，更重要的是，在掩盖与揭露的过程中，美国“民主制度”的真相让人一览无余。

（赵薇撰稿）

## 国会断案“性骚扰”——希尔女教授诉提名大法官

西方世界有句名言：“自从上帝把人类分成亚当和夏娃，男人和女人便在既争斗又结合中工作、生活。”

——题记大千世界，光怪陆离。1991年10月，大洋彼岸的美国冒出一爆炸性新闻：由布什总统亲自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被10年前的女部下、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法律教授安妮塔·希尔指控曾对其进行性骚扰。

女教授的指控犹如投下一枚重型炸弹，在美国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全美几家主要的电台与报刊大肆渲染，公众对此事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总统竞选。连布什总统也在百忙之中密切注视着此案的进展。

这是一起罕见的凶悍而丑陋的政治戏剧，它涉及到种族、女权等敏感的社会问题。在国会内，共和党与民主党唇枪舌剑，互相攻讦；国会外，妇女团体纷纷走上街头，拉起巨幅标语，高呼口号示威游行。舆论界称之为“十月惊奇”。

这件被称之为“托马斯现象”的奇案有如下四奇：

希尔女教授为什么在沉默了漫长的10年之后，才指控旧上司？此为一奇。

还在案件调查审理过程中，10月6日几家电台与报纸就率先披露了这一新闻，美国法律严格规定在没有最后断案之前，对案情是绝对保密的，那么，是什么人泄露了消息？此为二奇。

性骚扰案件历来被视为最棘手的案件，因为它取证困难。何况希尔的指控又是在事发10年之后，就更增加了案情审理的难度。最后断案的依据居然是双方的“道德人格”，此为三奇。

由个人案件而引起党派之争，此为四奇。

审理此案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曲折性，其引人入胜几近一部电视连续剧。这里，我们不妨追溯一下，借以了解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 一、黑奴之子成法官 踌躇满志爱挫折

克拉伦斯·托马斯，一个黑奴的后代，能够获得总统提名，进入最高权力中心联邦上诉法院任大法官，是极其不易的。

1948年，美国佐治亚州乡间的一所低矮阴湿的小木屋里，一声尖厉的婴儿啼哭打破了夜的沉静，产后虚弱的母亲看着自己怀胎十月的小生命却无丝毫喜悦。贫寒的家境、受歧视的肤色、沉重的生活负担，这一切像块巨石般堵在母亲的心头，她未曾料到这个唤作克拉伦斯·托马斯的婴儿日后将踏入上诉法院，参与国家的重大事务。

托马斯小时候住着没有上下水道的简陋小木屋，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他的父亲在他3岁那年外出打工，从此杳无音讯。他的母亲是位非常坚强的女性。在此后的岁月中。她每天早出晚归，为别人洗衣服，一个人挑起生活的重担，含辛茹苦地将三个孩子抚养成人。

托马斯深深地被母亲坚韧不拔的精神所影响，他从小就为自己立下了座右铭：“你会成功，但必须忍受”。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每当遇到困苦挫折，他总会想起这句话、激励自己战胜逆境，继续前进。

与家境贫寒相比，更使托马斯难以忍受的是种族歧视的痛苦。

自从哥伦布首航新大陆以后，欧洲的英国、爱尔兰、西班牙人便纷至沓来，白人在这里确立了自己的统治。美洲的印第安人与后来被当作奴隶贩来的黑人及其后代从此饱受种族歧视之苦。

直到1963年，美国《新闻周刊》公布的一项民意测验还有如下结论：

66%的白人相信“比起其他人种来，黑人并没有多大志气”，71%的人认为“大多数黑人总是提出比他们的接受能力更高的要求”。

虽然美国在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法案，然而黑人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以至著名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时，一些白人仍无动于衷。

当时托马斯还在学校里，作为一个黑孩子，他被班上白人学生的幸灾乐祸和公开叫骂激怒，险些以拳相加。升入高中以后，托马斯继续因肤色而承受白人学生的凌辱。

必须成功的信念激励着他，托马斯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进入美国名牌大学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法律，并获得硕士学位。走出耶鲁大学校门，托马斯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升任教育部民权司司长。1990年，托马斯又被调到联邦上诉法院任法官。这预示着托马斯将有远大前程，因为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历来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后备人选。

1991年6月27日，美国第一位黑人大法官马歇尔结束了在最高法院的20年任职之后，向布什总统提交了辞呈，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一炙手可热的空缺立时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克拉伦斯·托马斯有幸成为布什总统提名的候选人。

然而就在此时，舆论披露出“性骚扰”一事，在参议院就总统提名进行讨论表决的过程中，国会议员中的反对派提出必须先举行听证会，查清托马斯提名大法官是否真的曾经对希尔进行过性骚扰，才能最后投票表决。托马斯面临严峻挑战。

## 二、拳王沦为阶下囚 法律公司变被告

希尔女教授对提名大法官的指控是“性骚扰”，这是在70年代才出现于法律条文中的新名词。在号称以法治国的美国，“性骚扰”被视为犯法也是最近几年才被公众真正理解和接受的。政界首脑克林顿、著名拳王泰森都被人指控“性骚扰”。这类案件引发的新闻热炒，远远超过了一般案件。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行为属于这一范畴呢？70年代，密执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凯瑟琳·麦金农就注意到，男人视妇女为“可用的东西”，职业妇女为了赢得工作，常常不得不“出卖人格”。这种性骚扰使妇女遭受到性不平等的问题，沦为“性对象”。许多职业妇女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出卖人权”，为社会不齿；要么坚持洁身自好，丧失工作或晋升机会。

经过长期斗争，198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性骚扰”的存在予以认可，并将其分为二类：

一，构成犯罪的骚扰行为，如强奸、强奸未遂和性攻击等。

二，普通骚扰，如讲下流笑话、露骨的性挑逗、放肆的盯视、使人窘迫的碰撞、制造令人受歧视的工作环境等。

“性骚扰”概念的首次提出者麦金农认为：“性骚扰”同种族歧视一样，也是一种歧视，只不过前者建立在种族的基础之上，而后者则建立在性的基础之上。因此，“性骚扰”等同于以性为基础的犯罪。

自此，1789年的《人权法案》中关于人权的问题才最终为妇女开辟出一片天地来。从此，女性可以以此为法律武器向社会寻求帮助和公正。

关于“性骚扰”的界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所谓“指控容易，取证难”。在女权主义呼声日高的今天，托马斯会有怎样的前景？

现在，我们撇开托马斯，看看已有结局的两件“性骚扰”案：

1991年，泰森，这位享誉世界、“打败天下无故手”的拳王，因性犯罪刚刚获释，又再度因同样的罪名走上被告席。

泰森出生于1966年。1980年，年仅14岁的泰森开始了他的拳击生涯。1986年，20岁的泰森一举击倒待列弗·贝尔比克，成为世界拳击理事会重量级拳王。1987年又获世界3个拳击组织的重量级拳王。到1991年，25岁的泰森已参加了41场比赛，只有一场输给了道格拉斯。泰森是举世公认的继拳王阿里之后最有希望的新一代拳王。

1991年11月8日，泰森拳击生涯中一场重大的比赛——迎战霍利菲尔德——将要举行，泰森希望通过这次大赛夺回一年前被道格拉斯摘走的拳王桂冠。泰森本人一直卧薪尝胆，加紧准备，等待大赛。不料，一场指控，使这一希望化为泡影。

9月9日，马里恩法院的大陪审团接受了18岁的“美国黑人小姐”德里·华盛顿的指控，控告泰森犯有强奸罪。

据华盛顿指控说，泰森在应邀出席印第安那波利斯的黑人博览会期间，于7月19日凌晨两点约请她到他住的坎特伯里酒店房间，并在那里强奸了她。

1992年1月27日，法庭开始审理此案。审理期间竟有10名选美选手上庭指控泰森在印第安那波利斯对她们进行了“性骚扰”，要求泰森共计赔偿6.07亿美元。

1990年的黑人小姐罗塞·琼斯也上庭指控泰森，说他要求与之发生性关

系遭拒绝后，粗暴地对待她。她对《华盛顿邮报》说：“他不可以对女性继续胡作非为，我相信必须要有人出来制止他。”她要求赔偿1亿美元，“我知道他没有1亿美元，但夺去他的金钱，就等于夺去他的权力，这样定能教训他一顿”。

这位出身贫民窟的拳王被舆论界斥之为“奢侈”、“荒淫”、“充满暴力”。

1987年，他因强行亲吻洛杉矶一家露天停车场的女值班员，受到法庭指控；

1988年9月，泰森的前妻、女演员吉文斯在电视节目中对节目主持人说：“我一直都受着折磨，像在地狱一般。他有骇人的一面。”一位拳击手的话证实了吉文斯的指责，他说：“有一次泰森对我说，他出拳最棒的要数将前妻吉文斯击倒。”

这位拥有一亿多元资产、30多辆名车、数处别墅的大富翁自称是花花公子，他因其对女性的攻击与骚扰，不断受到起诉，仅花在这方面的诉讼费用就有好几百万。

泰森的罪行，按美国法律要判18年至63年徒刑，后经其多方努力，1992年3月26日，泰森被印第安那波利斯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一代拳王沦为阶下囚。他给被害的女大学生德西里·华盛顿带来的是从肉体到心灵的创伤，和一个“可怕的、久久不能散去的恶梦”。她所蒙受的巨大痛苦连陪审员都当场落泪。

1994年9月，距泰森入狱3年之后，又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性骚扰”案再次震惊了美国人：世界最大的法律公司——芝加哥的贝克和麦肯齐法律公司被旧金山法庭召上被告席。

这家拥有1700名律师、在30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的大法律公司被指控的罪名是：该公司对其职员马丁·格林斯坦对女性进行“性骚扰”一事未给予足够重视。原告为该公司过去的一位女职员，秘书里纳·威克斯。

威克斯指控格林斯坦——这位公司的专利和商标专家在与她共事期间，多次对她说下流话，动手动脚。一次工作餐之后，他用手捏住她的乳房，调戏她，然后用膝盖顶住她的后背，转过她的身体，说：“来，让我看看你的哪个乳房大一点。”威克斯说：“我惊呆了，我不知怎么办。”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威克斯过去的6名女同事也上庭作证，指责格林斯坦道德败坏，曾多次将女职员按到桌子上进行性骚扰，甚至问女职员：“你有性病吗？想不想有？”

格林斯坦上庭接受审讯时说：“这些是我过去生活的细节，发生的一切绝对没有恶意，没有伤害他人的意图。”

至于公司方面，则一再声称“对雇员的所有投诉都严肃对待，事实一旦清楚了便采取行动。”

然而，女职员们说，事件发生后，曾多次向上司反映，但格林斯坦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为此，法庭宣判威克斯对贝克和麦肯齐法律公司及格林斯坦的指控成立。威克斯将获得高达710万美元的“性骚扰”惩罚性赔偿。

以上仅是关于“性骚扰”的两个案例，但这一情况严重存在于美国社会，从中可见一斑。

专家们将“性骚扰”行为具体界定如下：

以有意的口头方式侵犯异性。专家指出，在异性面前大谈色情电影、淫秽录像片、黄色小说、读物，大谈性经历，对异性口出污言秽语等都属这一类骚扰行为。以有形的非礼行动骚扰异性。这类行为包括对异性不怀好意地盯视、故意碰撞抚摸异性身体、胁迫异性看黄色读物和录像等。制造“性骚扰”的工作环境。这种行为的表现是在工作场所布置黄色淫秽图片、广告、标语等。

希尔教授的指控应属哪一类呢？

### 三、提名大法官受控 女教授吐露隐私

由于希尔的指控，美国参议院被迫推迟原定于1991年10月8日举行的托马斯任命表决，而决定在1991年10月11日至13日接连3天“破例”两次举行听证会，对托马斯一案进行调查。听证的参加者有国会两党民主党与共和党，有托马斯与希尔及其证人。这一“空前盛况”由全美各家电视台实况转播，喧闹一时。从学生活动中心、百货公司到居民住宅、办公室，人们拉过椅子，团团围坐在电视机旁，等着观看这场最受瞩目的日间电视。

35岁的商法专家希尔被描述为一个“听多于说”的安静女性，而43岁的托马斯则一向以对妇女权益的特别关注而享有美誉，由这样的两个人来为一场“性骚扰”官司对簿公堂，自然会引来人们更大关注。

11日上午10时左右，听证会开始。会场设在参议院的大会议室。屋顶高悬着枝形水晶吊灯，洁白的大理石柱直通到天花板，使大厅显得格外典雅庄重。尼克松时期的“水门事件”，里根时期的“伊朗门”事件都曾在这里审理。今天，这里又将审理一场在美国历史上有轰动效应的官司。

首先登场的是国会议员们，包括5名女参议员，每个人都很严肃、稳重。伴随他们鱼贯而入的是300名记者、技术人员与摄影人员。镁光灯频频闪烁，旁听席上人头济济，座无虚席，众人心思各异，焦急地等待着听证的开始。托马斯的白人妻子维吉尼亚也神态漠然地坐在旁听席上，尽力装作满不在乎。

女主人公登场了。35岁的安妮塔·希尔身着淡蓝色西服套装，一头浓密的黑发呈波浪垂肩而下，明眸皓齿。的确算得上黑人中的美女。

男主人公克拉伦斯·托马斯穿着一套银灰色西装，神态严肃。他已人近中年，身体略略发福，但行动并不粗笨。他有着一般黑人的典型特征：卷头发、黑皮肤、厚嘴唇。当他稳步进入会场。略微红肿的眼睛和紧抿的嘴唇，显示出他的决心和痛苦。

听证开始后，首先由托马斯和希尔宣誓，保证自己将尊重法律，不说半句假话。至此双方都异乎寻常地沉着冷静。

宣誓之后，托马斯离开大厅。首先由希尔作证。

“希尔女士，首先请你说明为什么要指控大法官托马斯？”议员开始发问。

“对我来说，像今天这样与旧上司一同站在司法委员会面前，指控他当年对我的人格侵犯，我很难过。但是，10年来，我一直生活在那场恶梦里，时刻不得安宁。良心督促我，应该在公正的法律面前说出真相。

“那是在我25岁那年，跨出耶鲁大学法学系大门后，我应聘到教育部任托马斯的法律助理。从此与托马斯共事两年。

“我对新上司的第一印象很好，他平易近人，又能体谅下属。然而上班不久，我就开始被他那种有特殊含义的目光所困扰，我担心什么事情——我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终于在3个月之后的一天，下班前，我整理好文件正准备回家，托马斯拦住了我，约我当晚和他共进晚餐，我很震惊，但我很快拒绝了他。托马斯并没有被我的拒绝激恼，相反，他继续纠缠我，多次约我出去，都被我拒绝了。

“我永远想不到仪表堂堂的托马斯先生竟是这种人！被我多次拒绝后，他改变了方式，约我去办公室谈论工作，我无法拒绝，是的，大家应该知道，

我是他的助手，下属无权拒绝上司与你谈论工作，除非你想辞职。”

接下来的是短暂的沉默，整个议会大厅里静得出奇，人们都屏息注视着希尔。

希尔终于无限痛苦地接着开口了：

“那是一段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感到屈辱和痛苦。至于今天在公众面前当场表白，更使我困窘不堪。托马斯先生名义上说要谈论工作，实际上却是在用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回报我对他的拒绝。他毫不遮掩地向我谈起他在色情电影中看到的镜头，如女人跟动物性交，或者强暴镜头等。还给我看一些有各种色情动作的黄色书刊、他还自夸自己性本领如何高，说一些挑逗性的话语来羞辱我。

“托马斯的性压力一度使我非常消沉，我每天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不知道这个男人这一天又要耍什么新花样。

“也许有人会说，我应该离开他。可是作为一名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就业的机会并不很多，而且事实上我喜欢这份工作，所以我只有忍气吞声。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悲观情绪被他察觉，托马斯一度停止了骚扰。这就是当他就任就业机会平等委员会主席时，我作为助手也随他而去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错了。托马斯的压力再度压到我头上。他夸我的衣服使我性感、迷人，并再次向我发起了攻击战。一次，他指着桌上的可乐说：‘谁把体毛放进我的可乐里？’巨大的心理压力给我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我整天生活在抑郁寡欢之中，托马斯的影子如同恶魔般围绕在我的周围，我时常失眠、食欲不振，1983年2月下旬，我终因剧烈胃痛住院达3个星期之久。

“我清醒地认识到，托马斯这类人，积习难改，只能永远离开他。这时欧若罗拔茨大学向我发出了邀请，这才使我从地狱般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诸位也许会问：‘既然托马斯的行为已严重干扰了我的生活，为什么不在事发时，而是在事隔10年之久的今天才提出指控？’

“我承认，10年前没有及时采取行动是我一生的罪过。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确有错。我认为向世人公布这段经历，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托马斯先生。

“记得我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工作的最后一天，托马斯找我谈话，他说，如果我把他的行为告诉任何人，都将毁了他的前程。这不能算道歉。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我与托马斯先生并无任何私人怨仇，但时至今日，除了向公众说明真相以外，我别无选择。”

希尔作证后，她的4个证人来到参议院作证。其中两人证实希尔告诉过他们托马斯很久以前对她进行过“性骚扰”，两人作证她说过她的上司对她进行性攻击。

托马斯面临的第二个控告者是安吉拉·莱特，这位前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发言人、现任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观察家报》编辑的女子曾对记者说过这样的话：“我对那个男子知道得够多了，他是十分有可能做出希尔指控的那些事情来的。我从自己的经历中知道希尔一定在讲真话。记得有一天，同事托马斯忽然对我说：‘知道吗？你的外型很吸引人。’紧接着就问我：‘你的胸围有多少？’我感到羞耻，立即顾左右而言他。此外，这期间，他经常与我约会，甚至不经邀请就来到我的住处。”

在听证会上，安吉拉·莱特镇静地陈述了托马斯对自己的骚扰经历。她

说：“他是一个到处骚扰别人的人。看到有关希尔的报导以后，我内心有一种罪恶感。我希望不要让这类人进入最高法院，那是美国的耻辱。”

之后，卢维达·科曼作证说，还在耶鲁读书期间，托马斯就对她谈论他所看过的低级下流电影。

另一位妇女苏凯瑞·哈德奈特，托马斯的前特别助理也在听证会上抱怨说：“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工作期间，托马斯周围的工作环境使人感到压抑。只要你是位黑皮肤的美丽的年轻女性，你就休想让职员们把你当成一个平等的人看待。你会被人盯视打量，品头论足，因为你是女性。”

听证会暂时休会后，下一阶段由议员们向希尔及其证人诘问。

一个议员首先发问：“希尔女士，你能回忆一下9月9日布鲁德尼先生同你在电话里的谈话内容吗？是否其中一些内容导致你向司法委员会提出指控？”

希尔回答：“我们谈论了许多不同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关于‘性骚扰’的法律条文，他告诉我上诉的程序并询问我所经历的细节。”

“此外，我们还谈到如果我向司法委员会提出指控，这之后将会有来自委员会方面的调查，我也会被委员们细细盘问，甚至谈到这件事情的结果有可能影响到大法官提名人及白宫。”

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接踵而来：“希尔女士，如果有人向你保证说，你不必到公共场合露面，你的名字也不会公之于众，你不必做任何事情，只要在你的供词上签上一个名字就行了。你是否会为之所动？就像《今日美国》所报导的那样：‘可能有人暗中秘密指使他从提名中撤出。’我现在并不是问你是否有此事，我只是想知道万一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这一类话是否对你很重要并对你产生影响？”——言外之意，你是否被某个利益集团所收买？

希尔答：“我不记得谈论的细节了，我也不能确定是否这种话会在我心里留下印迹，我的确只能这样讲。”

接着又有人问及指控的时间——为什么不在事发当时，即10年前提出指控。

希尔承认这是她自己的一项错误的，现在是她“克尽其职的时候了”。

又有议员发问：“希尔女士，既然你说托马斯的骚扰使你非常痛苦，那么为什么在他到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赴任时，你没有留在教育部，而是再次随他前往？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正如我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托马斯的骚扰一度终止，这是我随他去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工作的第一原因。第二原因在于，当时人们在风传里根总统正打算裁减教育部职员，这使我担心会失去工作。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我没有趁机离开他，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我的一个极端愚蠢而荒唐的决定。只能给自己招致更多的痛苦。”

“希尔女士，你所指控的事情发生在10年之前，我不敢肯定你会记得清楚。所以我想请你告诉我上个月所发生的事情。”

希尔：“我的确是在指控10年前的事情。我不回忆那次电话谈话了。但是我必须对你诚实，关于你所问的事情我没有更多的要说了。我知道可能有许多事情要发生了。”

“你所说的可能发生的许多事情指的是什么？”

“我所说的那次谈话的实质与你的看法迥然不同。那次谈话是纯洁而明晰的，现在它已被人渲染得面目全非。至于我的指控，那是我清楚地记得10

年到 8 年前发生的事情，在我心里，它们如同昨天才发生的一样。我知道有人指责我不能清楚地回忆起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作为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经历，它非但不会随着时光飞逝而模糊，相反，却会随着时日的增加而在我心上加深烙印。我相信今天在场的各位，在自己的生命中，都有一段终生铭记的经历，难道有人会忘记那些刻骨铭心的事件吗？”

到底不愧是法律教授，希尔一席谈话言词犀利，使听众们不由得暗暗为她叫好。这是饱受“性骚扰”之苦的不幸女性，今天，她在接受测谎试验之后，依然表现出可以信赖的平静与坦然。连国会中以前支持托马斯提名而认为希尔在捏造事实的议员也不免动摇了自己原来的看法。

旁听席上希尔的父母，这对养育了 13 个子女的黑人夫妇也深深地为女儿的表现而感动，脸上露出一丝欣慰。

最后一个问题使所有人感到困惑：“既然托马斯严重干扰了你的生活，你似乎应该避之唯恐不及，你能说明为什么在此之后——在你离开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之后，又主动多次打电话给托马斯的原因吗？而且，从电话记录来看，你们当时仍保持一种良好关系。”

希尔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并不能令人满意，她说：“我承认我确实主动给托马斯打过电话，但是这些电话都是关于工作方面的事情，如我所任教的大学委托我请托马斯先生前来做报告等。”

希尔作证的时间，前后长达 7 小时，至此暂告一段。下面将由托马斯出场作证。

#### 四、托马斯痛击流言 两控辩真假难分

提名大法官托马斯在听证会前宣誓以后，便离开会场。直到结束对希尔漫长的听证后，才返回会场，回答议员们就希尔指控的质询。

他的表情使许多旁观者相信这的确是一个被人冤枉、蒙受不白之冤的“弱者”。

开场白也颇能打动人心：“我很遗憾今天在这种场合与大家见面。我10年前的女同事安妮塔·希尔对我的莫名其妙的指控，使我和美国正义的人民一样感到震惊。然而我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泥沙掩不住黄金，正义与公理在人民手中，风言风语不会玷污我清白的名声。圣经上说，人有三个名字，一个是父母给取的名字，一个是别人喊他的名字，另一个名字是他自己赢得的。我相信身正不怕影斜，上帝是我的最好的法官！”

旁听席上一片掌声响起，听证开始了。

首先由听证会主席辛普森发言，他向托马斯问道：“托马斯先生，你是否观看了希尔教授对你提出指控的听证会？能告诉在座的各位，你的感想吗？”

托马斯答道：“对不起，主席先生，我已被巨大的流言之网缠住，根本不想去听这类荒谬绝伦的疯言疯语。这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我感到非常抱歉的是，我同样给我的妻子维吉尼亚和儿子、母亲带来巨大的创伤。作为一个丈夫、父亲和儿子，我深感内疚。今天，我有公平的机会来洗刷某些心怀叵测者强加给我的恶劣名声，我想说，还我清白，还我正义！”

辛普森说：“我很高兴你能这样想。今天有这么多人出席听证会，你的机会来了。我想没有收看听证情形或许对你有利，因为它可能会影响你的情绪。”

“谢谢主席先生，我想希尔女士已经向听证委员会介绍了我和她的工作关系，这里我不再重复。但是我要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地告诉在座各位及听证委员会，对于她今天针对我的各项指控，我一概否认。我要特别向我的妻子维吉尼亚表示感谢，是她看了听证会，然后向我转述。我无法想象，没有她的支持，我会不会坚持到今天。”

“托马斯先生，你是否多次约会希尔女士？”

“我和希尔有过约会，但仅只有一次，我没有像她描述的那样，三番五次（她说有10多次）约会她，绝对没有，我对上帝发誓。”

当问及是否曾向希尔描述色情镜头，让她看黄色图片，口出污言秽语时，托马斯显得异常愤怒，但决不是恼羞成怒，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不是。他的表现明显是一个蒙受了不白之冤、身心受到巨大摧残的无辜者的形象。这一点，在场的人都能感觉出来。

他斩钉截铁地断然否定了每一项指控：“没有”、“绝对没有，先生”、“没有发生过”、“我发誓没有这件事”。

然后，他陈述了自己与希尔的交往：“我时常开车送她回家，有时进门喝杯可乐、啤酒或吃点东西，然后我们一起争论一些政治问题，时间一般在45分钟到一小时之间。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其他的什么事情，我只是把她作为我的好朋友之一。至于她虚构出来的什么我跟她谈论女人与动物发生性关系、杂交、强暴镜头、大胸脯女人的性交动作等不堪入目的下流字眼，我敢向上帝发誓，这纯粹是希尔的一派胡言！由安妮塔·希尔对我提出这样的

指控，使我格外伤心，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她是我全心全意帮助过的朋友之一。我开始怀疑我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对好心得好报这句老话丧失了信心。”

他说：“我搜肠刮肚苦苦思索，希望找出我到底对安妮塔·希尔说过或做过什么，会让她指控我对她有超出工作以外的兴趣，以及我曾跟她谈论过色情或X级的电影，但是我一无所获。

“我否认今天对我提出的每一项指控，否认用任何方式表示我曾与安妮塔·希尔谈过与性或色情有关的话题，否认我曾企图跟她约会，或我个人曾对她发生任何兴趣，否认我曾用任何方式骚扰过她。”

接着，托马斯话锋一转，开始激烈抨击司法委员会及其为确定托马斯是否适合出任大法官所举行的由电视台在黄金时段现场直播的听证会。

“没有任何工作值得我为它忍受这么多痛苦。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伤心的恐怖事件。如果你们高兴，就认可我的任命，如果不愿意，就不必认可。让这个程序就此打住吧！”

“这是一场马戏，这是国耻！从我身为美国黑人的立场来看，就我个人来说，这是在对胆敢有自己的想法、胆敢自己做事、胆敢有不同思想的有骨气的黑人施以高科技的私刑。这是个信息，除非你向旧规范臣服叩头，否则这种事情就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会被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私刑、摧毁、耍弄，但不是被吊在树上。”

他愤怒他说：“这不是美国，这是卡夫卡主义的做法。这必须停止。为了以后的被提名人 and 为了我们国家，这种做法都必须停止。我要声明，我出席今天的听证会不是为了挽回我的提名，而是要恢复我的清白。

“在整个程序中，我和我的家人被失去控制、如脱缰野马的参议院提名认可过程所出卖。在充满流言蜚语、怪诞恐怖的参议院认可过程中，尽管我无所畏惧，然而至今我也无力克服这个过程。它正在毁坏我们的国家，比麦卡锡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希尔的证人，安吉拉·莱特，托马斯也不屑一顾。当参议员辛普森问托马斯：“据说当初是你解雇了安吉拉·莱特，你能说明你为什么要解雇她吗？”

托马斯是这样回答的：“我解雇她纯粹是由于工作关系，因为她办事效率低，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各位，她的被辞毫无个人恩怨的成份。完全是工作关系，纯粹是工作关系。”

议员接着发问：“安吉拉·莱特已向听证委员会作证你曾对她有过人格侵犯和逾矩行为，对此，你又作何解释？希望你如实向听证委员会说明真相。”

“我只能说那纯粹是造谣中伤，那些事情从未发生过，我也从来不曾有过这样或那样她所编造的不良企图。”

“那就是说，你一直都这样，那是你惯常的作法，是吗，托马斯先生？”

“是的，这就是我一惯的作法，我的同事们对此有目共睹。我不是游戏人生的人，无论是性骚扰或任何别的诬蔑都不会改变我的本性。我自信自己是正派、认真、尊重女性的人。因为她们是我们的妹妹。”

对托马斯的听证共进行了两天。在12日和13日，托马斯连续出席两场听证会，席间他用激烈而尖锐的言辞，为自己讨还“清白”，从而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黑人团体中赢得广泛支持。一些黑人纷纷打来电话向他表示支持和

同情。他的白人妻子维吉尼亚在旁听席上手绢抹泪的情形和托马斯在听证会上红肿的眼睛，都给公众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托马斯的确是无辜者。

结束对托马斯的听证以后，开始由托马斯的证人作证。除了对托马斯的性格、品质、能力等大加褒扬以外，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攻击了希尔及其证人，认为他们在制造谎言、危言耸听。

托马斯过去的同事、现为非一美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弗洛伊德·哈伊教授出席作证时说：“从1985年3月到1986年7月，在托马斯先生担任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主席期间，我担任托马斯法官的特别助理。

“根据我在这个委员会期间的见闻，其中包括出席一些部员会议，我认为托马斯先生是一个头脑敏捷、办事干练的官员。他富有同情心，对人谦恭有礼，与同事相处融洽。同事们一致认为他精通业务，谦虚谨慎。至于与女性职员的关系，托马斯先生也表现得无可指责。他从未对女性职员有过不严肃的举动。我在委员会工作期间，从来没有听过一丝一毫关于托马斯先生对妇女轻慢的风言风语。此外，在我与托马斯先生的几次有限的交往中。我从来不曾听到他有任何否定妇女作用的片言只语。因此，我反对安妮塔·希尔对托马斯先生的指控，在我的记忆里，托马斯先生的工作成就与人格品质同样值得我们大家尊敬。”

曾与托马斯共事7年的一位同事接着说：“在共事的7年中，我们曾共同参加了上百次会议，私下里也有一些交往，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听人讲下流故事，更不用说由他自己来讲述了。人们认为他有些保守、不合时宜，当时办公室职员中一句流行的口头禅是：要想为托马斯工作，必须先洗净双手。”

珍妮·布朗，托马斯以前的一位女同事回忆起她与托马斯交往的经历时，无限感慨他说：“几年前，在我为遭受性骚扰问题而苦恼的时候，除了我最亲密的家人以外，托马斯是向我提供了最多关怀和同情的朋友，没有比他更细心、更敏感、更义愤填膺的人了。”

托马斯的大学同学，爱德华·金肯斯追忆托马斯还在上学时期，就与同学争辩说应该尊重女性，他曾写过一首诗《你是不是兄弟》，托马斯在诗中阐发的中心思想是：如果你不尊重妇女，你就不是他们的兄弟。另一同学里纳德·库柏也作证说：“托马斯一直很尊重妇女，他时常激烈指责那些轻视妇女的行为。托马斯对低级趣味的X级电影，总是认为荒诞不经，在同学中多次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

证人们指责希尔的为人，认为希尔突然对托马斯提出指控，远远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作为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小镇上的黑人的女儿，安妮塔·希尔给人们的印象是沉默寡言、不甘落后、有强烈的进取心。她也与人约会，但不多。她安静地听人交谈，很少插话，听到有趣的事情时，总是抿嘴一笑。但是在同学中，她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她“很有礼貌，有良好的修养，从来没有缺过一次课”。“她是一个说话直来直去的人。”她的同学这样回忆说。

但另一方面，希尔又是一个喜欢浪漫的女人。她的大学同学威廉·肯纳德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约她去看一部浪漫影片。”

希尔的女同事中的一些人则认为希尔好胜心强，是一个不甘落后的女人。同事们认为，在托马斯与希尔工作期间，看不出任何令人不愉快的迹象。

安德鲁·费歇尔，这位安妮塔·希尔在联邦教育部任职期间的上司，否认了希尔关于怕失去工作而不得不随托马斯去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工作的证

词。

他说：“我不同意希尔女士关于她离开教育部的原因是怕失去工作的证词。在这段时期内，教育部的职员们从来不曾面临失业的危险。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的财政开支来源，从而不必裁减职员。此外，也没有职员会因托马斯调走而感到自己的工作面临危机。为了便于继续开展工作，托马斯先生临行前特别介绍了亨利·辛格敦接替他的职位。

“希尔怕失去工作而跟随托马斯调动工作的说法没有丝毫根据。相反，当时她对我谈起她已被托马斯选中去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就职，谈话中，她对托马斯先生充满了崇敬和赞赏。

“事实上，希尔女士后来也和我谈起过她离开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转而成为一名法律教授的事情。她说她很感谢克拉伦斯·托马斯为她提供的工作机会，他一直都支持和鼓励她在事业上奋力进取。”

安德鲁·费歇尔的一番追忆无疑向人们显示托马斯与希尔一直保持一种良好关系，希尔描述的恐怖事情在他看来绝对不可能。

希尔曾经执教过的一所大学的同事作证说，在1983—1984学年期间，希尔邀请托马斯来大学作讲座时的表现，很难让人相信她今日的指控。

这位教授作证说：“当时由我负责举办一次关于就业歧视方面的讲座，需要一位这方面写过专著的专家来座谈。希尔向我推荐了法官托马斯，当他们共同出现在校园时，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亲密关系。”

一位前同事作证说，希尔是因为对托马斯倾慕有加，而“走火入魔”，是患了“痴想症”、“狂妄症”。他指出希尔曾多次对托马斯的工作能力及对妇女问题的关注给予高度赞扬。希尔现在的表现明显是一个犯了“歇斯底里”病的变态者。

这时，支持希尔与支持托马斯的作证者之间一场激烈的辩论开始了。

先是在十月十三日，参议院收到了一封署名苏凯瑞·哈德奈特的来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参议员先生：

1985年至1986年期间，我曾在托马斯任职的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中任职。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想披露当时“父亲般的工作环境”的真相。我必须首先申明，我写这封信，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受害者。

克拉伦斯·托马斯时时作出这样一种虚假的姿态，对手下的职员他似乎是父亲对子女、良师对学生。然而，这并不是事实。如果你是年轻漂亮的黑人女性，你就会被看作是单纯的女性。如果你能随时围着他转，听从他的召唤，你就会被别人格外关注，这是由于他的缘故。反之就会成为“被遗弃者”。

我理解为什么他的一些特别助理来为他作证的原因：他们是他们认识的人中最有权的黑人，也是他们所认识的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需要和他保持密切关系，因为他们需要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界中生存和发展。但是那些关于友爱、助人、反对性骚扰的证词完全是一派胡言，自从产生了性骚扰的空间，女人便深受其害。

毫无疑问，克拉伦斯·托马斯的办公室便是这样一个处所。我在知道总统提名后，曾向参议员讲述过这件事，但是鉴于目前听证过程中的虚假作证之风，我感到有必要再写这封信以公之于众。

您真诚的苏凯瑞·哈德奈特紧接着苏凯瑞的来信之后，托马斯的前秘书迪恩·豪特针对苏凯瑞的来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这位曾在 1981 年 5 月至 1987 年 9 月担任托马斯秘书的证人声称，苏凯瑞信中描述的情形与事实大相径庭，她认为苏凯瑞是一个因为工作失意而对上司不满的女人，“我从未听到她谈起性安全问题或是埋怨办公室里的气氛使她感觉不舒服。我也从未听到别的雇员这样讲过。

“此外，在我为托马斯工作的 6 年期间，托马斯手下的雇员中有许多非常迷人的女职员，我敢担保她们中也没有人因为性歧视的环境而感到不舒服。”

支持托马斯的证人们还对希尔最有利的证人安吉拉·莱特大肆攻击。

他们认为安吉拉·莱特是个工作表现不稳定、满腹牢骚的前雇员，其指控不值得相信。她的一位上司说：“我一直在抱怨她对从事的工作极不胜任。”

一位职员回忆说，安吉拉被解雇是因为她没能安排好一次有许多人参加的重要会议的准备工作。

他们还认为安吉拉不是正直、善良可以信赖的人，她会“不加思索就去攻击一个人”，“经常抱怨上司”。在工作中她经常早早下班，“花很长时间吃午饭”。当上司警告她如果她的表现这样继续下去，将解雇她时，她马上搬出种族歧视的帽子……

人们形容她是一个记恨心强、喜怒无常的、不成熟的女人，她喜欢在男人面前卖弄风情，然后向人吹嘘哪个男人被她俘虏，她喜欢有男人参加的机会。

总之，这些证人认为安吉拉·莱特的指控根本不值得信赖，这个出生于民权革命时期南部黑人家庭的女子，充其量只是一个被上司炒了鱿鱼心怀不满、动机不纯的抱怨者而已。

不管作证者的动机如何，自此一场真假难辨的论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 五、举国争议性骚扰 象驴大战国会山

关于托马斯的听证会，在证人之间激烈辩驳的同时，美国社会上也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潮，整个美国都卷入这场风波。许多人将听证会的情形录了下来，反复播放。从报纸电台、街头巷尾，到百货商店，希尔诉托马斯“性骚扰”一案成为公众流行话题。人们在这两位有丰富经验的、从容镇静的法律界名人之间不断猜测揣度。从法庭上的个人表现看，显然无法判断谁在讲真话，因为二人都训练有素，侃侃而谈；从人格上来认定，证人各执一词，公众也莫衷一是。

这一风波引起了白宫的关注。布什总统在10月11日这一天非常恼火他说：“‘性骚扰’的指控使一个正直而高尚的人受到中伤。我相信他在听证会上的发言讲的是真话、他列举了令人信服的强有力的证词。损害是很严重，然而他天生的正直和高尚操守，却使得即使是此种‘性骚扰’指控也不会对他有无法挽回的伤害。……今天大家看到了一个正直、高尚的人讲出了心里的话。他应该会被认可，我的意见是说他将获得认可，而且最后他将会得到他的良好名声。因为美国人民是公正的。”

白宫发言人费茨沃特也公开表明自己支持托马斯的立场不会变。他说：“我们对托马斯法官有完全的信心，未曾讨论其他。”

美国副总统夫人玛莉琳在美国广播公司电台节目中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性骚扰”问题是一个极普遍的问题，所有的职业妇女都可能遇到这类问题：“讨论‘性骚扰’是好现象，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领域。”

接着，玛莉琳回忆起自己在法学院遭到教授“性骚扰”的情形，同样，她也没有迅速采取行动，而是注意防范，“未让事态发展到恶劣的程度”。

美国前众议员和副总统候选人法拉丁·法拉洛第一次向公众公开了自己在18岁任办公室文职人员时遭受过的“性骚扰”经历，以声援希尔。

她说当时她在曼哈顿一家会计公司担任兼职打字员，她的老板总在她工作时紧紧跟在她身后，她被迫故意打错字以迫使他离开，后来，她的老板甚至对她动手动脚。

法拉洛说：“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拿了支票就辞职……这是1953年，我还是一个小女孩。那个时代你不能投诉，只能辞职。”

法拉洛说：“我，就像数百万美国女性一样，碰到这种状况，真是觉得难以名状的羞辱、懊恼和自暴自弃。1953年，我也面临走投无路……”

她认为：“这件事值得注意。让我们看看，托马斯不仅将在他的余生，也将在我的余生担任大法官。那种漠视女性的行为是很严重的。”

与此同时，一些妇女团体也向希尔发出援助，她们走上街头，拉起巨幅标语，高呼：“希尔，对托马斯说不！”许多深受“性骚扰”之苦的女性也纷纷打电话给希尔，鼓励她坚持到最后一刻，不要向任何人低头。

当然，托马斯也有自己的支持者。一个妇女团体写信给托马斯说：“请接受我们对你毫不动摇的支持，不仅是现在，也包括你的余生……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尽管打电话。”

原告希尔在这个过程中不但被记者们“围追堵截”，还受到几个陌生人的电话骚扰。

第一个电话里，一个男子对她说：“你这个说谎者，如果你认为‘性骚扰’不是好事的话，你等着吧。”

第二个打来的电话,只是一阵电台播音,希尔愤怒地称之为“纯粹骚扰”。

第三个打来电话的是个女子,她故意装出男人的声调说:“拿起电话来,我是克拉伦斯。”之后是一阵嘲笑、讥讽声。

有人专门就这一事件在美国公众中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有57%的美国公民认为托马斯的证词诚实可信;相信希尔者只占43%,托马斯在民众中显然已占上风。

在掌握二人“生杀予夺”大权的听证委员会内部,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共和党与民主党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共和党议员支持托马斯,竭力为他开脱“罪名”;反对托马斯提名的民主党则竭力诋毁他。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奇案不奇,托马斯一案看起来蹊跷,实际上是美国两大政党共和党与民主党争权夺利的结果。

由于最高法院在美国有“五票决定一切”的重要作用,所以历来成为两党相争的重要目标。最高法院原有的8名法官中已经有6名是保守派,如果再加上持保守观点的托马斯,最高法院中的保守派与自由派之比将为7:2。托马斯在堕胎、种族等敏感社会问题上的保守立场,使自由派的民主党极力阻挠托马斯进入最高法院。

以堕胎问题为例。在美国,堕胎问题一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

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堕胎案中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裁决,妇女首次获得自由堕胎权。在怀孕的最初两个月内堕胎受法律保护,3个月之后,要据孕妇的健康状况作出决定,除非是为孕妇的生命安全着想,否则在婴儿出生前的最后几个月内,不许堕胎。

这项法案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两党激烈斗争的焦点。

民主党坚决支持这一法案,甚至希望进一步放宽对堕胎权的限制,而保守派则从“保护人类生存权”的前提出发,顽固反对。到里根与布什共和党执政期间,曾试图修改或取消这一法案,说是因为它每年导致大量未出生的婴儿被扼杀于母腹中。但是反对者立即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对此,美国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合会执行会会长凯特·米彻尔曼说:“如果罗诉韦德裁决被推翻,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个政治景观将要改变。”

托马斯是一位持保守观点的法官,他在罗诉韦德堕胎问题上的保守立场,使他成为民主党攻击的对象。

1991年6月27日,第一位黑人大法官马歇尔宣布辞职,布什总统立即宣布由托马斯继任,并将这项提名交由参议院讨论通过。

布什的这项提名显然是经过一番考虑才决定的。从里根到布什,美国最高法院已由以前50年代自由派掌权转为以保守派为主,总统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政策在将来的连续性,可谓处心积虑,绞尽脑汁。

但是,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在参议院讨论过程中,遇到了来自民主党的阻挠,是否接纳这个保守派的大法官进入最高法院,成了两党争执不下的问题。为此,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1991年9月18日至20日举行听证会,就大法官托马斯的道德面貌、工作能力、司法观点等问题进行听证,以作出最后决定。听证会的情形由美国CNN电视台向全国实况转播。

1991年9月18日至20日,参议院司法会举行第一次任命听证会,会上两党发生激烈争执,反对者想极力挫败托马斯的任命。他们对托马斯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如“你对罗诉韦德案有何看法?”应该说,托马斯的答案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对于议员们提出的问题,他多以“不知道”之类的话掩

塞过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如此。他否认在过去的 17 年里曾与任何人谈论过这一案件。参议员讥讽他“这是我所听到的最没有水平的推倭之辞”。结果在 9 月 29 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表决时，双方以 7 票对 7 票的僵局争执不下。托马斯任命一事被递交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投票表决，时间定在 10 月 8 日。当时，参议院中除 41 名共和党议员赞成托马斯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外，还有 13 名民主党议员也支持总统提名。托马斯的任命似乎已成定局。

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10 月 6 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及纽约长岛的《新闻日报》却率先披露了托马斯曾对女部下希尔进行“性骚扰”的新闻，顿时举国舆论哗然。妇女团体尤其愤怒。参议院中民主党女议员如纽约州的史劳特、加利福尼亚州的波瑟、夏威夷的明克、华盛顿州的安苏德等人一起奔赴参议院，表示对希尔指控托马斯一事的关切，并在参议会上指出，应该在调查清楚是否真有其事以后，再对他的任命进行投票。参议院中本来就反对托马斯任命的议员也强烈要求查清此事，才能最终投票。参议院为此被迫决定将最后投票日延长一周至 10 月 15 日。并决定在 10 月 11 日至 13 日举行第二次听证会，单纯就托马斯法官的个人品行进行听证，民主党与保守党各推 3 人作为质询人，对托马斯、希尔及其证人进行了长达 3 天的听证。

至 10 月 15 日，参议院最后表决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两党从托马斯提名开始的尖锐冲突经过第一次听证会，第二次听证会，逐级增温，终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不论是民主党还是保守党都倾尽全力，使出看家本领，为使本党获胜而拼力“厮杀”，一场唇枪舌剑、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国会里正式爆发。

## 六、是与非各执一词 听证会难解难分

归纳起来，听证会上托马斯的支持者们主要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为他们所拥护的大法官撑腰打气的：

这些保守派的议员们猛烈抨击了将希尔指控曝光给电台、报纸的行为。认为是某些利益集团别有用心。关于这项指控的调查报告本应严格保密，并在宣誓书上签字，保证不外泄。联邦调查局未能保守秘密，成为保守派手中的一大把柄。他们攻击这种违法行为违背了司法和参议院法规，提出必须追究主要责任者，并加以必要惩罚。

议员们指出，希尔的指控不早不晚恰巧在参议院即将举行最后投票的 11 个小时之前公诸于众，矛头所向不言而喻。

从希尔提出指控的态度变化，说明希尔是为人利用。据说希尔的两个证人证实，希尔在当年 8 月份谈起托马斯的提名问题时，对他还倍加赞赏。而在第一次听证会进行期间，她却向联邦调查局提出了指控，但仍要求以秘密方式进行，那么为什么到最后投票表决前夕，她却一反常态，不但亲自在电视节目中指责托马斯，而且言辞愈益恶毒、激烈？

保守派议员坚信希尔被某个利益集团所收买，在听证会上公开说谎。

为什么希尔不在案发的当时，即 10 年前向上司或司法部门反映托马斯的不良行为，而要保持缄默达 10 年之久？尤其是联想到希尔本人是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本人又对民法颇感兴趣，完全懂得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如此行事，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她所陈述的“事实”只是想象。

为什么希尔在受到“恶魔”般的“性骚扰”并为之严重苦恼时，仍跟随托马斯从教育部转调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赴任？担心失业的托辞完全没有理由，有谁会相信堂堂耶鲁大学毕业生会找不到工作？

希尔的朋友们作证说，希尔曾对她们讲述过托马斯对她的“性骚扰”，但是他们没有细节可以陈述给听证委员会。况且，她们作为大学法律系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法律知识、谙熟法律条文的高级知识分子，竟然没有劝说希尔向法律寻求公正，似乎也有忤常理。

希尔的指控没有目击者，而且其指控的内容听起来更像一部荒诞小说。况且事隔 10 年之久，这些内容的真实性更值得怀疑。

为什么在托马斯身边工作的其他女性，从来不曾抱怨过那种压抑的性歧视环境？相反，他们作证赞扬他对妇女的尊重。难道托马斯能在希尔面前一幅面孔，在别人面前却是另一幅面孔吗？

如果那些肮脏的字眼如“可乐”一例的确发生过，为什么在她 1991 年 9 月 23 日的指控中没有向联邦调查局提出？为什么这一指控与 1988 年的一个案例极其相似？难道是因为法律教授希尔对此案曾密切关注过吗？任何人只要对照一下，就会发现二者何其相似！

如果托马斯的确对希尔有过“性骚扰”，她为什么还与托马斯密切来往？按照一般的情形看，受害者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

关于这一点，议员们又摆出了如下的两条证据：

为什么希尔会向她任教的大学推荐托马斯来做关于性别歧视问题的报告？为什么托马斯到学校以后，他们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很亲密？他们不但共进早餐，而且希尔还亲自驱车送托马斯去机场。

为什么希尔从托马斯手下“解放”出来以后，还主动打电话给托马斯？

根据托马斯的个人电话记录，希尔主动给托马斯打过 11 次电话，其中一次，她仅仅打电话向他表示问候，还有一次是向托马斯新婚表示祝贺。

反驳希尔指控的议员们，坚称希尔是在信口雌黄，是一个患有“ 虚幻症 ”、有“ 烈士情结 ”、对托马斯倾慕已久的女人，或者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女人。

同样，另一个重要的证人安吉拉· 莱特也遭到了这些保守派议员的攻击。他们搬出她工作成绩不佳、好勾引男人、有虚荣心、好抱怨上司等一系列性格特点，指责她只是一个对上司心怀不满的旧部下，证词不足为凭。

另一方面，这些保守派议员对托马斯的各方面成就、性格、人品等大加赞扬，指出他是大法官的最佳人选。

议员劳特说：“ 我认为现在是在我在公众面前公开我支持大法官克拉伦斯· 托马斯先生的立场时候了。

“ 我想回忆一下上周发生的事情，我观看了听证会的情形，结果更坚定了我的立场。

“ 首先，我注意到他的背景，我深深地被这个出身小镇的令人尊敬的人的一生经历所感动。现在他终于历尽磨难，取得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他将成为最高法院里的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根据他的出身，我相信他会给高等法院的提名与任命带来某些重要的东西。他必将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民主产生深远影响。

“ 关于教育，众所周知，他所受的教育使他完全具备担当这一重任的素质。

“ 从他的经历中——我已经注意他许多了，我认为他不只在平常的工作中而且在这次听证会期间，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他表现非常出色。他本人已经是联邦法官，从这一点来说，也具备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条件…… ”

议员比登发言说：“ 我同托马斯先生已经相识 11 年了，我已经出席了有关他的 5 次任命听证会，我亲自主持过 3 次，即他在教育部与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中的任职提名，然后我又出席了他出任哥伦比亚地区法院法官一职的听证会。

“ 作为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主席，他被许多极左人士所憎恨，即使如此，他仍然做出了惊人的成绩，以至于《华盛顿邮报》也刊文恭维他。

“ 我要告诉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克拉伦斯· 托马斯是一个诚实谦恭、品德高尚的人。我相信如果大家联想到他出身如此贫困，之后又经历了离婚的挫折，期间，他不得不卖掉他仅有的一辆汽车，以供儿子继续上学，这不像一个品质恶劣的人。

“ 他有着无上的美德，每一个与托马斯共过事的人，每一个认识托马斯的人，每一个与托马斯有过接触的人都了解他是一个好人，除了这个女人和其他的三两个人，我认为他们的指控不会淹没正义和公理。 ”

鉴于以上两方面情况——希尔指控的荒诞不经与托马斯个人素质的证明，这些保守派议员们否决了希尔的指控，坚持拥护托马斯加入最高法院，充当终身大法官，因为“ 这将对全体美国人民有利 ”。

安妮塔· 希尔的支持者则对这些评论反唇相讥，他们用一系列事实证明希尔证词完全可靠，参议院不能漠视一个深受“ 性骚扰 ”之苦达 10 年之久的无辜者的申诉，这是对美国 1789 年诞生的《人权法案》中的公民权利的无耻践踏，是对女权主义的一个沉重打击。

同时，这些民主党议员竭力攻击托马斯政绩平平，在法律界资历过浅，

没有法律观点……从而认为总统提名的候选人不具备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素质和能力。

关于希尔证词的可靠性，议员们的评论尽管五花八门，但大体集中于以下诸方面：

关于希尔在 10 年之后才提出指控的问题。

首先，这些议员指出，当时希尔仅有 25 岁。每个人在 25 岁时都可能犯错误，尤其是象希尔这样性格安静的女性。她没有在事发时告诉上司或向司法部门指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何况托马斯在工作上确实也给过她许多帮助。

其次，人们不应忘记，罗诉韦德案是发生于 1986 年的事，在此之前，“性骚扰”问题还只是一个不为人注意的问题，要想从法律上找到依据就更加困难了。

最后，10 年时间对希尔来说，完全是在痛苦中度过，这个国家已经欠希尔以及那些与希尔同样遭受“性骚扰”之苦的不幸女性大多。希尔能在 10 年之后来司法委员会作证，是需要克服社会舆论和偏见，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的，光从这一点来讲，也是值得钦佩的。

希尔不可能为“利益集团”所收买。希尔最初指控时要求为自己的名字保密，不希望公之于众，恰恰体现了她的性格特点。她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人，还在上学时“就不缺一堂课”，喜欢安静地倾听别人讲话，而不是自己来讲。后来，随着众人，尤其是妇女团体及那些蒙受“性骚扰”屈辱的女性的支持，她才最终克服了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勇敢地站出来，不再顾忌个人得失，在“性骚扰”这个困难的领域，发起了正义的冲锋。这种变化完全合乎逻辑，是无懈可击的。

希尔随托马斯从教育部到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任职，也不足为奇。在美国每年遭受“性骚扰”的女性中，只有 1%—7% 的女性向司法部门寻求帮助，大多数女性都只能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忍气吞声。女人面临两难选择：要么保持自尊，宁愿失业；要么甘心受辱，保住饭碗。而且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极少数勇敢者对冒犯她们的人的指控，她们会被认为是“好出风头”、“苍蝇不叮没缝的蛋”，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今天，希尔在沉默了 10 年之后终于鼓起勇气，向社会陈述自己的痛苦经历，不是照样被一些人诬蔑成是一个有“烈士情结”的好虚妄的女人吗？该沉思的是这个社会。

希尔的电话只是一些礼节上的问候，托马斯在这个期间如果没有和希尔通电话，料想希尔也不会主动打电话，况且六七年的时间才只有 11 次电话，根本无法说明他们的关系良好。遭受“性骚扰”的女性不一定与伤害他们的人彻底决裂，尤其是那些对他们工作上曾提供过很多帮助的人。

希尔在作证前已接受了测谎试验。当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官员问她是否愿意接受测谎试验时，她说“愿意”。然而就是这同一个为她做测谎试验的人，却反过来攻击她参加了测谎试验。他说有良好心理素质的人，即使说谎，也不会被测出来，那么，他为什么要求希尔参加这个测试呢？这对希尔来说，公平吗？

托马斯为什么要否认指控？从来没有一个被指控者会心甘情愿地主动承认对他的指控。何况，希尔的指控又是在办公室的小环境中发生的事情。托马斯知道希尔提不出直接目击者，这就是他敢断然否认的原因。此外，进入最高法院的愿望激励着他，为此，他做出一幅无辜蒙冤的姿态，以博取美

国公众的同情。他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因为有 57% 的美国人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希尔的同事们也对托马斯提出了指控，难道他们都是受希尔之邀，前来助阵的吗？即便她们的话只有 10% 是真的，那么托马斯先生的人格也要大打折扣了。

托马斯先生的大学同学说过，她们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读书的时候，就曾谈论过色情电影，难道同一个托马斯，在工作以后，就没有继续谈论 X 级电影的可能吗？

托马斯先生声称：他没有收看听证会的情形。作为一个多年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官，他应该明白证人的指控对他有多么重要，而他居然说他没有收听，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他是借此在他和参议院之间筑起一座高墙，使议员无法发问，因为“我没有收看”，如果一个人真的问心无愧、他会不敢面对指控吗？除非——这些事情的确实发生过！

托马斯先生声称：“只有上帝是我的法官，你不是我的法官。”当然，上帝也是我们的法官，我们不是上帝，但是我们有选举权，我们有权做出选择，这种狂妄的口气，不会让我投他一票。

(11) 托马斯先生指责整个听证过程，认为这是一场“马戏”，然而，我们要面对的是美国人民，我们必须对美国人民负责任，他要进入的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将影响这个国家三四十年的历史，这种谨慎难道有错吗？从历史上看，大法官的人品历来都是任命的一个依据，这又何足为奇！

(12) 托马斯先生试图用种族问题来遮掩事实的真相，他声称这个听证过程是以白人为首的听证委员会对他这个黑人的“高科技私刑。”托马斯先生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不但安妮塔·希尔是黑人，安吉拉·莱特也是黑人，听证过程只是依法律程序举行。只要我们听听议会外妇女团体的呼声，我们能对此无动于衷吗？种族问题的指称不但荒谬而且可笑，是经不起推敲的，简直是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

(13) 托马斯先生抗议这次听证会“毁”了他，然而事实上，这毫无依据。他大概忘了这不是法庭审判，只是听证，即使他的提名在参议院未能通过，他也可以照旧回到家中，做他的法官，开他自己的车，喝他的啤酒，看他的儿子玩足球，过他自己的生话。

从托马斯的个人素质来看，议员们也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托马斯不适于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议员们列举了托马斯在几次听证会期间回答问题的不尽如人意。对于议员们提出的各方面问题，他只是简单地回答“不清楚”、“没有考虑过”、“从来没有和人谈起过”，这类推诿之词，显然不是因为他缺乏司法知识，而是他为了进入最高法院，采取前任大法官苏特的“战术”，对参议员发问的敏感问题和自己的法律观点讳莫如深，使人无法知道他的缺点。

其次，托马斯到联邦上诉法院任职不过 16 个月，他所起草的案件裁决只有 27 件，与历来任命的大法官相比，他显然是资历过浅。

再次，他在种族问题上的独特视角，也成为议员攻击的目标。

托马斯认为，消除种族隔离是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想，白人永远不会公正地对待黑人。他反对有色人种优先的政策与措施，他曾经说过：“我一直反对强迫和诱使人们雇佣一定比例的少数人种的方案。”

批评托马斯的人认为托马斯进入高等法院不会帮助广大黑人群众。

所以一位议员就布什总统关于克拉伦斯·托马斯是“适合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的评论发表意见说：“我一直对这句话持有异议。我在全美国的 70 万名律师中权衡，我在一万名大法官中权衡，我在数以千计的法律教授中权衡，我在 875 名黑人法官中权衡，我在 200 位黑人教授中权衡，如果要我讲真话，我将不得不遗憾他说，我不赞成总统的提法。”

## 七、托马斯险遭否决 谁说谎仍为悬案

这场风波沸沸扬扬地发起，却虎头蛇尾地索然收场。

1991年10月15日，美国参议院在结束了对希尔指控托马斯一案的听证会之后，就克拉伦斯·托马斯就任大法官一事进行唱名投票表决，结果托马斯以52票对48票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这是美国历史上大法官提名人反对票最多的一次，托马斯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百零六位大法官和第二位黑人大法官。

1991年10月18日，白宫南草坪上阳光普照，一派节日景象，1000多人参加了托马斯就任大法官的宣誓仪式。这一盛大仪式由总统布什亲自主持，国会议员、托马斯的家人、来自他家乡针尖镇上的朋友都来向他表示祝贺。

这一场美国历史上罕见的丑陋、凶悍、剑拔弩张的有关种族、性别和党派的斗争，使托马斯百感交集，他说：“过去这段日子，我们一起经历了标准的战斗，现在是坐下来寻求解决办法的时候了。”“现在是向前移动的时候，是找寻我们国家优点的时候……是找寻解决方案而不是利用问题谋私的时候。我结束这个漫长的过程。我感谢上帝使我们度过最后那个痛苦的星期，使我今天能站在这里。”

托马斯的母亲，62岁的里奥拉·威廉斯说：“上帝作了最后的裁决。”

布什总统这一天也难以掩饰心中的高兴，他对参加典礼的人们说：“这个国家和最高法院将因有一个坚持原则的人而受益，他对全体美国人面临的问题和机会是敏感的，他是一个极端独立的思考者，有优异的司法头脑，热切相信一切美国人应享平等的机会。我为此感到高兴和欣慰。”

然而，反对派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托马斯是黑人和保守派，他就决不会当选。

看来这场“标准的战斗”远没有结束，它留给人太多的启迪和困惑。

公众认为，虽然托马斯最终闯过了“性骚扰”难关，但是，究竟托马斯与希尔谁在讲真话，却成为一个除两名当事者以外，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不解之谜。这一点连在司法委员会里任职大半生的大法官也难辨真伪。

如果托马斯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是无辜的。那么，希尔便在说谎。她在听证委员会的作证也只能被理解成是别有用心，如果不是她自己的观点，就是被人利用。利用她的人当然是反对托马斯出任大法官的民主党和其他利益集团。

可以猜测，他们先是指使希尔向联邦调查局提出秘密指控，希望在国会讨论托马斯出任大法官的问题上，给托马斯制造障碍，或迫使托马斯“激流勇退”，为避免自己卷入这样一场风波中，而主动弃权。

当这一指控没能打退托马斯的提名案，两派以7：7持平时，为了在10月8日最后投票表决的关键时刻彻底击败托马斯，这些利益集团中的某些人故意将消息泄露给报纸、电台，通过新闻媒体的作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从而迫使参议院不得不延朗表决。

再联系在为托马斯任命举行的几次听证会上，民主党议员的激烈抨击，的确不能简单排除这种可能性。因而在美国社会，许多大报小刊戏谑地称此为“生动的政治戏剧”。

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希尔没有撒谎。

那么，这场“戏剧”就更为荒唐。

以男性议员为主的国会议员无视一个深受“性骚扰”之苦的无辜女性的作证，是对女权主义者的一个沉重打击。美国报纸撰文《希尔覆辙，妇界警惕》，指出对“性骚扰”问题的指控困难重重，一些妇女团体愤慨他说：“参议院的一纸决定，使女权主义者几十年来的努力成果付之东流。”她们指出：女性因为“没权力，才会遭‘性骚扰’”。

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大讲“人权”的美国，这显然是对女性权利的一次无耻践踏。

再者，托马斯作为美国历史上继马歇尔之后的第二位黑人大法官，自称在这次听证会过程中，受到了白人集团施加的“高科技私刑”，在美国南部黑人中引起强烈反响。因此，这次提名中，也涉及了种族问题。

这次提名过程本身，也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深思，他们认为“浓密疑云一时难消散，最高法院连带受伤害。”一篇题为《沉痛检讨大法官提名及同意的过程》的文章认为，以后必须杜绝这种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幕僚公然泄密的违法行为，处理“性骚扰”案必须慎重、严肃。今后总统提名应与不同党派协商，以免像这次这样，不同党派“在性丑闻阴影下，使出政治小动作，导致对立情绪越来越激昂，手段越来越卑鄙，语言越来越尖刻、甚至到了下流的地步”，以至于使讨论最受尊崇的联邦大法官人选过程沦为罗马时代“野兽吃人的竞技场”。

同时，有人撰文指出，这一事件使今后的大法官候选人不得有任何过失，从而使这一严肃的政治问题变得荒唐可笑。

这件不是“案件”的奇案，给美国社会留下了难以消弥的阴影，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医治人们心头的创伤。

（邵惠莲 撰稿）

## 暴行血溅美利坚——俄市政府大楼被炸

### 一、九五“4. 19”大爆炸 全城紧急抢救伤员

在俄克拉荷马，人们习惯了龙卷风。恶劣的风暴肆无忌惮地横穿平原，扫荡城镇，将房屋、树木撕得七零八落。风暴过后，留下了坍塌的房屋和杂乱的废物。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认为：自然界不是邪恶可怕的，只是变化莫测而已。

尽管有龙卷风的袭击和破坏，但是，俄克拉荷马城仍不失为美国中西部地区一座古老而宁静的小牛仔城，这里居住着44万喜爱宁静生活的市民。

可是，这座宁静的古城，不幸闯进了比龙卷风更凶猛的恶魔，他们在1995年4月19日制造了一起令美国朝野震惊和举国悲痛的爆炸事件。

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这座古城所特有的、让美国其他城镇艳羡的宁静而平和的气氛给彻底摧毁了。

4月19日，天气晴朗，和风习习，处在春天里的俄克拉荷马城在鲜花和绿叶的拥簇中显得既艳丽又古朴。人们精神爽朗，仿佛那些美丽动人的花草都是为自己而开放。

上午8时许，正值上班的高峰期。俄克拉荷马市政府机构的550多位工作人员，有的牵着、抱着小孩，有的挎着背包，有说有笑地走入位于市中心的俄市政府办公大楼。

这座办公大楼外观雄伟华美，给人以庄严崇高感。里面装饰十分讲究，在这里工作，令人赏心悦目。该楼共有9层，差不多占据了第五街的整整一个街区。

在这座大楼办公的主要部门有：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社会保障总署、总审计局、总务管理局、药品管理局、美国特工处等派出机构。

在这座办公大楼的第二层，总务管理局为方便和照顾一些带有小孩的工作人员，特地设立了一个日托中心。该日托中心设施齐全，服务周到，所以，有小孩的工作人员都很乐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该中心。这里每天大约能接纳30多位大到6岁、小到半岁的孩子。

9点的钟声敲响不久，办公大楼正门前突然发生剧烈的大爆炸。顿时，火焰冲天，浓烟滚滚，整座大楼猛烈地震动起来，象发生了大地震一般。临街一边的墙壁、窗户全部炸塌，混凝土块、玻璃碎片像暴风雨似地四处横飞。楼前停放的数十辆汽车被建筑物碎块砸坏，燃起熊熊大火。整个大楼被浓烟和烈焰笼罩。

房屋的倒塌声，汽车的爆炸声，声嘶力竭的哭叫声，痛苦不堪的呻吟声，汇集成巨大汹涌的激流，冲击着一向宁静的俄克拉荷马城。

整个俄克拉荷马城立即骚动起来。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响着急促、刺耳的笛声，呼啸驶向被烈焰浓烟笼罩的市府办公大楼。俄克拉荷马市的市民不约而同地奔往出事地点，参加救援活动。

当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整个大楼当街的一面从一层到九层被“削”掉，削掉的部分大约占大楼的三分之一。乱麻般的钢筋、房间的水泥框架、电缆等参差不齐地裸露在外，掉下的混凝土块掩埋了大楼的第一、二层。停车场被炸出了一个深坑，地面散乱地布满血迹斑驳

的、不成形的儿童玩具，被炸断的胳膊和腿随处可见。

一些受伤者不时地从烟尘中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有的满身是血，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身上还燃烧着火焰，有的满头污垢、面目全非，有的衣服成了碎片。哭喊声、呼救声不绝于耳。

48岁的康迪，在社会保障总署工作，爆炸发生时，她刚刚停稳车，正准备向大楼走去。“忽然，我被强大的、炽热的气流刮起，像喝醉了酒的人不能支撑自己，我的脸撞到了小车上，”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道，“我的胳膊和下巴被炸断，脸立即肿胀、青紫，我前面的一名男子正要穿越大门，只见他的胳膊从他的身上飞了出去，但他被震迷糊了，竟浑然未觉，还继续往前走。”

艾迪·史密斯是国内税务局的秘书，她的工作地点距爆炸现场有5个街区，爆炸发生时她感到房屋有些震动，玻璃窗哗哗作响，“我当时打了个跟头。”她的两个孩子：3岁的切西和2岁的科尔顿都在市府大楼的日托中心。她以为是银行出了什么事，当得知是市府大楼发生爆炸时，“我差点晕了过去，胸口一阵紧缩，头脑里一片空白，脸色煞白，我给吓坏了。我什么也没来得及想，就驱车赶到现场。”她回忆道。面对断垣残壁，她凄厉地呼喊着两个孩子的名字，没命地挤过人群往前冲，她俯下身子，仔细地察看每一张血肉模糊的脸，却怎么也找不到她的切西和科尔顿。

“我的心都要碎了，像被炸毁的市府大楼一样。我流着眼泪，无力地坐在一堆碎石上，等待着、期盼着、祈祷着孩子们平安无事。”

3个小时后，艾迪的哥哥丹尼尔——俄克拉荷马城的一名警官在临时陈尸所认出了科尔顿。不久，又在医疗中心找到了切西的尸体。当艾迪看到两个肢体残缺不全的孩子时，她顿时晕了过去。

救护人员不遗余力地从被炸毁的楼层中寻找着遇难者，他们很快发现了数十具尸体，其中包括一些孩童，这些孩童年龄最大的6、7岁，最小的只有6个月，有的尸体被烧焦，面目难以辨认，有的扭曲成一团，还有的残缺不全。救护人员抱着血肉模糊的孩子，忍不住放声大哭。

警官罗克说：“当我从瓦砾中抱着一个面目全非、四肢不全的小孩时，我仿佛觉得我就是那孩子的父亲，情不自禁地，眼泪哗哗直流。”

受伤者立即被送到医院抢救。

专家们带来了遥感仪和警犬，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幸存者。

零乱的瓦砾中不时有呼救声和微弱的呻吟声传出来，救援人员不再搬运尸体，他们从死尸上爬过去，背出那些受伤者。但是，有的受伤者只能闻其声而不见其人，很难直接从乱石堆中把他们拉出来。有的受伤者看得见，却救不出来，救援人员只好伸进手去，握住受伤者的手，给予安慰，给予鼓励。

搜寻工作在艰难地进行。晚上10点左右，出事现场的救援人员和从四面八方来的志愿者费力地挥舞着铁撬和铲子，一厘米一厘米地往深处推进。突然，从一片混乱中传来一位女孩急促的呼救声，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当救援人员接近她时，只见15岁的布兰迪·丽古丝被压在一扇保险门下，她已呆在那里整整12个小时了。

“你想象不出她呆的地方像什么样子。”外科大夫雷克·纳尔逊说，“她完全被碎石盖住，幸亏有扇金属门挡住，使她还有些空间得以幸存下来，同时扭曲的金属架和直径大约2英寸的电线缠着她。”

救援人员花了近3个小时才把她救出来。同时，纳尔逊大夫给她输氧并

与她小声交谈，使她振作起来。“我告诉她，她已被俄市最好的外科大夫治疗。小女孩很懂事，也很勇敢。”

在儿童医院特设的等候室里，挤满了陷入绝望的人们。特尔·罗格叶坐在门厅的椅子上，前后摇摆。“我在诺曼上班，”40岁的他泣不成声。

罗格叶在俄城以南20英里的一家制造空调机的公司上班，当朋友告知联邦办公大楼被炸时，他惊呆了。他5岁的儿子克里斯托尔福，正在该楼的日托中心。

“我不愿相信这是事实。当我赶到这一团糟的俄城街头时，我有种空荡荡的感觉，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哪儿。我的妻子在哪儿。”罗格叶擦擦挂在脸颊上的泪水说道。

经过两小时的搜寻。他在儿童医院找到了他奄奄一息的儿子，医护人员在进行精心抢救。他只能像其他人那样，等待着一线希望成真，同时接受着人们的安慰。

“我经过战争，是的，我见过在越南战争中被杀害、被砍成两半的或四肢不全的战士，但那是战争啊，残酷的战争。可是，这些是孩子。这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一次犯罪！”

救护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据当天初步统计，停放在医院的尸体有20多具，其中13具是儿童，受伤者达200多人，有58人伤势严重，另有300多人下落不明。除政府办公大楼受损之外，附近还有6座楼房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根据5月5日现场清理工作结束时的统计，这起爆炸案共造成167人丧生，400多人受伤。死难者中有19名是儿童，另有2人失踪。一位联邦官员说，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爆炸案。

## 二、举国震惊总统发誓 重金悬赏缉拿凶犯

俄城爆炸案震惊了整个美国。

美国四大电视网和各地方电视台都对爆炸案作了及时、详尽的报道。举国上下一片震怒，怒吼声响彻全美国。人们游行示威，声讨恐怖分子的残暴行径，强烈要求政府尽快采取措施，及时破案，严厉惩办凶犯。

4月19日，俄城爆炸案发生时，克林顿总统正在同来访的土耳其总理举行会谈。整个会场洋溢着友善、轻松的气氛。

突然，白宫发言人麦柯里急急忙忙地走进来，神情十分紧张，面部肌肉绷得紧紧的，他俯身对克林顿总统低声说道：“据CNN报道，俄克拉荷马联邦大楼被炸，半边大楼被炸飞。”

克林顿总统当即中断了会谈，急冲冲地直奔椭圆形办公室，观看爆炸现场的实况直播。当看到从瓦砾堆中拖出来的孩子们的画面时，他怒不可遏，嘴里不停地骂着，手不停地挥舞。他后来告诉他的一位高级助手，他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挥拳砸烂电视机。”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总统说，这一爆炸案件“是对无辜儿童和毫无防备的平民的无情攻击”，是“邪恶的懦夫”所为。他发誓，绝不能容忍美国人民受到如此恐吓和威胁。他向公众保证，无论凶手跑到哪里，美国政府都有决心将他们捉拿归案，并给予最严厉的制裁。

克林顿召集有关人员征求意见，是否应该关闭机场，以防作案者登机外逃。克林顿同时还考虑是否请以色列出来帮忙。因为以色列总理拉宾已经打来电话“请战”。然而，克林顿的高级顾问说，千万别请以色列加入，因为这样看起来就会像是一场针对阿拉伯人的行动。他们认为克林顿总统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千万冷静一些，让联邦调查局全力以赴。

美国司法部长雷诺在4月20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警方将尽最大的努力及早破案。她说，警方目前已经掌握了与俄城爆炸案有关的数百条线索。她宣布，对提供重要线索的举报人，政府将给予最高为200万美元的奖赏。同时，她希望公众保持冷静，从惊慌和恐惧中解脱出来，大力提供有关信息。会上她还表示，只要抓住案犯，司法部门将依法对他们判处美国最严厉的刑罚。

这时，人们最关注的是，这起爆炸案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凶手是谁？是国外的恐怖分子，还是国内的恐怖分子所为？作案后的案犯又逃到哪里去了？他们会不会在别的地方制造同样的惨案？……

为了尽快破案，联邦调查局在俄克拉荷马市成立了一个破案指挥所。各种举报电话如潮水般打到破案指挥所和联邦调查局总部。案发后，仅两天的时间，就收到2600多个举报电话及其他信息。

破案的真正线索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侦破人员面对千头万绪的乱麻，有茫然无措之感。

### 三、高级侦探聚集俄域 蛛丝马迹查索案情

克林顿政府调重兵、遣强将，向俄克拉荷马城派出了大批联邦政府的执法人员、紧急管理人员和军队。仅联邦调查局就派了 200 多名侦探，其中包括侦破此类案件最富有经验的 5 名特工人员。此外，还有 4 个证据反应小组、爆破器械小组也派去协助办案。

从爆炸现场来看，在市府办公大楼前面，有一个宽 20 英尺、深 8 英尺的大坑。侦破人员经过分析，认为：这显然是停放在楼前的汽车炸弹爆炸引起的，其炸药估计有 1000—1200 磅。但是，这车炸药是定时爆炸的？还是遥控引爆的？或者是司机自杀性爆炸的呢？这些问题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经验丰富，办事一向干净利落。他们对现场及周围进行了周密细致的检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这帮干练的调查人员有着这样的信念：再高明的犯罪分子都不可能不在作案现场留下一点点他们的痕迹。

一般情况下，他们不太愿意相信目击者的证词，特别是在经历过此类灾难之后，处于紧张、惊吓状态下的目击者的证词。他们需要的是一些看得到的“证词”，他们相信的是那些有板有眼的“铁证”。因此，他们在想尽一切办法捕捉可靠信息，获取“铁证”。

调查人员很快就取得了关键性的“铁证”。一名沿街道寻找痕迹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终于在距爆炸地点不远的街面上发现了一些货车车轴的碎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碎片上刻有机动车辆的识别号。调查人员如获至宝，立即送到指挥所。经过技术鉴定，证实引起炸药爆炸的是辆小货车，同时查明了这辆小货车的车牌号码。指挥所立即将这一号码输入全国联网的机动车辆识别电脑中心。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一盘录像带又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就在大爆炸发生之前，办公大楼对面的一家银行取款机上的录像机录下了停放在大楼门口的一辆莱德出租公司的小货车。机动车识别号码在电脑中心的查询结果表明，那些车轴碎片就是从这辆货车上飞出来的。

调查人员依此层层追踪，很快便查清，这辆莱德出租车公司的货车是 1993 年的福特车，原属迈阿密的莱德出租车公司，后来这辆车又被分配给了堪萨斯州章克申城的艾略特出租车公司，章克申城位于俄克拉荷马城北面 270 英里处。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此时的激动心情丝毫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按联邦调查局的行后来说，他们找到的“铁证”是“栖息处”，意指嫌疑犯曾经逗留过的地方。调查人员通过此线索，便可以迅速找到嫌疑犯留下的痕迹，迅速弄清其特征，从而在短时间内抓获他们。

但是，这个艾略特出租车公司提供的却是假的线索，在爆炸事件发生的前两天去那里租车的两名男子留下的证件和执照经查全是假的。兴高采烈的调查人员一下陷进了失望和沮丧之中。

令人欣慰的是艾略特公司的经手人还能回忆起那两个租车人的模样。联邦调查局的肖像专家根据经手人的描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画出了那两个人的画像。很快，冠之以“约翰·多伊第一”和“约翰·多伊第二”的两名男子的画像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介传遍整个美国。美国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 20 日在华盛顿宣布，悬赏 200 万元捉拿案犯。

租车人留下的假证件也不是没有任何用处，他们驾驶执照的颁发日期是1993年4月19日，这正是联邦调查局扫荡韦科庄园，消灭邪教大卫派的日子。因此，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对爆炸事件的操纵者作了3种可能性分析。

首先，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国际恐怖组织所干的，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搞汽车炸弹乃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国际贩毒集团所为，这些毒品杀手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对政府和执法机构进行毫不留情的报复。

第三种可能性则是上述假证件所提示的邪教大卫派的极端分子。韦科庄园里的大卫教派及其头目考雷什是美国许多极右分子的偶像，而扫荡该邪教的4月19日成了这些极端分子心目中的“耶稣受难日”。最近一段时间，这些极端分子宣称要纪念韦科庄园事件，他们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和电台大肆宣传他们的观点。

然而，可能仅仅是可能，推测也不过是推测，它们都无法代替事实。俄城爆炸的作案者究竟是谁呢？调查人员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

在调查工作全面进行的同时，搜捕行动也迅速展开，甚至扩展到了国外。

联邦调查局获悉，一名持美国护照的男子，在19日大爆炸发生后不久乘飞机离开了俄克拉荷马城前往芝加哥，当晚这名男子又准备从芝加哥飞往罗马，而他的最终目的地是约旦。芝加哥海关官员对他进行了仔细盘问，以至耽误了他的航班。这名男子后来又改乘飞机经伦敦去罗马。

但是，在伦敦机场，他被英国移民局拘留，英方声称他可能是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的“嫌疑犯”。

20日下午，英国当局武装护送这名男子飞回华盛顿。与此同时，应美国政府的要求，罗马机场打开了这名男子直接运往罗马的行李箱，发现了一些有可能用来制造炸弹的材料。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慎重起见，对外只宣称该男子是一名重要证人，并拒绝透露他的姓名。

21日中午，白宫官员再次向报界透露了俄城爆炸案有关侦破的进展情况。这位官员说：“看来，这起爆炸案可能与中东的恐怖组织没有明确联系。”

俄城爆炸事件的第二天，星期四。距俄城270英里的章克申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布满了该城的大街小巷，他们的任务是根据两名嫌疑犯的画像去该城的每家酒吧和旅店、饭馆核查这两个人。

在出城半英里的一家名叫“梦境”的汽车旅馆里，调查人员发现了重要线索。

“梦境”旅馆的女老板稍微有些发胖，为人十分精明，名叫麦高恩，经营该旅馆多年。因她经营有方，所以，生意一直兴旺。

当联邦调查局向她出示两位案犯的画像时，她立刻便认出了“一号”通缉犯。她说：“一号”是在4月14日住进来的。4月18日，也就是俄城爆炸的前一天，他便退房走了。

女老板还告诉调查人员说，这小子长得眉清目秀，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有些孤僻，从举止神态上看不出有什么异样。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这位精明心细的女老板还记得该小伙子的名字，他叫麦克维。

这线索太重要了！但是，这个名字会不会是假的呢？

在如潮般的举报电话中，一个举报电话使调查人员的疑问获得了解答。这是“一号”通缉犯从前的一位同事在电视上认出了他的画像后打来的。他说这人的确叫麦克维，还说麦克维是个“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的十分仇视政

府的退伍老兵。他对联邦政府扫荡韦科庄园一事特别愤怒，他还曾经亲自参加了在那里献身的信徒的凭吊仪式，因为这是他心目中的圣地。

有了麦克维这个千真万确的名字，联邦调查局立即启动电脑系统，在巨大的资料库里查寻麦克维的下落。警方从过去和现在的罪犯、嫌疑犯以及在押人员的名单中查找麦克维其人。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这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特大案犯此刻正在佩里镇的一个拘留所里。

#### 四、一冒疑犯顷刻就擒 高科技织天罗地网

俄城爆炸案发生后仅仅 49 小时 20 分钟，凶犯麦克维就落入法网。案件侦破何以如此神速？佩里镇的警察是怎样抓住麦克维的？细节展开，人们看到，首先要归功于调查人员的丰富经验，归功于当代的先进科学技术，同时也不能不提到难得的好运气，甚至可以说，在整个破案过程中，经验、科技和运气相当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该案的传奇色彩。

4 月 19 日上午 10 时 20 分，大约离俄城大爆炸发生后不到 80 分钟，麦克维驾驶一辆 1977 年出产的黄色奎斯车疾驰在距俄市 60 公里处的 35 号州际公路上。他为自己这次成功的爆炸感到高兴，也暗自庆幸自己的“脱险”。想到爆炸引起的“精彩”场面，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他那一向冷若冰霜的脸上绽出了难以察觉的笑容。

他驾驶的车似乎也同他一样兴奋起来了，超速行驶在 35 号州际公路上。

正在佩里镇附近 35 号州际公路上巡逻的女警察汉格发现了麦克维驾驶的这辆超速行驶而且没有车牌的车。汉格截住了这辆黄色的小汽车，当她走近这辆车时，一眼看见坐在车内的驾驶者上衣口袋胀鼓鼓的，怀疑他可能携带了枪支。汉格要驾驶者出示执照，当麦克维掏驾驶执照时，便证实了汉格的怀疑是正确的。汉格立即拔枪对准麦克维，命令他不准动，接着迅速从麦克维身上搜出了一支半自动手枪，随后拘捕了他。

汉格和其他警察对麦克维和他的车进行了检查。麦克维的枪是一支 9 厘米的格劳克牌半自动手枪，枪膛里压满了子弹，车后箱里藏有一些可以穿透防弹背心的子弹和几把匕首，没有发现别的可疑物件。

麦克维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问道：“这里出了什么事？”他还安慰汉格等警察道：“不用怕！”他指望这样能让他尽快离开。

佩里镇的警官们当然想不到他们眼前这位身着牛仔衣裤、脚蹬军用皮靴的文静小伙子就是正在被通缉的俄城爆炸案主犯。此时，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还没有传真过来，并且 19 日的调查档案里还未出现麦克维这个人。

警察当局根据麦克维违反交通规则和非法持有武器等轻微违法行为，将他送到拘留所。根据法律有关规定，麦克维只要在第二天交纳 500 美元保释金受审后，便可以释放。

在麦克维被关押的一天一夜里，他表现得完全像个老老实实的人，他整天挂在嘴边的就是“是，长官”、“不，长官”，身子挺得笔直，像个训练有素的美国大兵。

第二天一早，麦克维盼望着审理他的案子，以便早早地离开。

但麦克维的运气不佳。佩里镇只有唯一的一名法官有审判权，而他正被一件离婚案弄得焦头烂额，无法脱身。麦克维的审理只有拖到第三天，即 4 月 21 日才能进行。

身陷拘留所的麦克维此时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不时地问看守人员为什么还不审理他的案子，还指责佩里警察当局违反美国法律。麦克维作贼心虚，法庭延期开庭使他怀疑警察当局是否已经发现他是俄城爆炸案的元凶。但是，他还是强装镇静，佯作老实。

20 下午，联邦调查局印发的两名嫌疑犯的画像传真到佩里镇。汉格发现，画像中一名短头发、长脸形的嫌疑犯与她头一天因交通违章而拘留的一名男子有些相似。但她不敢肯定被他拘留的人就是通缉犯。

21日清早，佩里镇的法庭上，法官正襟危坐，警察把满脸惊慌的麦克维带上了法庭的被告席。

法官对麦克维进行审理。

听了法官的提问，麦克维慢慢地缓过神来，这时他知道佩里警方还不知道他与俄城爆炸案的关系。

记录员把法官的审理记录输入电脑，同一时刻，麦克维的姓名及其他材料出现在联邦调查局的电脑数据库系统里。电脑网络瞬间联结起来。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联邦调查局在电脑屏幕上发现了“一号”通缉犯麦克维在佩里镇的一个拘留所。一份传真电报马上传到佩里镇警方。电报内容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我们找的那个家伙正在你们手中。

此时的佩里法庭，法官正准备宣判收取麦克维的500美元保释金后将其释放。突然警方负责人匆忙闯入法庭，向法官出示了联邦调查局的传真电报。

法官大吃一惊！好险啊！他几乎叫出声来。一个罪大恶极的凶手差点就从自己的手中被放走，那将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啊！

警官随即把行将获释的麦克维押往狱中，并派出佩里镇最优秀的警官严加看守。

此时的麦克维已彻底绝望，他知道，等待他的结果将是什么。

当天上午，联邦调查人员乘直升飞机抵达佩里镇。经过多方调查、审问和鉴定，证实佩里镇所关押的这名男子就是真正的“约翰·多伊第一”麦克维。

麦克维，纽约州人，现年27岁。1989—1992年在陆军服役，是一名机械工，参加过海湾战争。退役后，没有正式工作。他后来去过得克萨斯州，到被烧毁的韦科邪教庄园“朝圣”，回来时“极为气愤”。

21日晚上，在大批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护送”下，麦克维在一片“绞死他”的怒吼声中被押上专门来接他的直升飞机。这个被联邦调查局全球通缉的“一号”疑犯在不到3天的时间里落入法网，创下了联邦调查局缉拿案犯的一个奇迹。

麦克维的落网让人感慨万千：如果麦克维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如果法官没有被离婚案缠住而在规定的时间内审理麦克维违反交通案，如果联邦调查局的电脑系统稍晚输入麦克维的档案，如果……人们想象不出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更不敢想象这些“如果”如果成立的话，一切又将是怎样。

“一号”通缉犯麦克维已落网，警方对其提出起诉。“二号”通缉犯此时在什么地方呢？

## 五、二号疑犯下落不明 案情涉反政府武装

“一”号”通缉犯的落网，给美国人带来了无限希望，人们相信，“二号”通缉犯也能顷刻就擒。

随着麦克维被逮捕，破案工作的方向由原来估计的国际恐怖组织迅速转向国内的恐怖分子。美国司法部长雷诺表示，现有证据表明，俄城爆炸案与国际恐怖组织没有直接关系。

逮捕麦克维后，调查人员对他所持有的一切物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技术鉴定，希望从中获取更多有用的证据。

调查人员发现麦克维所持驾驶执照上的住址是密执安州德克县的一处农场，而这处农场是属于詹姆斯·尼科尔斯和特里·尼科尔斯两兄弟的。

联邦调查局迅速查出，麦克维与特里·尼科尔斯同在军队服役，两人一直是好朋友。退役后，麦克维与尼科尔斯兄弟一起住在这个农场。1994年11月，特里和麦克维先后离开了农场。

4月21日中午，联邦调查局包围了这家农场，并进行了仔细而全面的搜查，发现了一些制造炸药的设备 and 材料。

一些邻居提供情况说，麦克维和尼科尔斯兄弟俩在一起时，经常试制炸药和各种武器，他们经常听到从农场传来的爆炸声，随着爆炸声响，阵阵黑烟便袅袅升起。

特里还经常向邻居们说起麦克维。说麦克维以前是个性格开朗、有说有笑、很有幽默感的小伙子。自从参加海湾战争以后，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大爱讲话，经常酗酒，行为怪癖，随身总是携带一只手枪。

“我们也很纳闷，麦克维这样一位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怎么会有一种这样的性格。他的表情永远是冷冰冰的，我们从来就没有看见他脸上露出过笑容，两颊总绷得紧紧的。”一邻居说。

“他的眼神十分冷酷，我不敢同他对视。”一年轻姑娘说道。

邻居们告诉调查人员，麦克维和尼科尔斯兄弟与“密执安民兵”——一个反政府的准军事组织——有过密切的来往，他们经常参加该组织的一些会议。

调查人员拘捕了詹姆斯·尼科尔斯，并于22日把他押送到俄克拉荷马城。

21日下午，美国司法部正式宣布以爆炸案嫌疑罪名逮捕麦克维。几小时后，居住在堪萨斯州赫灵顿的特里·尼科尔斯向警察当局自首。赫灵顿离章克申城的莱德租车公司只有30公里。警方没有宣布逮捕特里，也没有对他进行起诉。警方私下表示，尼科尔斯的相貌与通缉令所描绘的嫌疑犯特征并无明显的相像之处，讯问也表明特里并非第二嫌疑犯。

联邦调查局追查凶手的工作丝毫没有放松。23日中午，一名涉嫌参与爆炸案的嫌疑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贝纳迪诺被逮捕，这名嫌疑犯名叫戴维·伊尼戈斯，是名逃兵，他所在的部队正好是麦克维也曾服役过的。

经过调查和审讯，司法部的官员说，伊尼戈斯也不是“约翰·多伊第二”。

22—23日，联邦调查人员除继续搜查密执安州詹姆斯·尼科尔斯的农场外，还对特里·尼科尔斯在堪萨斯州的住宅和工作所在地进行了搜查，同时搜查了麦克维在老家纽约州的彭德尔顿镇的居住地。但警方未公布搜索结果。

在搜查麦克维现在的住宅时，发现他所居住的亚利桑那州金曼镇的住所是一个反政府民兵组织的集散地，金曼镇则是反政府民兵组织“亚利桑那爱国者”的军事训练基地。

就在两个月以前，金曼镇曾发生过一次小型炸弹爆炸，一些房屋的玻璃窗被炸碎，只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时麦克维也在此镇。

联邦调查局决定重新调查这起金曼镇的爆炸案，以便寻找与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有关的证据。

调查表明，俄城爆炸案与民间准军事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嫌疑犯“约翰·多伊第二”至今仍下落不明。

## 六、恐怖行为日益猖狂 右翼极端组织逞凶

4月23日是美国历史上令人沉痛的日子，克林顿总统宣布该日为“全国哀悼日”。

克林顿携夫人希拉里于是日中午抵达俄克拉荷马城。他们听取了救援人员的汇报，看望了受伤者和遇难者家属。

下午四点，他们参加了为大爆炸中死亡人员举行的追悼仪式。

救援工作仍在进行，被破坏的联邦办公大楼的3—9层已清理完毕。因第一、二层积满了瓦砾，救援人员认为有人幸存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可以肯定还有一些尸体埋在下面，他们便开始动用重型机械。

在离清理现场不远处的一块草坪上，摆放着人们寄托哀思的无数花圈、花篮和鲜花。

联邦调查局的追查工作在全面展开，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据联邦调查人员透露，“一号”嫌疑犯麦克维与全美最大的民间准军事组织——“密执安民兵”有密切关系，像这样的反政府组织在美国许多地区存在，至少有300个。鉴于麦克维与这些组织的关系，调查人员说，他们越来越相信，在俄城大爆炸的背后，可能有一个更大的阴谋。

这一消息公诸报端后，美国朝野大哗，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严峻的现实和血的教训迫使美国公众和政府认真考虑应该怎样采取得力措施对付国内极端主义组织和极端主义分子的问题。

白宫办公厅主任帕尔塔在4月24日透露，为防止类似俄城爆炸案事件的再发生，克林顿总统提出将采取以下措施：在联邦调查局内建立反国内恐怖主义中心；通过新的法律，对国内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给予更严厉的打击和惩罚。

国会有关人士也表示，同意克林顿政府通过新的法律以惩治恐怖主义的提议。

民间准军事组织在美国已存在多年，近几年发展较快。他们模仿军队的编制，购置枪支弹药，经常进行军事训练和实战演习，随时准备战斗。然而，他们攻击的对象不是任何外国势力，而是美国政府。

秘密武装组织的口号是：“爱国者赶快清醒！”“我爱我的国家，但我恨我的政府！”他们在衣物上就印有这类口号，并大肆宣传他们的理论和主张。

秘密武装组织的成员认为联邦政府在不断地剥夺他们的自由权，所以，他们不得不进行战斗，以捍卫自己神圣的权利。他们尤其对联邦政府旨在对私人持枪进行管制的措施感到不满，认为这一措施有悖于美国宪法。因为宪法修正案第二条明确指出：“一支得到有效控制的民兵对于一个自由州的安全是必要的，人们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应受到侵犯。”

最近十几年来，美国又出现了一些由右翼极端分子组成的秘密民兵武装组织。他们主要由一些前军方和前警方人员，及宗教极端分子领导，专门从事反政府活动。目前美国有翼极端组织遍布40个州，其中新纳粹组织70多个，三K党团体90多个，光头党近40个，其他各种各样名称的50多个。这些组织中势力最大的是“爱国者民兵”，它在20多个州有近10万名成员和1000多万同情者。

这些右翼极端组织之所以能较快发展，势力之所以迅速扩大，主要有以

下原因：

首先是，它有一套具有欺骗和煽动色彩的理论 and 主张。他们大力宣扬公民享有绝对自由权，声称他们是美国宪法坚决的捍卫者。他们借宪法修正案第 10 条中关于“凡未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属于州或人民”的规定，攻击政府侵犯公民的权利，号召人们进行反抗。

他们还大肆宣扬种族主义和排外思想，声称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败坏了美国文化，犹太人夺走了美国财富，亚洲人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没有工作，拉美人下世纪将征服美国等奇谈怪论，激起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排外情绪。

他们编造说联合国正准备接管美国，以建立世界新秩序。在联合国指挥下的外国军队正在美国领土上进行大规模的严格训练，联合国的代言人，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正策划有一天在美国实行全面戒严，终止宪法，没收个人手中的一切武器等。

他们标榜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号召人民要进行一场反对联邦政府专制统治的革命，恢复民主、自由的美国传统。

除上述主张之外，他们同时竭力鼓吹“生存主义”，预言美国经济终有一天会彻底崩溃，号召人们积贮大量的食品、枪支和弹药。

其次是，冷战结束后，中东和平进程有了可喜的进展，一些政府终止了对以前在自己控制下的恐怖主义组织的资助和控制，这样，这些恐怖主义组织处在一种失控状态。自由恐怖主义组织就在这种背景下兴起。

再其次是，由于社会问题的增多，许多人精神空虚，寻找寄托，自由恐怖主义者的头目们采用神秘的形式大肆宣扬他们的理论和主张，这样，许多对社会有不满情绪的人和无所寄托的人便追随他们、支持他们和同情他们。

这些秘密的准军事组织的前辈们肩负着崇高的“理想”或“主义”，受某些政府暗中资助和操纵，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完全有能力从市场上搞来各种武器，还可以自己制造武器。与此不同，现在的准军事组织是一群狂热的宗教神秘主义者，他们标新立异，仅仅出于向世界证明自身的存在的目的，就可以把民众作为攻击目标而大开杀戒。

自由恐怖主义组织没有一个中心或统一领导，不同州的组织之间通过电脑和广播电台的节目互通信息。据报道，他们的电脑每天传播的信息达 10 万多。这些右翼极端组织除提出反政府、种族主义的口号和一些天方夜谭的怪论外，还进行大量的恐怖和暴力活动，滥杀无辜。

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极端右翼分子多次引发类似大爆炸的恐怖事件：1984 年 6 月 18 日，新纳粹组织枪杀了犹太电视节目主持人艾伦·伯格。

1985 年，他们又在阿肯色州同联邦特工部队发生枪战，多人伤亡。

1992 年底，联邦特工人员在爱达荷州逮捕一名名叫兰迪·韦弗的右翼极端分子，韦弗拒捕，最终导致他本人及妻子、儿子和一名联邦司法人员丧生。

1993 年初，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奉命对得克萨斯州韦科的一座大卫教派大院进行调查，以确认该建筑物内是否私藏了大量的非法武器。武装警察同院内的非法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导致 4 名联邦特工人员、6 名大卫教派分子当场身亡。

同年 4 月 19 日，联邦警察再度奉命进入该建筑，大卫教派武装分子同警方进行了殊死搏斗，警方要他们投降，遭到拒绝。在双方对抗中，该建筑物燃起大火，并被彻底焚毁。70 多名大卫教派教徒包括许多儿童在大火中丧

生。

联邦特工指责极端分子纵火自焚，但大卫教派及其同情者则指责政府对教徒实行灭绝政策，他们甚至声称这是政府向拒绝交出武器的公民开战，试图杀害所有持枪者行动的一部分，并发誓要进行报复。

美国报纸普遍认为，俄克拉荷马联邦政府大楼爆炸案发生在韦科事件二周年纪念日，这一点绝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1775年4月19日，北美殖民地波士顿民兵组织在列克星敦发动了反英武装起义，从而揭开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序幕。

1992年4月19日，一位叫朗迪·威弗的人袭击美国“烟酒及火器管理局”，他的妻子在枪战中被联邦调查局的枪手打死。

1993年4月19日，联邦政府包围了韦科大卫教的所在地，有70多人死于大火中。

1995年4月19日，阿肯色州一名叫史耐尔的人被处死，他杀死了一个当铺的营业员。史耐尔是位白人至上主义者，他被视为右翼运动的“殉难者”。

据悉，俄城爆炸案发生前的几个星期里许多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已处于警戒状态。3月份，在电脑交互网络中不断有警告美国“烟酒及火器管理局”的信息。3月26日，一位交互网络的使用者传出这样一则信息：“假定袭击发生在本周末，有些人被迫要杀死联邦机构的成员。他们需要有隐蔽的地方，需要医疗救护，需要我们的大力支持。”

人们怀疑右翼恐怖势力制造了俄城爆炸案是有根据的。据称麦克维是“密执安民兵组织”的成员，但该组织的发言人否认参与了俄城爆炸事件，也否认麦克维是该组织的成员。这又给俄城爆炸案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麦克维究竟是什么组织的成员？难道麦克维和另一名案犯两个人就可以制造如此令世界震惊的大爆炸吗？俄城大爆炸案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人们暂且无法知晓。但是人们却日益对俄城事件感到不安起来，整天提心吊胆。公民不禁要问：美国人的安全怎么保障？

## 七、恐慌气氛弥漫全美 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俄克拉荷马联邦大楼被炸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联邦机构进入“最高戒备”状态。

4月19日下午，全国至少有8个城市的联邦办公大楼接到“有炸弹”的恐吓电话，因而被迫关闭。大楼的全部工作人员被疏散，回家的回家，郊游的郊游，紧张、忙碌、热闹的办公大楼顿时静寂起来。

据报道，美国联邦政府总务管理局管辖下的联邦办公大楼在全国各地共有7900栋，并没有100多个日托中心，在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发生的当天，许多地方的联邦办公大楼和日托中心关门闭户。一些州、市和县的办公楼也疏散了部分工作人员。

全美国的各级政府机构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恐慌局面。紧张的气氛弥漫全美。

华盛顿大街上警察突然增多，似乎华盛顿是个主要由警察构成的都市，一些警察牵着警犬在政府大楼四周巡逻，高度警惕地注视着任何可疑的迹象。

白宫内的安全检查系统加强到了令人不安的地步。进出白宫必须经过严格、周密的检查。记者携带的仪器袋也要经过电子仪器扫描。五角大楼四周和地下停车场警员猛增，停放的车辆要经过逐个逐个的检验。联邦调查局总部疏散了数百名工作人员，原因是接到了两次声称总部大楼放有炸弹的匿名电话。一些政府机构的参观景点也被迫停止接待参观人员。

在纽约，惊恐的局面丝毫不亚于华盛顿，人们像赤脚站在一个巨大的热气腾腾的平底锅里面。

19日下午2点，纽约警察局接到一个匿名电话，电话声称纽约最大的办公大楼将于下午3点发生爆炸。该办公大楼一面将大楼内的一万多人疏散到附近的大街上，一面对大楼进行全面的检查，从地面到楼顶，每个角落都不漏掉，每个下水道口都不放过，结果什么也没发现。下午3点也没有任何反应，但人们还是害怕进入大楼工作。

下午4点，巡逻的警察在纽约州高等法院大楼门前的一条长凳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尼龙袋，神经紧张的警察立即封锁了附近的街道，命令行人赶快离开这个地区。他们请来了爆破专家，爆破专家小心翼翼地接近尼龙袋，结果发现尼龙袋里除有几块小纸片以外，什么都没有。

面对纽约市的惊慌局面，纽约市市长不得不出面劝告市民保持镇静，同时宣布加强安全防范措施。

在波士顿的联邦办公大楼，工作人员心里惶恐不安，不可终日。他们许多人草木皆兵，只要见到没有明显标签的包裹就以为是炸弹。设在2层的邮件收发室，人们不敢接近刚刚寄进来的邮件，总认为里面可能装有炸弹，心惊肉跳得不能做任何事。保安部门的官员上下奔波，疲于排“弹”。整个大楼充满了尖叫声，工作根本无法开展。最后，政府当局无可奈何，干脆下令停止办公，各自回家了事。

俄克拉荷马城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天内，美国许多人心神不宁，医院里的病人突然增多，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病人因终日神经紧张，有的甚至出现休克。

纽约市一家心理诊所，接待的人员空前增多，创下了该诊所有史以来的

最高记录。该所的心理医生们接待的大多数病人都与俄城爆炸事件引起的心理恐惧有关。大夫罗伯逊说：“他们大多害怕自己办公的地方和家中放有炸弹。有的人不敢走进自己车里，怕有人把炸弹放在里面。有些人经常出现大爆炸的幻象。有孩子的母亲们更是如此，她们头脑里经常出现从废土堆里被救援人员抢出来的血迹斑斑的小孩，就像电视里播放的那些镜头。”

该所的林达大夫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累过，当送走最后一位患者，有时间歇会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像放电影似地出现患者们向我描绘的画面。我不得不告诉自己，像我告诉我的患者一样：‘这已经过去，不是真的！’。”

星期四，也就是俄城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玛维特·克瑞汀莉去华盛顿联邦办公大楼上班。当她走进大门，眼前突然一黑，她不得不停下来，定定神。

坐进办公室，心跳加速，忐忑不安，俄克拉荷马爆炸的阴影挥之不去，俄城联邦大楼那些孩子们的惨状总在她的眼前浮现。

这个 26 岁的国内税务局的经营分析学家，有个刚满 4 个月的可爱的儿子。她的儿子就被放在该局新建的日托中心，她决定以后不再把孩子放在日托中心了。

她极力排除自己的杂念，试图很好地进入工作状态，可无论如何都不能像往常一样，一走进办公室就能全神贯注、一心一意地投入自己的工作。她突然觉得，在联邦办公大楼工作是一件冒险的事。

玛维特无法理解自己今天是怎么回事，不禁自言自语地问自己：今天，怎么啦？上午，随着时光的流逝，她尽量在脑海里排除那些想法。

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办公室里，玛维特突然听到大楼的火警响了起来，扩音装置通知人们撤离。

“这不像是一次演习，人们在到处奔跑，有的人找不到出口，来回地狂奔，有的人被重重地撞在玻璃墙上，整个大楼乱糟糟的。”玛维特说。

“我想知道这是否与俄克拉荷马爆炸案有关，我想到的是我的儿子，没有了母亲，他会怎么办？”

她和她的同事们冲出办公大楼后才得知，这不是一次火警，而是一次炸弹威胁。这时的玛维特想，她呆在里面或许比外面更安全些。她说：“我怀疑停放在大楼前的每一辆车里是不是都装有炸弹。”

俄克拉荷马事件后，许多美国人发现他们自己不可避免地会用一种心神不宁、魂不守舍的新眼光来审视他们的环境。任何丢弃的包裹都会被认为或许就是一颗炸弹，任何一辆小汽车都会被认为或许就装有几个炸药包。人们不敢轻易去接近送到家门口的邮包和食品盒……

纽约市的伊丽莎白说：“这样的事件你无法避免，没有什么办法能保护自己，这就是 90 年代的生活。”这位妇女不知是已经习惯了这种恐慌的生活，还是她比一般的人想得开一点，但是她却道出了美国 90 年代的生活真相。

俄城爆炸案发生后，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现不妨说上一两件，让大家来品评一下其中的意味。

联邦大楼发生的最直接的变化之一就是，在日托中心几乎到处贴着身穿制服的保安人员的图画。

在内华达，森林部官员保持高度警惕，成对地巡逻，防止极端的反环境保护主义分子的袭击。

在华盛顿，国立图书馆把《圣经》从玻璃盒里取出来，送到地下室郑重其事地锁了起来。

在新泽西州的纽沃克，警察为了减少过多的麻烦，封锁了政府大楼周围所有的街道，除办公大楼的工作人员或持有政府机关特许证的人或车辆，一律不允许进入被封锁的街道。

各地的警察向联邦工作人员散发了大量的传单，指示他们向打电话进行炸弹威胁的人多提些问题。传单说，那些威胁电话像肥皂泡那么容易被人戳穿。“大胆点！炸弹不会在你身边爆炸。我们随时在你的身边。”

针对美国公众围绕俄城爆炸案的担心和不安情绪，美国中央情报局代局长斯图曼德也承认，恐怖主义正在美国抬头，情况的确让人忧虑。他说：“我认为，我们会看到更多类似的事件，因此要格外小心。”

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力的安全保卫措施，全国的新闻媒介也大力宣传了政府所采取的措施，要求人们排除俄城事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相信政府。但在许多美国人的心里总有排解不去的阴影。特别是纽约市市民，他们还记得 1993 年发生在世界贸易中心的特大爆炸案。

## 八、世贸中心突遭劫难 惨绝人寰不忍目睹

1993年2月26日，纽约市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雪，轻柔的雪花悄然落下。料峭的寒风不紧不慢地刮着，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只是多了这番雪景。

位于纽约市中心曼哈顿南部的世界贸易中心，占地6.4英亩，是由7座建筑物组成的摩天大楼。每天，有5万人在此大楼里工作。每天这座大楼将接待8万左右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世界贸易中心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这里的工作直接影响到世界各地众多企业的经营状况，甚至连南非的矿工能否照常工作，也取决于该中心两座高耸对峙的巨塔下面的原料大厦的商人。有价证券商只要轻轻地按一下计算机键，数秒之后，世界另一洲的某终端设备就会显示出一笔可观的收入。

世界许多国家，如法国、日本、泰国、智利等在该中心没有办事机构。美国国内众多的州、市、联邦重要机构均在这座大楼租有办公室。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这楼里秘密设有一间办公室，其车库里终年存放着大型防弹轿车和监听汽车，以防万一。

该中心有3座耗资数百万美元的变电所，为曼哈顿所有的金融机构提供电能，并担负着确保纽约金融中心华尔街的电话畅通、使日成交额高达数亿美元的通讯业务顺利开展的重任。

该中心的地下建筑物相当于帝国大厦的两倍。一个购物中心、一个地铁站和一个可以停放2000辆车的大型车库。这地方十分繁忙，有300名工人负责管理和维修中心的空调、加热和管道等设施。

2月26日这一天，大楼管理处女秘书莫妮卡·史密斯显得格外兴奋，她已怀孕7个月，准备移交所有的工作给新来的秘书，请假回家，专心专意地等待孩子的降生。

莫妮卡是位精力充沛、热情活泼的姑娘。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喜欢她，经常同她逗乐，她那清脆甜美的笑声给人以轻松、自在的感受。莫妮卡长得很漂亮，在无窗的地下办公室，她就像温暖的太阳。

中午时分，她正在很轻松地整理文件。她的办公室旁边有一家餐厅。老钳工鲍勃·柯克柏里克在餐厅里刚打开冰淇淋蛋卷美美地吃着。离他不远，坐着地下建筑物管理处副主任比尔·麦克。他平时最爱吃波兰香肠，服务小姐见他进来，就笑眯眯地替他准备好波兰香肠。可这天他没有要香肠，而是要了些橙子。他在餐桌上摊开一张报纸，边看报，边剥着橙子吃。随后进入餐厅的是史蒂夫·克纳普，他是地下建筑管理处主任。他不急于用餐，而是一个劲儿地玩起报纸上的填字游戏来。

接替莫妮卡的新任女秘书走进莫妮卡的办公室。莫妮卡对这位瘦削的女人作了一番交代后，便叫她同去吃午饭。

这时办公室隔壁的地下停车库，停放着一辆黄色福特·埃科诺林牌运货汽车，里面有几个容器，盛有450公斤自制炸药。因为此车外观和颜色酷似世贸中心港务局的一辆车，所以未曾引起人们的警觉。车内的两名男子之一乘莫妮卡前去进餐之机，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着了引信。由于引信冒出的烟大多被橡皮软档挡住，很难让人察觉。两名男子从容跳下货车，钻进后面的一辆红色小轿车，飞速驶离车库。

位于B—2层的黄色停车库，能通向金融区所有的大街，所以司机们都乐意把车停在这里。

华尔街有价证券商蒂莫西·兰，还不到39岁，已经赚足了一大笔钱，就要作为华尔街商人退休了。今天，他原本不想工作，但被合作伙伴再三催促到此洽谈业务，尽管十分的不情愿，他还是来了。可车库已经没有空位，他驾驶的丰田牌越野汽车和另一辆由牙医用品代理商约翰·迪乔万尼驾驶的银色福特·陶拉斯牌轿车只好在车库进口处等候。他俩心急如焚地等待着。10分钟后，停车场看守人招手示意，让他们把车开进去。他们的车紧靠在那辆黄色的小货车旁边。当蒂莫西打开车门，去取后座上的大衣和证件时，运货车上的导火线已烧到炸药边缘。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险些让他走到另外一个世界。

B—1层的一间办公室，威尔弗雷德·默卡多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他有些累了。这位世贸中心顶层著名的“世界之窗”饭店的会计，一大早便来到这里。现在，他把采购到的2.7吨土豆、洋葱和黄瓜等全部入好了帐。

与此同时，港务局工程师卡尔·塞利格从42层楼的自助餐厅买了些色拉，独自一人乘电梯上楼。

就在这时，随着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一根14000磅重的钢梁折断了，巨大的冲击波引发气体膨胀，一阵龙卷风向四周冲击。

黄色运货车的西侧化为灰烬，所有由煤渣砖砌的建筑物都被炸成粉碎。停在黄色运货车附近的车辆起火爆炸，车身像花瓣似地被秋风刮掉，阵阵浓烟直冒。

爆炸物击穿了28厘米厚的天花板，将一名坐在黄色运货车正上方三层楼的妇女从椅子上猛烈地抛起，使她在空中腾出10米远。正在B—2层餐厅吃饭的鲍勃被一根炸飞的钢管击中头颅，当场身亡。横飞的混凝土块像弹丸一样射向比尔·麦克，他的脾和肾被射穿，动脉被撕裂。史蒂夫被一些以每秒2.5英里飞行的混凝土碎块击中左眼，当即丧命。这三位遇难者被埋在一米厚的碎石堆里。

在B—1层办公室坐着打盹的会计默卡多因其办公室倒塌而丧生。有价证券商蒂莫西·兰不幸中万幸，强烈的气流把他抛向空中又重重摔下，后脑勺被摔出了一条又长又深的口子。旋即他昏迷过去。待他苏醒后，试图站起来，但力不从心。他只好在玻璃碎片和零乱的碎石堆中艰难地朝楼梯爬去。呛人的浓烟一阵阵向他扑来，挡住了他的视线。好不容易爬到一堵低矮的砖墙，突然，他无力支撑自己，随着松动的砖石跌进了莫妮卡的办公室里。他压在一只胳膊上，但此人已不能动弹。他吓得想喊叫，却喊不出来，他差点连呼吸的劲都没有了。他满身是血，疼痛的感觉此时已不复存在，面对前方巨大的洞穴，他不得不停下来，无力地躺着，他迷糊中听到汽车警报器不停地鸣叫，洞内有撕心裂肺的呼救声，这也许就是地狱。“无论你走到何处，我将与你同行，并设法保护你……在我兑现向你许下的诺言之前，我决不离开你。”他又听见牧师在对他朗读《圣经》，上帝在同他说话。他泰然地躺着，接受地狱的磨难。

工程师卡尔·塞利格堵在电梯内无法出来，他不停地捶打着电梯，焦急地等待有人把电梯打开。电梯内烟雾愈来愈烈，熏得他眼泪鼻涕直流，他简直像是呆在一个烟囱里。他等待着，等待着，感到自己有些支持不住了，便拿起纸笔，给在新泽西州的子女写了份遗书。遗书写好后，他静静地坐在电梯里，耐心地等待上帝的裁决。数小时后，救援人员打开电梯把他拉出来时，他已是奄奄一息了。

恐怕遭受最大打击的生者应是莫妮卡的丈夫——爱德。大楼爆炸时，爱德正在波士顿参加一次商务洽谈会。当听到电台报道世界贸易中心爆炸的消息后，他马上拨了莫妮卡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电话里他能听到的只有“嘟、嘟……”的响声，他拨了一次又一次，结果都是一模一样。

于是他跑向自己的车，驱车直奔纽约。一路上，他极力安慰自己，莫妮卡会没事的，她是个好姑娘，也是个好妻子，还将是个好母亲。上帝会保佑她的。

但是，爱德还是无法摆脱那种不祥的预感，莫妮卡到底怎么样啦？他一次又一次地拨他的移动电话，但还是打不通。

在驶向纽约的路上，爱德不由得回想起他与莫妮卡一起走过的一段美好、幸福的路。1982年，他结识了比他大5岁的美丽善良的女秘书莫妮卡，地点就是在莫妮卡的办公室。身为商务代表的爱德在与莫妮卡的第一次交往中，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漂亮的、有双蓝宝石般明亮的大眼睛的姑娘。她是那么活泼开朗，同她在一起，从来不会感到生活有什么艰难和烦忧。

经过近10年的浪漫交往，他们生活得很和谐，像一个人似的。1992年，他们在纽约的一家教堂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后，他们在长岛买了一套房子，并按照他们的志趣进行了装修。一天晚上，莫妮卡让他用怀孕测试仪测试，一测试，他们欣喜若狂，热烈地互相拥抱。“我们即将有自己的孩子了！”他们为未来的宝贝买了婴儿床和儿童读物……

爱德打开收音机。收音机传来了记者的声音：“爆炸物摧毁了车库旁所有的建筑物。”爱德知道莫妮卡所在的B—2层被夷为了平地。

莫妮卡惨遭不幸：她被冲击波击倒，绿色套头毛线衫被点燃，四下乱飞的碎石砸破了她的内脏，当场身亡。爱德知道妻子的惨状后，昏了过去，之后又大病了一场。他不断地呼唤着妻子的名字，可妻子已不能听见他的呼唤，他再也看不到莫妮卡那双美丽的眼睛，再也听不到莫妮卡那爽朗甜润、活泼动人的笑声了。

贸易中心被炸仅4秒钟，警方就接到第一个报警电话，消防车立即赶到现场。4周后，消防救援人员才全部撤离现场。

在世贸中心北边几个街区的一家音响店里，一位身高1.90米、满头卷曲红发、一脸浓密胡子的男子走到一个风景窗口，从这个窗子俯视下面的街道。他叫马姆斯·阿比·哈里马，此时神情紧张。

他不停地看着手表。难道这次又像上次一样会失败吗？不！不会的。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把握，心里照常发虚，车内的炸药足以炸塌哈得逊河畔双塔中的一座，到现在怎么还没有半点动静呢？莫非……他思忖着。突然，一阵巨响传来……随即警车呼啸鸣叫，救火车、消防车一辆紧接一辆地向世界贸易中心驶去。阿比·哈里马终于长长地松了口气，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

阿比·哈里马是埃及移民，他在美国布鲁克林市的穆斯林中心结识了纳赛尔。纳赛尔也是埃及移民，1990年11月5日晚，因枪杀犹太人保卫同盟创始人迈尔·卡哈纳，当场被警方抓获，而判处22年徒刑。

1992年5月的一天，阴雨绵绵，阿比·哈里马及其同伙前往纽约阿蒂卡国家监狱探看纳赛尔。这位极端主义者鼓动探监者自制炸弹、招兵买马、扩充力量，将圣战进行到底。

探监者中有位叫萨拉姆，他1988年离开故土约旦，手持埃及护照进入美国。他既未受过什么教育，又缺乏主见，只会随波逐流，唯纳赛尔马首是瞻。

他曾把生于科威特、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埃贾德介绍给纳赛尔，埃贾德也成了纳赛尔的忠实走卒。埃贾德毕业于拉特格斯大学化学系，从事工业化学工作，年薪 3.5 万美元，是个典型的美国社会的成功者。

探监后，他们一伙制定了爆炸目标：华盛顿纪念碑、纽约萨克斯第五街百货店、帝国大厦和世界贸易中心。这资料是联邦调查局从缴获的文件中查明的。

2 月 26 日中午，刚吃完午餐的刑警唐纳德·萨多威在格林威治村自己的办公室，准备闭目稍事休息，电话铃响了。

“炸弹！世界贸易中心发生了大爆炸。太大了，太极了！”电话里传来急促的声音。这是联邦调查局设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办公室的特工打来的。

联邦调查局把特工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头行动，调查现场。

萨多威火速赶到现场，救护困在高层内的人员，并仔细检查别的地方是否还存放了炸弹。第二天，他到地下建筑物内了解情况。

经过初步的调查分析，专家们断定此是恐怖分子造成的惨案。爆炸物炸毁了中心内部设施，污水处理管道被炸裂。未经处理的污秽物倾泻而下，流进被炸成的洞坑里，同炸弹炸毁的混凝土集在一块，散发出令人恶心的臭味。

调查人员戴着呼吸器等防护装置，搜寻着，想方设法要从碎石堆中找到第一手证据和线索。他们希望找到还活着的人或与炸弹有关的线索。他们知道，有时就是一块碎纸片或破布条都对整个案件的侦破起着难以想象的作用。

萨多威决定从破坏最为惨重的 B—2 层查起，因为这里还保留着被炸后的原始模样，没有人进入。他们在废墟上小心翼翼地行走，像在布雷区爬行一样。发发可危的混凝土构件和不稳定、不牢固的碎石堆随时都会崩裂。幸亏混凝土中间有个一个人勉强能进入的小洞口，他们经过特工办公室和一片隐藏着巨大生命威胁的废墟，45 分钟后，终于到达 B—2 层楼。

停车场已被炸得犹如悬崖的平台，与弹坑呈 15 度倾斜，顶端的混凝土块上尚停有 15 辆汽车。萨多威等人不顾个人安危，在废墟上仔细搜查，寻找与破案有关的蛛丝马迹。

化学家找到一根像套管的断裂金属。汽车专家萨多威说：“这是一块锻造钢。”“我从来没有看见这种钢断裂得这么厉害。这只有直接放在炸弹下面，才有可能作成这般模样。”他无法抑制自己那份兴奋劲儿，因为他知道，炸弹就是在他们所处的位置引爆的。

他们拼命地在废墟中挖掘着，终于找出了另一根扭曲得像条小虫样的金属条块。萨多威兴致勃勃地拭去灰尘，上面呈现一组十分模糊的数字，但这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有啦！有啦！”他兴奋得像个小孩，把金属片高高地举起，向他的同伴示意。

“我认为这就是 VIN。啊，是汽车识别号码。”萨多威知道，盗车案专家通过这种号码就可以查出放置炸弹的汽车，进而再像削笋似的把案犯缉拿归案。

帕特·加拉索是泽西美德出租车行老板，他坐在办公室里，没事地嚼着口香糖，一个瘦弱的男子进来，其神态和 3 天前租车时一样显得激动。

他是萨拉姆。他对车行老板说，那辆黄色福特牌货车被偷了，因此他想取回租车时交付的 400 美元押金。加拉索表示，只有向警方报警后，看到了警察局签发的证明，才能拿到押金。萨拉姆告诉车行老板说，他不久还会来

取押金的，还说他急需这笔钱。

世贸中心爆炸案发生后的第六天，萨拉姆驱车来到加拉索的办公室。在此期间，联邦调查局根据在现场发现的汽车号码找到了加拉索的租车公司，查明了在世贸中心引爆的汽车就是萨拉姆租用而又声称被盗的那辆黄色福特牌货车。因此，萨拉姆前脚刚踏入加拉索办公室的门，就被便衣特工抓获。世贸中心爆炸案的第一位嫌疑犯落网。

萨拉姆落网后，刑警搜查了他的住所，发现了银行结帐单和萨拉姆与纳赛尔的一张合影。

世贸中心被炸后，阿比·哈里马坐飞机逃回埃及，过了几天安稳而自鸣得意的日子。3月14日黎明时分，埃及军事秘密警察包围了他的家，把他从床上抓起来，带到25英里外的军事基地，接着，他被带上一架由联邦调查局租用的飞机。飞机在纽约的斯图尔特国际机场着陆，又一名嫌疑犯被擒获，接受联邦调查局的审讯。

在搜查萨拉姆住宅的当天，联邦调查局搜查了4344号仓库，发现里面积存有大量的爆炸性化学物品，同时发现了萨拉姆与尼达尔·埃贾德共有的银行帐户。随即秘密搜寻了埃贾德在新泽西州梅普尔伍德的住所。在他的办公室里，特工们发现了埃贾德试图从计算机中删除的档案材料。特工们恢复了文件，证实了世贸中心的确是这几名恐怖分子所作。从文件中还找到一封信，信中扬言，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美国当局圆满答复，还将进行更大的爆炸活动。他们声称：“这仅仅是个小小的开始。战争远远没有结束。”

恐怖分子纷纷潜逃，唯有埃贾德例外，其中缘由，当时难以明了。后来得知，他是想在美国继续制造炸弹，以图他谋。

前埃及特工萨勒梅经常向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他也同哈里马等人一起前去探监，看望纳赛尔。之后，他曾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说，纳赛尔恐怖分子准备在纽约繁华市区发动一次恐怖的野蛮战争。但联邦调查局并不相信，并认为萨勒梅纯系为了获取巨额金钱以便挥霍。联邦调查局停止给他发放任何性质的津贴，实际上就等于解雇了他。

世贸中心惨案发生后，联邦调查局又把他作为有功之人重新聘用。不久，他又提供了重要情报，第二批伊斯兰恐怖分子伙同纳赛尔残余势力，正在计划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更惨绝人寰的大袭击。

他们的爆炸目标主要是：哈得逊河上的乔治·华盛顿大桥、霍兰和林肯隧道、联邦调查局总部大楼及联合国总部。此外，他们还准备在纽约商业区和住宅区的第47大街装置炸弹，因自制炸弹数量不足而未列入此次行动计划。

萨勒梅4月底带领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秘密进入恐怖小组用作制造炸药的基地——昆斯大车库。这是一排废弃的大楼，是理想的秘密制造基地。联邦特工秘密装上了隐形摄像机，恐怖分子的一切行动都落入了特工们的监视之中。

6月23日清晨，数十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包围了车库，在屋顶上和停放的几辆汽车后面布置了狙击手。萨勒梅故意没锁好进入车库的大门，特工们乘机而入，没有经过任何搏斗就生擒了6名阴谋分子。

1993年10月4日，曼哈顿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4名嫌疑犯被押上被告席，接受法庭的审判。大量的证人，包括大爆炸的直接受害者纷纷出庭作证，揭露恐怖分子的罪行。

副检察官吉尔摩·奇尔德斯起诉前先站起来，默默地向所有到庭支持他的人点头致意，然后向法官回顾了案发当日的情况。他说：“1993年2月26日，是恐怖主义者在美国犯下最惨无人道、最野蛮暴力罪行的一天。每个美国人都知道，如果当时他在场，他就是一个受害者，无法逃避。”

“那一天中午，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中午，然而，从许多迹象看，同平时没什么不同，数万职工在办公室里休息或在餐厅用餐。无数参观者依次走入电梯或站在楼顶平台上极目远眺。可是，这种平静和极有秩序的生活，在一瞬间，谁也不可能料到，上帝也不能料到，就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都经历了一场毕生难忘的浩劫，这一天是与在美国所发生过的最具毁灭性的恐怖事件联系在一起的。”

证人相继向法官陈述了恐怖分子的残暴行径，痛述了恐怖事件给许多无辜者带来的难以愈合的肉体和心灵创伤。

陪审团在听取了两个月的证词以后，获得了大量确凿无疑的证据。

在长达半年之久的审判期间，陪审团成员和法官每天都准时到席，从没有一人迟到或缺席过。有人带病坚持工作，表现了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同恐怖分子作斗争的决心。陪审团认真听取了206位证人的证词，反复鉴定了一万多页证词的真伪，在确定所有的证据都属实并无懈可击时，最后认定，埃贾德、萨拉姆、阿比·哈里马和贾赛夫是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凶犯。

在最后一次审判会上，因爱妻莫妮卡死于非命而痛不欲生的爱德作了一次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演说：

“1993年2月26日，我刚参加完一次商务会议，正盼望与怀孕7个月的妻子莫妮卡和未出生的爱子埃迪团聚。不料，一位同事闯入办公室，急切地告诉我世贸中心发生了爆炸。我当即给莫妮卡拨电话，无数次地拨，直到得知莫妮卡再也不能接我的电话，我再也无法对莫妮卡说我是如何深深地爱她了。我再也看不到我的孩子是个什么模样和他是如何成长的，再也体验不到父亲与孩子之间的情爱、尊重和友谊了。我失去的一切，都要归罪于今天被法庭判决的这些视苍生如草芥、丧尽天良的恐怖分子！”

爱德十分激动，重重地嘘了口气。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莫妮卡挺着大肚子、满脸欢笑的照片，一张是莫妮卡肢体不全、满脸血污的照片。顿时，整个法庭笼罩着沉重的悲哀气氛。许多人热泪盈眶。

法官达菲最后根据美国法律，裁决4名罪犯各240年监禁。

经过警方两年多的侦察，参加世贸中心爆炸案的另一名凶犯、潜逃回国的拉姆西·贾赛夫虽机关算尽也罪责难逃。1995年2月，他终于在巴基斯坦被巴基斯坦当局抓获，引渡到美国。

## 九、恐怖活动屡禁不绝 芸芸众生何时太平

1978年，一名叫威廉·皮尔斯的新纳粹分子写了一本《纳粹日记》。该书虚构了这样一个场面：上午9点15分，装满了硝酸铵和燃料油的卡车在华盛顿联邦大楼外发生爆炸，700多人死于非命，其中一名恐怖分子打电话给《华盛顿邮报》，吼道：“美国白人永远要活下去！”

俄克拉荷马大爆炸案发生的经过同这部小说中描写的十分相似。

俄城爆炸案使人们担心恐怖主义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不安定。对于防止恐怖活动，美国人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

1951年—1956年，纽约布中央总站、广播城音乐厅等著名场所发生了一系列的爆炸事件。所幸的是除一些人受伤外，无一人丧生。

1970年8月24日，麦迪逊威斯廉星大学陆军数学研究所内，一枚由反战活动分子埋放的炸弹爆炸，一位研究人员丧命，数十人受伤。有3名罪犯被抓获，第四名嫌疑犯至今下落不明。

1972年1月27日，纽约市演出经纪人索尔·赫罗克的办事处被一枚炸弹炸毁，赫罗克等9人受伤。赫罗克当时正在为苏联艺术家安排演出。事后有人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自称代表苏联犹太人干了此事，罪犯至今未捕获。

1975年1月24日，纽约市弗劳恩西斯饭店内一枚炸弹爆炸，4人死亡，近百人受伤。据查，这是1974—1977年间波多黎各民族主义组织“民族解放武装部队”在纽约制造的49起爆炸事件中的一件。

1975年12月29日，纽约拉瓜尼亚机场环球航空公司候机楼内，一枚藏在锁柜内的炸弹爆炸，11人死亡，75人受伤。

1981年5月16日，纽约肯尼迪机场泛美航空公司候机楼一厕所里炸弹爆炸，正在上厕所的一名乘客被炸得血肉横飞。

1983年11月7日，华盛顿特区国会山参议院大楼被炸，两名左翼激进分子自首。

以上主要是发生在纽约市等地的爆炸事件，发生在其他地区的爆炸案无法枚举。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准军事组织”的蓬勃兴起，爆炸事件日渐增多，手段日益残酷，造成的破坏日趋严重，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混乱。

美国极右势力不断增长和扩大，由极端主义分子组成的反政府组织与日俱增，发展十分迅速，并且在全美国处于一种失控或半失控状态，给美国社会的安定和公民的人身安全以及美国人崇尚的自由造成了严重威胁，已成为美国十分棘手的社会问题。同时，千奇百怪的恐怖组织由以前的隐蔽状态日渐公开化，公然向美国政府宣战。

面对极端主义分子的威胁，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包括增加1000名反恐怖执法人员在内的一系列反恐怖活动的新措施。克林顿政府和国会正在研究制定新的法律，严惩恐怖分子。克林顿甚至要求在必要时动用联邦军队。

世界贸易中心爆炸后，克林顿政府对恐怖主义分子加紧防范。据说，恐怖主义分子下一次很可能使用化学武器，甚至使用以前苏联流失到他们手中的小型核武器。日本奥姆真理教使用毒气制造东京地铁事件给美国政府和公众带来了更大的恐慌。克林顿政府准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秘密军事演习，检验一下美国侦破和拦截恐怖分子偷运核武器入境的可靠性。

然而，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最见得着的反恐怖活动措施，主要是在世

世界贸易中心被炸后，大楼屋顶了望平台和正下方的餐厅、塔楼不再向公众开放；350多名私人保镖巡逻在主要公共场所和其他地方；只允许持有身份证的雇员和发放特别通行证的人或车辆进入大楼；许多新装的安全摄影机在窥视；在炸弹起爆的地下停车场只限于司法官员和持有月通行证的房客停放车辆；为阻止快速汽车，2.7吨的水泥墩像碉堡一样构成了广场的疆界。

然而，要保证摩天大楼的安全，费用无论如何是昂贵的。世界贸易中心大楼被炸后的两年时间内，安全费用已是以前的3倍多，每年达到约250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将在1997年开始启用的价值6千美元的新安全系统。

美国公众普遍呼吁，在警察可以采取行动之前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去调查可疑的恐怖分子。众议院发言人纽特·金里奇在巡视了俄克拉荷马城的案发现场后说：“应扩大联邦调查局对准军事组织的调查权力，议会应给予对恐怖分子提出上诉更大的方便，并使其变得更容易些。”他说，“一个自由社会所要做的是在言论自由和犯罪活动之间划出一条十分明显的分界线。”

尽管如此，即使美国人为了安全愿意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些美元来增加警力，但美国人是否愿意牺牲或放弃一些个人自由，也成问题。在世界贸易中心，对雇员们的提包和公文包的例行检查被认为是过分侵犯人权而遭到拒绝，检查人员因此遭受攻击是常有的事情。新泽西州港务局中心的监督查尔斯·迈基什说：“人们应该可以享受一定的公民自由。这是个商业社会，而不是个军事组织。”哲学家里查德·罗蒂说：“英国处置恐怖分子的爆炸事件已有一代人的时光，而人们的自由并未减少。如果他们能做得好，我们也能做得好。”

事实上，美国政府有过多出于安全原因打击恐怖分子的行动，只是从未公诸于众罢了。克林顿总统曾经自豪地回忆道：“我亲自经历的最后一次行动涉及到了美国多数力量的快速、秘密调遣和协同作战。”然而并不是所有这类行动都会产生实效。据《时代周刊》得到的消息，美国政府计划对纽约市的奥姆教总部进行一次搜捕，但后来行动受到了法律上的阻拦，一位联邦法官拒绝签发搜查许可证，这次打算派快速反应部队突击的行动被迫流产。

美国的恐怖组织日益呈猖獗趋势，他们随时都可能制造更大、更惨无人道的恐怖事件。美国政府也正在采取措施，克林顿总统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说：“我们绝对不能让整个国家受到暴力恐怖活动的侵袭。”他还认为，只要通过惩治恐怖分子的新法律，“任何人敢于在美国国土上散播恐怖主义的种子，必将受到法律迅速而严厉的惩罚。”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刘易斯·弗尔赫与此同时也发出呼吁，要求加强情报工作对付民间准军事组织。他说：“美国的一些个人和团体正在武装自己，以备有朝一日同政府执法机构抗衡。还有一些人正在搜集武器，以支持反政府的政治活动。”但是，美国舆论认为，只要这些恐怖组织不触犯美国法律，联邦政府就难以合法地解除他们的武装，从而取缔这类组织。因此，这些组织将可能是一种长期存在于美国社会的隐患，像无数个恶性肿瘤隐存于美国社会的肌体里，随时都会有发作的危险。

一些清醒的美国安全专家认为，美国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背景和启示，因迷雾太浓，一时还很难有个明确的答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美国这片号称自由、民主、和平的国土上，已发生过的一连串令人心惊肉跳、惨不忍睹的暴力事件或许仅仅是一个开始，

像一块石头投入水中，仅泛起一个小小的水圈，这个水圈很可能扩大，蔓延到整个美国，美国很可能就会成为恐怖主义生长的沃土，成为恐怖主义者尽情厮杀的大战场。

（何晓林撰稿）

## 震撼全美的“世纪审判”——辛普森双命血案

1995年10月3日，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一天，美国总统克林顿不得不中断他的工作，离开椭圆形办公室，走到秘书室的电视机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多伊奇的工作午餐不得不临时改到一个有电视机的小房间里去；全美几十个大小机场里的飞机不得不推迟起飞；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额比平时下降了将近50%，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怀着急切的心情久久地等候在电视机前。这一天是被称为“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杀妻案的最后时刻，人们都急切地等待着法院宣布陪审团的判决结果。

自从1994年6月13日，美国前橄榄球明星、影视界当红演员辛普森的前妻尼科尔·布朗和她的男友罗纳德·戈德曼血迹斑斑的尸体在尼科尔的公寓外被发现、辛普森被警方传讯以来，辛普森就引起全美新闻媒介的不断关注。6月17日，辛普森驾车外逃时被捕，美全国电视网实况转播了在洛杉矶高速公路上惊险的追捕场面。辛普森被警方指控犯有双命血案，于是开始了一场历时474天、震撼全美的“世纪审判”。

为什么这起案件在美国如此引人注目？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让我们来对案件做一个全面的了解。

## 一、两次婚姻均不美满 辛普森涉嫌有来由

现年 48 岁的辛普森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体育大明星，是橄榄球历史上举足轻重、建树丰硕的传奇人物。他从球场退役后，改行做体育评论员并涉足影视圈，取得巨大的成功。从一个出身贫寒的黑人孩子，发展成为驰骋绿茵赛场的运动员和全美超级影视明星的辛普森，也因此而成为很多美国人，特别是美国黑人崇拜的偶像。

早在幼年时期，辛普森就与众不同。对于他一心想出人头地的性格，辛普森的母亲厄尼斯回忆说，在进幼儿园之前，他就曾对母亲说：“有那么一天，你会在报纸上看到我。”

辛普森有很高的天赋，他曾说过：“如果没有橄榄球运动，我就会在大学里有所发展。”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三年学习期间，辛普森成为该大学历史上最优秀的橄榄球跑位手，他也是美国最好的橄榄球跑位手之一。他说：“速度是我最好的武器，如果有什么地方不能让我跑起来的话，那我就没有必要呆在那儿。”

不久，他转到高薪的比尔斯队，为此他不无感慨他说：“对于穷孩子来说，钱意味着一切，”“我喜欢青年人从事的运动。如果我能从体育运动中取得一些成绩，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在我小的时候，威利·梅斯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不仅因为他是一名出色的棒球手，还因为他有一所漂亮的大房子。”

后来，辛普森在美国体育界名气很大，身价极高，他从小梦想终于变成现实，不仅出了名，而且还有了自己的轿车和别墅。

1975 年，春风得意的辛普森与青梅竹马的玛格丽特结了婚，并生了三个孩子，家庭生活颇为美满。但好景不长，他只有两岁的女儿艾伦偶然落入泳池淹死了。当他听到这个噩耗后痛不欲生，大叫道：“是她杀死了我的孩子！”辛普森认为玛格丽特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他们之间的感情也从此破裂了。不久，辛普森同玛格丽特离了婚。同年，他做了膝外科手术，从此结束了运动生涯。

1977 年，辛普森邂逅了年仅 18 岁、当时在戴西俱乐部做女招待的漂亮金发女郎尼科尔，辛普森对她一见钟情，深深坠入爱河。

1985 年，长期与辛普森同居的尼科尔为辛普森生下第一个孩子西德尼后不久，就同辛普森结了婚。

刚开始的生活还比较美满，但很快两人就有了矛盾，逐渐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辛普森经常让尼科尔一个人回娘家去，这样他就可以有时间玩橄榄球，尼科尔对此十分不满。由于双方分歧日益严重，辛普森常常对妻子破口大骂，拳脚相加。

1989 年新年，正当人们沉浸在过年的欢乐气氛中时，警方突然接到来自辛普森家里的紧急报警。警察匆匆赶到现场，发现来开门的尼科尔身上只穿着乳罩和湿淋淋的短紧身衬裤，一只眼睛红肿并有些瘀血，脸上还有一道伤痕，显然她刚被人狠狠打过一顿。尼科尔惊魂未定地向警察哭述：“他要杀死我，他要杀死我！”“他是否有枪？”警察问她。“他有很多枪。”尼科尔不安地喘息着，“你们总是不能把他怎么样，每次都是向他问问话，然后就走人，我想让你们把他抓起来。”这时辛普森从门后走出来：“你们已经来过不下 8 次了，难道还想因为这点小事就把我抓起来？这是我们的家务

事，我们自己能够解决，请你们赶快离开。”

辛普森还常常同其他女人混在一起。一次，辛普森与一个女人吃过午饭后不久，就被尼科尔碰上。尼科尔尾随其后，并当街高高大骂，直到警察赶来把她弄走。辛普森的朋友、歌手詹尼夫·扬谈到他们之间的婚姻时说：“他们的脾气都不好，从一开始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危险。”面对已无法维持的婚姻，双方终于在1992年分了手，法院判两个孩子由尼科尔抚养。

他们俩在一起的生活，几乎都是在断续的争吵、分居，然后暂时和解中度过的。1993年，辛普森与尼科尔曾试图复婚，但没有成功。

## 二、“六·一二”午夜血案 黑人偶像辛氏受控

1994年6月12日晚9时45分，尼科尔在其住宅附近的一家餐馆同几位朋友吃过晚饭后回家去不久，餐馆服务员、尼科尔的朋友戈德曼赶来送还尼科尔遗忘在餐馆的眼镜。当晚11—12点左右，尼科尔的邻居出来遛狗，当狗经过尼科尔家门前又跑回时，邻居发现狗的爪子上沾有血迹，这顿时引起了她的警惕。于是她沿血迹找到尼科尔家门口，眼前的场面完全把她惊呆了，只见尼科尔和戈德曼双双躺在血泊中，尼科尔身上只穿着单衣，脖子上有绳子勒伤的痕迹，戈德曼倒在旁边，身上有22处刀伤。从姿势上看，曾与人经过一番搏斗。

惊恐万状的邻居急忙报了警，警方很快赶到现场。据第一个到场的警察、一位老退伍兵描述当时的场面说：“那里到处是血。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血腥、最恐怖的凶杀案。”

警方马上立案侦查，并把事情通知了正在芝加哥的辛普森，辛普森当即飞回洛杉矶。由于辛普森有虐待妻子的前科，案发前数小时又被人看见同尼科尔在一起，于是成了警方怀疑的对象。当天中午，辛普森被押送到警察局接受讯问后又被释放。与此同时，警察在没有得到检察官许可的情况下，对辛普森家进行了搜查，结果分别在其家里和车中发现了与作案现场相吻合的血迹，在其宅内的洗衣机中也找到了带血的袜子和皮手套。警方在6月17日正式指控辛普森杀人，《洛杉矶时报》也刊登消息说辛普森是该案最大的嫌疑犯。

辛普森则声称自己无罪，并聘请美国知名的律师沙皮罗来为自己辩护。他说在杀人案发的那段时间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不在现场。至于辛普森当时究竟在哪里，是否真如他所说的那样不在现场，日后成了法庭辩论的焦点问题。

当警方赶来抓人时，辛普森拒捕出逃，由好友考林斯驾车在高速公路上与警察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周旋。

整个追捕过程近似于一场游戏，但是辛普森不象往日那样速度惊人。警察并未真想逮住他，而辛普森也没真想逃跑。他只是想回家看一看他的妈妈，在他的好友、也是与他长期合作的队友考林斯帮助下，丢下律师和医生驾车出逃。消息传开后，人们争先恐后地跑来看热闹。警察拿着辛普森丢下的大哥大，开始在圣迭戈高速公路上追赶辛普森，其场面如同美国警匪电影片。

负责空中侦察的直升飞机报告说，辛普森手中有一把手枪。一些人纷纷赶到公路两旁等待辛普森的白福特车经过。他们看到辛普森的车后，跳跃着，高呼着，手中打着标语：前进辛普森，前进！

在市中心警察局大楼里，警方专门成立了捉拿辛普森的总指挥部。此时，负责捉拿任务的特种小组和处理危机的人员正坐在大厅里，看着前方传来的电视画面。

“嘿，他的车子掉头了，这回他可要自投罗网了。”一位官员说。

“是的，”另外一个人回答，“或许他想找死呢！”

但是，前方警察传来的消息说：“辛普森准备回家一趟。”

25名特种队员立即奔赴辛普森的住宅。一部分人在房子里等候，另一部分人则带着望远镜。一个谈判组和医疗组包围了辛普森家，并在草丛和大树后面隐蔽起来。队员们都装备有自动来福枪，架势之正规，如临大敌一般。

当考林斯开车驶到辛宅前时，警察们可以看到辛普森坐在车后座上，手中确实有一把左轮手枪，正对着自己的下颚。就在这时，一个小孩子突然从辛宅内冲了出来，跑向白色福特车。

“那个小东西是谁？”特种队的队长阿尔巴尼斯问。

“辛普森的儿子杰逊。”一个队员答到。

“快把他从这儿弄走！”阿尔巴尼斯下命令。

此时，那个小家伙正哭着拉着考林斯的衣服，好象在问着什么，而考林斯看起来也泪流满面。两名警察静静地从辛宅里走出来，没带任何武器，将小家伙带回房子里去。现在危机处理小组面临的问题是考林斯的安全，因为现在没有人敢保证辛普森是否还保持理智。他们想把考林斯弄出这个区域。

考林斯在警方和辛普森之间做着调停工作，他一会儿劝说辛普森平静下来，一会儿又跟警方说多给他一点时间。“能看得出来，他忙得够呛，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阿尔巴尼斯说，“考林斯始终不愿走进这所房子，因为他担心我们会逮捕他。”

当时，警察要抓辛普森，办法很多。他们可用催泪弹，可等辛普森睡着，或直接向他进行心理攻势。

辛普森通过手机，同谈判组成员威瑞特讲着他的内心世界。他回忆着他有生以来的成功和失败，以及他的要求。威瑞特对辛普森说，你的孩子们需要你，请你千万要冷静。辛普森表示想同在旧金山市医院工作的母亲讲两句话。威瑞特答复辛，他的条件可以答应，以后有时间还让他俩见见面。

通过反复耐心地劝说，辛普森终于决定向警察投降。

辛普森举着双手走进房子，以表示他没有带武器。他说他想带走两张家庭照片，他看起来极其悲伤和疲倦。警察们将其带到起居室内，给了他一些果汁喝，然后让他单独同母亲通话。

几分钟后，警察走进来问他：“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上路了。”他们给辛普森戴上手铐，将其带出房子。一路上，辛普森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对不起，孩子们，我实在对不起。”

辛普森被捕后精神沮丧，他的朋友、以前的橄榄球队友鲍勃，以及辛普森的崇拜者、电影制作代理人杰克都说：“他满脸是泪，几乎连话都不能说了。”辛普森的辩护律师沙皮罗提出，鉴于他的当事人精神状况极差，需要治疗。

在警察把他正式送往监狱之前，辛普森郑重其事地给他的孩子、母亲和所有关心支持他的人写了3封信。在信中，他表明了自己对尼科尔的深爱、他的无辜，及要求新闻媒介出来为他申冤。信中辛普森写道：“我不相信有罪这种说法。所有这一切对我的指控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请不要为我难过，我有着美好的人生，许多好朋友，请想想以前那个真正的辛普森吧！”

而戈德曼和尼科尔的好友们此时也异常悲痛，他们表示了对受害者家属的支持。几天来，戈德曼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朋友们打电话给戈德曼的父母及兄妹，告诉他们戈德曼的朋友们没有忘记他，他们对戈德曼的家属表示支持。戈德曼的父亲弗雷德里克感动他说：“我真没想到，一个25岁的小伙子，竟有那么多的好朋友关心他、支持他。他的确是个好人，不应该有这样一个结果。”

尼科尔的孩子，9岁的西德尼和6岁的简斯汀，现在由姥姥照看。他们的学校专门为他们请了一位心理医生，以防与警察打交道的过程中受到惊

吓。在尼科尔家门外，尼科尔的许多朋友们顶着烈日，手持鲜花，不约而同地来到她的遇害地点，默默地将鲜花放在地上，深鞠一躬，然后离去，场面颇为伤感。

辛普森被捕后不承认有罪，并宣布悬赏 50 万美元捉拿杀人凶手，还重金聘请了强大的律师团为他进行辩护。至此，轰动全美长达一年半之久的“世纪审判”拉开了序幕。

### 三、世纪审判法庭大战 检方遭遇“梦之队”

1994年6月13日清晨，美国著名律师克拉克家中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听筒，立刻听出对方的声音，是洛杉矶警察局的侦探菲利普·瓦特纳。就是他最先赶到尼科尔和戈德曼的谋杀现场，并对嫌疑犯辛普森的房间进行了搜查。对于克拉克来说，接到他的电话并不感到吃惊，因为他们之间过去打过很多次交道，都是有关案子的事。但这次与往日似乎有些不同。她问道：“这次的被告是谁呀？”

“辛普森。”瓦特纳回答。

“他是谁？”

“大名鼎鼎的橄榄球运动员、电影《裸枪》的男主角呀！”

“对不起，菲利普，我真的不认识他。”

但克拉克对该案很感兴趣，她接下了这个案子，作为检方首席辩护律师。

从1994年8月至11月间，洛杉矶高等法院和受理辛普森案的伊滕法官在当地公众中选出由9名黑人、2名白人和1名拉美裔人组成的辛普森案陪审团。这12名陪审团成员经检方与辩方双方认可，在1994年的11月正式宣誓。检方的律师班子由白人女律师克拉克主帅，她在过去十几年的刑事诉讼中几乎没有失过手，共胜20多起凶杀案。辛普森的首席辩护律师由57岁的黑人律师柯克兰担任，他与辛普森重金聘请的几位著名的黑、白人律师一起，组成了实力强大的“梦之队”辩护律师团。

1995年1月，在检辩双方为期半年的调查取证和准备工作以后，洛杉矶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辛普森案。该案在美国之所以引起如此之大的轰动效应，其与众不同之处是，这次电视传媒直接进入了法庭，并且每天都对辛普森的审理过程进行实况报道，于是该案成为美国人每天议论和关注的话题。

在法庭的审理过程中，检方与辩方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纷呈、异常激烈的交锋，双方都列出了大量的人证和物证来为自己辩护。据统计，双方共提供人证126人，其中检方人证72人，辩方54人；物证857个，其中检方488个，辩方369个。

特别要指出的是辛普森的首席辩护律师柯克兰，因他为许多黑人辩护（其中只有少数是富翁和知名人士）成功，而在美国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他的出现给对方增加了很大的压力。事先有人评价：“辛普森所有的辩护律师团成员加在一起也赶不上他一个人，只要他出现在法庭上，辛普森该做的就是等着出狱了。”此话并不为过，只要了解了柯克兰，我们就会明白这番话的含义了。柯克兰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施里夫特，是一位虔诚的浸礼教徒。1949年，他随家人移居洛杉矶，并在加州洛杉矶大学学习。1962年，他毕业于洛亚拉大学法学院，然后在洛杉矶做城市律师代理，担任过1965年瓦茨暴乱中群体受害者的辩护律师。

1966年，一件案子改变了他的一生。当时有一个名叫戴德维勒尔的黑人青年，在他送怀孕的妻子去医院途中，因超速驾驶而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柯克兰担任死者家属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柯克兰虽竭尽全力，但最终还是败诉了。失败非但没有打击他做律师的信心，相反却增强了他今后专为黑人鸣不平的决心，同时，他在法庭上出色的表现也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心中。

1981年，他为球星塞托斯辩护。塞托斯因超速驾驶被捕入狱，不久发现

他吊死在狱中。警方说是自杀身亡，但柯克兰表示异议。经过开棺验尸，证明塞托斯是因狱中缺氧窒息而死。柯克兰为塞托斯的家人赢得了 400 万美元的赔偿。

1972 年，他的当事人，一名叫普拉特的黑人黑豹党成员。因被控谋杀一名白人教师而被判终身监禁。直到 23 年后的今天，柯克兰仍在为无罪释放普拉特而努力着。他说：“要为正义斗争到底。”

此外，他还曾为主演《另一种打击》的影星多德·布里奇斯辩护，布里奇斯被指控朝一名黑人开了 8 枪，而那名黑人没有被打死并亲自当庭指证他。但在柯克兰的辩护下布里奇斯竟奇迹般地获胜。之后，柯克兰又出任世界超级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的“性骚扰”案的辩护律师，并再次获胜。从柯克兰辉煌的律师生涯中，不难想见，美国一流律师的参与将大大提高该案审理的精彩程度。

果然，检方先声夺人，由克拉克向公众和陪审团描述了一名备受摧残的女子的悲惨故事。自从辛普森与尼科尔结婚后，两人就几离几合，纠缠不清。17 年来，辛普森对尼科尔的虐待没有休止。1988 年冬，尼科尔身怀六甲，醉醺醺的辛普森指着尼科尔，嘲笑她是个“肥猪”，并将她赶出家门。从 1989 年开始，尼科尔多次因遭毒打被送进医院。检方在法庭上出示了求救录音以及尼科尔鼻青脸肿的照片。多名证人也证实了尼科尔在这场婚姻中的屈辱。

检方指出，辛普森与尼科尔离婚后，还屡次纠缠她，当他发现尼科尔另有新欢不再听从他时，遂起杀心。辛普森曾对朋友说过“做梦也想把尼科尔给杀了”之类的话。这些都表明了辛普森有杀尼科尔的动机。

辩方则由柯克兰迎战。只见他身穿深蓝色西服，条纹状的衬衫配上红蓝相间的领带，一副温善的大叔形象。他以缜密的逻辑推理和惊人的记忆力，给对方以强有力的反驳。

柯克兰首先指出辛普森虽对尼科尔有过争吵和不当的行为，但并不能因此推断辛普森杀人，犯罪专家也指出这样的推断很少成立。再说辛普森虽有毛病，可尼科尔本身也并不清白。她有吸毒行为，还偷税漏税，并与别的男友有过口淫性行为等等。所以她此次被害很可能是与毒品有关的一起谋杀。此外辛普森仍爱尼科尔，辛普森几次对痛打尼科尔都表示过忏悔，双方离婚后仍试图复婚，也证明两人还有一定的感情。当辛普森听到尼科尔被杀的消息后，非常悲痛。由此可见，辛普森的杀人动机完全不成立。

检辩双方相持不下，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辛普森有或者没有杀人动机。当检方提出有证据表明辛普森有作案时间，此举立刻遭到辩方的否认。问题到了关键，于是，就作案时间的有无，双方开始紧张的争执。

#### 四、辛普森究竟在哪里 各执一词的时间表

在法官的手中，有一份案发期间的时间表，详尽他说明了在此期间辛普森的活动情况。

1994年6月12日晚9时30分至9时45分，辛普森同客居其家的朋友克林在麦当劳吃过晚饭后回到家中。此后，克林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给朋友打电话，当晚再未见过辛普森。

10点钟，尼科尔与她的母亲通了一次电话。

10时25分，出租车司机帕克按辛普森的预约提前来到辛普森的家门口，并在外边吸烟等候，当时他没有看到辛普森的白色福特车。

10时40分。司机帕克通过应答器找辛普森，但无人回答。

10时55分，帕克看到有一黑人闪进辛普森的房子。同一时间，克林听到卧室外面有很大的响动。随后帕克通过应答器找辛普森，这一次辛普森答话说他睡过了头，正在洗淋浴。

11时至11时15分，辛普森出门，坐出租车去机场。11时45分辛普森乘机飞往芝加哥开会。

当晚零时10分，邻居发现血案。

凌晨3时，警官瓦纳特和朗格被辛普森邻居的报案惊醒。

4时至4时30分，两警官先赶到现场并进行上报。

5时至5时30分，警方赶到现场并立案侦察。

5时30分克林被警察从梦中叫醒。

6时至6时30分，克林向警方描绘夜间听到响动的地点，随后发现血手套。

从时间表上不难看出，在9时45分至10时55分这段时间里，辛普森去向不明。检方推断辛普森在10时15分左右的时间里，正在尼科尔家里行凶。因为尼科尔的邻居说，10时15分听到尼科尔的爱犬悲鸣。司机帕克在10时25分时没有看到辛普森的白福特车，说明他不在家中。10时55分帕克看到的走进辛普森家的那名黑人男子，可能就是做案归来的辛普森。杀人后，乘他的福特车回家，翻墙而入，他发出的响声惊动了克林和辛普森的管家卡托。检方由此断言，杀人凶手就是辛普森！

此言一出，立即遭到辩方的攻击。辩方指出，辛普森当晚9时45分至11时，一直呆在家中没有外出。从血案现场来看，凶手和被害人曾进行了长时间的搏斗，辛普森没有可能在前后1小时稍多的时间内杀死两个人，并返回家中清洗血污。在法庭上，辛普森露出当年打球时留下的左膝的伤疤，表明自己无力杀害两名年青力壮的人。

辩方还出示了大量的人证，证明辛普森在案发时间内不在现场。有一对夫妇证明，10时25分，即检方确定的作案时间10分钟后，尼科尔宅前无任何异样。另外，也有人看到，案发时辛普森的白色福特车就停在辛普森宅前，这同帕克在夜幕中所看到的情况有矛盾。洛杉矶机场的一名服务员证明辛普森登机前非常平静，毫无慌乱之状。据与辛普森同机飞往芝加哥的摄影师宾格海姆回忆，他们在飞机上兴致勃勃地谈论着高尔夫球，辛普森当时的心情不错，看不出他有什么反常现象。辛普森所住的布拉萨宾馆服务员也回忆说，辛普森是在黄昏时分到达的，他看上去有些累，但精神还好。他在总台逗留了一会儿，同服务员们开着玩笑。在搬进915号房之前，还极有兴致地给

人签名留念。辩方由此得出结论，各种迹象表明，辛普森案发时间不在现场。

双方所持的观点和出示的证据各有道理，法庭一时很难判断哪一方说的是真。那么究竟辛普森当时在哪里呢？恐怕只有辛普森自己最清楚了。

被此案弄得昏头胀脑的主审法官伊滕只好宣布暂时休庭，改日重审。而陪审员们好象没有听见一样，仍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原来他们已经累得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由于连月来神经高度紧张和在法庭上无休止的辩论，多数法官和陪审员已经疲惫不堪了。检方律师克拉克每天晚上把她的两个小孩子哄睡后，就回到位于洛杉矶市的第 18 层楼办公室里忙碌起来，有时会干到黎明。阿克兰也是每天很少休息，一有时间就坐下来翻看案件材料。这期间共有 8 位律师因健康状况提出辞职，连一向被称为“法庭雄狮”的霍曼律师也面露疲倦之色。难怪伊滕不无感慨他说，这次审判是“一次极富挑战性、非同寻常的审判。”

## 五、一双血手套和血袜 铁证如山还是栽赃

重新开庭的日子又到了，检辩双方经过短暂的休息和调整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法庭大战。这一次检方气势逼人，拿出了指控辛普森杀人的最有力证据——双带血的皮手套。

检方指出，白人警察富尔曼6月13日在辛普森住宅后院通道上发现了沾满被害人血迹的一只皮手套，而在杀人现场的被害人身边又找到了另一只。据DNA（脱氧核糖核酸）检验，手套上面有两位受害人的血、毛发和衣物纤维以及辛普森的福特车内的毯子上的纤维。这种皮手套与辛普森平日所戴手套品种是相同的，而且，从尼科尔以往使用信用卡购物的记录上查明，她在1990年曾为辛普森买过同样品牌的手套。所以，可以这样判断，辛普森正是戴着这双手套杀死了尼科尔。

检方提出要求辛普森试带手套，以证明该手套是他的。辩方开始极为犹豫，担心一旦合适，将对本方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梦之队”律师团成员们进行了短暂的商量后，决定还是征求辛普森本人的意见。辛普森此时也没了主意，但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杀人犯，还是决定冒一次险，试带手套！

紧张的时刻到来了：面对法庭内上千双眼睛和摄像机、照相机镜头，辛普森也不禁紧张得满头是汗。辛普森小心地拿起一只手套，慢慢地戴起来。人们发现，辛普森费了好大劲，才勉强戴上。柯克兰的脸上顿时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辩方随即反驳说，辛戴着这么小的手套，连手的正常屈伸都不方便，还要再持刀杀人，那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事后据柯克兰回忆，检方在此问题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如果不是检方要求辛普森试带手套，该证据可能成为导致辛普森败诉的最有力的物证，而辩方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进行试带也是一步险棋。

血手套问题没有得出结论。检方不给辩方以喘息，又提出了另一个有力的物证——血袜。原来，警方在6月13日搜查辛普森的住宅时，曾在辛普森的床上发现了带有两名被害人血迹的袜子，这也足以证明辛普森杀害了尼科尔。

对于检方一连串的指证，辩方着实忙得不可开交。为了拖延对方，以便争取更多的时间寻找破绽，辩方首先在司法程序上与对手展开辩论。辩方指责警方在没有检察官批准的情况下就对辛普森的住宅进行了搜查，这不符合法律程序。检方针锋相对地反驳说，警方在紧急情况下，有权为了及时搜集证据而不经检察官的批准进行搜查。检方要求辩方不要回避血证，希望能得到对方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时，辩方发现了检方指控中存在重大的破绽。警方进入辛普森住宅搜查时摄下录像带是下午4点13分的事。当时卧室床上并无血袜。而后来的警方记录却出现血袜，并且记录上标明了在室内采集证据的时间是在下午4点13分以后。由此，辩方指出，检方的证据非但不能让人相信，而且很有可能是有人故意栽赃，留下血手套及血袜子等假证据嫁祸于人。

检方的几个有力证据不但被对手予以反驳了，没有起到指控的作用，而且大有被对方用来攻击自己的危险。可是检方并不气馁，他们又出示了另一个更为有力的证据。

## 六、血迹取证血样化验 孰真孰伪难以判断

检方出示了在现场采集到的血迹及其化验结果，作为最强有力的证据。检方指出，在杀人现场戈德曼身边的海军帽上、辛普森的吉普车及辛的家中都发现辛普森本人与两名被害者的血迹。况且，辛普森的左手指关节有新伤，很可能是作案时砍伤的。不仅如此，经过血液遗传基因化验表明，辛普森是杀人凶手无可置疑！

辩方立即反唇相讥，认为检方出示的证据令人怀疑。用于检验的血样也可能受到污染，这会影响到血液化验的结果。全美最有名的华裔刑事科学鉴定专家李昌钰作为辩方证人，指出检方提供的血液和其它证据的重大疑点，可信度极低！例如，警方在杀人现场采集到的唯一的一滴据说是辛普森的血，是在放置一个晚上已经风干后才用一张纸包起来的，而辩方复检时，发现这张纸上有一滴鲜血浸透的痕迹，这很象是有人作了手脚。

辛普森的辩护律师沙皮罗也指出，当时，他在证物上没有发现多少血迹，但两周以后，两名专家却发现了大量的血迹，而且经过化验证明正是辛普森的。试问，这些血从哪里来的呢？他还暗示法官，在辛普森被捕的当天，他流了一些血，作为血样，警方进行了保存。但不久后发现，血液少了很多，那些不翼而飞的血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检方发现自己的证据没占到什么便宜，立即向法庭出示了可能证明辛普森杀人的另外一些物证。1994年5月份，辛普森买了一把38厘米长的匕首，并开了刃，同时他还买了假须等东西。这些迹象表明，辛普森极有可能就是杀人凶手。但辩方强调，这些仅能表明一个人是否具有杀人动机，而不能证明他是否杀了人。

辩方进而指出，在杀人现场曾发现一串脚印，既不是辛普森的，也不是被害人的，警方对此却根本没有做任何查证，而这很可能就是杀人凶手留下的脚印！以上事实表明，检方的证据不仅不可信，而且明显是有人故意栽赃所为，栽赃人很可能正是主持证据采集工作的白人警察！

法庭内连日来气氛异常紧张，场面也极其压抑。陪审席中戈德曼的父亲弗雷德里克，看到电视画面上儿子血淋淋的镜头时，竟不能自持，老泪纵横。而尼科爾的三个姊妹则为尼科爾轻轻地嚼泣着。在此期间，辛普森的母亲始终不见踪影。法庭外的人们更是关心案情的进展，去看一看辛普森驾驶的白色福特车也成为时髦的举动，以致于出现了街道两旁大群人等待白福特车的出现和成群的车列队尾随其后的现象。

1995年8月，正当检辩双方辩论得异常激烈的时候，也是检辩双方法庭辩论接近尾声之际，法庭审理出现了另一个高潮。替辛普森辩护的61岁著名律师F·里·贝利突出惊人之语，声称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辛普森是被白人警官栽赃陷害的。这个人就是刑事侦探、负责犯罪现场证据采集工作的白人警察马克·富尔曼。

## 七、富尔曼警察受指控 种族主义者有嫌疑

贝利律师指出，就是富尔曼将一只手套从辛普森前妻被害的现场带到辛普森的家里，然后偷偷放到地上。检方立刻质问辩方，富尔曼与辛普森素不相识，为什么他要加害辛普森呢？辩方当即传唤一名妇女出庭作证，证明富尔曼是一个十足的种族主义者！

这位妇女作证说，她曾于 1985 年在酒吧遇到过富尔曼，当时曾清楚地听到富尔曼恶狠狠地骂道“恨不得所有的黑鬼都死光！”他还表示讨厌那些和白人女子在一起的黑人，而辛普森的妻子尼科尔正是一名白人。由此可见，富尔曼陷害辛普森合情合理。

辛普森的律师随后在法庭上讯问了富尔曼。但富尔曼矢口否认见过这个女人，并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检方对辩方的讯问方式向法庭提出了抗议，认为仅凭这一条证据来证明富尔曼是种族主义者，实在不可以相信。法庭表示同意检方的提议，要求辩方能提供出更多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富尔曼是种族主义者。

检方为了彻底驳倒辩方的指控，出示了许多人证，以证明富尔曼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检方指出，许多认识富尔曼的人，包括他的黑人朋友、以前的黑人警察搭档和得到过富尔曼帮助的受害者们，都认为富尔曼决不会是个种族主义者。

富尔曼的第二个妻子、当教师的珍妮特说：“我不可能嫁给一名种族主义者，对这种事情我很敏感。我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同有其它信仰的孩子们在一起，特别是黑人孩子，我甚至于不喜欢开种族主义的玩笑。”洛杉矶市的黑人检察官梅伊尔斯，从 1989 年以来一直是富尔曼的朋友，他在法庭上作证说：“也许是富尔曼见到了太多的黑人的阴暗面，以至于让他对黑人产生了厌恶情绪，但我敢说，他决不会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据富尔曼的心理医生戴维回忆，自从富尔曼 1985 年由地方警察局调到西洛杉矶市中级警察局以来，他的心理压力大有缓解。从 1981 年开始，富尔曼每周去看两次戴维。由于他长期接触罪犯，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他希望通过戴维，进行心理治疗。在戴维的帮助下，富尔曼参加了绘画班并进行了有规律的学习，他的情绪大有改善。1983 年，富尔曼对他的另外一位心理医生提到戴维时说：“他是一名好医生。我过去常常想找个人揍他一顿，现在我平静多了。”

但辩方并不放弃自己的观点，在此期间四处寻找证据。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 1995 年 8 月，一位名叫麦金妮的女作家提供了富尔曼暴露其种族主义仇恨的录音带。

在这盘录音带中，富尔曼向一位电影剧作家承认，他在过去 10 年里 41 次辱骂黑人为“黑鬼”，并利用警察身份和办案机会，以制造假证件、栽赃陷害等可耻行径让许多黑人受到不公正的法律制裁。通过录音带，人们还听到富尔曼对自己的种种恶劣行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绘声绘色地描述他如何把黑人司机的驾驶执照撕毁，再指控其无证开车；以及他如何把曾注射毒品的黑人身上的伤疤强行搞掉，再指控其最近又重新吸毒。

辩方还提供了数名证人（其中包括两名白人妇女）到法庭作证说，富尔曼曾讲过“只有死黑鬼才是好黑鬼”以及“如果让我干，我就把黑鬼们弄到一起统统烧死”等明显的仇视黑人的话。

辩方摆出的这些明晃晃的事实，使整个法庭顿时哗然，陪审席内嘘声一片。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眼前这位衣冠楚楚的警察，竟会是一名种族主义者。可想而知，这些证据会给检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果然，检方原先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大大受挫，不得不承认富尔曼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是个坏警察，他根本不配当警察。但检方为了稳住形势仍坚持说，富尔曼虽然是个坏蛋，可这并不能抹杀辛普森杀人这一事实。所以检方要求法官及陪审员们，不要因为富尔曼而忽略了辛普森，因为审理本案的目的是，谁是杀人凶手，而不是谁是坏蛋，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辛普森！

为了进一步打击检方指控的可信性，让富尔曼和检方出洋相，辩方还要求富尔曼再次出庭，就是否辱骂黑人为黑鬼及在法庭上说谎一事作出解释。富尔曼当然不愿意这么做，于是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出庭作证。至此，辩方在法庭里的气势占了上风，也完全掌握了法庭辩论的主动权。

经过近9个月时间紧张激烈的法庭较量，检辩双方，包括法官及陪审员在内的所有人员都已精疲力尽了，该调查和讨论的问题也都进行完了，接下来的只剩下等待法庭的最后宣判了。

## 八、审判结局出人意料 474天和不到4小时

1995年10月3日，法庭最后宣判的日子终于到了。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这一天的确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此案从发案到最后宣判，历时一年半。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牵动着无数美国人的心，新闻界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如今，此案终于要告一段落了，有谁不想听一听故事的结局呢？

法庭最后宣判时刻，美国上至总统、下至百姓，有1.5亿人停下手中的工作注视着电视屏幕。在欧洲，有许多家电视台参与了转播对辛普森判决的实况。而此时的洛杉矶高等法院内外，气氛更是异常紧张。法庭内，检辩双方以及受害者的家属和被告家属都早早地入位就座。法庭外，警察密布，人头攒动，黑人与白人、辛普森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聚集在广场上。

当日上午，当地时间10时07分，“世纪审判”最后的时刻到来了。经过一年多的审理，陪审团分析了133位证人的1105份证词后作出决定，法庭正式宣布：“辛普森无罪！”至此，被囚禁达474天之久的辛普森获得自由，这场马拉松式的刑事审判终告结束。

听到这一判决结果的美国人，此时此刻，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法庭内，辛普森轻吁一口气，笑容满面地与他的律师们拥抱；而后排的受害者家属们则失声痛哭，以手掩面。克拉克和其他检方律师则呆呆地坐在一旁。法庭外，白人与黑人的表情正如他们的皮肤颜色一样分明，大多数白人觉得他们被美国的司法制度出卖了，他们惊诧不已，愤怒之情溢于言表；黑人们则是欢呼雀跃，仿佛在庆祝什么重大节日一样，相互拥抱、笑逐颜开！

美国总统克林顿自始至终观看了此案的最后宣判。当看完终审的电视实况转播后，克林顿呼吁美国人尊重陪审团的裁决。

然而，最让人们觉得惊讶的却是，这项耗资1000多万美元的“世纪审判”在陪审团那里却讨论了不到4个小时，就对被告作出一致裁决，其速度之快是法学界所始料不及的。法律专家原以为讨论至少要进行好几天呢！

不仅如此，陪审团其实早在10月2日听取检方与辩方的最后论辩后就已经作出了无罪的一致裁决。但是，考虑到该案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它在美国黑人与白人社会中的巨大牵动力，为了给洛杉矶警方以充分的时间来进行防暴部署，主审法官伊滕决定将判决结果推迟一天宣布。

难怪事后有人评价说，“世纪审判”仅在法庭上就持续了9个多月，提出的证据与数据成百上千，法庭审理的全部文字记录长达5万多页！而陪审团讨论并作出判决却只用4个小时，这在美国司法审判史上也算是一个“最”字记录！速度之快令法学界震惊！

那么，陪审团如此之快的决定，是否过于轻率了呢？黑人占绝大多数的陪审团是否故意偏向黑人辛普森，为其开脱罪责呢？为什么两名白人和一名拉美商人也判辛普森无罪？判决是否公正？……所有这些问题，都立即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有自己的看法或意见。

陪审团是如何说的呢？他们如何解释他们的判决呢？一位陪审员说：“我已经被关了9个月了，难道还要关我9个月不成？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每天都在听，都在想，最后4个小时只是把判决确定下来并写出来而已。”

其实有心人不难看出，虽然此案的辩护律师在一开始就将凶杀案的重

点，由单纯的男女关系破裂和家庭暴力转换为种族歧视及刻意的设计陷害，但大多数民众（包括少数黑人在内）仍相信辛普森是有罪的，也相信美国司法程序最后会伸张正义。因此，许多人在聆听辛普森被判无罪获释后，均感到十分惊讶，特别是对陪审团在仅经过 4 个多小时的讨论后就达成决议一事，表示难以置信。

不过，另外一部分美国人，包括大多数黑人在内，认为辛普森被无罪释放，是老天有眼，未让无辜的人蒙受冤屈。

对于许多确认辛普森有罪的人来说，检方败诉不可理解。他们认为，这是辛普森有钱，所以能请到最好的律师，因而胜诉。在他们眼中，美国的司法正义是为有钱人设计的。

但美国律师和犯罪学专家则从理论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是如下几个原因导致了检方的败诉：

首先，检方自始至终缺少谋杀的现场证明人，也没能找到谋杀的凶器。而其它证明大多是推断，是间接的，这样就缺少说服力。

其次，检方所列的作案时间表不能服人，许多问题难以解释。这是辩方始终牢牢地抓住、并用来反驳对方的一张“牌”。

另外，检察官克拉克的策略也存在错误。她以为强调辛普森殴打妻子的前科，可以获得女性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同情。但没有想到一个主要是黑人（12 位陪审员中，有 9 位是黑人，其中又有 5 位是女性）为主的陪审团，竟然以种族的认同代替了对性别的认同，判定与其同肤色的辛普森无罪。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辛普森案的问题又出在陪审团身上，因为这个陪审团无法做到不区分肤色。

最为重要的是检方倚重的血迹证据出了问题。一方面，提供证据的警察富尔曼是个种族主义者。从辛普森案一开始，辩方就多次指出这一点，并四处寻找证据，终于找到一名女作家提供的足以证明富尔曼是个种族主义者的证据——录音带。录音中将富尔曼的种族主义仇恨暴露无遗。富尔曼的所作所为为柯克兰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他把警方提供的证据定为蓄意栽赃，是充满仇恨的种族主义的体现。

另一方面，从 1987 年 DNA 用于诉讼案以来，人们对 DNA 取样的方法和效果一直争论不休，双方都搬出了 DNA 方法检测的一流专家，但结论却不相同。而且警察在取样、检查现场时缺少监督，程序不够严格，使取样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因此，检方最有力的犯罪证据的基础就瓦解了。

当然，这只是专家们的分析而已。至于其中是否还包含有什么别的因素，是否和美国近年来警察为非作歹、黑人遭受歧视有关，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辛普森案算是告一段落了。而且按照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即使今后有新的证据，也不能再指控辛普森杀人。但是到底是谁杀了尼科尔和戈德曼呢？这仍将是一个谜。

## 九、本案远远没有结束 种族鸿沟怎能填平

在辛普森案热闹过后，只要人们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裁决所引发的问题远远超过了它解决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它留下了“到底谁是凶手”的悬念，更重要的是，裁决导致了强烈的社会震荡。围绕辛普森案裁决的评价，美国社会出现了尖锐对立的观点，也出现了深层面的思考。

辛普森案暴露得最明显的是美国社会依然存在难以填平的种族鸿沟，这是美国人无法回避的可悲现实。据统计，自1977年以来，有63名黑人因杀害白人而被判刑，而只有1名白人被起诉杀害黑人而入狱。许多黑人被审讯后，只有先出示证据证明自己是无罪的，否则就是有罪的。

辛普森无罪获释的消息传出后，美国黑人和白人反应正如他们的肤色一样截然不同，呈现出两种对立情绪。聚集在法庭外的洛杉矶市中心的黑人群众欢呼雀跃，欢庆气氛传遍全美黑人社区，节日般的场面在黑人社区随处可见。从加利福尼亚到纽约，从迈阿密到芝加哥，黑人和少数民族都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他们认为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绝大多数白人对判决结果感到震惊和失望，甚至认为被美国的司法制度出卖了。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认为陪审团的裁决是错误的。

事实上，对辛普森案的反应一开始就是以种族划分界线的。多次民意测验显示，多数白人一直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而大多数黑人则认定他是无辜的。

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判决后随即进行的民意调查，受调查的白人有60%认为判决是错误的，而90%的黑人则坚信判决正确；73%的白人认为辛普森有罪，而只有27%的黑人认为辛普森有罪；有20%的白人对“美国社会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持赞同态度，而有高达50%的黑人对此持赞同态度；白人的典型反应是：这是对司法制度的嘲弄！黑人却认为：一来辛普森是受种族主义者白人警察陷害的，理应无罪释放，二来就算他杀死了两位白人，那也不算什么，它只是对黑人长期屈辱史的正当反应，三来对辛普森的审判是对全体美国黑人男子的审判，象征意义浓厚，对他开释就是对黑人男性整体的肯定。

辛普森案暴露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司法制度弊端重重。首先是金钱对司法公正的干扰极大。辛普森不同于其他被告，他拥有财产数千万美元。他出资1000万聘请了著名律师、DNA专家、刑事法律顾问及现场调查专家，组成了号称“梦之队”的豪华律师团，包括全美最优秀的辩护律师和各方面的专家，其中沙皮罗月薪10万美元，柯克兰价格更高。到该案结束，每名律师都得到了5—6万美元的报酬。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辛普森没有这么多钱或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该案或许早已结束了。金钱对他的胜诉起了关键作用。事后一家美国报纸评论说：“辛普森案告诉人们，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杀你的妻子。”还有人指出，辛普森案给人的印象是美国“有两种司法制度”，“一种是对有钱人、著名人士的”，“一种是对一般人的”。

其次，刑事案件中的陪审员制度能否保证司法的效能和准确性受到怀疑。在辛普森案的12位陪审员中，若以性别划分，有10位是女性，仅有2位是男性。若以种族划分，共有9位黑人、2位白人、1位拉美裔。他们的年龄平均是43岁。这样的陪审团成员结构，乍看之下，是很难让人觉得具有代

表性的。女性居多，是检察官的刻意安排。黑人居多，则是被告律师的有意选择。事实上，除了陪审团的成员结构在此案中有争议，审案地点也有争议。为什么地方检察官加西蒂将此案的审理，由离案发地点布伦特伍德较近的一个主要是白人聚居的富裕城市圣塔蒙利卡，转到一个黑人较多、并曾在几年前因罗德尼·金被警察殴打而引起暴动的洛杉矶市？这样的选择，固然是为了避免案发地之居民因受媒体渲染影响，而无法作客观公正的考虑，但是对检方的策略却是相当不利。事实上一个如此受人瞩目的案子，已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中立的地方，因此，选择洛杉矶本身，也并不能排出各种干扰。

另外，陪审团成员的法律和教育素质也值得一疑。在辛普森案中，仅有2位陪审团成员是大学毕业生。这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公民，却要试图了解DNA和其他高难度的技术问题，他们的能力是否能够胜任，确实也值得怀疑。除了辛普森案之外，今天许多的民事和刑事诉讼案，都有极为复杂的法律和技术问题，若没有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要想客观公正地作判断，实在不易。教育程度不高的陪审员，是否比较容易左右，可由一句比较法学专家的名言得到印证：“假如我是无辜的，我宁愿受法官的审判；但假如我是有罪的，我会选择接受陪审团的审判。”

尽管检察官提出1000多项证据，法院对整个过程的纪录长达5万多页，但陪审团几乎没有花时间深思熟虑，或严肃的小组讨论。他们在不到4小时就达成协议，宣布判决。这样的仓促行为，使人认为陪审员有可能是相信辛普森杀了人，但仍然判他无罪。

有关全票同意制度的规定也有待研究。在辛普森案中，是一致裁决辛无罪。但若出现了10：2或9：3票的情形，使他仍然因证据不足而得释放，这又代表了什么呢？有2到3票认定他有罪，难道会使检方在心理上好过一些吗？对一般认为他有罪的大众而言，司法正义能因此而实现吗？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全票同意之要求，少数坚持己见的陪审员可以无需妥协，将自己的看法陈明。另外，他也不必承担因不肯被迫为另一方所说服，而使陪审团的讨论无限度的拖长所带来的任何压力。不过，就辛普森案达成判决协议速度之快的情形来看，非全票同意的方式，并不见得会对讨论时间的长短有影响。现全美仅有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俄勒冈和蒙大拿5州允许非全票同意的判决。至于在12人的陪审团判决成立所需的票数，最少是9对3票，至今尚未有低于此比例者。

在辛普森案中，种族倾向明显，显得很像是利用了黑人对黑人的同情和与白人对立的情绪。因此，人们开始对由普通人担当的陪审员能否摆脱情感误导和种族取向，能否坚持理性，保持司法公正，提出了根本的质疑。

辛普森案还暴露了执法机构的缺陷。被公诉人当作主要证人的警官富尔曼是个标准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他曾声称：“只有死黑鬼才是好黑鬼”，“如果要我干，我就把黑鬼赶到一起统统烧死！”他的这些种族主义恶行被揭露后，不仅导致了诉方的失败，更使人看到了美国警察队伍中的种族主义势力。另外，洛杉矶警方搜查取证过程中的不合法行为、内部管理的混乱等等都表明，执法机构问题之严重已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辛普森案引起人们注意的第三个问题是美国新闻制度的弊端。辛普森案的审判成为“世纪审判”，很大程度上是由新闻界“炒”成的。在该案中，新闻媒体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从转播辛普森和洛杉矶市警察在高速公路上的追逐，到警方侦办此案将嫌疑犯提起公诉；从筛选陪审团、开庭传讯证

人，到全案的结束与陪审团的宣布判决，整个办案过程都在新闻媒体的渲染之中，使此案深受重视而被认为是“世纪审判”。新闻业的最大特点就是猎奇。辛普森的名人效应，从明星到杀人嫌疑犯的戏剧性变化，黑白通婚，再加上处于洛杉矶这个种族关系复杂的地区，这一切部符合公众和新闻界的猎奇心理。于是各种媒体蜂拥而上，报道活动规模空前。结果，媒体的取向干扰了审判过程，引导人们关注一些无聊的戏剧性情节，而偏离了犯罪事实的求证和思考，把一件严肃的司法审理变成了一部肥皂剧。

克拉克律师将此案的审判和电影“罗马假日”相比，认为它完全是媒体炒热的产物。她指出法庭上喧嚣充斥的情形，指责担任主审的法官未能控制住场面。她认为：假如此案能移到一个较为中立的地点，或是延迟开庭，使情绪降温，限制记者人数，或者可以避免一个偏离公正的司法环境。

审案中披露出辛普森对妻子施暴长达6年之久，从而引起人们对美国家庭暴力问题的关注。据美国妇女组织收集的数据，全美有600万家庭存在暴力，问题之严重超出人们的想象。

## 十、尾声：辛普森不轻松 杀人嫌疑伴随终生

1995年10月3日，“世纪审判”刚一结束，出狱后的辛普森就坐车回家了。在返家的路上，他迫不及待地给朋友通电话：“本人正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到家后不久，就举行了盛大的香槟酒会。他与来客喝酒，听音乐，大大地欢庆了一番，一点没有为亡妻尼科尔冤死而悲痛的心情。他后来去过一趟尼科尔的墓地，但只有匆匆忙忙的30秒钟，而且连鲜花也没带。

对这样的丈夫，人们哪敢恭维呢？左邻右舍都不想搭理他，他的朋友们也疏远他，连他非常喜欢光顾的乡村俱乐部也开始冷落他。最使他恼火的是，在离辛普森住处不远的树上出现了刷写的口号：“欢迎回到杀人犯居住的布伦特伍德。”当地的房地产联合会主席在电视中公开表达了希望辛普森搬离此地区的愿望。

后来，面对美国“舆论法院”给予自己有罪的判决，辛普森索性离开了烦人的加利福尼亚，飞到阳光明媚的佛罗里达去打高尔夫球。在那里，尽管他把微笑洒向四面八方，但是在高尔夫球场上他永远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找不到任何人和他打球。每当他举起戴着手套的手时，总能引起人们一阵愤怒的骚动，因为手套曾在法庭上被当作他杀人证据而出示。每当辛普森出现在高尔夫球场上，在球场上空就会出现带着书写有“辛普森滚出去”的条幅的飞机。

同样使辛普森感到伤心的是，电视台、出版社和广告公司的负责人，在如何对待辛普森的问题上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有广泛影响的国际创新管理集团公司，已经声明不再做辛普森的代理人了；在辛普森被捕之前与其密切合作过的全国广播公司体育电视台和赫兹公司已经声明对他不再感兴趣；最糟糕的是，在审判前出版过辛普森写的《我想告诉你》的利特布朗出版社，对他的出书计划反应冷淡。

不过，辛普森并不甘寂寞。他虽然对美联社记者称，“名利”二字对他如同浮云，但他没有忘记赚钱。他想把他的大名O·J的使用权卖给服装厂和体育用品公司，后来大概因为他的形象不佳而作罢。接着，他又打算在1996年2月去亚特兰大的体育节上为他那张在洛杉矶遭警察追捕的照片签名，每张收费160美元，但此事也不了了之。

对辛普森打击最大的是，在审理过程中一直支持他的女模特芭比拉小姐，在不久前的电视上公开声称与辛普森断绝关系。理由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辛普森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许多热心人向芭比拉发出了警告，以辛普森这种反复无常的性格，他很有可能干出某种惊人的举动来，所以她最好记住警察局的紧急电话，以防辛普森旧病复发，祸从天降。

总之，不论获释后的辛普森日子过得好坏，但有一点是辛普森所要面对的，那就是他将带着公众提出的“究竟谁是杀人凶手”这个疑问度过他的后半生。

（李威撰稿）

## “白水事件”的前前后后——危机四伏的克林顿

克林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 1992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一举击败因海湾战争而赫赫有名的布什总统，夺取白宫宝座。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上任之初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那时候，总统办公室每天都收到大量的克林顿私人邮件，其中多为表示祝贺和爱戴之情。然而时隔不久，震惊美国上下的“白水事件”和克林顿的桃色丑闻令克林顿夫妇堕入烦恼的深渊。

## 一、“白水事件”曝光 九二大选竟过关

提起“白水事件”，还要追溯到十几年前克林顿在阿肯色州任州长时期。1978年，克林顿还是阿肯色州的司法局长。他和夫人希拉里与他们的好朋友麦克杜格尔和苏珊夫妇联合成立了“怀特沃特（即白水）房地产开发公司”，对欧扎克山一带的风景区进行投资开发。当时，一家名为“101河开发公司”的企业从州内一家地产公司以每公顷988美元的价格购进一片土地，不久，该公司又以每公顷2178美元的高价，将其中的93公顷土地转手倒卖给克林顿夫妇和麦克杜格尔夫妇，总计约20.3万美元。一年后，克氏夫妇与麦氏夫妇又以每公顷2684美元的价格，将这片土地卖给克氏夫妇和麦氏夫妇合伙成立的白水公司，其间一进一出便净得4.6万余美元，两家至少可各得一半。然而，克林顿夫妇事后说，他们在白水房地产开发中不但没有盈利，反而赔进约6.9万美元，而克林顿夫妇的纳税记录中也没有上述收入的记载。这桩土地买卖在不长的时间里接连暴涨地价，克氏夫妇与麦氏夫妇竟然愿意以高出原价两倍多的价格购买101公司的土地，不久又提价转卖给自己的公司，而且声称没有收益，岂非咄咄怪事。

1978年下半年，克林顿当选阿肯色州州长，麦克杜格尔亦随他在州政府中任职。希拉里在克林顿担任州长后继续负责白水公司的经营业务。一年多以后，麦克杜格尔辞去公职，买下麦迪逊信托银行公司，重新投身商海。不久，该银行公司以20%的利率借贷给希拉里3万美元，资助白水公司在开发项目的地皮上营建样板房。

1982年，麦克杜格尔买下麦迪逊担保储蓄与贷款公司。这是州府小石城的一家政府金融机构，负责帮助那些经营不善的贷款与储蓄公司解决财政困境。该公司在麦克杜格尔主持下得以迅速发展。

两年后，有人向联邦政府举报麦克杜格尔，称麦氏买下的担保储贷公司从事投机活动，该公司与麦迪逊信托银行公司的业务往来也有问题，当局马上要求进行调查。麦克杜格尔在这种状况下，仍于1985年为克林顿偿还竞选州长时欠下的5万元债款举办筹款招待会，并自掏腰包，捐助3万余元，帮助克林顿还清了借款。调查人员认为，麦克杜格尔捐助的这笔钱很可能来自麦迪逊担保储贷公司，而非个人财产。

麦克杜格尔对克林顿夫妇的热忱帮助，自然赢得了克氏夫妇的回报。麦克杜格尔在麦迪逊公司面临联邦当局调查、公司每况愈下、经营日益恶化的危难时节，向希拉里求助。希拉里供职的罗斯律师事务所（她是该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立即为麦克杜格尔的麦迪逊公司提供法律帮助。她利用克林顿的州长职务，获得了阿肯色州证券专员贝弗利·巴西特的批准，以优先股的方式出售股票，为麦克杜格尔的公司筹集了急需的资金，使面临扼喉之危的麦迪逊公司得以喘息。希拉里还设法提供了小石城弗罗斯特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用此证明麦克杜格尔的麦迪逊公司具有偿付能力，为获取批准筹资提供法律依据。

在当局对麦克杜格尔的麦迪逊公司进行调查期间，希拉里合伙执业的罗斯律师事务所应麦克杜格尔的要求，充当了他的法律代理人，希拉里更是竭力为麦迪逊公司进行辩护。每月，麦克杜格尔从他的一个秘密账户支付罗斯律师事务所2000美元，据说是法律咨询费用。但是这笔钱并没有按照常规进行结算，更没有列入律师事务所的账目，而是直接付给了希拉里，并且由克

克林顿利用晨练之机，直接从麦克杜格勒的办公室领取支票。克林顿的一位朋友曾公开证实确有其事，同时声称，克林顿每月亲自跑到麦克杜格勒的办公处拿取支票，是件众人皆知的公开秘密。

克林顿也曾亲自出马，向一位富有的小石城前市政法官兼小企业管理局人员大卫·黑尔施压，要他为麦克杜格勒的公司提供贷款。不久，麦克杜格勒的夫人苏珊就得到了这笔高达 30 万美元的非法贷款。

尽管麦克杜格勒使出了浑身解数，克林顿夫妇也千方百计地予以帮助，但麦迪逊公司的状况并没有根本好转。1986 年，联邦当局强令麦克杜格勒辞去该公司的职务。同年，一份调查报告发现，白水公司居然动用麦克杜格勒的夫人苏珊·麦克杜格勒的部分贷款，以 55 万美元买下了一家公司的地皮。阿肯色州当局在此前就打算关闭麦克杜格勒的投资公司，由于州长克林顿动用否决权干预，麦迪逊公司得以维持。

1989 年，麦迪逊公司终于难逃厄运，由于经营不善。当局查封了这家公司，不久终于倒闭。通过查账发现，该公司亏损严重，由于麦迪逊公司的倒闭，致使纳税人损失了 4700 万美元，当局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收回因倒闭造成流失的纳税人资金，遂就 1985 年由克林顿夫人希拉里递交的弗罗斯特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一事提起诉讼。希拉里在罗斯律师事务所的亲密同事文森特·福斯特，要求当局将此案交由他们的律师事务所办理。很快，当局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并与罗斯律师事务所签署了合同，正式委托该事务所受理此案。后来充任克林顿政府副司法部长的韦伯斯特·哈贝尔，当时也是罗斯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由他出面承办这一案件。哈贝尔与联邦管理人员商定赔款 100 万美元、并由其收取 40 万美元酬金。

麦克杜格勒因涉嫌造成麦迪逊公司倒闭，以及制造假破产和其他欺骗行为，被指控犯有金融诈骗罪。麦迪逊公司与麦氏夫妇和克林顿夫妇合伙开办的白水公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间不乏令人生疑的交易。然而，早在事发以前，麦克杜格勒已经按照希拉里的要求，将有关白水开发公司投资的所有档案送到了克林顿的州长办公室。据后来报道，在 1992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希拉里指使手下人全部销毁了这些档案。经过一年的调查，麦克杜格勒居然于 1990 年被宣判无罪，对其指控也不了了之。

1991 年 10 月，克林顿正式宣布参加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次年 1 月，总统大选的预选还未开始，美国新闻媒介就曝出克林顿的桃色丑闻。1 月 17 日和 24 日，纽约一家小报《明星》周刊先后登出两则消息，两名妇女均声称与克林顿有染。其中一人是阿肯色州的尼科尔斯，她曾状告克林顿是一个色鬼，并指控他至少与 5 个女人通奸。另一人是歌女珍妮·弗洛尔，她声称手中握有这方面的谈话录音。克林顿利用一切传播途径极力洗刷自己。不久，尼科尔斯撤销了对克林顿的起诉，但弗洛尔仍坚称自己说的“全是实话”。

桃色风波尚未平息，新闻媒介又将 1969 年越战期间，克林顿逃避服兵役的消息捅了出来。尽管克林顿极力辩解，仍让人感到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在这期间，还有人将克林顿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时吸毒的历史也端了出来。1992 年 10 月，美国《新闻周刊》等三家媒体为了弄清克林顿逃避兵役一事，专程到美国国务院护照处查找当年克林顿申请出国护照的原始记录。他们惊奇地发现，几页重要的记录已经失踪，而 1969 年的这段时间，恰是克林顿在牛津读书躲过了征兵登记日期，并曾一度出访苏联。护照记录的丢失

引发了人们一连串的疑问，同时也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共和党借此猛烈攻击克林顿，克林顿的竞选班子也予以反击，暗示共和党人布什当政的国务院做了手脚。

追寻丑闻、互挖墙脚、谩骂攻击甚至造谣诽谤，这是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特色和“传统”。每一个候选人均会被攻击得体无完肤，任何缺陷和隐私都会被人挖出来作为攻击对方的炮弹。美国历史上的一些著名总统也难免如此。1864年，亚伯拉罕·林肯参加第二次竞选时，竟然被攻击者冠以“暴君、盗贼、恶棍、屠夫、骗子、笨蛋、牛皮大王”等一大串恶毒的称谓。克林顿当年竞选州长，也曾被他的对手攻击为“下流坯”、“收破烂大王”。克林顿则回敬对方是“幼稚无知的小崽子”。在这场揭短大战中，桃色丑闻往往是众人关注的中心话题，也是致对方于死地的杀手锏之一。当年，民主党人加里·哈特与布什竞选总统，一桩桃色丑闻就令哈特翻身落马，被迫退出竞选舞台。克林顿在这场总统竞选大战中，同样经历着剥皮剔骨、上刀山下油锅般的磨难。

尽管丑闻迭出、选战正酣，有关白水经济案的是是非非并没有停止。1992年3月，《纽约时报》首次刊载了有关白水公司和麦克杜格尔与克林顿之间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的文章。克林顿立即向记者表白，声称他和夫人希拉里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同时声称他们在合办的白水公司中不但没有盈利，反而损失了2.5万多美元。为此，克林顿夫妇向大法官詹姆斯·莱昂斯提出了重新审查白水地产交易的请求，丹佛会计事务所也应克氏夫妇的要求进行了调查分析。分析报告认为，麦克杜洛尔夫妇实际控制青白水公司，而克林顿夫妇没有非法行为。克氏夫妇在白水公司的交易中损失了6.89万美元。大法官在一份没有公开的报告中则认为克林顿夫妇遭受了损失。

当局在麦克杜格尔的麦迪逊公司倒闭时，曾决定由结算信托公司监督清理麦迪逊公司。该公司也是一家联邦所属机构。此时，结算信托公司向司法部提出重新审理麦迪逊公司案的请求。由于总统大选正值关键时刻，当时的司法部长担心重审此案会被视为布什政府进行竞选的政治手腕，导致不利后果，因而拒绝进行调查。此案遂被搁置起来。

1992年底，克林顿夫妇为了尽快摆脱与白水公司的干系，由罗斯律师事务所的文森特·福斯特操办，将他们在白水公司中的股份以每股1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麦克杜格尔。在此之前，由于经营不佳，白水公司也已提出破产申请。麦克杜格尔知恩图报，收购克林顿夫妇手中的股权实为帮了克氏夫妇一个大忙。

199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以克林顿和民主党获胜而告终。尽管克林顿迭出丑闻，尽管布什政府取得了海湾战争的赫赫胜利、以及外交事务上的众多成就，期盼变革、要求改变经济状况和解决国内问题的美国选民，最芝还是相信了克林顿的种种美好许诺，宁愿容忍克林顿的种种丑闻，选择一个并不完美、但似乎能带给他们希望的新总统。

## 二、联邦重开调查 克林顿丑闻频频

1993年1月，克林顿正式就任总统职务。入主白宫是克林顿多年的梦想。60年代初期，克林顿还是一个中学生，他在一次中学“模拟政府”的竞选中当选“参议员”，并有幸以阿肯色州代表的身份赴首都华盛顿参观政府机构。在那里，他有幸在国会参议院议员餐厅，与自己家乡的参议员，也是当时的参院外委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共同进餐。他在参观白宫时，受到了肯尼迪总统的接见，并留下了一张与总统握手的珍贵合影。华盛顿之行给克林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行成了他确定人生道路、决心从政的转折点。如今，梦想变为现实。自然令克林顿颇有志满意得之感，似乎以往的一切政治梦魇均已烟消云散，再不会与他纠缠。

然而，美国总统，乃至参、众两院均由民主党一统天下的状况令共和党难以接受，他们不甘心共和党在政治上的落伍。克林顿任阿肯色州州长时的政治对手也未就此罢休，“白水事件”成了他们向克林顿总统发难的武器。就在他们沸沸扬扬极力要求由联邦政府出面，重新调查“白水事件”的时候，原阿肯色州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克林顿总统的白宫法律副顾问文森特·福斯特突然于1993年7月20日自杀身亡。福斯特是克林顿夫妇的密友，曾多次参与白水公司在业务方面的法律事务，并曾为克林顿夫妇处理一些私人法律事务。他是涉及白水公司与麦迪逊公司相互关系的某些内幕的知情人之一。

警方在福斯特自杀后没有发现他的遗嘱，但据说在自杀现场发现了一份阿肯色州从80年代以来有关土地交易的记录名单。白宫在福斯特自杀后立即派人进入他的办公室。白宫法律顾问伯纳德·努斯鲍姆亲自清理了办公室内的有关文件，并与另一名白宫人员拿走了一棵有关“白水事件”的文件。据说，这些文件很快交给了克林顿夫妇的私人律师，而没有送交司法部有关调查人员。警方事后声称，白宫人员阻挠他们调查福斯特自杀案，使他们查证困难，难以进行工作。

福斯特之死以及白宫对此案的行为，立即引起舆论界的关注，并激起调查人员的极大兴趣。报界纷纷提出质疑，甚至质向白宫为什么不配合有关人员调查，如此遮遮掩掩是不是有见不得人的事情。反对党更是沸沸扬扬，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在各方的压力下，联邦政府重新开始调查“白水事件”。

1993年11月，由克林顿总统亲自任命的小石城女检查官葆拉·凯西自动退出调查组，联邦检查官唐纳德·麦凯接替了她的工作。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提出成立由两党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共同调查白水公司和麦迪逊公司案件。这一建议得到了银行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亨利·冈萨雷斯的赞同。但不久，冈萨雷斯出尔反尔，转而反对共和党人的建议。

同年12月，白宫首次向外界透露了有关福斯特办公室内“白水事件”卷宗的去向，承认这些卷宗已被取走。然而，此事并没有通知调查福斯特自杀案的司法部门。迫于新闻媒介和公众的舆论压力，克林顿夫人希拉里被迫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她竭力进行表白，声称她和自己的丈夫参与投资的白水公司没有获得什么收益，完全是一起失败的投资。希拉里指责新闻界，质问他们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纠缠不休。

希拉里的表白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反对党依然穷追不舍。就在希拉里接受记者采访的次日，共和党众议员吉姆·利奇公开要求司法部长珍妮特·雷

诺任命一名特别检查官，专门负责调查“白水事件”。然而，这一要求遭到了雷诺的拒绝。

白宫对福斯特自杀案调查工作的不合作态度，以及此案与“白水事件”的关联与影响，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疑。人们不禁怀疑福斯特是否真的知道关系到总统夫妇的什么秘密，他会不会因为担心案情的进一步发展，最终难免代人受过，实在不得已而用自杀来逃避一切难堪的后果。外界的猜疑，舆论的压力，迫使克林顿夫妇于1993年12月下旬同意将有关“白水事件”的所有文件交给司法部。

就在福斯特自杀案还未弄清、“白水事件”仍未了断之时，克林顿后院起火，报界又曝出涉及克林顿桃色丑闻的新消息。1993年下半年，美国《旁观音》杂志的记者大卫·布鲁克通过连续采访克林顿任州长时的四名保镖，获取了大量有关克林顿的绯闻。这四名保镖均是阿肯色州的警察，也是克林顿任州长时最忠实的贴身警卫。他们在克林顿任州长之初直到他当上总统的10余年时间里，始终负责克林顿一家的安全保卫工作。据他们介绍，除了保卫工作，平时还要干许多杂芳，为州长夫妇提供各种服务。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州长，甚至在克林顿竞选总统曝出桃色丑闻时，还为他隐瞒真情。然而，克林顿当上总统后，对待这些人“简直象对狗一样”。终于，保镖们愤怒了，他们在威胁下保持了一年沉默后，最终向外界倾吐了一切。

帕特森和帕里是两名中年警卫，也是克林顿任州长时最信任的保镖。据他们介绍，尽管克林顿一再发誓，他只在结婚之前有过风流韵事，但实情并非如此。克林顿与希拉里结婚后旧习不改，始终在外拈花惹草，情人竟达几十个之多，其中既有一夜风流，也有长达十几年的固定情侣。帕特森列出了固定情人的姓名，数量竟有半打之多。这些人包括一位大法官的妻子、阿肯色州的女律师、克林顿办公室的女工作人员、报社的女记者、公司的女职员以及化妆品女推销员和歌女等等，不一而足。她们的年龄从30多岁到40多岁不等，与克林顿均有较长久的暧昧关系。

克林顿为了与自己的这些情人幽会，真是费尽了心机。他总是利用晨练或深更半夜去幽会。只要希拉里一外出，克林顿马上通知自己的情人，公然把女友叫到家里寻欢作乐。有时希拉里和女儿睡熟后，克林顿会悄悄溜出自己的房间，借用警卫的汽车去会自己的情人。每逢此时，克林顿的贴身警卫就成了他的忠实哨兵和通风报信者，专门负责监视希拉里的动静，一有风吹草动，马上用无线电话通知克林顿返回。尽管如此，希拉里还是察觉了克林顿的这种勾当。一次，希拉里半夜醒来不见克林顿的踪影，她马上大声呼叫警卫去找她的丈夫。最终，怒火万丈的希拉里与狼狈赶回的克林顿在厨房里大闹了一场，直打得满地杯盘，一片狼籍。

实际上，希拉里对自己丈夫的风流艳情早已风闻，但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和政治需要才维持着婚姻。这种关系在克林顿竞选总统朗间表现得尤其鲜明。在新闻媒介的采访现场，克林顿夫妇亲密无间的精彩表演，与当年民主党人哈特在竞选中曝出绯闻后，其夫人大哭大闹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实，希拉里自己也同样婚外有情。她与小石城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文森特·福斯特关系暧昧，此人在克林顿当选总统后，被任命为白宫副法律顾问。据警卫帕特森介绍，希拉里与福斯特的亲密关系，在克林顿的宅院里是公开的秘密，他们这些侍从人员都知道此事。只要克林顿离开本城，福斯特就会不期而至。警卫们都曾亲眼见到两人长时间热烈拥抱接吻的情景。福

斯特与希拉里的特殊关系，自然促使他忠实效力于这一家庭。他不仅参与了白水公司的法律事务，同时也参与处理过克林顿夫妇的许多其他私人法律事务。他是白水一案的真正知情者之一。正因为如此，福斯特于 1993 年 7 月 20 日自杀后，带走了他所知道的一切秘密，也留给了人们一连串的疑问。

克林顿对自己的风流韵事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尽管如此，他的情人仍不时给他带来麻烦。歌女弗洛尔与克林顿有长达 10 余年的风流史。克林顿当选州长后，她曾要求在州政府中谋个职位，由于未能予以解决，弗洛尔便拿两人的性关系对克林顿进行要挟，最终如愿以偿。然而，弗洛尔并未就此满足，她最终还是向新闻媒体公开了这一隐情。事发后不久，弗洛尔也未能保住自己的这份公职。

弗洛尔事发后，侍卫宫记录出入州长官邸车辆号牌的登记被克林顿下令销毁，州长官邸的电话记录也被全部收走，估计也已销毁。克林顿的下属一再警告侍卫人员，要他们严守秘密，不得透露任何内幕。克林顿甚至声称：“只要没有照片，我就是自由的，清白的。”然而这一切，在忍无可忍的侍卫们口中，全部被端了出来。更有甚者，昔日的情人居然状告克林顿进行“性骚扰”，打起了没完没了的官司。

焦头烂额的克林顿一面招架跳色官司，一面还要继续应付要求弄清“白水事件”的强大压力。在国会，除了共和党议员一再发难外，民主党议员也开始有人应和。民主党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附合共和党人关于任命特别检查官的要求，其他民主党参议员也表示支持。

1994 年 1 月中旬，克林顿被迫作出让步，要求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任命一名独立检查官进行调查。不久，雷诺正式任命前纽约市联邦法官、共和党人小罗伯特·菲斯克为独立检查官，负责调查白水和麦迪逊经济案。

通过调查，当局发现了一系列疑点，希拉里曾要求麦克杜洛尔在合伙公司的经营方面由她全权负责，以减少经营活动中的损失，此事在一封信中讲得清清楚楚。但希拉里对此极力否认，声称自己仅仅是合伙人，不参与具体经营。希拉里借贷的一笔 3 万美元的抵押金，却由麦克杜格尔分期付款，而希拉里则享受抵押金的税收优惠，此事有逃税之嫌。此外，克林顿夫妇卖出白水公司的股份，这笔交易的收入也没有纳税记录。克林顿任阿肯色州州长期间，曾得到麦克杜格尔等各方面的资助，据麦迪逊案的调查，阿肯色州的四家银行就曾向州长克林顿提供 28 万美元的个人贷款。至于克林顿夫妇与白水公司和麦迪逊公司在经营等各方面的关系，以及希拉里的罗斯律师事务所在其间所起的作用，更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疑点。

与此同时，报界不断披露，白宫对调查福斯特自杀案和“白水事件”采取了不合作态度，阻挠有关人员查找证据。根据美国的法律，当局对上述案件的独立调查工作应当秘密进行，任何党派和个人，甚至国会和政府都不得插手干预。然而，白宫人员却直接打探并插手调查工作。白宫法律顾问努斯鲍姆就曾多次秘密会见财政部和司法部的有关人员，了解有关案件的指控和调查进展情况，甚至旁听对涉案人员的审问。

就在新闻媒介沸沸扬扬追踪报道上述案件之时，报界的一则消息令人震惊，阿肯色州小石城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销毁了福斯特的所有档案，其中包括涉及白水公司的有关文件。此事正值独立检查官菲斯克上任之初。

白宫的行为以及外界的种种质疑，促使独立检查官菲斯克断然作出决定，直接要求白宫和财政部有关人员到法庭作证。联邦调查局遂向 6 名白宫

高级助手和 3 名财政部官员发出传票，他们分别是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哈罗德·伊基斯、白宫联络主任马克·吉兰、白宫法律顾问伯纳德·努斯鲍姆、克林顿的亲密朋友、总统高级顾问布鲁斯·林赛、克林顿的新闻秘书莉萨·卡普托和克林顿夫人希拉里的办公厅主任及新闻秘书玛格丽特·威廉斯。被传唤的财政部官员则有副部长罗杰·奥特曼、总顾问琼·汉森和办公厅主任乔舒亚·斯坦纳。

### 三、总统濒于破产 菲斯克报告公布

联邦调查局发出传票的次日，白宫法律顾问努斯鲍姆突然宣布辞职。这位嗜烟如命的白宫大员成了困扰克林顿政府的“白水事件”的第一个牺牲品。

努斯鲍姆是克林顿夫妇的好友，他也是华尔街的著名律师。正是由于希拉里的帮助，他才成为白宫法律顾问。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配合默契，观点一致，在白水一案中尤其如此。白宫法律顾问是美国法律界最受尊敬和最有影响的职务。然而，罗斯鲍姆就任以来却从没得到半点安宁。他在处理一系列事务中的所做所为，不断遭到国会及法律界的抨击。福斯特自杀后，努斯鲍姆并没有立即查封福斯特的办公室，反而与其他白宫人员前往清理并拿走了有关“白水事件”的所有卷宗，同时又阻止联邦调查局人员进行调查。几个月后，传说那些卷宗神秘地失踪了。由于外界的压力，白宫才不得不承认这是努斯鲍姆所为。

努斯鲍姆在福斯特的皮包里曾发现一张便签，他认为这是福斯特的遗书。然而，他并没有立即将这张便签交给调查人员，而是压了几天之后才交出来。此时，便签已经变成了几十块碎片，既没有署名，也未找到指纹。这一证物反而使案情变得越来越神秘。

尽管努斯鲍姆一再辩解，他对调查的干预只是为了适当地平衡保守总统的国家机密和确保调查工作的需要，然而，他的行为毕竟超出了允许的范围。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的日益增多的质疑和抨击，努斯鲍姆终于难以招架，只得辞职下台。

他在递交给克林顿总统的辞呈中说：“非常不幸，由于那些不理解或不想理解的人引起的争议……我现在认为，我重新去过不公开的生活可能是对您最好的服务。”他声称，他在任职期间的所做所为，都没有超出“法律和伦理规范”。

克林顿以“非常遗憾的心情”接受了努斯鲍姆的辞呈。在前一天晚上，克林顿与努斯鲍姆曾就此事专门会谈了约一小时。在宣布辞职前，他们又再次进行了会谈。

努斯鲍姆辞职引发了美国朝野更强烈的要求追究总统责任的呼声。美国议会的共和党人首先发难，甚至有人提出要克林顿辞职，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公开要求克林顿做出明确解释，如果解释不清，就请克林顿下台。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克林顿“应该在美国国民面前解释清楚。但总统不仅不对事实做出解释，也不回答国民提出的疑问。”他认为，克林顿的言行与当年尼克松隐瞒“水门事件”真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格拉姆是国会颇有影响的参议员，据说此人欲参加1996年美国总统竞选。他所发表的要求克林顿辞职的言论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在克林顿任期内也是首次有人提出要他下台。

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阿方斯·达马托同样言词激烈，他认为“与‘水门事件’相比，也许‘怀特沃特事件’性质更恶劣。”新闻界也纷纷将“白水事件”与“水门事件”相比较，称“白水事件”为“白水门事件”，以借喻其中的政治意味。

对此，克林顿在3月7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竭力进行辩解，他声称自

己和夫人希拉里既没有参与“白水事件”，也没有企图掩盖什么。他对记者将“白水事件”与“水门事件”相比较的言论提出异议，他声称：“把这两件事扯到一块儿是完全荒谬的。共和党人企图无中生有把这件事搞大，从而达到其政治目的……白宫从未试图掩盖事实真相，没有发生此类渎职行为。”他声称自己是去年10月才听说此事。

美国副总统戈尔也为克林顿解脱，他声称克林顿“未做任何坏事，也将对调查给予全面的合作。”他认为：“这个问题被过于政治化了。”同时指责共和党人的言论“充满偏见”。

总统顾问斯特凡诺·普洛斯则毫不客气地指出，共和党“因没有其他可利用的材料而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问题”。言下之意指责共和党人小题大作，完全是利用此事进行政治攻击。

白宫的努力并未能阻止新闻界和共和党人穷追不舍的势头。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强烈要求召开听证会，由国会出面调查此案。部分民主党议员出于各种考虑，也开始支持这一主张。民主党议员、众院税收委员会主席唐·罗斯滕科斯基原来反对召开听证会。此时也表示可以考虑。但特别检查官菲斯克却表示，目前正值秘密调查的关键时刻，由国会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并不适宜，国会如果行使作证豁免权甚至会影响进行调查。

与此同时，外界流传着各种传闻。有消息说，福斯特是在弗吉尼亚州的私人套穷里自杀的，有人将他的尸体移到了华盛顿附近的公园里，因为福斯特与克林顿夫妇的关系、以及他对“白水事件”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他的自杀案已成为菲斯克检查官正在调查的“白水事件”的诸多问题之一。

这些传闻来自华盛顿的约翰逊·史密克咨询公司，以及共和党人拉什·林博，甚至还有一些经纪人。传闻冲击了金融市场，导致美国国库券市场和国际货币市场的价格下跌。商界人士纷纷咨询此事，新闻媒介则要求白宫和传闻散布人做出解释。

白宫对此十分恼火。白宮女发言人迈尔斯指责新闻机构和共和党人对“白水事件”火上浇油。她称这些传闻是编造的“谣言”，同时声称：“任何一个昨天可能在金钱上遭受损失的人都应当责备史密克或林博。这个消息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是没有根据的。没有丝毫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消息是属实的。”她谴责一些媒体的报道，并称路透社是“表现最不好的新闻机构之一”。

“白水事件”不仅在美国国内引起震荡，其冲击波也扩散到国外，东京货币市场上的美元比价因此事而下跌。一位东京的经销商评论说：“由于‘白水事件’，对于美元来说，绝对是一种看跌的行情。”日本、韩国、印度、意大利、英国、法国、西班牙、瑞典等许多国家的新闻媒体均报道了此事，有的报纸甚至连续进行跟踪报道。

意大利的报纸称这一丑闻为“白水门事件”或“克林顿门事件”。西班牙的《国家报》则认为白宫处理此事“似乎越来越不老练”。但美国大众不同于新闻界和政治家，仍相信克林顿能够渡过难关。瑞典的《每日新闻报》指出，尽管至今尚无人指控克林顿违法，但“白水事件”使克林顿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大大减弱，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克林顿夫妇在公众中的形象。他们的医疗保健改革计划将难以实现。

克林顿在竞选时曾许下一大堆诺言，但上台之后却没有大的作为，甚至在外交方面被人斥之为无能。他非常希望在任内有所成就，尤其在内政方面能有所建树，而医疗保健改革计划就是他抱有最大希望的头等大事。这一计

划对老年人和低收入者在一定程度上有益，如果得以通过并实施，不仅大得人心，甚至有可能像媒介所渲染的那样，在美国历史上留下点光彩。

但是，这一计划遭到了国会中反对党议员的百般挑剔，“白水事件”更使这一计划雪上加霜。希拉里是克林顿推行这一计划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人，丑闻使克林顿夫妇大大分心，使原来就很困难的改革计划更加难以推进。甚至连专门调来负责推进这一计划的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哈罗德·伊基斯，也不得不忙于处理涉及“白水事件”的各种问题。政治评论家马莎·佩特森评论说：“凡是使他们不能专心致志于推进医疗保健改革的日常事务的事情都将使工作更难于展开。”

实际上，共和党人揪住“白水事件”不放，以及时推进医疗保健改革计划制造困难，均有其自身的政治目的。1994年正值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意欲借克林顿的丑闻，损害民主党在公众中的影响，以期获得中期选举的胜利，改变该党在议会中的劣势，甚至影响199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此时，美国部分媒体的民意测验也确实表明，克林顿在公众中的形象受到了损害。美国广播公司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克林顿的公众支持率已经从调查前一周的58%降到了52%。

就在克林顿刚刚任命大律师劳埃德·卡特勒接替努斯鲍姆的白宫法律顾问一职不久，司法部副部长韦伯斯特·哈贝尔又突然宣布辞职，使稍稍平息一点的“白水事件”又起波澜。哈贝尔曾与希拉里共事于小石城的罗斯律师事务所，他也是克林顿夫妇的密友之一。当年，他曾代表罗斯律师事务所，受当局委托办理麦迪逊公司一案。在办理一宗案件的过程中，当局原商定付其3万美元，而实际付费却是原价的两倍。据说，哈贝尔辞职是因涉及过去办案时收费过高，以权谋私。政府官员也声称，他是因过去在律师事务所的“私人问题”而决定辞职。实际上，调查人员在调查小石城的罗斯律师事务所时，发现了哈贝尔在白水一案中所起的作用。他们还发现，哈贝尔有可能同时为政府制定储蓄法案和贷款法案。哈贝尔实际上是白水一案的第二个牺牲品。尽管如此，哈贝尔在辞职时仍表示：“我与总统夫妇的20年友谊永远使我感到自豪，而且也永远是对我支持的源泉，他们对我的支持从未中断过。”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哈贝尔刚刚辞职，国会立即作出反应。3月17日，参院在无人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决定举行“白水事件”听证会。几天后，众院也以408票赞成，15票反对，通过了类似的决定。

与此同时，前小石城市政法官大卫·黑尔承认犯有贷款诈骗罪，他声称，他是在克林顿的压力下才向白水公司提供补贴性联邦贷款的。共和党众议员吉姆·利奇也指控克林顿夫妇曾接受白水公司和麦迪逊公司送交的15万美元收入。

对此，克林顿再次在公开场合进行表白。他在一次电视台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矢口否认在“白水事件”中有任何过失。他说：“我认为我们在那件事中根本没有做过错事。”他声称，自己在这方面的记录相当不错，如果有错误，他是会承认的。有人提及，克林顿被怀疑对调查麦迪逊公司的联邦有关机构施加过影响。他对此坚决予以否认，并声称自己与这类事“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愿有任何关系。”他还为希拉里曾充当麦迪逊公司律师一事进行辩解。克林顿在记者招待会上充满自信地表示，他就任总统以来的工作“与一代人时间内任何一位总统的工作相比成绩最大”。但是，希拉里在此

之前曾承认，他们在白水公司的交易中有“不少过失”。

不久，克林顿和希拉里相继公布了他们在70年代后期的税单，以及在一宗投资交易中的收益情况。克林顿以此证明自己没有接受退税。税单表明，克林顿夫妇确实在白水房地产交易中蒙受了损失。但希拉里却在一宗农矿产品投资交易中赚了近10万美元，当初她的投资只不过才1000美元。

克林顿公布税单后不到一个月，调查人员又从档案中发现问题。希拉里在1980年经商中获得的6498美元的收入，没有向税务机构申报。当时，这笔收入应缴纳的联邦税为3315美元。阿肯色州地方州税为514美元，从1980年到1994年，14年来这笔税款的利息总额已累积达10786美元，连同税款共计14615美元。此事曝光后，克林顿夫妇立即向美国财政部和阿肯色州补交了税款和利息。他们表示，不清楚这一过失是怎样造成的，但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美国公众对克林顿及“白水事件”感到迷惑和失望。一位新闻媒介的民意调查员说：“人们因为这件事而灰心丧气，这不是他们选举克林顿时所预料到的，也不是他们开始对他的议事日程寄予很大希望时料想到的。”多数民意测验表明，克林顿的支持率在下降，而反对他的人有所上升。人们时克林顿的个人品质一直存有疑虑。

但是，由于调查工作一直没有重大进展，也没有更多的确凿证据，部分公众并不认为“白水事件”是件大事，反而觉得只不过犯了点小错误，或根本没有过错。但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有那么多烟幕就肯定有点名堂”。共和党人正是利用这一心理，对“白水事件”大肆渲染，同时穷追不舍，意欲真正搞出点问题，破坏克林顿和民主党在公众中的影响。

“白水事件”确实影响了白宫工作人员的情绪，使他们不能专心于日常政务，反而要拿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应付涉及“白水事件”的各种问题。克林顿雄心勃勃的医疗保健改革计划，以及其他施政计划均因此受到影响。他的个人形象也因此而大打折扣。对此，克林顿曾愤怒地指责共和党人的所做所为是“分裂、转移注意力和进行破坏的政治手段”。

除了政治上的影响，克林顿夫妇在个人财政方面也遇到了困难。“白水事件”涉及个人经济问题，按照美国的法律，政府不会为个人打官司出钱，即便克林顿贵为总统，也要自掏腰包。不巧的是，原阿肯色州州政府的一名女职员，也在此时状告克林顿曾对其进行“性骚扰”，打起了另一桩没完没了的官司。

在美国，打官司的费用是极其昂贵的。克林顿身为总统，涉及他的官司均有复杂的背景，应付这种案子自然要聘请有名望的大律师，而这些人的收费也同样高得惊人。在“性骚扰”一案中为克林顿辩护的名律师本内特，每小时收费为400多美元，加上本内特聘用的助手费用，整个律师班子的收费约达每小时1000美元左右。华盛顿的著名律师大卫·肯德尔担任“白水事件”一案首席辩护律师，他的收费自然不会低于上述标准。两宗官司一年的律师费就达200万美元左右。

美国律师为总统私人官司提供法律服务，既不能不收费，也不能少收费，甚至采用特殊的长期付款方式也不行。这些名律师往往与政府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如果在收费问题上采取特殊方式，便会引来说不清道不明的许多麻烦，甚至招致不同利益集团及公众的穷追不舍。

克林顿总统的年薪只有20余万美元，加上希拉里的收入和其他收益，两

人一年的纯收入不到 30 万美元。如果再加上以往的积蓄，克林顿夫妇手中的财产也不足 200 万美元。这显然难以支付高昂的律师费。实际上，没完没了的两宗官司已使他们面临破产之虞。

克林顿夫妇在万般无奈之下，经过反复考虑和权衡利弊，最终向公众伸出了求援之手。1994 年 6 月 28 日，克氏夫妇正式宣布建立一项专门基金，接受公众的私人捐款，以解决高昂的诉讼费用。这项基金将由民间的专门法律事务机构代管。它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可以接受最高限额为 1000 美元的私人捐款，包括一般企业和政治说客的捐款，但拒绝接受大公司、大企业和政治利益集团的捐赠，以避控制之嫌。

这项基金马上有了捐款人，最早的两名捐款者便是克林顿夫妇，他们分别向该项基金捐了 1000 美元。

其实，那位阿肯色州女职员的指控是颇令人怀疑的。这位名叫鲍拉·琼斯的女士恰是在法律规定时限的最后一天提出起诉的而此事却发生在 3 年以前。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事发后 3 年内不提出起诉则不再有效。因此，有人怀疑此事可能有某种政治背景，琼斯则完全是被人利用。

另一方面，琼斯的指控是否属实也大打折扣。据这位女士的姐姐透露、她认为妹妹的指控是捏造的，因为琼斯曾高兴地告诉她。

自己靠与克林顿之间的这件事就可以赚大把的钱。

但是，不管指控是真是假和能否成立，此案将和“白水事件”一样，不会有个简单的了结。两脏诉讼困扰着克林顿，使其心力交瘁而又财源枯竭。他为个人官司而向公众募捐的做法，也算开创了一项美国历届总统从未有过的先例。

6 月底，独立检查官菲斯克公布了有关福斯特死因的调查报告，其结论是“自杀身亡”。报告称，当游人在公园里发现福斯特的尸体时，他手中握有一把 0.38 口径的左轮手枪。报告同时附有一张福斯特手握左轮枪的照片。

菲斯克同时认定，福斯特的自杀与“白水事件”没有关联：白宫与财政部在白水和麦迪逊案件中的接触也没有违法行为。至此，似乎“白水事件”有了一个初步结论，这一结论自然有利于克林顿。然而，白水一案还远远没有结束。

#### 四、国会举行听证 克林顿中期受挫

美国参、众两院继菲斯克公布调查报告后不久，分别举行了“白水事件”听证会。7月26日，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首先举行听证会，这也是国会针对“白水事件”第一次举行正式听证会。这次调查主要围绕白宫官员是否与财政部调查“白水事件”的有关人员进行过秘密接触，以企图阻挠调查工作这一问题。有传闻说，前白宫法律顾问努斯鲍姆曾与财政部副部长奥特曼等多名高级官员秘密会晤，磋商阻止调查的对策。为此，除努斯鲍姆等涉嫌人员到会作证外，新任白宫法律顾问劳埃德·卡特勒也出席作证。但是，这次听证会仅被局限于特别检查官菲斯克已经调查过的问题上，其结果并没有新的重大发现。

几天后，参院也举行了涉及“白水事件”的第一次听证会，集中调查福斯特死亡问题及与“白水事件”的关系。会上，一份向新闻界散发的长达200页的专题调查报告中，特别检查官菲斯克再次确认福斯特是“自杀”，而非外界传说的“谋杀”。其后，参院银行委员会要求20余名政府官员到该委员会作证，就调查白水一案时白宫与财政部之间的20多次接触提出质询。作证的人包括财政部长本特森和副部长罗杰·奥特曼。奥特曼曾向该委员会透露白宫在数月前举行白水一案听证会的情况，但后来他又改变了一些说法。

白宫官员承认上述大多数接触不应该进行，但又否认存在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他们辩解说，这些接触仅仅是为了磋商如何回答新闻界就案情所传的各种问题。

财政部部长本特森则声称，自己对这类接触毫不知情。他在参院银行委员会长达3个半小时的作证期间，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他说：“我翻遍了财政部文件，我进行了彻底的回忆，我们仔细检查了成千上万份文件，但找不到一份向我简要介绍白宫这些会议情况的书面文件。”他说，他是从报纸上获悉白宫就“白水事件”举行的几次会议。他声称，他对自己的副手奥特曼和财政部顾问琼·汉森与白宫之间的上述接触，均是在事后才知道的。本特森的表白赢得了参院银行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信任，共和党议员皮特·多梅尼西甚至说：“我信任你，你是真金。”

然而，财政部副部长奥特曼的境况则完全与本特森相反。他在8月2日参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被严加盘问达10小时之久，其后，他又再次出席作证。

奥特曼在同年3月以前一直是负责清理麦迪逊公司的结算信托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是财政部属下对储蓄和贷款公司进行监督的机构。这位42岁的财政部大员曾就“白水事件”与白宫官员多次接触。然而，他在同年2月议会的一次质询中，声称只有一次接触。事后，他又几易说法。财政部其他官员则承认，财政部与白宫的这类接触有几十次之多。

国会议员对奥特曼的表现极为不满，许多人认为奥特曼极不诚实，共和党议员甚至提出罢免他的职务。奥特曼对此态度坚决，他表示：“我不打算辞职。”白宫也公开对他表示支持。白宮女发言人迈尔斯声称，总统仍然支持奥特曼，而且认为他“工作得很好。”

克林顿总统也公开表态。他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评价奥特曼时说：“他在那里的工作很出色。财政部长信任他，我也信任他。”克林顿同时针对外界的指责，为自己与“白水事件”的关系再次进行辩解。他说：“我反复他

说过，我一直没有做过错事，我没有做过错事。”他称自己的所做所为“没有出现违法行为，没有出现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

然而，由于“白水事件”的影响，克林顿总统的形象还是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大多数美国国民认为，对于克林顿来说，已不适用“诚实”、“可信”这类字眼。在克林顿召开此次白宫记者招待会前不久，路易斯—哈里斯联合公司所做的一项民意测验也表明，在美国成年人中，只有40%的人对总统评价“很好”或“相当好”，而59%的人认为克林顿的政绩“一般”或“较差”。尽管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已开始复苏，克林顿也一再鼓吹自己普惠于民的医疗保健改革计划，但他的支持率仍在下降。

众议院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刚刚结束对“白水事件”的第一轮听证会，联邦法院突然宣布了一项出人意料的人事变动。美国前司法部副部长肯尼思·斯塔尔被任命为独立检查官，接替年初刚刚就任此职的罗伯特·菲斯克，负责“白水事件”的调查工作。

共和党人肯尼思·斯塔尔曾是前首席法官沃伦·伯格的下属，1981年至1983年任司法部部长顾问，1989年至1993年任司法部副部长，他也是美国上诉法院的法官。他是美国上诉法院的一个专门小组选中后担任独立检查官一职的。

此时，从尼克松“水门事件”时代延续至今的任命独立法律顾问的法律已经过时失效，国会延长了该法律的有效期。司法部长雷诺即要求联邦法院再次提名菲斯克续任独立检查官一职。然而，联邦法院认为，此职应由与克林顿政府无关的人担任，遂任命斯塔尔取代了菲斯克。

在此之前，菲斯克已经完成了白水经济案第一阶段的调查工作。他已调查了白宫与财政部之间就“白水事件”所进行的接触，以及前白宫法律副顾问福斯特自杀案。他认为，白宫与司法部之间的接触没有违法行为，同时认为福斯特纯属自杀。此时，菲斯克正在调查白宫处理福斯特办公室内涉及“白水事件”的卷宗是否有越轨行为。

对于斯塔尔的任命，共和党议员感到满意。参院共和党领袖罗伯特·多尔毫不掩饰他对此事的愉悦心情，他希望斯塔尔的就职能够导致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

国会对“白水事件”的调查也确实正在一步步深入。参院银行委员会已经就此案收集了上万份文件，并与几十名涉案人员进行过正式谈话。但是，无论是听证会的答辩，还是其他调查材料，均无重大突破。

刚刚卸任的独立检查官菲斯克曾对福斯特之死有过明确的结论，他认为福斯特纯属“自杀身亡”，这一调查结论已向媒体公开。然而，新闻媒介在8月中旬发表的一篇文章，又为此事罩上了一层疑云。

8月17日，美国《华盛顿时报》透露，第一个发现福斯特尸体的目击者所看到的现场情况，与菲斯克后来公布的调查报告及现场照片大有出入。在官方公布的照片中，福斯特死时右手握有一支左轮手枪。这位目击者声称，他发现尸体时，福斯特仰面向上，双手平放身体两边，手掌向上，手中根本没有手枪。他将此事报告以后联邦调查局曾三次派人了解情况，他均按上述所见进行答复，明确提到尸体手中没有手枪。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证词在官方的报告里却变了样子。他感到气愤，并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这位目击者还提到，联邦调查局人员曾多次向他暗示：尸体的右手掌向下压住了手枪，他很可能没看清。这位目击者说，尽管有这种可能，但他看

到的实情并非如此。他坦率而又忧虑地向记者表示：“我决定保持沉默。坦率他说，我对一些报道说福斯特手中有枪感到不安，因为是有有人把枪放到那里的。”

这篇文章还透露，福斯特的尸体是在与华盛顿相邻的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国家公园里发现的。最初，公园管理人员曾证实，第一个向他们报告发现尸体的人是一位驾驶白色面包车的男子。这个男子就是上述目击者。可是后来，这些公园管理人员却否认有上述事情发生。这令那位目击者十分担忧。

据媒介透露，记者采访这位目击者是由众议员丹·伯顿一手安排的。这位众议员曾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多次对福斯特的死因提出质疑。他认为，前独立检查官菲斯克主管的调查工作并不充分，有许多疑点仍未弄清。他根据各种问题得出的推理是：福斯特并未在公园里自杀，他是被人移尸到那里的。

尽管福斯特之死已经被认定为“自杀”，但导致他“自杀”的原因却一直讳莫如深。外界对此众说纷坛，然而始终没有一个权威的结论，官方更是守口如瓶。福斯特是“白水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了解此事的大量内情。他的自杀以及白宫对调查此事的不合作态度，让人感到其间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

就在新闻媒介发表上述文章的同时，财政部副部长奥特曼在国会议员“狂轰滥炸”般的指责声中，被迫宣布辞职。他被人们称作“白水事件”的又一个牺牲品。

其实，奥特曼本人与白水事件并无直接关系。虽然他曾是清理麦迪逊公司结算信托公司的负责人，但他并未象福斯特等人那样直接参与克林顿夫妇的土地经营活动。然而，他在国会就白宫与财政部之间的接触作证时，未能真实地提供证词，以致触怒了国会的议员大人们。结果，这位民主党人遭到了国会中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的同声谴责，并在听证会上被两党议员长时间地严加盘问。

奥特曼是克林顿在大学时代的好友。他一向以善于处理棘手问题和精明过人著称。1969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商业管理博士学位。不久，他加入了华尔街著名的莱曼兄弟公司，并在几年内成为该公司的合伙人，同时赢得了精明的公司合并专家的美名。1985年，他成了日本人占有股权的布莱克斯通集团的副董事长。他一面积极地为日本人合并美国公司效力，一面又公开反对日本对美国经济的渗透。

奥特曼曾两度在财政部任职，他是克林顿政府处理经济问题的顶梁柱之一。他曾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得以在美国国会批准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也是克林顿政府与国会之间就通过预算方案进行协调的关键人物之一。

奥特曼还是一位积极为本党效力的民主党人。他曾先后为肯尼迪、卡特和克林顿等民主党人竞选总统而奔走游说。

然而，这位时年48岁、年富力强而又精干处理多种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百万富翁，却在“白水事件”的漩涡中翻了船，以至在他辞职时，竟无人表示挽留。虽然奥特曼竭力维系对总统的忠诚，甚至在他辞职时，仍表示希望自己的这一举动能够平息“白水事件”。克林顿一面对他的辞职表示遗憾，一面又支持奥特曼的决定，他说：“我认为你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了正确的步骤。”白宫发言人迈尔斯也不冷不热他说：“辞职的决定是奥特曼做出的。”她表示，没有让奥特曼在政府中另谋他职的安排。奥特曼的去职，未免给人一种

孤立无援、凄凄然的感觉。

就在奥特曼宣布辞职的第二天，美国财政部首席法律顾问琼·汉森也因“白水事件”受到牵连，不得不向财政部长本特森递交了辞职书。汉森曾受奥特曼指派，就司法部准备调查麦迪逊公司倒闭一案，向努斯鲍姆通风报信。她还两次与白宫官员晤商有关事宜。据说，她的上述行为并没有越轨。汉森还为奥特曼应付国会的听证会准备答辩词。为此，国会在听证会上对汉森也进行了长时间的严加盘问，质询一直持续到深夜。

到此时为止，由于“白水事件”的牵连，已有努斯鲍姆、奥特曼和汉森三位大员为此丢掉了乌纱帽。如果将与“白水事件”多少沾点边的前司法部副部长哈贝尔也算在内，则已有四位高官为此而去职。然而，尽管这么多要员因“白水事件”受到诛连，作为此案事主的克林顿却至今没有受到正式指控。

1994年10月，《战略投资》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杰克·惠勒的文章，文中披露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消息。惠勒在文章中声称，克林顿与贩毒团伙有关系，他是被这个名叫“乡下佬黑手党”的贩毒团伙推举上台的。这个黑社会组织不仅暗杀要揭发他们的人，而且通过克林顿批准成立的阿肯色发展金融机构洗钱。他们已经控制了阿肯色州政府，甚至有可能已染指白宫。克林顿的朋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者似乎也在进行贩毒活动。

惠勒说，墨西哥政府与这个贩毒团伙有关。每年，从墨西哥贩运到美国的毒品约价值1000亿美元，主要通过10余个贩毒集团进行走私。墨西哥执政党也从毒品交易中捞取了几十亿美元的好处。这些毒品的大部分首先进入阿肯色州，然后再扩散到美国南部和中西部。

惠勒在文中还披露，阿肯色州的9名警察揭露克林顿任州长期间有不轨行为。他们声称，克林顿不仅吸毒，而且用公家的钱周游各地去会见自己的女朋友。

惠勒的文章有如一石击水，虽然激起层层波浪，但终究未能起到翻江倒海的作用。他的文章耸人听闻，但似乎缺乏充足而又强有力的证据。尽管惠勒声称民主党将毁在克林顿手中，克林顿本人也将因此而入狱，但实际上并没有人据此起诉克林顿。此事仅只成为克林顿任期内的一支小小的插曲。当局对“白水事件”的调查也没有因为此事而停顿或改变方向。

然而，惠勒关于民主党将毁在克林顿手中的言论，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被言中。民主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一败涂地，其中不无克林顿自身的原因和“白水事件”的影响。

1994年11月8日以后，美国中期选举的最后结果出台，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和州长选举中大获全胜，取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和大多数州长职位。这使共和党自50年代以来第一次在参、众两院占据一统天下的地位。

民主党的失败有诸多原因，例如，克林顿政府政绩不佳，选民不满现状，强烈要求变革；美国经济虽有好转，但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实惠；就业艰难，降低失业率尚不理想；克林顿当初竞选时许下的众多诺言未能兑现，其中最得人心的医疗保健改革计划一直没有结果等等。除了上述重要原因之外，克林顿在处理外交和政治问题上的软弱无能，以及纠缠不休的“白水事件”和克林顿桃色丑闻，均给国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们已开始对克林顿感到失望。上述原因为共和党奠定了中期选举胜利的基础。

加之自1993年以来，先后有两本涉及克林顿阳白宫日常政务及内幕的著

作出版，书中内容来自作者对内阁部长及高层知情人士的采访。据两书披露，克林顿遇事优柔寡断，工作毫无条理，而且脾气暴躁，动辄训斥下属。白宫工作秩序亦是一片混乱。两书关于总统个人性格和工作作风的描述，无疑又使克林顿在公众中的形象受到损害。

除此之外，克林顿任人唯亲的做法也让人们反感。克林顿当上总统后，大量任用从阿肯色州带来的亲信，从克林顿身边的助理到多部的要职，许多官员均由阿肯色州人充任。原希拉里供职的罗斯律师事务所就有4名律师身居要职，前白宫法律副顾问福靳特和司法部副部长哈贝尔均是该事务所的律师。这些人自成体系，为所欲为，令朝野上下许多人反感。舆论界将白宫的混乱归罪于这些人，公众也因此对克林顿政府侧目。

共和党控制了国会，参院银行委员会主席也将中共和党人担任。因此他们可以放手继续调查“白水事件”，这对克林顿来说无疑是件烦心的事情。在政治上，面对一个反对党占多数的国会，克林顿政府将承受巨大的压力，白宫的许寒施政方案将难以顺畅通行。

对于克林顿来说，1994年是又一个多事之秋。“白水事件”和绯闻官司沸沸扬扬地又闹了一年，虽然仍无大问题，但也远未结束，这些烦人的纠缠将会依然与克林顿相伴。

## 五、国会深入调查 克林顿夫妇出庭

1995年，国会对“白水事件”的调查进一步深入。5月下旬，参议院以96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扩大调查“白水事件”范围的决定。为此，国会将举行新一轮的听证会，重点调查福斯特自杀后，白宫处理有关“白水事件”卷宗的情况，以及克林顿当年竞选州长时的经费来源问题。

部分民主党参议员也对进一步调查“白水事件”投了赞成票。他们强调，调查工作应主要针对克林顿夫妇的地产投资情况，而不应涉及竞选经费来源问题。实际上，后一个问题将涉及许多人，头绪众多，背景复杂，涉足此事将使调查工作难有止期，这对民主党十分不利。

7月18日，美国参议院开始举行新一轮听证会。这次听证会延续到8月中旬。由参院批准，以共和党参议员阿方斯·达马托为主席的参院银行委员会、以及共和党主席和民主党高级官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将在下一阶段对“白水事件”的其他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他们已获得95万美元的经费专门用于调查。全部调查工作将在1996年2月29日前结束。

听证会并没有重大收获，白宫对于国会的调查采取了一种推托、躲闪，甚至公开顶牛的不合作态度。国会无孔不入地急于找出问题，而白宫也千方百计地对国会的要求作梗。12月中旬，参院调查委员会负责人、共和党人阿方斯·达马托公开指责白宫阻挠调查“白水事件”。他要求有关人员交出1993年11月5日白宫官员与克林顿夫妇的私人律师之间的一次会谈记录。他认为交出这一记录至关重要，很可能有助于弄清白宫是否阻挠调查“白水事件”。

为此，参院“白水事件”调查委员会的两党委员专门就一项决议进行表决，结果以10票赞成8票反对予以通过。决议要求白宫在12月12日下午5时前交出上述材料。

白宫马上回敬对方，声称当事人与自己律师之间的内情秘密受美国法律的保护，拒绝交出有关材料。参院调查委员会只得将此事交由参议院讨论，参议院则很快就此事进行表决，结果以51票对45票通过决议，要求由联邦法院出面强迫白宫就范。此事一时陷入僵局。

不久，双方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和反复磋商之后，各自在不丧失原则和利益的前提下互相作了让步。白宫声称，只要不作为自动放弃律师与当事人关系特权，他们可以交出上述材料。他们要求，不得以此作为先例，进而要求白宫公布克林顿与律师之间讨论“白水事件”的所有材料。调查一方同意上述部分要求，但同时表示，不承担以后不再索要其他材料的保证。

克林顿和白宫人士均表示，现在对“白水事件”的调查纯粹是政党政治的产物，是对方玩弄政治的手段。克林顿一再表示，自己在这件事情中没有过错。白宫副顾问马克·法维亚尼也声称，公布上述材料将证明，共和党人“长期以来的搜索是徒劳的”。

1996年初，白宫官员突然宣布，找到了两份调查人员长期追索的材料，一份涉及“白水事件”，一份涉及所谓的“旅行门事件”。

“旅行门事件”发生在克林顿上台不久的1993年5月，白宫以贪污和账目混乱为由解除了白宫旅行办公室7名工作人员的职务。随后，又将该部门油水丰厚的生意交给阿肯色州的一家公司。此事公开后舆论大哗，白宫在诸方压力下被迫恢复解雇人员的工作。此前，白宫对外界所传希拉里插手此事一直矢口否认。此时，这份由前白宫行政事务主管、总统助理沃特金斯所写

的备忘录却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在总统夫人希拉里的指使和压力下被迫执行上述决定的。当记者问及此事时，希拉里断然否认参与此事，她声称自己“实在不记得有这么回事”。

另一份调查人员一直追索的材料，是希拉里当年担任麦迪逊公司律师的收入记录。两年来，调查白水一案的检查官始终要求白宫交出这份材料，而白宫一直坚称没有这份材料。就在1996年初，希拉里的私人文件管理员突然在白宫一间图书室里发现了这份文件。图书室位于白宫三层总统夫妇的生活区内，并且与希拉里的办公室相通，除总统夫妇身边的工作人员外，一般人难以进入此地。这位文件管理员在国会作证时说，她认为有人故意将这份文件放在图书室的桌子上，但她对何人所为不得而知。这份文件神秘地出现使人自然联想到克林顿夫妇，但希拉里矢口否认是他们所为。

当年，麦迪逊公司因非法经营将政府提供的6000余万美元贷款全部赔光。希拉里和罗斯律师事务所曾为该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和信用证明，因此对此事负有重要责任。调查人员一直追索希拉里担任该公司律师时的收入记录，以证明她对该公司业务参与的程度。希拉里也一直声称，她为该公司办理的法律事务非常有限。然而，刚刚发现的这份100多页的文件证明，希拉里广泛地参与了麦迪逊公司的法律事务，并多次为此而收取费用。

两份新发现的文件证明，希拉里没有说实话，舆论界为此猛烈抨击克林顿夫妇，《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甚至直称希拉里为“天生的说谎者”。希拉里在公众中的形象顿时失去了光彩。民意测验表明，超过半数的人对这位第一夫人表示反感。

尽管克林顿在每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中大肆吹捧希拉里是“出色的妻子、称职的母亲、杰出的第一夫人”，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各大报纸却登出了独立检查官传唤希拉里出庭作证的消息。希拉里对此泰然处之，她公开表示对出庭作证毫无畏惧，并且愿意与那些找麻烦的议员们辩论，同时为自己进行辩护。

1月26日，身为美国第一夫人的希拉里出席了联邦法院的听证会，就白宫重新出现当年的律师帐单一事进行了答辩。在长达4个小时的质询中，希拉里面带微笑，发誓对上述事情一无所知。虽然她只是作为证人出庭答辩，并未受到起诉，但作为在任总统的夫人出庭作证，这在美国历史上还绝无仅有。这次听证会的内容没有公开，但似乎没有抓到希拉里的什么把柄。

不久，希拉里刚刚完成的一部谈论青少年问题的新著又起事端。该书还未上市，外界就风传此书是第一夫人剽窃他人之作，除封面署名外，整部书都是别人的作品。希拉里费尽口舌仍难以平息外界传说。白宫为此不得不向记者出示克林顿夫人的手稿原件，同时承认在该书拟订选题和提纲，以及成书过程中，确实得到过别人的帮助，但真正写成此书的还是希拉里本人。由于公众对希拉里在“白水事件”中的“诚信度”持怀疑态度，于是涉及第一夫人的各种传闻统统让人难辨真假，这为克林顿夫人不断带来麻烦事。

就在第一夫人出庭后不久，阿肯色州小石城的联邦法官霍华德要求克林顿为“白水事件”有关的一桩案件出庭作证。小石城联邦法院正在审理与“白水事件”有关的一桩案件，被告是现任州长吉姆·塔克和麦克杜格尔夫妇，他们均是克林顿夫妇当年经营房地产时的合伙人。

法庭指控被告在80年代曾合伙获取数百万美元的非法贷款。前小石城市政法官大卫·黑尔还指控已经离异的麦克杜格尔夫人苏珊。他说，克林顿等

人向他施加压力，要他向苏珊非法提供由政府担保的 30 万美元贷款。苏珊因公司倒闭而无法偿还，她因此被指控犯有诈骗罪。黑尔已因其他罪行被判刑，他是白水一案的重要证人之一。

面对指控，苏珊首先提出让克林顿为其作证的要求，她声称克林顿是唯一能证明她无罪的人。联邦法官批准了这一要求，同时向总统发出传票。按照美国法律，克林顿完全可以拒绝出庭作证，但这样做会引起众多猜疑，反而对克林顿不利。因此，克林顿的律师马上发表声明，表示总统将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合作。

1996 年 4 月 28 日，克林顿以证人身份在白宫通过录相为上述案件作证。白宫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总统在此案中是证人，他未受到任何刑事指控。联邦法官命令暂时封存作证录相，并禁止公开克林顿作证的内容。这部作证录相将留待陪审团调用。

## 六、案情未有穷期 九六大选看好戏

“白水事件”已经沸沸扬扬地折腾了近4年，然而许多关键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克林顿夫妇当年在阿肯色州的地产经营、律师服务和竞选活动中，是否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大量私利？是否逃税？是否使用非法资金？克林顿当上总统之后，是否指使干扰对“白水事件”的调查？福斯特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他的死到底与“白水事件”有无关系？所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几乎全都没有明确的结论。

那些当年在白水地产交易活动中与克林顿夫妇交往密切的合伙人，几乎全都走上了被告席，有的已经被判有罪。那些参与阻挠调查“白水事件”的政府高官纷纷落马，福斯特更是搭上了性命，唯独克林顿夫妇始终没有被起诉。这桩马拉松式的案件依然让人感到迷雾重重。

伴随着“白水事件”，“旅行门事件”，桃色官司也同样紧紧缠绕着克林顿夫妇。他们的个人品德和在公众中的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他们的家资也被消耗殆尽，几近破产的边缘。

美国的纳税人也付出了代价。据官方统计，仅用于“白水事件”的调查费就已花费了近2000万美元。这其中，仅独立检查官罗伯特·菲斯克在任的几个内，就花掉了近600万美元用于调查。斯塔尔继任后的花费更是远远超出上述数字。看来这个无底洞还要继续填下去。

1996年正值美国大选年，克林顿千方百计调整策略，力图重新树立形象，争取连选连任。民主党更是上下一致，拥戴克林顿出马。克林顿的崇拜者甚至以他为原型，拍摄了一部名为《美国总统》的故事片，为其歌功颂德。

然而就在此时，一部名为《原色》的匿名小说轰动了美国朝野。小说以当年克林顿竞选总统为背景，以总统夫妇为原型。书中主人公杰克·斯坦顿州长同样有一位精明而又专横的妻子，他在这位妻子的帮助下不择手段地爬上了总统宝座。

小说内容是虚构的，然而却处处能让人找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主人公斯坦顿沉迷女色，道德沦丧，在政治道路上不择手段。书中一名黑人律师透露的许多内情，让人感到简直就是克林顿竞选内幕的大曝光。这位律师让人联想到克林顿的白宫助手斯特凡·诺普洛斯，甚至有人猜测他就是该书作者，以至这位白宫大员拼命赌咒发誓，一面断然否认与此事有关，一面发誓要找出真正的作者。

在美国，政治小说并不少见，作者唯恐不能出名。这部小说处处影射当今总统，作者似乎知道许多内情而又隐姓埋名，实在耐人寻味。他似乎提示世人，总统确实隐瞒了什么秘密，而两党人士也拼命想从书中找出某些事实依据，以便能查明作者的线索。人们一致认为，作者很可能就是克林顿的亲信。但这名背叛者抛出此书的目的却不得而知。现在，这部小说已经成了美国政客们的案头书。

到本文结束时，对“白水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之中。也许，克林顿夫妇根本没有问题，但从目前已知的情況看，这点似乎不大可能。从另一方面看，精明的克林顿夫妇毕竟是法律专业的高材生，而且从业律师多年，他们对美国法律的罅隙了如指掌，要想脱却法律干系，设法隐瞒事实而又不让人抓到尾巴是完全可能的。这一点，他们也确实已经做到了。因此，“白水事件”也许永远是个弄不明白的糊涂案。

其实，“白水事件”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典型体现，一桩经济案在政客们手中翻炒成了没完没了的政治事件。随着大选日益临近，美国两大政党的揭短大战必将日益白热化。也许后面还会爆出惊人的冷门，重现智者千虑的覆辙。也许克林顿能够绝处逢生，顺利连任美国总统。此番究竟鹿死谁手，看来好戏还在后面。“白水事件”前景如何，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

（孙安坚撰稿）

